

阎稚新

LI DA ZHAO AND
FENG YU XIANG

李大钊和冯玉祥

解放军出版社

李大钊和冯玉祥

阎 稚 新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4988



解放军出版社

1114938

李大钊和冯玉祥

阎 稚 新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¹/₈印张 22万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3185·61 定价, 2.40元(平)
3.70元(精)

前 言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在领导五四运动、创建党的组织、领导人民革命运动、促进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历史功勋，是众所周知和举世公认的。然而，在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钊同志在倡导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同时，曾以巨大的精力致力于军事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成为我党最早从事军事活动和军事工作，开创中国军队革命政治工作的先驱者之一，并且他还亲自担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这方面的杰出活动和丰功伟绩，由于历史的原因，尚缺少发掘和系统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环节而鲜为人知。

冯玉祥将军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将领、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然而，冯玉祥将军由一个旧军人，转变为一个爱国民主将领，走上革命道路，却与李大钊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也是人们知之不多的。

近年来，笔者由于参加编写军队政治工作史，及主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的需要，有幸涉猎了近万件、上亿字的珍贵档案文电和历史资料。其中不仅有我党的文件，而且有共产国际和苏联国防部档案中保存的驻冯玉祥部苏联顾问的一手材料；不仅有大钊同志的书信、报告、文集，而且有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

刘伯坚等同志的言论和资料；不仅有早期的《国民军史稿》、《国民军革命史初稿》，而且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陈毅等同志的回忆文章；不仅有冯玉祥的亲属和当时的亲历者提供的资料，而且有冯玉祥的亲笔记载。大量的文献和资料证明，大钊同志早在建党之初和北伐战争时期，作为党的历史任务在北方战场从事军事活动，开创军队革命政治工作，为结成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而冯玉祥自驻节南苑，发动北京政变，组建国民军，访问苏联，南口大战，直至五原誓师，策应北伐，会师中原，都息息相关于大钊同志对他的影响、推动和指导。至于刘伯坚等同志，陪同冯玉祥由苏回国、五原誓师、创建国民军政治工作和培训大批军政人才的历史性作用，在资料中也有不少记载，同样是非常珍贵和有研究价值的。

为了响应李大钊研究规划，笔者遵循周恩来同志生前倡导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的原则，写了这本小册子，试图透过李大钊、刘伯坚、邓小平等同志与冯玉祥之间的深情厚谊与合作关系，探讨大革命时期党在北方的军事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若干侧面，以缅怀大钊同志在军事工作领域的杰出活动和不朽功勋。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蒙陈悦同志加工修改，特表示谢忱。由于史料和水平所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为了抛砖引玉，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敬请史学界的前辈、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一、李大钊、冯玉祥南苑会谈与冯玉祥转向革命	(1)
1. 党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纲领与李大钊的革命活动	(1)
2. 李大钊、冯玉祥南苑会谈	(11)
3.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秘密联盟	(15)
4.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冯玉祥北京政变	(21)
二、国民军的兴起与党的“联合国民军”方针	(33)
5. 国民军在北伐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33)
6. 党“联合国民军反对段张”的方针	(37)
三、李大钊说服冯玉祥经营西北边陲	(46)
7. 冯玉祥政治受挫与被迫下野	(46)
8. 李大钊劝说冯玉祥西北屯垦戍边	(49)
四、李大钊、冯玉祥协议创建国民军政治工作	(55)
9. 李大钊为冯玉祥疏通国际关系与促进苏联援冯	(55)
10. 冯玉祥委托李大钊领导国民军政治工作与创办西北军干校	(60)
11. 李大钊、冯玉祥与“五卅”运动	(65)
五、李大钊与胡景翼和国民二军	(71)

D. K. S.

12. 李大钊、胡景翼北京会晤与开封会谈·····	(71)
13. 李大钊帮助国民二军与王若飞创办北方 联合军校·····	(79)
14. 李大钊领导和开展河南工农运动·····	(83)
15. 李大钊二赴开封与力挽中原危机·····	(86)
六、李大钊策动郭松龄联冯倒奉·····	(92)
16. 全国革命高潮与党的反奉统一战线·····	(92)
17. 李大钊策动郭松龄倒戈反奉·····	(97)
18. 郭松龄、冯玉祥反奉密约·····	(99)
19. 郭松龄直捣奉天与国民军击破李景林·····	(105)
20. 郭军功败垂成与李大钊悼念郭松龄·····	(111)
七、党援助国民军大沽抗日与“三一八”惨案·····	(125)
21. 直奉“讨赤联军”与党的统一战线主张·····	(125)
22. 日舰炮轰大沽口与国民军英勇反击·····	(128)
23. 人民群众反对英、日、张、吴运动与 “三一八”惨案·····	(133)
八、李大钊、蔡和森、刘伯坚配合争取冯玉祥·····	(141)
24. 李大钊亲自安排冯玉祥出访苏联·····	(141)
25. 冯玉祥在苏联参观访问·····	(147)
26. 蔡和森、刘伯坚对冯玉祥的争取工作·····	(155)
27. 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会见冯玉祥与 斯大林援冯决策·····	(160)
九、李大钊制定进军西北的战略方针与敦促 冯玉祥回国·····	(168)
28. 南口战役及李大钊分析其失败原因·····	(168)

29. 李大钊敦促冯玉祥回国与进军西北的战 略方针	(175)
30. 冯玉祥决心回国重震军威	(177)
十、李大钊、刘伯坚帮助冯玉祥五原誓师和开拓 国民军建设新局面	(183)
31. 刘伯坚帮助冯玉祥五原誓师	(183)
32. 刘伯坚库伦报告与党的国民军工作方针	(189)
33. 李大钊、刘伯坚和国民军政治工作新局面	(197)
34. 李大钊提出“同甘、援陕、联晋、图豫”的 行动方针	(199)
十一、李大钊联络阎锡山援冯反奉	(202)
35. 阎锡山参加“讨赤联军”反冯的历史经过	(202)
36. 党的“联合阎锡山”与“四省联合抗奉” 方针	(206)
37. 李大钊争取阎锡山联冯反奉	(208)
十二、冯玉祥西进援陕与解围西安	(213)
38. 杨虎城、魏野畴与西安保卫战	(213)
39. 冯玉祥进军陕西与西安解围	(220)
十三、共产党人帮助冯玉祥建立西北革命政权	(224)
40. 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军政府——国民军 联军驻陕总司令部	(224)
41. 西北最高政权机关——国民军联军总部 及其军政实施	(226)
十四、党领导创办“第二黄埔”——中山军 事学校	(233)

42. 中山军事学校与北方“军校网”	(233)
43. 革命熔炉——中山学院	(236)
十五、李大钊为“组织共产党军”而斗争	(239)
44. 李大钊直接领导的“张兆丰师”	(239)
45. 邓小平、史可轩共建的“许权中旅”	(242)
46. 党掌握着连队官兵的“石谦旅”	(244)
十六、李大钊敦促冯玉祥出兵长安、会师郑州	(248)
47. 李大钊密函建议冯玉祥出师东征	(248)
48. 冯玉祥誓师西安与会师郑州	(250)
十七、冯玉祥率国民军官兵痛悼李大钊	(252)
49. 李大钊英勇就义	(252)
50. 西北军民痛悼李大钊	(256)
十八、党对冯玉祥将军的历史评价	(259)
51. 党中央领导同志对冯玉祥的评价与赞扬	(259)
52. 党和中央领导同志对冯玉祥亲属的关怀	(263)
53. 冯玉祥将军的亲笔遗嘱	(269)
54. 历史地看待冯玉祥走过的一段弯路	(273)
结束语	(281)
附录：《李大钊和冯玉祥》大事记	(285)
注释	(299)
后记	(309)

一、李大钊、冯玉祥南苑会谈 与冯玉祥转向革命

1. 党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纲领与 李大钊的革命活动

邓小平同志说：学理论、学哲学，还要加上学历史。很多问题，不学历史，认识就不全面，学了历史，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不那么明确的就明确起来了。历史确实是最有说服力的”^{〔1〕}研究李大钊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我国北方地区，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革命运动，影响和推动冯玉祥转向革命，在国民军中开创革命的政治工作，不能不首先弄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前前后后的历史背景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兴衰；否则，就很难理解那时的许多社会政治现象及其来龙去脉。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虽然名为共和国，但实际上继续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统治，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九一二年三月，北洋军阀的头目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从此，中国就沦为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和混乱时期。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在广大人民的讨伐声中垮台。由于袁世凯的死，帝国主义失去了在华的总工具，他们

开始各自扶持一派或几派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从此，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和奉系，分别以段祺瑞、冯国璋（曹錕、吴佩孚）、张作霖为头子，形成了三大军阀集团。此外，还有晋系、滇系、桂系、川系等许多地方军阀。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在各个帝国主义支配下，长期割据争斗，互相抢权夺地，造成了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一九二〇年上半年，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暗中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并联合西南地方军阀，利用“五四”运动后全国人民反对亲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有利时机，发动了对皖系军阀的战争，即“直皖战争”。结果皖系战败，皖军大部被打垮，皖系内阁倒台，段祺瑞下野，直奉二系军阀集团控制了北京政权。直皖战争的结果，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得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失利。

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它在直皖战争中的失败，极力扶植它的另一个工具奉系军阀张作霖。于是，又发生了一九二二年四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一九二四年九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在这些战争中，各个军阀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他们之间的地盘你吞我噬。到北伐战争前夕，形成了三大军阀力量：一是英美扶植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二十万，盘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及陕西东部，控制着交通干线京汉铁路；二是亲英、美的原直系军阀孙传芳，拥兵二十万，占领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和上海地区；三是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三十五万，控制着东北三省、河北、山东及京津地区，操纵着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北段。这三大军阀在其帝

国主义主子的支配下，实行封建专制统治，残害革命党人，镇压工农运动。他们以“武力统一”为号召，发动连年不息的内战，造成了工业凋蔽，农业破产，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据估算，由于军阀混战频繁进行，军费支出逐年增加，北京段政府的军费支出竟占财政支出的70%左右，地方军阀的军费支出，有的多达该地财政支出的94%以上。仅就北京政府的军事预算来说，五四运动前夕的一九一八年达两亿零三百万元，为辛亥革命前夕一九一〇年一亿零二百万元的一倍。

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军阀们不仅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大借外债，而且对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他们巧立名目，增加捐税，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什么印花税、烟酒牌照税、验契税……等等，尤其各种附加税，名目繁多，自由加征，毫无限制。一九一五年，仅田赋附加税就增加了七百八十八万三千六百七十元；到了一九一九年，人民负担的附加税超过正税数倍。除田赋税外，其他各税也成倍增长，以一九一六年与一九一三年相比较，烟酒税增加了三倍，印花税增加了六倍，甚至连学生的毕业证书和入学志愿书也要贴印花。可见，军阀们伸向人民的吸血管是无孔不入的。

军阀们在混战中，还大肆对人民进行残酷掠夺和血腥屠杀。他们所到之处，抢夺财物，奸淫妇女，搜杀人民，无恶不作。一九一八年三月，直系军阀进入平江时，沿途烧杀奸淫，事后仅在一个山洞里就发现气息奄奄的妇女三百人。后来，军阀张敬尧进入平江，宣布三日不封刀，野蛮残杀无辜人民。

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族危机和人民灾难日益深重，全国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挽救国家的危亡，纷纷起来进行反

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就成了中国革命打击的主要对象。

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仍在坚持斗争，但是，他们对封建军阀势力的反动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幻想依靠这一派军阀去打倒那一派军阀，企图这样来推进革命事业，结果一再失败，苦于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事业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开辟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列宁领导下，揭露了华盛顿九国会议加紧争夺远东和重新瓜分中国的侵略阴谋，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主要敌人，明确了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征询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否可以合作的意见。他还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其他革命力量共同斗争，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的精神和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国内各阶级的动向，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明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斗争口号。这个文件还主张共产党、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团体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向帝国主义

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眼前的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共同的敌人——本国的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为此，“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责。”党的“二大”文件，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真正的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口号，吹响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战斗号角。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工作的李大钊同志，在我国北方地区对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展开了积极的广泛的宣传，并领导工人、农民、学生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群众运动。

大钊同志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和文章，系统地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北洋军阀互相混战、祸国殃民的罪恶。他指出：“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就是由于被“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蹄下面”，才“沦降于弱败的地位”。强调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他根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马列主义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要实现真正的“平民政治”，完全打破政治上、

经济上、社会上的特权阶级，首先必须打倒封建军阀的统治，“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

大钊同志同对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批判了“不干涉政治”的论调，指出那是“任军阀残暴而不敢抵御……间接延长军阀统治的寿命”。他指出：“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的障碍”，才是解救人民苦难挽救国家危难的唯一办法。他说：“被压迫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是“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的“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大钊同志响亮地号召：“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

大钊同志还广泛地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十一周年纪念日，大钊同志指示中共北京地委，组织了数千工人、学生反对封建军阀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散发了中共北京地区委员会的《敬告国人书》和《敬告劳动者书》。这是讨伐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檄文，它宣告：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致死命的敌人”。指出：只有“打倒军阀和作军阀账房的政府”，打倒“中国太上政府”的国际帝国主义，才能救中国。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篇文告还明确提出实行“暴力革命”的思想，强调“惟有枪才能对付枪，惟有暴力才能打倒暴力”，“惟有‘革命’是救中国的方法！”在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农民运动开始兴起，学生运动也伴随着工农运动高涨起来了。

李大钊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作为我党早期的统一

战线的倡导者之一，曾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两下广州，三赴上海，四跨长江，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和国民党的“一大”，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加速中国反帝反封建大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为影响和推动冯玉祥转向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实行革命统一战线和政治合作的主要对象。早在一九一九年，李大钊就和孙中山有过接触，并且经过后来频繁的访问会谈，建立了真诚的革命友谊。李大钊对孙中山非常钦佩，认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总是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到他家作客，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2〕}

一九二二年八月，孙中山因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被迫由广州避居上海。这是他一生中屡遭挫败中最惨重的一次打击。正在孙中山陷入极大苦闷、一筹莫展之际，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谈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民主统一战线问题。经过多次会谈，孙中山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决定改组国民党，作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接着，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九月，孙中山为改组国民党进行准备，召开有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干部会议。李大钊参加了国民党改组计划的研究工作。

事后，李大钊在回忆当时与孙中山会谈情况时说：

：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

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小时，当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3〕}

上海会谈之后，李大钊和孙中山、廖仲凯等，共同筹备和主持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对此，李葆华同志回忆说：

从一九二二年底到一九二四年初，父亲经常不在北京，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为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工作。早在建党初期……父亲受党委托，负责同孙中山先生联络，本着既联合又斗争的精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由于父亲和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迅速发生转变，开始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依靠少数地方军阀不成，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正式确定了“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父亲被孙中山指派为这次大会的代表，并担任大会的重要领导工作。^{〔4〕}

中共中央对李大钊在统一战线方面的杰出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

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5〕}

大钊同志在一开始领导北方党的工作时，就十分重视军事斗争和军队工作。早在一九二四年，大钊同志就以他的远见卓识，明确提出了共产党直接抓军队和建立革命武装的思想。当时，他在动员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时，就深有体会地讲道：“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他说：“我们党要建立革命军队，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非常需要懂军事的人。”^{〔6〕}这个杰出的思想，是他以前的“惟有枪才能对付枪”的暴力革命思想的具体发展。大钊同志在这前前后后的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和军事工作，无疑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曾经利用他在国内外的崇高声誉，在北洋军队中，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和军队保持着联系，作过很多工作。为了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开展党对军队的工作，他在一九二二年夏曾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在吴佩孚的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工作，并派共产党员到吴佩孚企图控制的京汉、京绥、京浦、京奉、陇海、正太六条铁路工作，不仅使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而且对以后国民军的作战行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还曾派陈毅同志入川，去做争取杨森部队的工作。大钊同志也十分重视为我党培养军政人才。他在保定军官学校建立了党支部，派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担任教官。他输送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及其武汉分校，冯玉祥的西北军干部学校、广州和武汉的农民讲习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等国内外学校去学习，为我党培养了许

多建党、建军的优秀人才。大钊同志那时在军事活动中播下的革命种子，在当时的大革命中和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这期间，大钊同志对冯玉祥国民军的艰巨工作。这是大钊同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军事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钊同志革命历史中光辉的一页。

对于大钊同志在北方地区的工作和对国民军的工作，党中央给予了正确的评价。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在全面评价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勋时，指出：

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1〕}

薄一波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斗争历史时，对大钊同志从事军事活动和抓军队工作，也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

我研究过李大钊的历史。大革命时期，他在军队里，在北洋军阀里头，他很有些工作，他在军队里头联系的很广泛。比如说，冯玉祥在北京有过一个举动，搞过历史上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他把曹锟、吴佩孚推倒了，把溥仪皇帝赶走了。北方党在那时候，对于军队啦，武装斗争啦，在里边是有活动的，特别是李大钊同志是有活动的。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个国民军——国民一军、国民二军、国民三军的成立，不能说和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活动没有联系。特别是冯玉祥再次兴

起，从苏联回国后，又搞了个五原誓师，而五原誓师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北方党和李大钊活动的重要成果。

薄一波同志还说：

冯玉祥等人的国民军，所以能从北洋军阀里分化出来，是我们党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李大钊和他领导的北方党起了很大的作用。^{〔8〕}

不难看出，薄一波同志对大钊同志的评价与党中央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本书在研究大钊同志在国民军中的工作时，就是以此为基本依据的。

2. 李大钊、冯玉祥南苑会谈

一九二二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大钊同志在积极开展群众革命运动的同时，也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他和北方党利用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向具有民主倾向和处于逆境的冯玉祥开始进行争取和联络工作。

大钊同志这个正确的抉择，是有其客观依据和有利条件的。

首先，大钊同志不仅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早在辛亥革命和滦州起义时，就与冯玉祥结下了革命友谊。最近，王占连所写的回忆文章提供了重要史料。他说：

李大钊与冯玉祥早已结下了革命友谊，远在辛亥革命首义后，经天津政法专门学校白毓昆老师介绍，李大钊、冯玉祥一同参加了中国同盟会。

一九一二年一月，以白毓昆（白雅雨）为首，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李大钊在北方发动了反清的滦州

起义。为准备这次起义，李大钊曾协助白毓昆在滦州、雷庄一带进行调查联络。起义后宣布了北方革命军的成立。冯玉祥任总参谋长，白毓昆任参谋长。不久，起义军因遭到曹锟统率的新军第三镇的堵击，双方在雷庄激战而失败。白毓昆在古冶被捕遇难，王金铭，施从云英勇就义。通过这次起义，李大钊与冯玉祥的革命友谊更加深厚。^{〔9〕}

大钊同志的崇高威望与他同冯玉祥的深厚友谊，无疑会受到冯玉祥的信任。这是大钊同志进行工作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次，冯玉祥与吴佩孚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当时，冯玉祥正受到吴佩孚的排挤，处于困难的境地，正需要帮助。大钊同志巧妙地利用了冯、吴矛盾，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

冯玉祥原系北洋军阀直系将领，曾任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第一次直奉战争前，任陕西省督军（按：一省的军政长官）。一九二二年八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调任河南督军。他到开封任职后，一面招募新兵，扩充和整顿自己的军队，一面对地方事业也进行了积极实施。当时驻扎在洛阳的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很久以来与冯政见不合，对冯心怀忌恨，深感冯在河南是自己的一大障碍，对冯蓄意排挤打击，处心积虑地要把冯搞掉。

冯玉祥的亲身回忆《我的生活》，记录了他和吴佩孚在这期间的几次冲突：

一是冯玉祥拒绝为吴筹款。有一次吴佩孚发来电报，要冯在河南为吴筹措八十万元款子，并且要求以后每月划拨二十万元，冯当即拒绝。冯玉祥在忆文中说：

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我连思索也没有，马上复电说我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钱，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他接我这电，更把我恨入骨髓。

二是吴佩孚拒绝采纳冯玉祥的省刑薄税条陈。冯写道：

我原先是希望吴佩孚往好道上走的，曾经很诚恳地对他上了二十条条陈，详述我对省刑薄税爱民爱国的意见与办法。但他觉得没有恭维奉承他，不但不被接纳，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

其实，吴佩孚是一个爱财如命，残酷成性的封建军阀，他对省刑薄税自然毫无兴趣，绝不是说几句恭维话就可以使他采纳的。

三是在冯拒绝为吴筹款后，吴佩孚威逼当时任总统的黎元洪把冯玉祥调出河南。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黎元洪下令调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并命令他三天之内把部队调赴新任。冯接到命令后，当即率领所属部队开拔北上，驻扎北京南苑，并将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南苑航空署旧址。

四是吴佩孚克扣冯部军饷，使冯玉祥的部队陷入粮匱饷乏的境地。在冯部从河南开拔时，吴佩孚假意答应每月仍由河南拨助二十万元军饷。但是，在冯部离开河南后，吴佩孚就把他的诺言抛到了九霄云外。同时，仰承曹锟、吴佩孚鼻息的北京政府，不敢将吴虎须，也不为冯部筹款发饷，致使冯部陷入困境。在《我的生活》中，冯玉祥将军深有感慨地说：

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

我们全体官兵多年在饥困之中挣扎，幸赖上下一

心，艰苦奋斗，得以自存。在河南两月，稍得喘出一口气，至此又重新陷入粮饷匮乏的境地。^{〔10〕}

大钊同志就是在冯玉祥遭吴暗算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冯玉祥到革命方面来，亲自前往南苑同冯玉祥进行了会谈。李大钊是北京著名教授，又是滦州起义时的战友，冯玉祥对他的才学品德非常敬慕。李大钊对冯玉祥的爱国言行也很钦佩。李大钊到达南苑后，冯玉祥及其左右对他极为敬重，尊为上宾，两人交谈十分投契。当时北京政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焦点上，一是建立中苏外交关系，一是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的活动。他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这两个方面。李大钊向冯玉祥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热烈地谈到列宁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正式宣布同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同时还谈论了南方革命的形势和策略，赞扬了孙中山的奋斗精神，介绍中山先生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下，认真地总结了革命活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中国革命只有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才有成功的希望。冯玉祥也说起一九二〇年他驻扎汉口时，孙中山先生曾派他的秘书徐谦持中山先生的亲笔信，到汉口看望自己，表示希望“加强合作，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言谈中对孙中山的知遇之情，感激不尽。李大钊欣然说道：“孙先生在南方，冯检阅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协力效法苏俄，刷新政治，中国就有前途。”冯玉祥高兴地说：“教授一夕谈，胜读十年书”。^{〔11〕}

大钊同志此次主动访问陆军检阅使公署，并与冯玉祥成功地进行了南苑会谈，为在困境中的冯玉祥指出了一条出路，对冯氏后来实行军事政变，脱离北洋军阀阵营，转向革命，并同中国共

产党长期合作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3.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秘密联盟

一九二四年一月，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四月二十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李大钊任组织部长。后来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和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李大钊是北方执行部的领导人。一九二四年底，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书记。所以，在这一时期，大钊同志是共产党兼国民党北方地区的总负责人。

在此期间，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为了建立人民反直统一战线，加紧进行对冯玉祥及其部队的争取工作。同时，积极开展人民革命运动，“二七”惨案后一度陷入低潮的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又开始了新的高涨。当时，有两个较大的运动：一个是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总统后，全国人民掀起的反对曹锟及其帮凶吴佩孚的反直运动；一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群众运动。冯玉祥在大钊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以及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的影响下，他的思想更加倾向革命。

《国民军革命史初稿》记载中，有两件事可以说明群众运动对他的影响。

第一件事，是要求军阀裁兵的运动：

北京为“五四”运动之发源地，青年思想急进，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已成为革命民众一致之要求。其反军阀之发朕兆者，即主裁兵。冯甫抵京，国民裁兵

俱进会，即以裁兵意见询之。冯立即复电赞同……。

第二件事，是收回旅顺、大连运动：

十二年三月（按：一九二三年三月），旅顺、大连租期已满，政府本应根据条约，实行收回。所有军人，均应一致奋起，以为后盾。时全国民众团体，奔走呼号，义愤填膺；而各地学生，游行演讲，尤其热忱。冯氏当时正努力军事教育，与北京各大学相观摩，故与各大学学生团体之各科学者接触之机愈多，关系愈密。关于力争收回旅大运动，鉴诸民气之激昂，痛外患之日深，于四月一日，通电力争，誓为民众后盾。^{〔12〕}

对于这两件事，《国民军革命史初稿》的作者结语说，“足以激发冯军之良知”，比较恰如其分地说明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对冯玉祥的影响，使冯玉祥倾向革命。

由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反帝反封建军阀革命运动，特别是人民反直运动的开展，加速了军阀内部的分化。奉系、皖系军阀利用人民反对曹锟、吴佩孚的情绪，也扛起了反直大旗，与广东革命政府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冯玉祥本来早就对曹锟贿选为总统和吴佩孚的穷兵黩武、骄傲奸诈深为不满，怀有推倒贿选，廓清政治的想法，在全国反直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推动下，对曹、吴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大，秘密地与奉、皖两系，联络反直。他曾与奉系代表郭瀛洲会谈，表示：“苟能利国富民，弭国内无意识之争，祥虽不敏，愿随海内贤豪共图之。”^{〔13〕}当时，段祺瑞蛰居天津，曾与山东督军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联络倒直，冯玉祥派参议刘子龙，前往接洽，互通声援。

与此同时，冯玉祥与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建立了联系，孙

中山曾派秘书徐谦北上劝冯实行革命。但是，冯玉祥自感势力孤单，实力有限，不敢冒险行动。他秘密地联络胡景翼、孙岳，积极准备推翻曹、吴统治，进行政变的准备工作。

《国民军革命史初稿》记载了冯玉祥当时的情况和意图：

中山先生选派民党同人访冯氏，告以与段张（按：段祺瑞、张作霖）联络之情形，并促冯氏早日举行革命……。十二年（按：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马伯援来谒于南苑。冯即告之曰：‘直系兵力，数倍吾人，冒险盲动，终必失败。稍待则济，不必急之，我终要举行革命，请转语中山先生及季龙（按：中山先生秘书徐谦）。’观此可知冯氏与中山先生之关系，及首都革命之酝酿也。

冯氏预备革命之外援虽定，然其实力仅一师三旅，究属有限，势不能不图谋结合真正之革命同志。时北方军人，于直系势力范围内，有革命意志与革命历史者，莫过于胡景翼、孙岳二人。故欲发动革命，首当结纳胡、孙，以共策进行。^{〔14〕}

可见，冯玉祥已定下了革命的决心，并开始联络胡景翼和孙岳。《国民军革命史初稿》当然不可能谈到大钊同志对冯玉祥的帮助，但是大钊同志身兼国共两党的要职，国民党对冯的联络，是不能避开大钊同志的。

冯玉祥之所以与胡景翼、孙岳结成反直同盟，是有其渊源的。

胡景翼，系同盟会老盟员，曾响应辛亥革命，举行耀州起义。二次革命失败后，曾会晤中山先生，深受中山先生革命之影响，在陕西重树旗帜，建立军队。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将胡部

改编为师。胡以冯的治军方法，训练部队，与冯结成了深厚友谊。吴佩孚知道胡的革命历史，深怀疑惧，阴谋收编胡的部队，而且经常克扣胡部粮饷，使胡部陷入困境。

孙岳也是同盟会老会员，而且是冯玉祥在滦州起义时的老同志，平日情谊较深。曾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失败后留居太行，与胡景翼结识。曹锟任直隶督军时，聘孙岳为顾问，后任命孙为教导团团长。直皖战争时，孙屡建战功，但是，却遭到吴佩孚的忌妒和排挤，多年来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得不到重用和提升，因此郁郁不得志。

关于冯、孙之间的历史关系和孙岳与曹锟的矛盾，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记载说：

我们曾共谋滦州起义，自那时订交，多年来往来无间，不但私人交谊深厚，在革命主张上亦志同道合。

民国既立，曹仲珊把他（按：指孙岳，当时任曹锟部第三镇参谋官）视为洪水猛兽，百般排挤，使之不能立足。^{〔15〕}

从以上可以看出，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结成联盟是有其共同基础的。他们都是同盟会的老会员，都具有一定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倾向，而且都受到曹锟、吴佩孚的排挤。同时，他们之间早就结下了较深的友谊关系。对于这一点，《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也说他们是“处境同，困难同，而革命之志亦同”。^{〔16〕}

关于冯、胡、孙结成反直同盟的过程，《国民军革命史初稿》和冯玉祥《我的生活》均有记载，但是，两者内容不尽相同。我们不妨先把《史稿》关于冯、孙密谈的记载，抄录于后，供研究参考。

一日，（孙）访冯于南苑，冯延之昭忠祠草亭，屏去左右，冯指阵亡将士坟墓，故以言挑之曰：“阵亡官兵为国捐躯，能落得一个忠字，已是千古矣！孙二哥你死之后，人将以何字谥汝耶？”孙坦然曰：“一般革命党人，当然以军阀走狗之头衔相赠也。”冯曰：“尔镇守一方，统兵数千，为何甘作人之走狗？”孙莞尔曰：“岂仅我带兵数千之人为然，不犹有带兵三四万之人，甘为人做走狗耶？”冯问其人是谁？孙曰：“即尔冯焕章是也。”冯叹曰：“方今曹吴专政，总统亦以贿选告成，又主武力统一，穷兵殃民，流毒海内，我辈坐视，深感疚心！倘有为民请命者，甚愿执鞭负弩，以为前驱！”孙曰：“直系倒行逆施，失败之期，当在不远，倘有机可乘，我辈当行其素志。”冯曰：“奈兵力单薄，与曹吴较甚悬绝何？”孙曰：“胡笠僧（按：即胡景翼）亦富于革命意思者，吾可往说之。”冯曰：“吾固知笠僧为救国之士，已与有相当之联络矣！”^{〔17〕}

这篇记载详细而又富有戏剧性，我们虽不能直言说它不真实，但考虑到冯与孙是老关系，而且交往很深，完全可以真诚直率地交谈，何必如此旁敲侧击进行试探！若与冯玉祥回忆相较，更可以看出其中的问题。冯玉祥所记，是他亲身经历，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其真实性，无疑应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依据。

据《我的生活》所记，冯玉祥是先联络孙岳，然后通过孙岳去联络胡景翼。与孙订盟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冯玉祥在南苑召开“追悼阵亡官兵大会”时。会谈的地点是南苑昭忠祠草亭。对于会谈的情况，冯写的非常详细。

我和孙二哥多年相契，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说着话，已走到坟地中间一座草亭跟前，即同进去坐下。我于是正式说道：

“目前闹到这个局面，我想稍有点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所辖的虽然名叫一师三混成旅，但实际还不到三万支枪。处此境地，未可莽撞。但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账东西一股脑儿推翻，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我们创造民国的先烈？”

“焕章老弟！”孙二哥十分诚恳的和我说：“您若是决定这样干，我必竭尽力量相助。此外还有胡笠僧、岳西峰（按：即岳维峻）他们，也定然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我可以负责去接洽。”

我故意说道：“您提胡、岳他们！他们如今有了禄位，有了金钱，怕不见得肯和我们干了吧？”

孙岳说：“这个大大不然，我知道他们，比您清楚得多。他们现在河南，实际上是郁郁不得志，对曹、吴的作法，早已深恶痛绝。何况他们都是老革命党人，更何况他们和您有如此交谊。横竖直奉马上就要干了，我们有的是好机会。我先布置一个头绪，待机行事，必有把握。”

这段冯、孙会谈的描述，看出冯、孙是竭诚相见，快人快语，开门见山，揭示出了冯、孙、胡订盟的政治基础和个人情谊，完全不似《国民军革命史初稿》所描述的那样，冯、孙会谈是以互不信任的试探开始的。

经过孙岳的联络，大约过了两个星期，胡景翼派岳维峻来见

冯玉祥。他们在北京旂坛寺兵营进行了会谈。岳维峻转达了胡景翼的态度，表示愿意与冯、孙联合推倒祸国殃民的曹、吴政权。冯玉祥当即与岳约定三条盟约。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写道，

我说：“西峰弟，您既如此说，我们公是公，私是私，我也有几点意见，要和您开门见山地谈一谈：第一，吴佩孚为了打倒异己，为所欲为。对奉战事目前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吴若有命令给您那边，您万万不可接受。第二，我们须利用形势，相机而动。将来我们若果成功，必须迎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我们应当竭诚拥护。否则我们就是争权夺利，不是真正的革命。……第三，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我们既拿定了决心，此后当严整纪律，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帮助民众的地步，否则我们决不能成功！”

对这三条，岳维峻一一答应，说回去完全照办。过了几天，胡景翼亲自来见冯玉祥，两人进行了秘密会谈。胡景翼表示完全同意双方约定的三条，并强调说：“尤其孙中山先生主持大计的一条，是再好没有。”^{〔18〕}

至此，经过多次秘密会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方的思想豁然贯通，反直三角联盟已经形成，发动军事政变的基础已经奠定。

4.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冯玉祥北京政变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实现以来，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革命运动，特别是人民反直运动不断高涨，广东革命政府与奉系、

皖系结成反直联盟。在北方，大钊同志和北方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并且推动冯玉祥日益倾向革命，结成了冯、胡、孙联盟。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化，全国形势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

九月四日，皖系军阀残余浙江督军卢永祥受奉系军阀张作霖指使，发动了对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的江浙战争。九月十八日，张作霖率奉军十五万，响应卢永祥，进兵山海关。吴佩孚率兵二十万迎战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九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宣言》揭露了曹棍贿选总统以来十八条罪行；明确了江浙战争的性质“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指出“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在党的号召下，全国反帝反封建军阀和反直运动更加高涨。

对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有所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战争爆发之必然。

张作霖自十一年（按：一九二二年）夏为直军败后，退出关外，延揽军事人才，简练军实，增兵备战，设大规模之兵工厂，督造野炮重炮。两年之间，无日不卧薪尝胆，冀雪前耻。以无机可乘，乃保境安民，坐待时变。迨贿选告成，曹任总统，舆论哗然。孙中山先生宣布讨伐，浙督卢永祥，亦通电反对，并召号各省代表来杭，研究方法。张亦派员参与，相约战端爆发，东北

同时并举。

先是这年八月二十四日江浙战争爆发（按：此系卢、齐正式宣布决裂之日），这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奉张因急要声援势将败北的浙卢，即在热河、冀东一带向直军发动进攻。九月十三日京奉线交通断绝，十六日朝阳方面也开始动作。吴佩孚、王承斌奉曹仲珊（按：即曹錕）电召，于十七日到北京，十八日即对奉张下了讨伐令。^{〔19〕}

冯玉祥对曹、吴主战的态度，从开始就表示反对，曾当面向曹錕提出意见，遭到拒绝。后来又给吴佩孚写了一封长信，劝吴不要因为意气用事而以国家人民为牺牲，吴不仅不听，竟将原件退回，在信封写了“少说话”三个大字，冯玉祥气闷不已。

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吴佩孚委任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迫令进军热河，表面看来对冯是极端借重，实际上是“借刀杀人”的阴谋。

首先，从北京到热河一线，无舟车之便，运输困难，大军前进异常危险。冯玉祥说：

吴佩孚这次派我，表面是说古北口这一路关系重大，非劲旅不能胜任，实际是因此路遥远险阻，接济困难，意欲陷我部队于绝地。^{〔20〕}

第二，对于军饷、粮秣、子弹、服装，吴佩孚概不供给，要冯玉祥就地筹办。当时，秋尽冬来，塞外已是严寒天气，冯部官兵没有冬服，又无子弹补充。这样一支无衣无食的部队进军荒漠奇冷的塞外，无异于送死。为此，冯玉祥与吴佩孚进行了抗争。

命令既下，即须准备出发。为了给养的问题，我和

王怀庆特意找吴商议。吴的意思早就宣布，此次出兵，概不设兵站，粮秣饷项，统由各本军随地筹办。我说：

“这话恐怕行不通吧。路途这般远，这般难，假如还要自己筹办站，那不但妨碍了部队的作战，并且扰害地方，乡绅百姓全会被这一着得罪了。”

吴很轻松随便地答道：“兵站是用不着办的。你们只管走到那里吃到那里，不但自己省却许多麻烦，地方官绅也是万分欢迎的。”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吴答道：“这还用问吗？地方上官绅谁不愿意接办官差。他们花了五个，可以报十个，大发财源的事，谁也唯恐抢不到手。你只管开拔，不要顾前思后的。我在湖北、河南，都是这种办法，地方上欢迎，我们自己也省事。”

我说：“扰害百姓的话且不说罢。我走的古北口这一路，完全是荒僻的地区，往往一百里、八十里的没有人烟，我们自己向那里办粮去？你说的办法就说别路可行，我这一路也是万万不成！”

谈至此，双方僵坐，毫无办法。……我和王怀庆出来，王仰着头叹口气道：“我们这是死路一条啊！”^{〔21〕}

第三，不仅如此，吴佩孚还埋伏下了锦囊毒计。他在出发前暗嘱胡景翼监视冯军，如发现冯有异常行动，即行就地解决。他还发给胡机关枪五十挺，嘱咐胡说：“你拿这五十挺去打张作霖。打完了，留起来，还有用处。”这完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伎俩，其矛头指向冯玉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殊不知冯与胡早有密约，他的这番用意，胡景翼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冯玉

祥。

此事，《我的生活》亦有记载：

……除派王承斌同行，对我监视而外，复令胡笠僧率部相随，嘱咐他，如我有何异动，即就近解决。吴的用心真阴毒，在他要用我为他拼命的时候，仍然蓄意要把我们消灭。可是他万也想不到，胡笠僧会把话告诉我。所以他的阴狠，实是利令智昏而已。^{〔22〕}

由以上可见，吴佩孚的恶意在于：冯玉祥如能战胜奉军，他可一举两得，在冯胜张后再消灭冯；如冯不能胜奉军，则借奉军之“刀”消灭冯。

冯玉祥洞悉吴佩孚把他“置之死地”的阴谋后，曾向曹锟辞职，曹极力慰留。面对前唯死路、后无生计的绝境，冯玉祥只剩下一条出路，就是按照冯、胡、孙联盟的约定，相机发动北京政变。他在出发之前做了筹划和安排。

他向曹锟推荐孙岳为北京警备副司令。冯在《我的生活》中是这样记载的：

在这当儿，我打听的北京副司令之职尚是虚悬，我特意向曹仲珊推荐了孙二哥。曹不以为意，即由保定调孙二哥到京，任为警备副司令。后来孙二哥见了我笑道：“你特意把我弄来给你们开城门是不是？”我听了他的话，也不禁笑了。^{〔23〕}

冯委任亲信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一切事宜。同时留下一营精兵归蒋指挥以作内应。这个营只有一个连留驻旃坛寺，其余秘密分驻京外各处，必要时集中使用。

他还将从河南招募来的一万多新兵，编了三个补充旅，分别

由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担任旅长。这三个旅借口要进行军事训练，全部留驻北京，作为应援前线或其他必要的机动使用。

他在出发前，函请京兆尹刘萝庚，代征大车千余辆，运输粮秣；又向绥远都统马福祥借用骆驼三千匹，备山路运输。此外，他还分派刘治洲、邓萃英、刘之龙、张树声为密使，联络各方或侦察军政情形。

筹划就绪后，冯玉祥即令部队于九月廿一日出发。行军序列为张之江部、宋哲元部、刘郁芳部，冯玉祥自率李鸣钟部、鹿钟麟部。廿四日开拔完毕，冯玉祥进驻密云古北口。

当时，胡景翼担任援军第二路司令，待命通县。吴令其由喜峰口进军热河。冯派人请胡暂缓开拔以观变，胡同意。随后，冯胡订约于古北口。

孙岳担任京师警备副司令，有兵一团驻守各城门。冯、孙各派人来往奔走，联络密商发动革命，双方表示一致行动。

这时，段祺瑞派人送来亲笔信，大意表示不赞成内战，希望冯玉祥自处。以后，又劝冯玉祥倒吴。

同时，奉系张作霖派员来古北口，声明只要推翻了曹、吴，奉军不再向关内进兵。冯玉祥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二是奉军不得入关。奉方代表一一答应。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由古北口到达热河之滦平。其时，冯部官兵，饥寒交迫，前后受压，困难万分，军心激愤，大有“哀兵”之势。十月十九日，蒋鸿遇电告冯玉祥，吴佩孚在山海关督战连败，丰台驻军全部开赴前方，直军后方空虚。冯玉祥接电后，认为士气可用，班师时机已经成熟，当即召开全军将领会议，一致决定班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并拟定“国民军”

名称，预计廿三日占领北京。

对此，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写道：

“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当即秘密发信给胡笠僧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棚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芳、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名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2〕}

十月廿一日下午，冯玉祥下令班师。令后队鹿钟麟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他还下令胡笠僧星夜南下，攻下滦州、军粮城，截断京奉路，防吴西归。令李鸣钟率部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同时，令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部，限期班师。

二十二日，鹿钟麟如期到达北苑，与由北京出城的蒋鸿遇会合，分配和协调了行动计划。当晚八点，率部由北苑出发，午夜十二点驰抵安定门。此时，在北京城内的警备副司令孙岳已接到通知，当即下令守城部队大开城门，里应外合，接应鹿钟麟部队进城。举义部队顺利开进北京城内，首先接管全城防务，同时，将全城电话和电报线彻底割断，一切进占首都北京应完成的急迫任务，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统统办理妥贴。

第二天清晨，北京的通衢要道上，布满臂缠着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红布圆白字袖章的国民军岗哨和士兵。全城大街小巷贴满了国民军的安民布告和入城布告。市民们走上街

头，顿感气象一新，大家闪着惊喜的目光相望，并道“老冯回来了”。

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抵达北苑。第二天，与前来相会的胡景翼、孙岳，召集王承斌、张之江、刘骥、鹿钟麟、李鸣钟、何遂等二十余名高级将领，举行紧急军事政治会议，全体决议，正式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会议公推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

会后，冯、胡、孙及全体师旅长通电全国。通电宣告国民军的成立，表示“誓将为国为民效用”，“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社会贤达，急起直追，商补救之方，开更新之局”。同一日，国民军向全国颁布了《建国大纲》五条，表示“愿与邦人君子共同讨论”。五条是：

- 一、打破雇佣式体制，建设极清廉政府；
- 二、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
- 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实施，务求民隐；
- 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攘夺欺诈行为；
- 五、信偿必罚，财政公开。^{〔25〕}

紧接着，国民军下令悬赏购捕直系军阀吴佩孚。全文如下：

国民军总司令部赏格：查吴佩孚，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人神共愤。兹者，国民厌乱，渐趋和平，吴佩孚应如何激发天良，幡然悔悟。乃竟敢盘踞天津，拒不停战，并率领残部抗拒国军，驱人民于死地，作泄愤之私图。吾民何辜，屡受戕害；与国何仇，甘作孤注。此等

元恶凶顽，若不及早剪除，将何拯吾民而救吾国？兹特悬赏购捕。无论军民，如能各本义愤，将祸首吴佩孚死毙者，赏洋五万元，生擒者，赏洋十万元。储款以待，仰即周知。

国民军总司令 冯玉祥

国民军副司令 胡景翼

国民军副司令 孙岳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26〕}

国民军组成的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又在北苑召集高级将领开会，讨论政治改组，一致决议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成立“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据冯玉祥日记中载，会议向曹锟提出三个条件：“一，下令停战；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三，请他自动退位”。^{〔27〕}至此，曹锟不得不下令停战，免去吴职，调吴任“青海屯垦使”。

十月廿八日，冯玉祥又向全国发出召开和平会议的通电，历数军阀混战之危害，主张和平统一，提出“此后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国家建设计划，非一二人所能集中，亦非一二党派所能持。必须一国贤豪，同集京师，速开和平统一会议，将一切未解决问题，悉数提出，共同讨论。以多数人之主张为指归，以最公平之办法为究竟，期待最良结果，实力奉行，以免内争，以安邦本。”^{〔28〕}

十一月一日，曹锟见兵败涂地，不得不宣布辞职，被国民军软禁看管。就在这天，按照十月廿五日北苑会议决定成立“摄政内阁”，由黄郛任国务院总理。

摄政内阁虽然是过渡性的政府机构，但它成立之始便办了一

件辛亥革命未竟的历史遗案——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皇帝出宫。

辛亥革命成功后，在中国首都竟然还保留着一个清朝废帝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极大耻辱，而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一条祸根。

冯玉祥早在讨伐张勋复辟时，就极力主张扫除这个奇怪现象，铲除这个祸根，但当时未能如愿。班师回京后，决定采取驱逐溥仪出宫的断然措施。不意，清宫在内阁未讨论前预知此事，并妄图阻挠。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获悉后，报告黄郛，提出：事不宜迟，迟恐生变。黄郛连夜召开内阁紧急会议，首先将原优待清室条件予以修改，决定“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即日起移出禁宫”；同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善后事宜。紧急内阁会议还决定，由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国民党人李石曾，前往故宫执行。溥仪废帝即刻离开故宫，太监和宫女们也随之迁出宫外自选住地。至此，清朝的帝王制度残余宣告彻底复灭。

对驱逐溥仪出宫事，冯玉祥写道：

当日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用的东西迁出宫去……所有宫中的财物，都由……保管委员会接收之。事后有人造谣，说冯某攫取了多少宫中宝物云云，对于这种无稽的谰言，我都无庸辩解。……烟筒中冒烟，虽亦可使人眼迷，但不过一会工夫，仍现出清白的天空。这个谰言，终久也就自己消散了。^{〔29〕}

冯玉祥班师回京后的这段时间，还积极进行了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政的活动。十月廿四日，冯玉祥如约电请中山先生北

上主国政。廿七日，中山先生复电说：

义旗聿举，大慙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

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冯、胡、孙当即复电，请孙中山早日北来，指示建国方略，电文如下：

感电敬悉。辛亥革命，未竟全功，以致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役既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同深企盼。

十一月七日，冯玉祥请马伯援持亲笔信去广州，迎接孙中山北上。信中说：

爰于十月二十三日班师回京，并联合所属部队，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为国为民效用。先生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务希即日北上，指导一切。除请马伯援代表欢迎晋谒面陈外，特备此緘，以表微忱。^{〔30〕}

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宣言》复述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纲，提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装，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

在此期间，吴佩孚亲率所部反攻天津，结果在杨村被打败，遂率身边幕僚数人乘英国军舰，从天津走海路南逃。

北京政变是大革命时期具有重大影响和进步作用的一个政治事件。当时中共中央指出：这次政变“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表现军阀势力之崩溃，一是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开始形成”。^{〔31〕}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前后采取的一系列军政措施，如推翻曹吴政府、改革军队、主张和平统一、推行

民主政治、迎接孙中山北上、驱逐溥仪出宫等，无不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的要求，国民军的组建正是民族资产阶级武装形成的重要标志。

二、国民军的兴起与党的 “联合国民军”方针

5. 国民军在北伐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北京政变前后，李大钊对国民军进行了积极的争取工作，不仅推动了北京政变的发生，而且推动了国民军的兴起和发展。李葆华同志回忆说：

一九二四年底，北方地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实施，加快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促进了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大分化。

可见，北京政变正是在党的统一战线的巨大影响和李大钊的直接推动下实现的。李葆华又说：

父亲对争取国民军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亲自做冯玉祥及其手下的高级军官的工作。父亲还把一些同志派进国民军中去做中、下层官兵的工作。后来，国民军各军中有不少负责工作是共产党员担任的。^{〔32〕}

正是在李大钊和北方党的直接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的基础上，特别是随着北方革命运动深入广泛的发展，国民军得到迅猛扩大，由北京政变时的三个军、四万余人，很快达到七个军，三、四十万人的实力。同时，国民军各部所到之处，普遍成立军政府和政权机构，统一管辖地方行政事

务，其势力范围曾经先后扩展到我国北方和黄河流域十四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绥远、察哈尔、陕西、宁夏、甘肃、青海、热河、辽宁、山东、山西的广大地区。

当时，国民军三个军的发展情况如下：

国民军第一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除冯玉祥原属一师、三旅部队外，又招募新兵万余人，组成三个补充旅。杨村战役后，收编直隶败军万余人。绥远第一混成旅，由旅长郑金声率领由绥入京，归冯扩编成师。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时，将察省驻军三个旅，改编为国民军。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李鸣钟任绥远都统。从此，绥远、察哈尔两特区及京师地区，即属国民军第一军防地，共辖部队四个师、二个警备旅、五个混成旅、二个骑兵旅和炮兵旅、卫队旅各一个，还有军官教导团、炮兵教导团、机炮团各一个。

国民军第二军，系胡景翼部队，在改编为国民军时，胡自兼第一师师长，辖六个旅、两个炮兵团。岳维峻任第二师师长，辖二个旅、一个炮兵团。田玉洁任第三师师长，辖两个旅。从一九二四年底至一九二五年初，大钊同志曾亲自做团结胡景翼和帮助国民二军的工作（详细经过，本文将另章论述），使国民二军有了很大发展。后来，在河南又收编了吴佩孚属下的刘镇华、阚玉琨的部队，扩大到号称二十余万之众。

国民军第三军，军长是国民军副总司令孙岳兼任。北京政变时，孙岳在保定整编部队，除建制豫军外，辖四个师、三个混成旅、一个补充旅和一个混成支队。分别由何遂、叶荃、陈文钊、王为蔚为一、二、三、四师师长，徐卓增为建制军总司令。

一九二四年冬，在胡景翼被任为河南督办时，孙岳亦被任为

河南省长。当时，吴佩孚尚占据河南，国民二、三军均驻屯于河北。孙岳为帮助国民二军南下河南，首先任命何遂为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并兼前敌总指挥。何遂由保定出发时，仅带随从幕僚一百数十名，工兵一排，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抵达大名，将旧巡防八个营编为两个团，又增加炮兵、骑兵、辎重兵若干，组成第十五混成旅。此时，国民二军还在京汉沿线同吴佩孚部队对峙。何遂准备由河北南部一带渡过黄河，进迫开封，故先派部队进攻滑县道口。何遂驻濮阳，先锋部队前卫至兰封。十二月二日，何部进攻滑县道口，京汉路之吴军，即全部撤退到黄河南岸。何遂乘机分派三个支队进攻开封，开封之敌不支议和。十二月四日，何遂进入开封，当即以代理河南省长名义，布告安民。

至此，国民军在河南的势力已经牢固地确立了。

国民军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国民军在北方十四省市势力范围的确立，对北方深入工农运动和革命斗争，造成了非常有利的形势。大钊同志和北方党，利用北京政变的有利时机和冯玉祥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革命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北方的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当时，在国民军驻扎的直隶、河南及察绥地区，我党在群众中开展活动，他们基本上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中立态度。在北京，有时还争取了国民军大刀队以“维持秩序”为名，实际上保护群众的集会、游行，来对付段祺瑞军警的破坏和捣乱。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还通过与国民军的关系，救出了“二七”惨案以来被捕的工人领袖，恢复了“二七”以后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在很短的时期内，铁路工人运动重新发展起来。津浦、正太、陇海、胶济、京奉、京绥各路工会都恢复到“二七”以前的局面，京汉铁路总工会又重建起来。北京政变后，中

国共产党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又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召集国民会议。指出：挽救时局危机的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而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的国民会议；号召国民会议预备会应当急速在北京召开。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广泛开展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运动。

国民军的兴起、发展及其势力范围在十四省市的确立，还为以后的北伐战争，开辟了它的北方战场。

我国现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由南北两个战场组成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战争。^{〔33〕}

毛泽东的这一正确论断，既肯定了大革命在南方战场（长江流域）上的伟大胜利，又肯定了大革命在北方战场（黄河流域）上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过去对北方国民军工作研究与宣传似乎有所忽视，因而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甚少，讲的不多。

众所周知，在北伐战争时期，我国革命力量的中心在南方，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而反革命政权的中心在北方，以北京为反动军阀的大本营。当时，直系、奉系、皖系三大军阀拥有的七、八十万军队，大部分盘踞在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地区，控制着京汉、京奉、津浦等交通干线。革命的武装部队有：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拥有兵力十万人；北方国民军共七个

军，拥有兵力三十万人。不难看出，北方国民军抗击和牵制着三大军阀的大部分兵力，而且单独抗击和牵制着三十五万奉军和直系的一部分主力部队。特别在以后的南口大战的危急关头，国民军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苦斗，抗击着奉张、直吴、晋阎、鲁张联军的军事进攻，承担了非常繁重的战略任务。

对国民军的这种战略地位，党中央在一九二六年曾作过如下估价，指出，国民军能够在西北存在和发展的战略意义在于：

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住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未来北伐，对奉若没有国民军之骑兵炮兵参加，实难驱逐奉军出关。^{〔34〕}

党中央还对国民军的作战能力作了如下评价：

冯军之纪律与战斗力，实比之一般的北伐军为好。再加以一个时期的休养训练，同时助以政治工作，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作用的。^{〔35〕}

中共中央还指出：我们所以“对于现时西北军工作十分重视”，完全是因为我们“知道西北军在现时的革命斗争中占什么地位，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占什么地位”。^{〔36〕}

党中央的这些精辟论断，虽然是一九二六年提出的，但它无疑是党中央在研究考察了国民军的发展历史及其反军阀的战斗历程所得出的结论，它完全适用于从国民军组建至后来五原誓师，策应北伐的各个历史阶段。

6. 党“联合国民军反对段张”的方针

北京政变后，由于国民军的兴起和发展，冯玉祥转向革命，

造成了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也由于冯玉祥在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失误，使北方的政治局面复杂化，导致了冯玉祥宣告下野，国民军受到了挫折。

冯玉祥最大的失误是请段祺瑞出山。原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约定北京政变成功后，迎接孙中山北上主持一切。但是，在十月二十四日北苑紧急军事政治会议上，当接到吴佩孚回兵进攻杨村的消息，为了应付军事上的严重形势，巩固既得的胜利和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联合和拉拢皖系的政策，由孙岳临时提议请段祺瑞出山，竟获得与会者全体通过。这样，就铸成了大错。“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全局遂陷入几乎无可挽救的形势。

对于这个严重失误，冯玉祥通过以后的惨痛事实教训才有所认识，但悔之已晚。对这件事，他有两段记载。一段是记述北苑会议时的情况：

正当会议未散的时候，果然接到报告，说吴佩孚已从前线撤回一部劲旅，正在回攻杨村。……为了应付当前军事上严重的困难，孙二哥便临时提议，请段祺瑞出山，以示与皖派联络……。大家亦以为，一则目前困难非此不能打破；二则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

另一段，是冯玉祥痛述自己的悔悟。他说：

一时只看见了军事的成败，忽视了政治的后果。孙二哥这个提议，竟得全体赞成。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哪知由于这个临时动议，竟断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37〕}

冯玉祥的另一个失误是不参与政权。他抱着“军人不干政”

的姿态，对待北京政变后的内阁组成。摄政内阁成员，听任黄郛自决，冯、胡、孙未曾荐举一个人。就连在前任内阁担任次长的冯的亲信薛笃弼，也不准留任，以避免操纵把持政权的嫌疑。对此，冯玉祥说：

内阁人选既定，我们都觉得十妥十全。其中没一个我的私人，亦无胡、孙一个私人，完全本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意思决定的。^{〔33〕}

这种迂腐之见，不能不说是造成政权旁落，导致失败的因素之一。

段祺瑞决定出山主政后，即积极联合奉系张作霖，反对和排挤冯玉祥。

十一月五日，摄政内阁和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后，段祺瑞从天津致电冯玉祥，表示反对。电文说：

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往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

对段祺瑞的电文，冯玉祥十分不满，他回忆当时的态度时写道：

我真不明白段先生是什么居心？我想，莫不是曾经做过军谘府大臣，磕头磕上了瘾，定要留着溥仪给他过磕头瘾么？当时我就提笔亲拟了一个电稿，我说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从这里可以看出段之倒曹、吴，是出于皖直的畛域之见，完全为私

人报仇雪恨，何曾为国家人民想一点？^{〔39〕}

其实，段祺瑞何止是为私人报仇，这封电文完全暴露了他顽固坚持封建军阀统治的本性。果然，在他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就下令解除对溥仪的监视；在他执政的第六天（十一月二十九日），溥仪就偕同郑孝胥、陈宝琛，逃到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不久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往天津，后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傀儡皇帝，这绝不是偶然的。

十一月十一日，段祺瑞召开天津会议，电邀张作霖、冯玉祥参加，列席的有皖系的卢永祥、王揖唐、梁鸿志等人。会议决定由国民军和奉系两军将领发电公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电文发出后，得到皖系、奉系和直系的响应。

关于天津会议，国民军史书有详细记载：

近畿战争，既告结束。国民军之意，甚愿以国政奉诸孙中山先生，特派马伯援南下欢迎，惟中多阻碍。安福系诸人，则希望段祺瑞取得政府之最高权位，多方游说各实力派。拥有雄厚兵力之张作霖，首即赞成。而此时长江各督齐燮元、孙传芳、肖耀南等，原属直系，深恐富有革命性之国民军，以政权属中山先生，与彼等不利。……十一月十日，遂由齐燮元、肖耀南、孙传芳……等，联名通电，拥护段氏。翌日，段祺瑞，张作霖邀冯会议于天津，张力主段氏秉政，时列席者，有卢永祥、王揖唐、梁鸿志诸人，皆旧属皖系，亦附合张氏，议遂定。

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竟公然违背迎接孙中山北上和奉军不入关的盟约，乘机开进关内，先占天津，后进北京。结果，组

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的段、张、冯三派的联合政府，实际上是皖、奉两派掌权。这样，旧的反动统治被排去，新的反动统治又建立起来。在北方，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及革命统一战线内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而北京，成了这许多矛盾的焦点，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对于北京政变后的复杂政治形势，党中央有过不少分析，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指出，在中国革命潮流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国的封建军阀已逐渐崩溃，分化出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现在北方的国民军，便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在近数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与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尤其是其中之更左派”。因此，党决定：“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的是帮助国民军”，而且必须“加紧在国民军的工作，帮助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40〕}党中央的这些指示，明确规定了“联合国民军”的方针。

对党的联合国民军的工作，在后来苏联派往冯玉祥部队的军事顾问团领导人之一的维·马·普里马科夫有过如下记载。他说：

在华北建立的国民军，发表了反帝宣言，这使国内革命力量的联合有了可能。李大钊教授（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员、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被派往华北去谈判。为了同北方军队首领谈判，几位知名的国民党人也和他一起出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讨论了北方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

普里马科夫写道，中共中央认为：

必须直接联系当时中国人民群众为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来看待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

普氏接着指出，中共中央基于上述认识，正确地断定了，

国民军今后的前途，因而十分重视国内革命总形势和中国北方反帝、反军阀运动之间的联系。因为如果革命运动发展起来，国民军就会倾向于革命运动并跟着它走，如果反动势力暂时得势，国民军的作用就会有所改变。⁽⁴¹⁾

这虽是一个苏联人事后综述，但却正确地阐明了党的联合国民军方针的重要意义，记录了李大钊肩负的重要使命和对国民军的工作。

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作了正确分析，采取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正确策略。在此期间，大钊同志亲自对冯玉祥做了许多工作，还派人和通过书信往来对冯玉祥部下做了许多工作，向他们解释和宣传党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同时，大钊同志还派出许多同志直接到国民军去，深入下级军官和士兵中进行活动。在国民二军和三军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及其他重要职务。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还积极地开展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群众斗争。

在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倾向革命，邀请孙中山北上；段祺瑞、张作霖为了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也宣称共商国事，邀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为了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应邀于十一月十二日由

广州动身北上。但是，段祺瑞执政后，却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背叛前约。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当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时，段祺瑞采取了对抗孙中山的行动。一方面，他发表声明宣称“外崇国信”，反对取消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他又宣布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反对召开国民会议，蓄意同孙中山针锋相对。孙中山非常生气，对段祺瑞派到天津欢迎他的人严加训斥，说：我在外面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府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竟然公布“善后会议”条例，明白规定“善后会议”完全由军阀、官僚等反动统治者和拥护他们的人组成，真正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律不能参加。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孙中山扶病到达北京后，段祺瑞、张作霖要他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讨价还价地和他商讨参加“善后会议”的条件。国民党右派分子也在孙中山周围吵吵嚷嚷，要他放弃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而参加“善后会议”。孙中山坚决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则坚决联合国民军，支持孙中山，主张发展“废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由段祺瑞操纵的“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张。三月一日，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北京开幕。大钊同志出席了大会，领导了这次大会的工作，并被大会推举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这两个大会，互相对抗，形成了鲜明对比。“善后会议”是一个军阀分赃会议，争权夺利，明争暗斗，闹得乌烟瘴气，全国人民无不反感和唾骂；而革命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得

生气勃勃，十分认真。在“善后会议”的幕前幕后，尽是一些反动的官僚、政客、军阀和腐败没落的遗老遗少，以及行将就木的老朽。而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人选完全是另一种气象。他们来自二十多个省市，代表二十多个国民会议促成会，二百多个代表中有工人、农民、学生、记者、律师、教授、职员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会上，大家发言热烈，慷慨激昂，强烈反对“善后会议”，愤怒声讨段祺瑞、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这样的会议，虽然不可能达到改组反动政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但它极大地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对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三月十二日，正当国民会议促成会胜利进行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与世长辞。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亲自参加和主持了治丧委员会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北京党组织发动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宣传运动。李大钊还亲自书写了《挽孙中山联》，全文如下：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巨，自明季于今兹，汉种子
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
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
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
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
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
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
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
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振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

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
成厥大业慰英灵。^{〔12〕}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党和共青团组织，在追悼孙中山的三天活动中，发动了三十万人参加，散发了三千多份宣传品，配合当时的国民会议运动，宣传新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孙中山葬礼那一天，十数万北京人民举哀送殡，实际上形成了一次反帝反封建军阀和反段的群众大示威。当游行队伍经过西华门时，愤怒的群众把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挂在那里的牌子砸碎了。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冯玉祥将军的极大悲痛。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记载：“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噩耗传来，……国民军全体皆缠黑布，持服七日，以志哀悼。”在一次致词中，“一说到中山先生的死，我不禁一阵心痛，热泪簌簌的落下。”^{〔43〕}

在党的“联合国民军”方针指引下，经过李大钊、孙中山的教育和帮助，冯玉祥终于决心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脱离北洋军阀阵营，转向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道路。

三、李大钊说服冯玉祥经营西北边陲

7. 冯玉祥政治受挫与被迫下野

天津会议后，段祺瑞、张作霖进入北京，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冯玉祥原来期望在政变后扫除封建势力，打破军阀制度，实现和平统一，扶持民主政治，请孙中山北上主政，等等一切计划，全都成为泡影。同时，奉、皖两系视冯玉祥为眼中钉，肆意进行排挤打击。张作霖更是大逞威风，对冯施加军事压力，在进占天津时，竟解散了国民军王承斌部，逼王辞去直隶督都。同时，吴佩孚陈兵江淮一带，蠢蠢欲动。冯玉祥承受了这样的政治挫折，又面临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苦于找不到解救办法，无可挽回地愤而辞职。他先通电全国，表明辞职下野苦衷。接着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三日、十二月五日连续致电段祺瑞，请求辞职。

在这几个电文中，他陈述了自己辞职的理由、心迹和要求：

第一，他宣称北京政变的目的已经实现。他说，他发动北京政变是因为曹、吴政府嬖幸用事，贿赂公行，财政诛求无厌，吏治刚纪全无，迷信武力，肆毒全国，为了铲平内战，实现和平，所以“联合友军，主张回师停战”。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的愿望实现了，所以辞职引退。这一点在全国通电及十一月廿五日辞职电中讲的都很明确。

例如，全国通电话：

今曹虽引咎，吴尚负隅。天下滔之，不知所届。幸而合肥段公，以三奠共和元老，受全国一致之推崇。翩然莅都，总执国政，并通电全国，将集合海内贤豪，共商国是。和平可期，改革可期。

十一月廿五日电文说：

窃查此次战役，玉祥因目睹民艰，不堪再罹战祸。回师入都，无非为促进和平起见。今战事已停，建设开始，玉祥素愿以偿，亟应勇退。

“目睹民艰，不堪再罹战祸”，“促进和平”诸语，确系冯玉祥真诚心迹的表露，但对段祺瑞的称颂，都是言不由衷，无非是向国人表明他以大局为重，并敦促段氏醒悟而已。

第二，他宣称，他要为实现“军不成阀，阀不代阀”做一个榜样。全国通电话：

所望全国各界，本十三年变乱相寻之教训，为彻底觉悟共同之主张。务使军不成阀，阀不代阀。一可斩循环报复之根，二可以去民治推行之障。祥虽不敏，粗知大义。躬行实践，请自祥始。兹特宣告，解除兵柄，决心下野。

冯玉祥这样做，或许可以向军阀们“将军”，并向国人展示他为民为国之公心，但是，视权如命的军阀是不会跟随冯玉祥带的这个头儿，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冯玉祥宣称，他下野之后，“深愿一游欧美，专心学术，为异日报国之备”。他说：“玉祥自幼从戎，未尝学问。平生缺憾，追悔无穷。未遇机缘，难偿夙愿。……大局澄清，指日可望。玉祥投戈讲学，正在此时。”在段祺瑞拒绝他的辞呈

后，他公然称病，三次陈情说：“病体现觉不支”，“近日失眠旧症，复发且剧”，“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俾得稍事休息，调摄病躯，山林优游，借增学识。则此后学成之日，即将来报国之时”。^{〔41〕}

我们不难看出，冯玉祥当时是产生了一定的消极情绪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失望，他似乎在思索和寻求新的解救当前危机的办法。因此，他惟恐一旦被解职，引起国民军官兵的灰心失意，特致电胡景翼、孙岳，以救国救民相勉励，希望他们“本此举义之宗旨，努力一心，维护大局。并盼曲鉴苦衷，互相体谅”。^{〔45〕}

十一月廿五日，冯玉祥将全军军权交给了所部将领张之江、李鸣钟二人。同时致电张、李军长和全体官兵，勉励他们为国效力，为国珍重。他告诫张、李决不可效尤军阀；嘱咐全体官佐，“勤加训练，爱恤士卒。各兵士应恪守纪律，敬礼长官，与夫同伍同事之应互相亲爱，互相规劝，仍当玉祥在职之时。”^{〔46〕}

十一月廿五日下午，冯玉祥飘然隐去，避居京郊天台山。挽留者纷至沓来，冯一概不听；各方面来函来电，一律拒复。

从十月二十一日北京政变，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引退，时间不过月余，政治风云就发生了与他期望相背的迅变，对于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冯玉祥悔恨交加地总结道：

段祺瑞这回初到北京执政，谁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觉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疮和虱子割尽除净，使国家人民少受些弊害。谁知上台不久，就证实了：不但旧有的虱子未除，反倒加了臭虫；不但大疮未割，反倒加了疥疮。官僚买办，二花脸、三花脸，等等全都来了，成天抢官、抢权、分赃打吵，闹得昏天黑地……^{〔47〕}他痛心地说：

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扫除军阀势力，打倒

贿选政府，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实现和平统一的主张。但因在军事胜利之中，没有能够建立革命政府，结果仅是给予当时最凶恶的军阀曹錕、吴佩孚一个致命的打击，或能减去异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而外，这次革命的意义，已在奉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为私人势力的合作之下断送了！”〔48〕

冯玉祥已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但是他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说道：

我看着前途一团漆黑，没半点光明的气象，遂决定避入天台山，以示消极。〔49〕

冯玉祥这些沉痛的自述，揭露了他内心世界真正的苦衷，道出了他对时局的失望和对前途的茫然情绪。在这里，段祺瑞不再是“全国一致推崇”的“三莫共和元老”的“合肥段公”，而是“官僚买办”、“二花脸”、“三花脸”之流；“首都革命”的目的不是已经实现，而是“在奉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为私人势力的合作之下断送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不是“和平可期，改革可期”，“大局澄清，指日可望”，而是“昏天黑地”，“前途一团漆黑，没有半点光明的气象”；他退避山林也不是“调摄病躯，山林优游，借增学识”，而是“避入天台山，以示消极”。这些真实的揭露，当时既不能见之于电文，又不能公诸报端。这时的冯玉祥只能把他的政治苦闷和忧国忧民的焦虑当作咽在肚里的苦水了。

8. 李大钊劝说冯玉祥西北屯垦戍边

冯玉祥宣布下野，自释兵权，隐居天台山后，段、张仍不罢

休。当时，冯的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北京、天津一带，鹿钟麟还担任着北京卫戍司令，对段、张是极大的威胁和心腹之患，段、张必欲去之而后快。同时，段祺瑞又不希望冯玉祥远走高飞、消声敛迹，担心由于冯的出走破坏段、张、冯三角局面，失去均势而受制于奉方。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段祺瑞决定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为察哈尔省都统，李鸣钟为绥远省都统。这样，既不使冯部远离，又把冯部调离京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冯认为这是段、张的阴谋，让他到贫苦寒冷、交通闭塞、远离海口的西北地区，是使他难于购买武器、装备和扩充自己的部队，因而拒不受命。根据曾任冯玉祥秘书的共产党员陈天秩回忆说：

在任命发表后，段祺瑞派内阁总理贾耀德去天台山，劝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冯对贾说：我本来是陆军检阅使兼西北边防督办。这哪里是新的任命，分明是对我的撤职，请你转告段执政，另选贤能。

张作霖派他的少帅张学良和谋士杨宇霆，也到天台山劝冯就任新职，冯仍坚持不去。国民党的孙科、汪精卫等人也到天台山劝冯不要消极，早日下山，挽救国家危机。冯则消极表示：要解甲归田，隐居读书，不涉足争权夺利的政局。^[50]

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对冯玉祥下野后的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冯在此时下野会使形势急转直下，对国民革命是不利的；冯的部队也会由于冯的引退，失去中心支柱而被分化瓦解；西北地区虽远离海口，但段、张势力也鞭长莫及，大有经营余地；同时，背靠苏联，可争取苏联援助。于是，党和李大钊又一次向

在徘徊和苦闷中的冯玉祥伸出了支援之手。一九二五年一月，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与冯玉祥进行了多次交谈，说服冯玉祥接受了西北督办任职。对此，陈天秩回忆说，经过多次直接交谈，徐谦向冯玉祥讲：

他和李大钊曾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几次同苏联大使加拉罕交换过意见，劝冯不要消极，打消辞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苏联可以通过外蒙到张家口的路线，给冯以无偿援助。冯高兴地接受了李大钊和徐谦的建议，通知鹿钟麟来天台山，要鹿去会见贾内阁，转报段执政，表示自己愿意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

陈天秩认为，这是“冯玉祥在徘徊中接受了共产党对他的影响和帮助”^[51]的结果。

一九二五年二月初，冯玉祥下天台山，从门头沟乘火车经西直门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务。经过与李大钊、徐谦几次会谈后，冯玉祥展开了我国西北地区督办防务和屯垦戍边的艰苦事业。现根据《冯玉祥日记》和《国民军史稿》的记载，将冯玉祥在西北兴办的新事业简要列举于后，从中可以看出党和大钊同志对冯玉祥所做工作的成果及冯玉祥将军的业绩。

（一）培训军官，加强军事训练

冯玉祥一贯重视军官和士兵的培养和训练，受任西北边防督办后，他积极培训军官及造就特种兵人才，创办和开设了干部学校、交通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铁甲车团，并在司令机关设训练处总管部队及军官的训练。

他主张“治军之法”和“用人之道”在于选贤任能。他常说：

吾一向用人，不问亲不亲，只问贤不贤？不问多不多，只问能不能？

知人用人，须咨之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而观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总之，非苦下身段，在事实上切实体察一番不可。^{〔52〕}

他强调，“营长以上官长，非读书不可，盖人必读书，方知进退也”。^{〔53〕}他经常给国民军高级将领，讲述读书之重要，指出，“如不发愤读书，何以救国，何以救民，何以尽本分”。^{〔54〕}

他针对国民军部队“练多训少”的弊端，提出“要改良旧习，多训少练，使兵皆知个人与国家之关系，实在是休戚与共，祸福相同”。指出，官兵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方能成为有用之兵”。^{〔55〕}

（二）民政、治安与抚恤、救济

当时的西北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肥沃，交通不便，人罕经营，所以十分贫穷落后。冯玉祥到任后，进行了积极开发。

1. 治安与剿匪：察绥两省，自民国以来，盗匪猖獗，四出滋扰，绑票杀人。冯分防协剿，经过三个多月，逐渐肃清。

2. 抚恤与救济：

冯玉祥拨款五万元，设立救济机关，教养贫穷无靠的群众：

养老院——收养年老不能自营生活的老年人；

孤儿院——抚养无人抚育的孤儿；

残废院——收容盲聋及肢体残废者；

栖留所——教养京绥沿线的青年乞丐，授以一技之长或充当劳工，数月后乞丐绝迹；

平民医院——平民患者皆可就医，有支付能力的酌收医药费，

无支付能力的免费医治。

3. 戒烟与禁烟

陕、甘、宁、青素以种鸦片著名，而且大半运入察绥，然后输散各省。察绥两省吸食鸦片的人难以数计，冯玉祥广设戒烟所，每月戒烟者在五百人以上，吸烟恶习，迅速根除。

4. 建设模范新村

在张家口东南地区，划地五顷，拨款五万元，修建新式房屋、公共集合场所、图书馆、浴室、机井、发电室和马路等，凡农村需要的设备，应有尽有。

（三）兴办学校与普及教育

冯玉祥责成察绥两省大小机关，设立平民学校，由政府职员兼任教员，教当地群众识字。为打破各民族之间语言文字隔阂，为开发西北培训人才，在归化城开办“五族学院”，后改为中山学院。还曾拟集资办西北大学，后因战祸又起，半途而废。

（四）奖励移民与屯垦戍边

国民军总部，为使官兵实行屯垦政策，分遣各师、旅、团分驻各地，一面防守边陲，保卫治安，一面划地垦殖，开发实业。先后在张家口等地，兴办起面粉公司、皮革厂、纺毛厂和牲畜场，开采煤矿，均收到显著成绩。有一次，冯玉祥给卫队旅官兵讲话，谈到屯垦问题时说：

……吾人看哥仑布探新大陆之事，亟应奋发有为，阳气所发，金石为开，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依我计划，将来我军士兵，每人可得十八顷地，彼时各将父母接来，再娶一女学生，自耕自食，何乐如之。^{〔56〕}

（五）扩充军队与制造武器

自奉军入关，张作霖依恃战胜之余威，不断增兵关内，锐意扩充地盘。蟄伏岳阳的吴佩孚，到处伸张活动，企图东山再起。国民军处此南北压力下，如不扩张军备，必将难以生存。冯玉祥审时度势，决定扩充军力。

首先，逐步将国民一军扩编为西北军，辖陆军十二师，骑兵二师，炮兵二旅，卫队一旅，交通队一团，共约十五万人。由韩复榘、孙良诚、郑金声、佟麟阁、石敬亭、石友三、马鸿逵、谭庆林、唐之道、刘汝明、蒋鸿遇、张维玺、张树声、孙连仲等分任师长，冯治安任卫队旅长。冯的辖区除察、绥、甘三省外，还有北京地区，南苑至张家口一线均为冯军驻守。这时，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已扩充至二十五万人，孙岳的国民三军已发展为三万人，一、二、三军共有四十多万兵力。

其次，加强了空军建设。在北京设航空司令部，以王乃模为司令，邓建中为副司令，拥有飞机二十一架。在北京、包头、张家口、平地泉、归绥等处，设有临时飞机场。这个年轻的空军，在后来的京津战事中，担任侦察、轰炸及为炮兵校正等项任务，在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以上西北军政建设一系列事实可以看出，党和大钊同志对冯玉祥与国民军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此时的冯玉祥，经过党和李大钊的教育帮助，从苦闷、消极和徘徊中焕发起来，精神振奋，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和智慧，作出了很大的业绩。虽然，他在政治经济建设中的某些措施，带有“乌托邦”性质和小农色彩，但仍不失为是个创举，对国对民是有建树的。

四、李大钊、冯玉祥协议 创建国民军政治工作

9. 李大钊为冯玉祥疏通国际 关系与促进苏联援冯

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李大钊为了进一步建立冯玉祥国民军同苏联政府之间的联系，促进苏联援冯，多次亲自奔波，往返于北京苏联大使馆与张家口冯玉祥国民军总部之间，进行频繁的活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底，冯玉祥亲自派秘书毛以亨到北京，邀请李大钊、徐谦来张家口。毛以亨到北京和李大钊、徐谦商谈两天后，陪同李、徐来到张家口。冯派他的副官长张允荣，用冯自己乘坐的汽车到车站迎接。冯玉祥就在土尔沟自己的办公室迎候，并告诉他的随从人员，此日不接待任何宾客，以便同李、徐会谈。参加会谈的有参谋长刘骥、副官长张允荣、外事处长唐悦良和秘书毛以亨。经过一整天的会谈，达成了要求苏联给予国民军军事援助的协议，拟定了要求援助的具体内容。李、徐并请冯派负责人员到北京，与苏联大使加拉罕谈判军援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在会谈期间，冯玉祥提出要聘请李大钊、徐谦做他的高级顾问。李大钊认为，徐谦是国民党驻冯部的代表，聘为高级顾问有利于公开协助冯的工作，而他自己还是不承担顾问更有利于开展

工作。冯认为李的意见很对，称赞李是从革命事业着眼的，有学问、有远见，他敬佩共产党人不计较个人名利的高尚精神。会谈结束后，毛以亨陪同李、徐当夜返回北京。

根据张家口会谈结果，冯玉祥很快派国民军参谋长刘骥、外事处长唐悦良和外交专员包世杰为代表来北京，同苏联大使加拉罕进行谈判，商谈苏联援助国民军各种武器装备的项目和数量。苏方当即答应，给国民军的主要武器械弹：步枪、机枪、大炮及各种弹药，都作为无偿赠送。关于军援运输路线，双方商定，取道陆地交通，用火车经西伯利亚运至上乌金斯克，再用汽车转运到外蒙首都库伦（今乌兰巴托），然后由国民军派人设法运到张家口或平地泉。三月底，刘骥等由北京返回张家口，向冯玉祥报告了与苏联大使馆一周谈判的经过和结果。

同年四月，苏联派驻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最高顾问鲍罗廷，专程由广州到北京，准备去张家口亲自同冯玉祥会谈，以便最后敲定国民军参谋长刘骥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谈判提出的军援项目。

冯玉祥与鲍罗廷的会谈是由李大钊安排的，陈天秩有一段回忆，颇为具体：

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徐谦到张家口向冯玉祥转达了此事。冯高兴地表示欢迎，但同时又觉得，没有合适的下榻之处，恐怕招待不周。徐谦说：“我在广东和鲍罗廷常在一起，苏联共产党人生活简朴，不计较对个人的招待条件。这次也可能早车到，若双方能达成协议，晚车即可回北京。”于是，冯玉祥派刘骥去北京迎接鲍罗廷来张家口。在土尔沟冯的办公室，冯、鲍经过一天的商谈，顺利达成了苏联对冯部的军事援助协议。^{〔57〕}

冯玉祥为了搞好接收苏联军援的工作，很快派遣国民军总部副官长张允荣，率张振亚（又名张存实）等人为冯氏驻外蒙代表，组成接运苏援办事处。冯还利用由他介绍到段政府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通过外交途径，任命毛以亨为中国驻苏联上乌金斯克领事，取得合法的政府官方使节身份，防备北京段政府利用外交侦探，侦察苏联援助国民军武器装备的情报，保障军援计划免遭意外破坏。

关于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历史，苏联驻国民军军事顾问团领导人的《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有几段重要记载，其中有关李大钊的作用的记载，更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继胡景翼之后，冯玉祥也向苏联提出了援助的要求。冯玉祥信件的内容是：请求在莫斯科接见国民军第一军代表团，并对张家口至库伦之间的公路纠纷协助予以调解。

北方国民军指挥部根据李大钊等人的建议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的请求。^{〔58〕}

《冯玉祥与国民军》着重写了苏联方面的情况：

苏联政府细心地研究和讨论了国民军首领们的来信。显然地，这些国民军的社会基础和北方其他的集团基础一样，虽然这些军队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但是意志并不坚决，各军的司令都没有革命的经历，而军队本身也没有革命的传统。

姑且不论苏联政府当时这些看法是否全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对冯的国民军转向革命是有保留的。可是，他们最后还是决定援助冯玉祥，关键是考虑到党和李大钊对国民军的影

响。该书说：

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的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特别考虑了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的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位有威望的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亲自参加了第一军代表团。这证明革命营垒对苏联援助中国国民军是极其关心的。同时，苏联政府还分析了援冯的意义，考虑到：

……若是同意援助国民军，这对北方的政治局势可产生良好的影响，并且有助于中国反帝力量的联合。鉴于此，苏联政府于1925年3月21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和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于是两个军事顾问组（在冯玉祥军队里工作的张家口组〔主要组〕和配合张家口工作的开封组），立即派往北方军队。^{〔59〕}

上述记载在时间上和个别情节上似乎有些矛盾。例如：国民军第一军代表团是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到莫斯科去的，冯玉祥的信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公路纠纷也应当是在苏联援助之后发生的。但是，苏联决定援冯是在三月；胡景翼向苏联请援的时间更早一些，是在二月。所以，对这些事件的前后联系有些颠倒。同时，李大钊参加国民军第一军代表团去莫斯科一事，别的史书均未见有此记载，尚待查考。不过，我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李大钊促进苏联援冯，两种史书完全一致，因而是不容怀疑和否认的。

从一九二五年四月开始，苏联军援源源不断地运到冯部。五月，苏联派前远东军区总司令任江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三十人，经外蒙到达张家口。冯玉祥亲自主持了欢迎宴会。当时，张家口只有

一家白俄开的西餐馆。冯玉祥担心白俄不可靠，决定不用西餐待客，就用自己的厨师掌杓，中餐西吃，顾问们第一次品尝中国名菜，齐赞味道鲜美，十分高兴。

苏联顾问到达后，立即展开对军官的培训和部队的训练工作。在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帮助下，冯玉祥建立了炮兵、机枪、步兵、工兵和骑兵等学校，苏联专家主持了整个教学过程，并亲自授课。冯玉祥还在张家口、丰镇、平地泉设立三个训练基地，由苏联顾问帮助训练部队。

七月，冯玉祥亲自到三个训练基地，检阅经过苏联顾问训练的部队，进行军事技术表演和军事演习。

九月，各军校的第一批学员毕业了。其中骑兵学校二百五十名，炮兵学校一百五十名、工兵学校七十名，中级和高级步兵学校三十八名。这些学员分配到部队，对提高冯玉祥部队的战术和技术水平，增强战斗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苏联顾问还帮助冯玉祥建立了武器、弹药工厂，过去，冯玉祥部队使用的是帝国主义供应的武器，不仅陈旧过时，而且口径不一。工厂生产武器后，大大改善了部队的装备状况。

一九二五年九月间，李大钊为了使国民军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红军战胜沙皇白军，和粉碎十四个帝国主义围攻苏联的宝贵经验，建议冯玉祥派团以上军事干部赴苏学习。九月廿九日至十月廿日，冯玉祥派出国民军第一军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方面进行了谈判。苏联同意了冯玉祥的请求。十月间，冯玉祥派参谋长熊斌率团级军官鲁崇义等赴苏联学习。并从学兵团挑选了十五名优秀连排长，送苏联基辅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其中有田德修（后改名吉合，是我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少将副武官）、王受恒（后改名王

智涛，延安抗大军事科长，解放后曾任华东防空军副司令员），还有杨念照、叶茂极、郝鹏举、李连海、胡运泰、杨国体、董悌青、陈念浚、石友信、史书、李境青等。

苏联对冯玉祥的援助，充分显示了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不仅一切军援是无偿的，而且苏联顾问的生活费用也是自理的，甚至顾问团聘请的中国翻译蒋光慈的一切待遇，也由苏联供给。苏联顾问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真诚无私地施教，手把手地亲自示范，革命精神十分感人。冯玉祥经常找受训的军官和士兵询问情况，官兵们异口同声地称赞顾问们认真负责、无私忘我的可贵精神。顾问团负责人还每周给冯玉祥讲一次课。任江讲《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与革命战争》，林顾问讲《苏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对冯玉祥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开始认识到苏联共产党的伟大革命气魄和援助中国的无私诚意，并把自己是工人的儿子引以自豪。当时，在张家口有两条醒目的大标语：“劳动救国”、“劳工神圣”。

10. 冯玉祥委托李大钊领导国民军 政治工作与创办西北军干校

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影响冯玉祥和国民军，使之趋向革命化，经过对冯玉祥的大量工作，冯欣然委托李大钊，创办和领导国民军的政治工作。

当时，冯玉祥虽然保持与孙中山友好，尊重国民党，但并不急于同革命的南方合作。在冯玉祥的部队，也禁止任何政治宣传鼓动，下级军官和士兵又不识字，因此不懂得革命的目的和意义。这个问题不解决，部队革命化就很困难。

一九二五年五月，李大钊以很大的精力同冯玉祥进行了会谈，劝说他在部队建立政治工作。李大钊对冯玉祥说：“你的部队要真正革命，必须重视政治工作，要联俄联共。”李大钊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向苏联顾问团的领导人提出建议，共同劝说冯玉祥及国民军指挥部，使他们确信在部队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李大钊同志提出了部队的政治学习计划，建议俱乐部应当成为政治工作的中心和基础。要在俱乐部周围建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研究孙文主义小组，并预定成立十个俱乐部。经过大钊同志的努力，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冯玉祥在有些犹豫之后批准了李大钊的建议方案，决定先建立两个俱乐部，而且委托李大钊负责领导政治工作。从此，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国旧式军队中开创了革命政治工作的新纪元。

对此，《一个志愿兵的札记》中（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写道：

今天进行装甲列车试验性射击，因此，我们来到哈宁同志那里。在哈宁处，我们碰上了……李大钊教授（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组织者之一），他身材高大，面孔恬静，有一双聚精会神的眼睛，戴着一副角制大镜框的眼镜。

李大钊正忙于在军队里建立政治俱乐部。他使冯玉祥同意通过政治俱乐部在军队里宣传国民党纲领。为了与冯玉祥进行谈判，李大钊从上海来到北京，而当时，北京警察局局长已对他下了通缉令。他秘密地进入冯玉祥部队的辖区，在营房里躲藏了几天，然后在夜里离开北京，前往张家口。在这里，他与元帅会晤，对于组织俱乐部一事，得到了元帅的同意。^{〔60〕}

那时，冯玉祥在张家口修建了一座国民军总部和西北边防督

办公署，取名新村。在新村大院里，设有贵宾接待室，专门用来接待李大钊和徐谦。冯玉祥还在大院里开办了图书馆和礼堂，作为轮流训练营以上军官的场所。因此，新村也成了开展政治工作的一块阵地。

为了开展国民军的政治工作，李大钊选派宣侠父、陶梁（改名陶新畬）等一批共产党人，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为掩护，到国民军中工作。

宣侠父^{〔61〕}、陶新畬到达张家口后，冯玉祥亲自接见谈话。他平素喜欢同知识青年交谈，他认为李大钊介绍来的，肯定是有学问、有爱国热情的，便安排他们到新村图书馆任宣传员。宣、陶主管图书馆后，充实了马列主义书籍和孙中山著作，增添了《政治经济学》等书刊，以及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

对宣侠父在西北军的工作，他的夫人金铃所写的《宣侠父烈士传》有一段可资佐证：

侠父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工作期间，以他充沛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进行了大量工作。他一方面和冯玉祥及其上层军官广泛来往，另一方面又利用办俱乐部、图书馆、训练班等形式，上课、演说、教唱歌曲，广泛接触广大官兵，向他们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以国民革命为宗旨的新军队，作了大量启蒙和组织工作，开创了西北军政治工作。^{〔62〕}

在宣侠父、陶新畬的帮助下，国民军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教育，首先在国民军总部设立宣传部，派出宣传员，对各军官长讲解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及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新

三民主义的各项内容。然后，选派政治训练成绩优良分子，到各部队和各机关进行宣传讲解。同时，还派政治人员到附近乡村，宣传三民主义，联系人民群众。宣传教育方法灵活多样，除散发传单、报刊、漫画、发表讲演外，还表演新剧，使深蔽闭塞的察绥各地，革命空气也浓厚起来。

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冯玉祥还在新村开办了营长以上军官轮训班，主要学习三民主义。在轮训班上，冯玉祥还让部队负责人报告苏联顾问在部队中认真训练、亲身示范的实况，然后组织讨论“是什么主义促使顾问以忘我精神帮助训练？”报告人有炮兵旅长孙连仲、骑兵旅长王镇淮、学兵团长张自忠、工兵教导团长程希贤。当时，宣侠父、陶新畬也和受训的军官在一起生活和学习，并积极向军官们宣传革命道理。他们还通过轮训班结识了孙良诚、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高级军官，在国民军上层也进行了革命宣传和团结工作。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宣、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宣侠父当了孙良诚部的政治部主任，陶新畬当了孙连仲部的政治部主任。由此可以看出，在张家口时宣、陶的工作成就。

为了扩大革命宣传，李大钊还派共产党人为国民军办了两个机关报：一个是在张家口办的《察哈尔国民新报》，一个是在包头办的《西北日报》。《西北日报》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出版，后改称《中山日报》。

据刘贯一同志回忆：《西北日报》的社长是蒋廷宋，与蒋同时在一起工作的还有李大钊同志派去一批共产党人。刘贯一同志说：

蒋廷宋同志是李大钊一九二五年派到冯部工作的。

……当时在《西北日报》的工作人员，还有马吉良（浙江诸暨人，当时任编辑，是个大学生）；胡英初（中共党员，大学生，也是李大钊派去的，担任编辑，原是天津《益世报》编辑）、鼓振纲、丁宝铨（中共党员，也任编辑），还有刘贯一（刘景熙）。^{〔63〕}

而刘贯一则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包头参加西北军，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当时在《西北日报》社担任编辑兼记者。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特别是京津地区的反帝爱国学生，在北方地区党组织的发动下，纷纷投奔张家口冯玉祥的国民军。为了收容这批学生，李大钊、徐谦建议冯玉祥开办西北军干部学校，对他们施以军事训练。冯玉祥与其部将商议后，接受了李、徐的建议，成立西北军干部学校。委任张之江为参谋，陈琢如为校长，选择学兵团的优秀营长为中队长。李大钊亲自帮助冯玉祥筹办这座学校，并派宣侠父到干校工作。

西北军干部学校成立后，将七百多名学生编成五个中队，开始进行军事训练。学员们革命热情很高，大家传唱由李大钊的诗《红旗颂》谱写的革命歌曲。当时发生了国共两党之间的争论，对此，冯玉祥采取了调和劝解的态度。据陈天秩回忆，有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陈琢如校长报告冯玉祥说：学生中有国民党，有共产党，经常激烈的辩论。冯对陈说：“我们不管是什么党，到我军来了，我们要一样的当亲兄弟爱护，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军事本领。”两天后，冯玉祥亲自到学校召集全校学员讲话，除勉励学生努力加快学习

军事本领，准备为被残杀的工人、学生报仇雪恨外，并宣称我们军人是不党的，你们校长和队长都象亲兄弟一样的爱护你们，都希望你们迅速的成为我军的骨干。^{〔64〕}

冯玉祥这种比较开明的态度，促进了西北军干部学校的革命民主气氛。这批学生，后来成了国民军的基层骨干。

总之，由李大钊创建并派宣侠父等共产党人推行的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它不仅为刘伯坚等同志领导国民联军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而且为以后我军的政治工作提供了借鉴。

11. 李大钊、冯玉祥与“五卅”运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实行血腥屠杀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是五四运动以后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人民革命运动，它把一九二四年开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标志着大革命风暴的来临。当时，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南北呼应，汹涌澎湃。

五月三十日，惨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全城立刻沸腾起来。北京党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反帝为统一目标，迅速地将北京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学生组成“沪案雪耻会”，工人组成“工人雪耻会”；还有四百八十多个团体参加组成的“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六月三日、十日、二十五日，在以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人民连续举行

了三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六月十日游行前，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五卅”运动中第一次“北京国民大会”。这次大会是由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的，开得极为成功。大会开始，首先为惨遭杀害的上海工人，静默致哀。接着，请来自上海的工人代表报告英、日巡捕屠杀同胞的经过。全场“声泪俱下，泣不可抑”，群情激愤，高呼：“为工界同胞报仇！报仇！”“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收回租界”，“救国救民坚持到底”等口号。许多人跳上搭好的五座讲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有人咬破手指血书“誓死救国”四个大字。大会最后通过了《北京国民大会宣言》。《宣言》声讨英、日帝国主义，援助被难同胞，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会后，二十万群众冒着滂沱大雨游行二十余里，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气概和斗争决心。

六月廿五日为全国总示威日，北京各界三十多万人，冒着酷暑游行示威六小时，奔走数十里。参加游行的以工人为最多，郊区农民也赶来参加了示威。

据北京《晨报》、《京报》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报导，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还组织了一次国际性反帝会议。报导说：

六月三十日，北京五百多个团体五万多人（一说二十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朝鲜、印度、土耳其、日本、德国等国代表应邀出席大会。共产党员刘清扬、朱务善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等出席并发表演说。会上高呼“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

这次大会，无疑会使群众受到一次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

际主义教育。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的党、团组织还发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抵制日货运动。北京学生罢课，从六月三日到九月八日，坚持三个多月之久。工人雪耻会还发动在英国使馆、兵营中工作的中国员工，退出使馆、兵营和外国人住宅，拒绝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还组织绝粮纠察队，发动群众不向英国人和日本人供应食品货物，停止供应英使馆的水电。据当时报载，这一斗争，使得英国使馆、兵营的日用起居，非常困难，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气焰和威风。

李大钊还派赵世炎等到天津、唐山等地，组织和领导那里的日本纱厂工人、开滦矿工和海员举行罢工，组织两市的学生罢课。在奉张军阀严密统治下的天津，组织了盛大的群众示威游行。我党领导下的进步报纸——《救国日报》，也在“五卅”运动激烈的斗争中在天津诞生。

波澜壮阔、举世震惊的“五卅”运动，给冯玉祥及其率领的国民军以巨大的政治影响，推动冯玉祥及其国民军进一步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促进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变革。

“五卅”惨案噩耗传到张家口国民军部队后，冯玉祥立即电汇两万元抚恤伤亡工人，并派顾问彭程万至沪慰问，同时，两电张作霖，要张对惨案有所表示。在张家口，他下令全体国民军官兵为上海死难者服孝两周，统一规定每个国民军官兵上衣，都要缀上两条半寸宽、六寸长的白布条，条上写红色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取消不平等条约”。冯玉祥还特地命令国民军全体军官，摘下用日本进口绣金线做成的军衔肩章和兵种符号，表示国民军抵制日货的决心。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宣传员和青年学生，深入到大街小巷，展开了有声有色的宣传活动，发表演说，发动

群众举行集会游行，号召张家口和北方各省民众起来，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为上海牺牲的工人报仇雪恨。国民军的宣传队，只用了两天的功夫，就完成冯玉祥交给他们的排戏任务，突击编排了话剧《上海的悲剧》，在张家口演出多场，使广大群众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冯玉祥素有“基督将军”之称。他自幼信仰基督教，笃信基督教义——平等与博爱，并以此作为全军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滦平班师、“首都革命”时，他还按照基督习俗袖围十字。“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原以为各国教士应该按照基督教义，仗义执言，援助中国人民。但是，各国基督教界却寂然无声，冯玉祥大为怀疑和不满。七月八日，冯玉祥通电全世界基督教徒，进行质问。

这封长达一千五百多字的电文，痛述了“五卅”惨案的经过，揭露和谴责英、日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电文列举各国友好人士和团体以及全世界工人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声援，质问为什么“素以持正义、谋公理鸣于世”的基督教徒却如此沉默？”这封电文引用基督福音中救世爱人的论述，对照基督教之所作所为，对基督教的虚伪性进行了质疑。这说明，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基督教暴露了它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真实面目；同时，也教育了冯玉祥，使他动摇了对基督教的虔诚信念，并逐步抛弃了它。这里，有必要摘录电文的有关部分，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人民革命运动对冯玉祥的影响。电文在引证了《约翰福音》与《马太福音》中有关言论后说：

……今青年学生，皆是束发英俊，实可亲可爱之弟兄也，乃横遭惨杀，死于非命。工人受压迫，正如压伤的芦苇；中国人民之于今日，正如将灭之灯火；不见基督徒

有披发纓冠之教，抑强扶弱之义，以表彰公理。然则奉基督教，所学何事？更不知各国传教于中土者，所为何事？岂非徒具基督教之名，而无基督教之实乎？况基督徒乃世界之宗教，无国界，无种界，不能以沪案为中国之事，遂漠不关心也。宜本乎教旨，生切肤之痛，同情援助，尚何待焉？不然则传教之事，岂非别有用意吗？非基督徒，辄谓教士来华，假布道之名，行侦探之实，言之啧啧，其将何以辩之？呜呼！教徒堕落，江河日下。以英吉利奉基督教为国教之国，始以鸦片毒害中国；继以暴力割取香港等地；复占据税关，剥夺主权；今且肆行屠杀，视我鸡犬不如，已不禁为基督教惋惜。而各国教会，对此凶暴残杀，亦默而不言，一若暗示同情者，则教徒之堕落，将伊于胡底？吾不禁为基督教危矣！^[65]

冯玉祥虽然看到了基督教的虚伪和没落，但他还存在幻想，表示发出通电是“爱教心切”，希望基督徒“对于惨案，仗义执言，为基督教争人格”。

冯玉祥的一纸电文，当然不能改变基督教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基本宗旨。电文发出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在冯玉祥部队布教的牧师们也改变了对冯玉祥的友好态度。一个与冯往来多年结成朋友的西方牧师公开对冯说：工人、学生都是“乱党”，日本人和英国人开枪是对的。冯玉祥十分气愤，当面骂他是“冒充的基督徒”，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从此，冯玉祥对基督徒的信念彻底幻灭，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冯玉祥的思想变化，国民军广大官兵的思想发生了新的转机，部队也发生了变革的新气象。冯玉祥摘掉了自己的“基督

将军”的帽子，取消了部队多年来以基督教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为主课，更加坚定地国民军和西北军干部学校中推行党和李大钊帮助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治工作。那些随军的基督教牧师们，也纷纷离开国民军部队。广大官兵解脱了基督教的束缚，在艰苦操练之余，完全致力于学习研究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更加振作地走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

“五卅”运动是一个反帝爱国运动。它对中国各革命阶级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冯玉祥及国民军在运动中经受住了考验，并在人民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更加倾向革命。这也充分说明，党的“联合国民军”的方针的正确性和大钊同志对国民军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五、李大钊与胡景翼和国民二军

12. 李大钊、胡景翼北京会晤与开封会谈

李大钊在帮助冯玉祥和国民一军的同时，也对胡景翼和国民二军进行了积极的帮助。

胡景翼是个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将领。他早年加入同盟会。他在陕西新军时，曾首倡反清各派势力结盟，促成西北革命三大组织（同盟会、军学各界、哥老会）的联合，形成了陕西民主革命的洪流。武昌起义胜利，陕西新军宣布独立。胡景翼任标统时，作战屡获全胜，声名远扬。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胡东渡日本深造。他在日本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在他学成回国向孙中山辞行时，中山先生拉着他的手说：“西北大事，要完全依靠你了。”一九一七年，他联络各军，组建靖国军，请于右任出任靖国军总司令，他由总司令改任第四路军司令。一九二一年秋，冯玉祥派孙岳到陕西，劝说胡景翼“换旗”，暂时归依曹吴，以图后举。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期间，他拒绝执行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的命令，并在他的防区内，保护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一九二四年秋，冯、胡、孙结盟发动北京政变，政变成功后他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国民二军军长。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胡景翼就任河南督办，挥师南下，进驻开封。

关于胡景翼的这段经历，载于陕西省纪念胡景翼逝世六十周

年大会印制的《胡上将军景翼生平事略》中。从中可以看出，李大钊对于胡景翼和国民二军进行的统战工作是有客观基础的。

关于李大钊与胡景翼第一次会晤的时间，其说不一：

《胡上将军景翼生平事略》的记载是：一九二二年春，胡景翼开始和共产党建立联系。当时，直奉战起，胡率陕西陆军第一师出潼关，援助冯玉祥，立解郑州之围，豫局大定，并在北京设办事处。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从此，胡在思想上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变。

张绛同志所作《李大钊与河南党组织的创建》则说，“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为了营救被捕的工会领袖和工人，于一九二四年底，在北京与即将就任河南督办的胡景翼会晤，希望他抵豫后，尽快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起来。

有的书记述为一九二四年，胡景翼驻防京津时，得知孙中山实行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由共产党倡导和由李大钊参与制定的，出于对李大钊的仰慕，由他的同乡、北京大学教授康醒浮介绍，认识了李大钊。

还有的说，是一九二三年六月至一九二四年一月期间，国共合作形成后，李大钊为了广泛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开始有计划的主动接触和联络冯玉祥、胡景翼和国民军部队。

这些说法，时间不同，而且只是一个大概，均不够翔实，唯屈武回忆对李、胡第一次会晤的时间和内容比较详细。他说：在“北京政变大约两星期之后，李大钊与胡景翼在北京第一次接触”。这次会晤，“是根据胡的要求，李的同意而安排的”。他说：

北京倒曹起义两星期左右，我领着胡景翼同车从通

县去苏联大使馆与李见面的。在那次会见中，胡即向李提出要求苏联帮助武器问题，李答应同加拉罕大使研究。不久，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经李大钊同志派我陪同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率军南下，直攻郑州，进驻开封。^{〔66〕}

屈武同志是当年奔走于李、胡之间，曾起过桥梁作用的重要联络人，李、胡第一次会晤是他亲身经历，他的第一手材料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因此，可以断言，李、胡第一次接触的时间是北京政变后的两星期左右，大约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前后，而不是一九二二年春或其他时间；联络人是屈武，似非康醒浮教授；地点是苏联驻华使馆；内容尽如屈武同志所说。

胡景翼到达开封后，积极网罗人才，决心刷新政治，推行三民主义，要在中州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他很想请李大钊来河南一趟。

关于胡景翼邀请李大钊来豫的原因，屈武回忆说：

我与胡景翼到河南开封后，经过紧张的十天艰苦工作，局势得到了基本稳定。但胡景翼深感还有许多重大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是想请李大钊同志来河南一趟，对有些问题帮助解决。而又感到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身负重任，工作肯定很忙，很难说一时脱身前来河南。同时又听说孙中山先生北上到了天津，身体欠佳，也想派人前往看望，同时也曾希望孙中山先生今后有机会到河南来一趟，有些问题想和他谈谈。

由于以上原因，胡景翼决定派我前往北京，一是向李大钊汇报他（胡景翼）到河南后的工作情况；二是想

请李大钊同志，是否能抽出时间来河南一下。同时，又派李仲三、寇遐、刘治洲、李可亭等前往天津看望孙中山先生。于是我和李仲三等五人，同时从开封出发到达北京。^[67]

屈武到达北京后，把胡景翼的亲笔信交给李大钊，并向李大钊汇报了河南的工作，转达了胡景翼对李大钊的邀请。李大钊因工作繁忙，需要考虑一下再作答复。此间，屈武随李仲三等人去天津看望了孙中山，中山先生委托屈武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陕西去发动和促进召开国民会议。屈武第二天返回北京，李大钊同意去河南，屈当即陪同大钊同志前往开封。据屈武回忆，他们到达开封的时间，可能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八日。胡景翼一见李大钊到来，出乎意料之外，真是万分高兴。李大钊在开封住了六、七天，与胡景翼进行了多次会谈。

关于李大钊与胡景翼开封会谈的内容，屈武、张绛、马文彦的回忆文章，各有侧重，有必要摘录于后，供作研究之依据。

第一，屈武的记述：屈武参加了两次谈话，据他回忆，李、胡第一次会谈的内容，是胡景翼向李大钊报告了国民二军来河南后的全面情况及以下五个关键性问题：

（一）从苏联运来的军火武器在国民军如何分配问题（屈注：因当时，通过苏联使馆，我们从苏联运来些军需弹药，运来时经过察哈尔国民一军冯玉祥那里，胡是怕冯玉祥多留武器，认为国民二军刚到河南，军队装备差，想通过李大钊同志在军火分配上给以照顾，多分些——因那时这批武器是经李大钊同志直接管理分配的）；

(二) 苏联顾问到河南来，充实加强国民二军及河南督办的一些工作问题；

(三) 整顿和加强军队建设问题；

(四) 有关政治上、组织上的重大问题；

(五) 其他一些有关事情。^{〔68〕}

屈武未参加李、胡的第二次谈话。屈武参加的第三次谈话，主要是胡景翼要刘天章（李大钊派往国民二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带学生队，武装一批进步青年，充实部队实力。李大钊同意了。后来这支学生军就是刘天章的学生营。据屈武说，以后每天都谈，参加人有李大钊、胡景翼和胡的高参刘允臣。由于屈武陪李大钊在开封只住了三天便去了陕西，以后还谈了些什么，屈未作记述。

第二，屈武、马文彦的谈话：据《河南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屈武、马文彦谈李大钊在河南》一文说，李大钊到开封后的主要活动有：

首先，根据胡景翼的要求，李大钊同意增派苏联专家、顾问，帮助整顿国民二军（王若飞自传中还记述了拟建立类似黄埔军校性质的军官学校）；在苏联援助军火的分配方面，给国民二军以优厚；派一些青年（实际多是共产党员）到开封协助工作等等。

其次，是做胡景翼的工作。胡景铨清楚记得有这样一次谈话：“李先生谴责吴佩孚在京汉铁路枪杀工人，还讲了工人力量强大。我大哥胡景翼说，我就是要依靠工人，工人说话算数，他们不哄你！我说，工人会造枪，咱们就没有办法。李先生说，不光是那些，没有工人劳

动，怎么养活我们。还说了些无产阶级的道理。经过李大钊的工作，胡景翼对工农群众的态度和以后河南工人运动的开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张绛的记述：《史学月刊》1982年第五期张绛《李大钊在开封》一文说，李大钊还会见了随国民二军到开封工作的共产党员，随后于一九二五年元旦返回北京。

第四，苏联顾问维·马·普里马科夫记述：在《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中，他写道：胡景翼是第一个向苏联政府提出援助请求的。“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这位将军邀请加拉罕到开封他的官邸，此后胡景翼又派了一个军官代表团同大使谈判”，这个代表团由“胡景翼将军的代表刘（允臣），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右任）将军，以及北京大学李（大钊）教授”组成。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胡景翼的代表又访问了加拉罕，“请求我们给部队提供教官”，苏联还没答复，胡景翼就又“向大使请求暂时给他派一些军事顾问，因为预料邻近的军阀即将向他的部队发动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决定满足胡景翼提出的向他的部队派遣顾问的请求。二月二十七日，苏联军事专家从北京去郑州，以便帮助领导和运用他（胡）所拥有的军事力量”。^{〔69〕}

根据以上各方面的史料所载，李大钊和胡景翼开封会谈，以及李大钊在开封的活动，其主要内容应是：

- （一）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军火的分配问题；
- （二）请求苏联派军事顾问到国民二军帮助工作；
- （三）请李大钊派一批青年到国民二军工作；
- （四）李大钊亲自做胡景翼的工作；
- （五）李大钊会见在国民二军工作的共产党员。

李大钊与胡景翼会谈的成功，使胡景翼更加倾向革命，积极实施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工农运动亦随之开展，河南几乎成为北方革命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两次会晤使李大钊对胡景翼的思想言行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计划对胡加以培养教育，作为日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靠同盟者。在李、胡开封会谈期间，大钊同志在与屈武谈到国民军一、二、三军问题时，曾详细地谈了他对胡景翼的看法和打算。屈武写道：

大钊说：冯玉祥、孙岳我都接触过，胡景翼在北京也接触过，可以说胡景翼这个人比那两个人好，不过那时认识还不深刻。通过这两三天接触，我感觉胡这人很好，一是有政治远见；二是有股事业心。他迫切想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起来。建立起来的条件主要靠苏联来支持，一是武器弹药的支持，二是军事人员的支持。……他的这些出发点不象军阀搞自己的势力那样。从政治上是向前看的，是正直的，进步的。他想培养革命的军事力量与军阀的反革命力量相对抗，这是不简单的。^{〔70〕}屈武继续写道，李大钊满怀希望地说：

把胡景翼培养起来，这将来同我党合作是个可靠的人，这个力量培养起来，对我们党的事业是有利的。……现在我们有条件，在武器装备上苏联支援我们不少；在军队顾问方面也不成问题，甚至在同冯玉祥分配军火问题上，可以满足胡的要求，想要多少，就给多少！”^{〔71〕}

正是在这个与中国革命成败攸关的革命军队问题上，李大钊针对陈独秀忽视武装革命的倾向谈了自己的看法。屈武写道，李大

钊说：

他（按：指陈独秀）有些书生气，我要有机会约他到北京来，也同他一起到河南来同胡景翼接触接触，了解了解，使他知道不是他原来他所想象的进步的革命军队和军阀都是一样的想法。^{〔72〕}

可惜的是，大钊同志希望把胡景翼部队改造培养成为一支革命军队，实行武装斗争的想法，由于胡很快地猝然病故而未能实现。

在李、胡开封会谈期间，李大钊还同屈武纵谈中国革命必须建立革命军队，依靠武装斗争的光辉思想。这些谈话，虽然不属于李、胡谈判的内容，但却是李大钊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指导思想，也是他争取胡景翼部队作为同盟军的指导原则。这对了解和研究李大钊同志的整个革命活动和争取整个国民军的工作，是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的。

屈武写道，在河南开封，李大钊还曾为孙中山要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宗旨，同他作过商讨，李大钊对国民会议的性质、作用和前途进行了精闢的分析，指出，在当时的形势下，“用召开会议的办法来解决现实问题恐怕解决不了。”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革命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屈武写道，李大钊非常明确地说：

现在中国革命的最大阻力是军阀势力，……革命是向前发展的，要发展，首先要把军阀势力铲除干净，这是最主要的。军阀势力铲除不了，革命无法向前推进。你召开个国民促进会议，作个决议，就能把军阀武装解除

了？谁肯呢？谁也不会放下武器的。^{〔73〕}

屈武继续写道，李大钊在分析了以帝国主义势力为靠山的各派军阀混战厮杀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打仗”之后，指出：“军阀势力不铲除那怎么行呢？要铲除，就得靠革命的进步军队，同军阀势力对立，斗争。等待时机成熟，利用军阀混战，乘机消灭他们。只要革命武装扩大了，军阀势力就削弱了，经过几次战争，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消灭之”。^{〔74〕}

对这次谈话，屈武深有感慨地说：“李大钊同志当时对革命的深刻论述，对我教育很大，深感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才能，他这次讲话使我印象极深刻，因而能记忆多年。”^{〔75〕}

第一次大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于武装斗争的认识还处于幼稚的水平，但是，李大钊同志却明确而又深刻地提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革命军队”，“经过几次战争”，“消灭和铲除军阀”势力的伟大战略思想，确实不愧为革命武装斗争的倡导者和先驱者。

13. 李大钊帮助国民二军与 王若飞创办北方联合军校

李大钊与胡景翼北京会晤和开封会谈后，为了帮助国民二军，先是派屈武随胡景翼到开封，协助胡稳定河南局势，又派刘天章组建学兵营，为国民二军训练干部；同时，派出一批同志到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条战线，加强基层领导工作，帮助胡景翼经营河南的地方工作。在李大钊的积极争取和支持下，苏联的武器装备也陆续运到国民二军，而且还运来了八架飞

机，为国民二军建立起航空部队。

一九二五年五月，中共中央根据李大钊同志的建议，决定派王若飞同志到河南开展军事统战工作。此时的王若飞，已是经历了法国勤工俭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斗争考验，成为我党杰出的活动家之一。

王若飞由上海到达北京后，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分配到河南国民二军工作。六月，王若飞到达河南。六月七日，他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郑州召开的声援“五卅”运动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后，来到开封国民二军。他根据胡景翼的原计划，首先帮助国民二军创办了北方联合军校。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以西拉尼为组长、拉平为参谋长、包括三十多名军事专家的苏联顾问组到达河南。王若飞在苏联顾问协助下，帮助在胡景翼去世后接任河南督军的岳维峻建立了国民二军管理指挥中心——司令部。

王若飞还在原有学兵营的基础上，又开办了一个模范营，派遣共产党员到这两个营开展工作，发展党员。他邀请苏联顾问对这两个营进行军事训练，同时，抓紧了对学员的政治教育。他还从学员中选派一些有觉悟、有才干的青年到苏联去学习。接着，王若飞又在学兵营和模范营的基础上，开办了四个炮兵班，一个通讯班，九个步兵班，两个骑兵班和一个工程班，使北方联合军校初具规模，学员达到两千四百名。这个军校是模仿广东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其任务是要在提高国民二军的战斗训练水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它的开办就迅速提高了国民二军的军政素质，加强了二军的战斗力。

但是，正当王若飞创建军校的工作卓有成效地进行时，国民

二军内部对北方联合军校的校长人选和办校宗旨问题发生了不同派别的争论。特别是岳维峻任用吴佩孚派进的奸细马祥担任军校的正式职务后，苏联顾问和岳维峻之间也发生了矛盾。这时，吴佩孚也乘机制造舆论，攻击国民二军“增加了赤色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岳维峻不愿再继续执行李大钊与胡景翼会谈协议。对于岳维峻的转向，王若飞从上层到基层都做了不少工作，但已无法挽回逆转的形势。

对于这段历史，苏联派驻国民二军的顾问A·B·勃拉戈达托夫的回忆录《中国革命纪事》所记甚详，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他记述苏联顾问组到达开封后的情况说：

当时决定要集中顾问们的全部精力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为高、中级指挥官开办短期训练班；建立督军管理机关（国民军第二军司令部）；开办一所低级指挥官学校。再就是制定检查国民军第二军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战斗力情况的计划。督军岳维峻审阅了我们的计划和纲领，并表示同意，但一切到此地也就无声无息了。

接着，发生了北方联合军校校长人选的激烈争斗。苏联顾问写道：

国民军第二军内部各派领导人之间因为联合军校校长的人选问题，而进行的角逐，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相当激烈了。

督军胡景翼活着的时候，曾指定国民党左派、前安徽省督军柏文蔚将军任校长。在学校开学时，柏文蔚作为学校的校长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苏联是中国的的朋友，她的代表正在这里参加开学仪式。督军命

令他立即结束讲话。这次事件后，督军自己兼任了校长职务，然后又任命了吴佩孚的一个信徒徐将军任副校长。……由于吴佩孚分子获得了胜利，督军的主要顾问于右任不得不于七月离职，而代之的是吴佩孚分子马祥。这样，所有领导职务都被吴佩孚分子所窃据，他们下达了反对“赤色危险和结社自由”的命令。

勃拉戈达托夫追忆说，在胡景翼在世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公开活动”，“允许集会和结社”，河南的工人运动和党团工作都有很大发展。苏联顾问到达的开始，岳维峻任督军，苏联顾问“只能做些允许他们做的事情”。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于右任担任岳维峻主要顾问以后，苏联顾问“便也可以在部队中进行工作”。“随着吴佩孚在河南影响的加强，顾问们便不断遇到各种障碍”。勃拉戈达托夫记述了国民党中央执委的一个委员给岳维峻的信来证实当时的情况，他写道：

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给督军岳维峻的一封信可以证实这一点。他写道：“在胡景翼任督军期间，不仅将河南的国民党员，而且将其他人团结起来。但你团结了什么人呢？都是马祥一样的恶棍！他们都是直系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反对革命。”^{〔76〕}

正是在河南政局无可改变的逆转下，王若飞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出任豫陕区委书记，从主要投身国民二军与北方联合军校的军事统战工作，改为主要从事党的工作，担负起组建豫陕区委机关和领导豫陕工农运动的任务，他和苏联顾问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北方联合军校也就夭折了。

十八年后在延安整风与总结历史经验时，王若飞在他著名的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长篇讲话中，对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在国民军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他在谈到大革命初期的形势和争论时讲道：那时“全国形势是大发展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暴风式的发展。当时的大事变：广东的商团事变，冯玉祥倒戈（二四年），二五年有两次东征，反奉战争，直奉联合战争，直到首都革命”。“在群众运动上有五卅运动，各地群众运动都起来了。南方革命运动有广东政府的支持，北方有国民军，这是一个热闹时期”。他指出，一九二四年十月“全国局面因冯玉祥之倒戈而发生大变化”。当时国民军受到共产党和苏联大使加拉罕的影响，倾向革命。“当时国民二军胡景翼的部队最大，有二十多万人”，“如果我们能利用此机会发展，完全可能”。他还说，李大钊和胡景翼谈判“在开封设立军校，拟招收二千学生，其规模大于黄埔”^[77]，可惜中途夭折，教训极其深刻。

14. 李大钊领导和开展河南工农运动

由于受李大钊的帮助和孙中山的影响，胡景翼主政河南后，在政治上是比较开明的。他积极推行扶助农工的政策，允许群众进行集会结社，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当时，李大钊和北方区委派了许多同志到河南各条战线的基层，开展群众革命运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中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公开举行。北京段政府获悉后，下令胡景翼解散代表大会，逮捕参加大会的代表。胡景翼拒绝执行，并把大会领导人请来，拿出北京当局的电报给他们看，他公然宣称代表大会可以放心地继续进行下去。

“五卅”运动爆发后，开封、郑州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河南省工会会员人数大为增加。共产党和共青团也接受了一批新的党、团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团员总数增加了四倍。

在此期间，李大钊还加强了对河南农村红枪会运动的领导，把旧式的红枪会改造成为新式的农民武装，推动了河南的农民运动发展，配合了国民革命战争。

红枪会是大革命时期，在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兴起的自发的农民武装。这支农民武装，反对“洋人”（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但却迷信、落后，甚至有的被军阀和土豪劣绅所利用。李大钊对这支农民自发武装力量，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精闢的分析。他认为：“概括地说起来，红枪会确是一种武装自卫的农民团体”，“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并已“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他指出，红枪会的政治作用，不但可以“保卫他们的闾里”，“并且可以崩溃军阀的势力，根本破坏军阀的营垒”。^[78]但是，李大钊并没有满足这种自发的农民武装组织，指出，必须对他们进行改造工作。他号召“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把现在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盟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使“蓬蓬勃勃的农民大运动”，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红枪

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79〕}李大钊同志的这些论断和号召，实际上是为我党提出了红枪会运动的方针政策，指出了红枪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在国民二军管辖期间，李大钊两次亲临河南，除做团结国民二军的工作外，还指导了中原地区的工农运动，过问改造红枪会的工作。大钊同志派往河南工作的王若飞等也积极开展河南的工农运动。在这些杰出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河南的农民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四月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时，全省加入农民协会的会员达到二十七万之众，在红枪会运动的基础上组成的农民自卫军拥有十万人枪。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次誓师北伐前，武汉国民政府明令宣告：“红枪会为河南人民之合法武力”。北伐军进入河南后，贺龙、周逸群签署布告，宣布河南红枪会“系人民团体，农民自卫武装，实合本党目的。”

当北伐军与奉系军阀在河南作战期间，农民协会和红枪会全力以赴支援北伐军作战。在北伐战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战役之一的临颍大战中，因得到红枪会的有力支援，北伐军仅以三师之众击溃数倍于己的奉军主力部队，使奉系军阀在河南全线崩溃，河南战局基本明朗。

河南红枪会在北伐战争中，还有力地配合了冯玉祥国民军的东进。他们破坏敌人交通，袭击奉军后方，使奉军深受威胁而加速北退，冯玉祥得以顺利进军豫西。吴佩孚战败由巩县逃窜时，被巩县红枪会围攻三昼夜，几乎被农民军活捉，使这个不可一世的十四省联军统帅，在红枪会面前犹如丧家之犬，狼狈不堪。

河南红枪会在北伐战争中作出的这些巨大贡献，不能不说是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对红枪会工作的伟大成果；同时，也是

与国民二军管辖河南时所创造的有利条件相联系的。

15. 李大钊二赴开封与力挽中原危机

一九二五年二、三月间，被胡景翼收编的吴佩孚旧部队阚玉琨、张治公，重整旗鼓，盘踞洛阳，在刘镇华指使下，向胡景翼发动进攻，豫西战役爆发。胡景翼亲临前线指挥，经过十余天激战，战事以刘、阚失败而告终。正当胡景翼向孙中山发电告捷之时，不意右臂生疔。接着，中山先生逝世噩耗传来，胡景翼悲痛万分，病情日益恶化，不幸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日与世长辞，终年三十四岁。

胡景翼病重弥留之际，立下了遗嘱，倾吐了他的素志，重申了他的政纲，安排了他的后事，推荐了他的继承人。现将他的遗嘱摘要如下，供作参考。

胡景翼在倾吐了他“对世界观念，以人类互相亲善，永久和平，期臻大邦治之隆为指归”，和“对国事，主张民治”的生平志愿后说：

至于豫省军民两政，本欲积极刷新，期成清明之政治，故网罗人才，邀至名流，欲以豫省为始基，推行全国。如办清乡，肃吏治，兴教育，振实业，重自治，利交通，倡文化等事，到任三月，时间过促。即迁豫西乱事，一切未克办到，仅将教育基金独立恢复，自治实行，差堪告慰。然疚心已多，遗恨靡穷，无以对全省之父老百姓也。……迺来集合同人，正谋善后，欲使孑遗之民，稍获照苏，此愿莫遂，予目难瞑。……予对友军，极端

尊重冯总司令之为人，统兵愈多，而纪律丝毫不紊，模范军三字，当之诚无愧色。我诸将士，务须资为矜式（按：敬重和取法之意），奉为坊表，军国大事，听其主持，必能裨益民人，巩固共和。孙总司令之精密整暇，亦为余所倾服，且彼此为昆季之交，不拘形迹，相印人心。居恒谈及开发西北，移军实边，甚为契合。其所部军队，皆为患难死生之交，休戚相同，缓急可依。故国民一、二、三军，名义上虽有次序之分，精神上毫无畛域之见，凡我将士，永志勿忘。……予对本军观念，切望加意团结，勿稍涣散。岳总司令西峰，辅予有年，劳苦功高，忠诚谨厚，在僚属中，无出其右，予久目为替人，今其时矣。^{〔80〕}

胡景翼的遗嘱最后语重心长地说：

予今年三十有四，报国心长，而事业未半，赍志以歿。诸将士但能遵此遗嘱，以成余志，则余将含笑九泉矣。^{〔81〕}

从以上遗嘱文稿中可以看出，胡景翼病危时仍不忘革命，他谆谆告诫所属，要反帝爱国，打倒列强，建设中国，尊重友军，团结本军。可惜，他却看错了岳维峻，竟推为国民二军继承人，以致铸成大错。

胡景翼死后，冯玉祥获悉，大哭失声。他下令国民军全体官兵挂孝三日致哀，并电告胡父，丧事费用，由冯担任。他还在华山脚下，为胡景翼筑墓营葬。

对于胡景翼的一生，我党给予了正确的评价。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爱国名将胡景翼逝世六十周年座谈

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胡景翼将军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立下的光辉业绩，赞扬胡景翼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爱国的一生。^{〔82〕}同时，在陕西省政协和省民革举行纪念胡景翼逝世六十周年座谈会前夕，习仲勋同志由北京发去《纪念胡景翼将军》的题词。题词写道：

胡景翼将军赤诚爱国，胸怀大志，献身革命，功劳卓著。他整军经武，有智有勇，知人善用，将士归心。他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热心公益，造福人民。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谦荣礼让，平易近人。将军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高尚品德会永放光芒，他的光辉业绩会永垂史册。^{〔83〕}

这就是我们党对胡景翼光荣一生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胡景翼病故后，其军政职务由国民二军第二步兵师师长岳维峻继任。岳维峻继任初期，口头上表示愿意按照胡的临终遗嘱行事；但是这个人思想落后，政治反动，实际上并不很好执行胡景翼在世时制定的各方面政策。他排斥胡景翼的旧人，疏远开明的国民党的元老，冷落共产党人，信用吴佩孚分子。

国民二军的成份原本就很复杂，宗系很多。胡景翼在世时把一些军阀部队收编易帜，归属国民二军，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慑于胡景翼当时的威望和实力，这些派系部队尚不敢轻举妄动。胡去世后，他们并不甘心岳维峻接任督军，而岳的才能也不足驾驭这样一支复杂的部队，于是便展开了争夺督军的激烈斗争，甚至以武力互相威胁，只是由于奉军张作霖入关，沿京汉路向南挺进，威胁国民二军，这才迫使国民二军的各派将领达成妥协，同意岳维峻做胡景翼的继承人，但斗争并没结束。从岳继任督军

之日起，各派均想把督军置于自己的影响和控制下。岳维峻的总顾问虽然由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担任，但几个主要顾问却由各个集团分摊担任。不久，吴佩孚将自己的心腹马祥派来充当督军顾问，吴佩孚分子就逐渐代替和压倒了国民党人，派系矛盾愈演愈烈。

随着岳维峻地位的巩固，他“野心毕落，积极备战，不顾国民二军实力和后方实力，准备向外扩张地盘，计划东攻山东，南打湖北，北取保定，西取山西，即所谓的‘杀四门’”。〔84〕

国民二军的逆转，造成河南与中原的危局。当时，在河南的苏联顾问团向李大钊报告了岳维峻“杀四门”的计划。李大钊深感河南形势十分严重，为了争取岳维峻，扭转中原危局，在紧急关头，于四月间偕同于右任第二次来到开封。

李大钊到达开封的第二天上午，即由刘允臣、胡景铨陪同前往督军办公署会见岳维峻。当时，岳正躺在床上吸大烟。李大钊风趣地说：没关系，不要急，你吸你的大烟，等会儿再谈事情。岳非常尴尬，慌忙起来到会客室，接待李大钊和于右任。

李大钊问岳：“现在局势紧张，你准备打谁？”

岳答：“最近张之江派人来找我，说是准备联络吴佩孚，攻打奉军。”

李大钊根据北方各地军情，劝岳：“目前，奉军的威胁还不算大，应该集中力量先打吴佩孚。不要弄着这一摊，又搞那一摊。”并且告诉岳，攻打吴佩孚问题，他已在京汉铁路工人中安排好了。

在李大钊透辟入理的劝说下，岳不得不在表面上同意不“杀四门”。同时，为了巩固他在河南的地位，他乘机向李大钊提出继

续向国民二军派人，以加强实力的要求。

在会谈中，李大钊向岳宣传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希望他支持工农运动，并具体提出了豫陕区委工作人员的交通问题，要他给来往豫陕之间的区委人员以乘车的方便。岳满口答应，当即写了张条子：“马文彦^{〔85〕}要票就给，不论等级。”^{〔86〕}豫陕区委的交通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李大钊在开封期间，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专程从郑州到开封，向大钊同志汇报了党的工作情况。李大钊还在开封各学校及民众团体欢迎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李岳会谈后，大钊同志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旋即返回北京。

此时，屈武也回到了河南国民二军。据屈武同志回忆，由于岳维峻的反动本性未改，扩张野心日炽，大钊同志对他的谆谆劝说未能生效。李大钊离开开封不久，岳维峻的反共面目就暴露无余。六、七月间，他改组了北方联合军校的领导集团，免去了胡景翼生前推荐的国民党左派分子柏文蔚的校长职务。督军总顾问于右任于是愤而去职。他还下令禁止群众自由集会结社，使河南的群众革命运动再度陷入反动的禁锢之中。

一九二五年十月，岳维峻暗中勾结吴佩孚召开了鸡公山会议，秘密联络孙传芳召开了徐州会议，约定进攻山东奉军，以实现他扩张领土的野心。当时，他执掌着号称二十万之众的大军，踌躇满志，胃口甚大，不仅要囊括山东，而且要鲸吞山西。他组织了进攻山东的兵力，也作了攻打山西的部署。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中旬，岳维峻以李纪才为总指挥，率收编的原靳云鹗部和吴佩孚降将陈文钊的第四师、王维蔚的第五师、田维勤的混成旅、马乾三的骑兵旅、李养泉的第一师第二旅、刘佩蓉的炮兵团等，分两路进攻山东。结果，由于内部不和，陈文

1
3

钊等叛变，国民二军大败。直奉军阀闻讯，乘隙向河南发动进攻，岳维峻被迫放弃开封，弃师西逃，渡河入晋，被晋军抓获，当了俘虏。国民二军余部退入陕西，吴佩孚进占开封。从此，河南又沦为直系统治，人民群众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
3

由于岳维峻不听李大钊劝告，抛弃了胡景翼的革命政策，失去了军心民心，外受直奉军阀强大压力，内部分崩离析，导致了国民二军的溃败，使革命成果毁于一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六、李大钊策动郭松龄联冯倒奉

16. 全国革命高潮与党的反奉统一战线

北京政变后，奉系军阀野心日炽，积极扩大关内地盘，伸张势力于沿海及长江各省，取皖系势力而代之。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督办，分别由奉系将领李景林、张宗昌、姜登选担任，并以邢士廉部进占上海一带。他们排斥和压迫冯玉祥的国民军，借口保卫京师，进逼北京，在政治上，奉系军阀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对人民抽捐筹饷，横征暴敛。在“五卅”运动中，秉承帝国主义旨意，镇压工人运动，屠杀罢工群众和爱国同胞。因此，奉系军阀在当时已成为北方最大的反动势力，帝国主义者在华的最忠实的走狗，中国人民的死敌。

“五卅”运动后，全国的反帝国主义怒潮更加汹涌澎湃。在北方，李大钊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关税自主运动。

一九二五年八月，驻京美使马克谟正式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中国政府择定日期、地点，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帝国主义者公开要求中国应先“恢复相当的秩序”，要求实行禁止一切反帝国主义言论、团体和出版物的法律，然后他们就可以修改关税协定，作出让步。不难看出，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企图利用关税问题，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扼杀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并以此

为诱饵，收买一部分资产阶级，分裂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对帝国主义抛出的“增加二五税率”的这根骨头，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控制下的段祺瑞政府，视为“唯一的续命汤”，竟不顾人民反对，全力支持关税会议的召开。他们在九月下令封闭了上海总工会，作为换取“关税会议”的进见礼，并积极准备会议的召开。

在帝国主义通过关税会议向中国人民发动的新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尖锐而严正地指出，“帝国主义者那种二五附加税的让步已经欺骗不了中国人民了，已经缓和不了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了”。^{〔87〕}党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不要受帝国主义的恐吓和欺诈，坚决反对关税会议。

在北方，李大钊和北方区委领导和组织各界人民，为反对召开关税会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了引导人民群众认清帝国主义反动本性，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开展斗争，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党的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表《告工农学生军人书》，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运动之下高喊收回关税自主权，更应该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媚外军阀民族革命的口号之下高喊收回关税自由权。”^{〔88〕}大钊同志还通过进步团体和报纸刊物，并亲自发表演说，用大量事实，彻底揭露了关税会议的侵略本质，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激发人民群众的斗志。大钊同志还在段祺瑞政府召开关税会议前后，组织了多次要求关税自由、反对关税会议的示威游行，这些游行示威，都遭到了段政府军警的阻挠、殴打和破坏。

十一月十日，在大钊同志领导下，由全国学生总会等各界进步团体发起，组织了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研究与决定了运

动的指导方针，同时发出通电，要段祺瑞即日下野，滚出北京。

接着，十一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组织领导下，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大钊同志亲自带领群众高呼：“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解散关税会议！”等口号。群众的游行队伍同段张的军警进行了英勇搏斗，冲破军警包围，浩浩荡荡冲向段政府所在地。二十八日，示威群众还一度包围了段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游行大队还开往段祺瑞的住宅，准备举行群众公审，驱逐段祺瑞下台。二十九日，大钊同志又率领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通过了“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等决议案。会后，又举行了盛大游行示威。

这次由李大钊和北方区委领导的关税自主运动，给反动军阀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一个反奉倒段运动在全国迅速形成。

一九二五年十月，同奉系军阀存在着深刻矛盾的孙传芳与吴佩孚，也利用人民群众的反奉情绪，发动了反奉战争。十月十五日，孙传芳通电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向奉系宣战。蜷居岳阳的吴佩孚也乘机跑到汉口，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通电讨奉，妄图东山再起。在孙、吴联合进攻下，奉军迅速从上海、南京及津浦线溃败，退回山东。孙传芳五路向前猛进，占据徐州。对于国民军，奉军先是派人约请联合进攻孙传芳，被冯玉祥拒绝。于是，张作霖下令李景林、郭松龄进攻国民军。国民军积极备战，准备迎敌。

在此激剧变化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为了指导

反奉运动的深入发展，发表了《对反奉战争宣言》，指出：

反奉战争已经开始了！此次战争现在虽只在江浙范围，马上会蔓延到全部直系军阀及北方国民军对奉联合作战。

宣言指出了反奉战争的广泛性及其与直奉战争的区别：

去年的直奉战争，交战者虽只是直系与奉系两派军阀，而人民间因贿选而反直的空气，实与直方以很大的打击；现在因压迫爱国运动而反奉的空气，比去年反直的空气浓厚百倍，普遍而且深入一切民众之中，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

宣言分析了军队对这场反奉战争的态度，指出：

南方的十余万国民政府的军队固然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反对奉军，北方四十万国民军，也同情于民众的爱国运动而反对奉军。

宣言在明确了反奉战争“虽然搀和了一些军阀势力，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后，对反奉战争的目的和各项任务作了规定，指出：

全国的民众反奉战争之目的，乃是从释放爱国运动中的政治犯，启封爱国机关，解除奉系和安福系的武装，……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权，一直到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19〕}

中共中央还致电冯玉祥及国民军，要他们应为人民自由

及解放中国，亟起反奉。

当时，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也进行了清醒的分析，号召人民积极参加反奉运动，确定了支持国民军促成反奉各派武力联合的正确策略，并强调指出：

我们现在的策略：必须促成打倒奉系军阀的胜利，以至于最后完全消灭奉系军阀。但同时无论如何，我们又不能让直系军阀，在奉系军阀失败之后，恢复他们原有势力。^{〔90〕}

大钊同志还对当时国民军、奉军、直军三种武装力量，作了如下分析：

综观时局的现象，在北方，奉系军阀已经沮丧于民众威力所指导的反奉联合战线之前。奉军所以不敢逼入京畿的原故，民众反奉的气势亦颇为有力。反之国民军因为得到民众的援助，虽然尚未加入战争，而所处的地位，比以前已较为巩固。直系军阀，此次乘民众反奉的怒潮而再起，其初虽藉口于奉系军阀之如何压迫民众为其发展的理由，但其自身在沪各处的行动，压迫民众，仍与奉系军阀同其行径。全国民众对于照样压迫民众的直系应即提出严重的抗议，切实指出直系压迫民众的事实，而直系知道他如不改易其类似奉系军阀的行动，民众将以其曾经反抗奉系者以反抗直系，则直系亦终于继奉系以后为民众所征服而已。在南方，广州革命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于荡平东江之后，西江以及南部，亦将指日肃清了。这些事实，都是民众势力发展的验证，亦是民众势力作最后胜利以结束国民战争的联兆。^{〔91〕}

基于以上形势的分析,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认为,这时存在着推翻军阀政府,迫使段祺瑞政府“还政于民”的有利条件。因此,他积极支持国民军,促进反奉各派的联合。他曾经组织铁路工人帮助国民军运送军需物资,并在天津附近组织武装配合反奉战争。

17. 李大钊策动郭松龄倒戈反奉

不仅如此,大钊同志还秘密地与奉军将领郭松龄联系,促进郭松龄联冯倒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间,郭、冯之间经过多次商谈,达成联合反奉协议。十一月廿二日,驻扎在滦州的郭松龄通电起义,倒戈反奉。

郭松龄举义后,我党、团中央立即发表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宣言指出:

数月以来,本党继续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现在反奉运动已从奉系军阀内部爆发出来了。这种爆发,一面看出全国反奉的高潮已压得奉系军阀不得不分化而溃裂,使反奉运动易于成功;一面可以看出民众未有武装的积极行动及国民军之犹豫,使反奉运动不流血的成功,其结果在此次反奉运动中,不但有直系军阀势力,并且有奉系军阀势力。^{〔92〕}

郭松龄倒戈反奉,一般历史记载均归因于奉系军阀内部矛盾重重,这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殊不知在爆发这一政治事件的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个强大的动力,即:“大钊同志还亲自与郭松龄联系,促进他倒戈反奉。”^{〔93〕}正是大钊同志派人

龄进行了积极的争取工作，经过一段酝酿，使郭松龄的思想向着革命方向转化，因此，当奉军内部矛盾激化，郭松龄处于困难境地时，便毅然联冯反奉，从滦州回师东北。

关于李大钊对郭松龄的争取工作，我们目前还未找到详细的历史记载，但据可以查到的正反两方面史料来看，应当是确信无疑的。现将有关资料节录于后，供读者研究参考。

廖华所著《任国桢同志传略》中记载说：

李大钊同志还亲自作郭松龄等奉军将领的工作，联络他们参加反帝、反奉战线。在“五卅”运动高潮中，李大钊同志以中国国民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派遣共产党员任国桢和国民党员钱公来、朱霁青等到奉天，指令他们一方面发动学生、工人、市民参加反日、反奉运动，同时界以与郭松龄接洽的任务。据任国桢兄弟任国栋同志回忆：“任国桢到奉天后，与郭松龄秘密联系，策动郭松龄倒戈。当时国共合作，国民党派钱公来、朱霁青，共产党派任国桢。钱公来管党，任国桢和朱霁青管财政。”^{〔94〕}

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逮捕人员及起诉等情形》中所载，与上述材料，可谓首尾相联。该项材料载，一九二五年八月间：

……任国桢受李大钊派遣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时，任国桢与朱霁青在哈埠积极进行援郭活动，任国桢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进行过秘密接触，洽商接济郭松龄武器弹药及款项问题。^{〔95〕}

上述材料已经充分肯定了李大钊对郭松龄倒戈反奉所起的积极促进作用。对这一点，延安整风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同志也曾指出：“此时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前郭与李大钊有关”。^{〔96〕}

另外，从许多反面材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据《郭松龄将军》一书记载：

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松井七夫，在他写给日本外务省的秘密报告中，反复强调说郭松龄的政治主张是受了“赤化党”，“过激党”的影响。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在一份秘密报告中，也以肯定的文字述说：“郭将以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作——原引者注）之主义，政策为政纲，”

“郭与冯玉祥有可靠之联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加藤高明，于十二月三日回答政友会总务会长山本条太郎等三人询问时说：“关于郭松龄，听说俄国方面提供了武器弹药……”，以张作霖名义向三省发布的“防范赤化党人”的通令中，有“张上将军查郭松龄之反叛，系受赤化运动之煽动，而赤党之宣传以哈埠为最甚”。^{〔97〕}

由此可见，郭松龄在滦州举兵反奉，李大钊确实起了直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在起义前后，也确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方面有过密切联系，得到了政治上的帮助和物质上的支援。

18. 郭松龄、冯玉祥反奉密约

郭松龄倒戈的直接诱因，是他与张作霖的矛盾趋于激化。

郭松龄，字茂辰，辽宁沈阳人，毕业于陆军大学。年轻时受辛亥革命影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甚为痛恨。曾只身赴广州，追随革命先辈。后归沈阳，暂栖身于张作霖部下，但他对张作霖穷兵黩武，攻城略地很不满意，因而蓄意于革命。他曾在东北讲武堂任教官，是张学良的老师。张学良对他的才学非常赏识，推荐他当了少校参谋，后升任团长，旅长。

奉军内部有新旧两派之分，互相倾轧，由来已久。新派中又分为士官派与大学派。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领袖，矛盾十分激烈。由于士官派比较得势，而郭松龄才高力厚又深受杨宇霆等人的忌妒，因此，在张作霖面前郭屡遭谗言，得不到信任和重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张作相等均任省督办，各踞优越地盘，而郭松龄却无所得，仍屈居张学良之下任付军长，因此他与张作霖、杨宇霆等的矛盾更为加深。

反奉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命令郭松龄统兵进攻国民军。郭虽遵令入关，但却避战主和，他自己也称病住进天津法国医院。张作霖曾疑其中有鬼，三次电召郭回奉，郭拒不奉命。张作霖又派张学良携攻击令入关，郭极力陈述不可战的理由，张学良无可奈何地返回东北。当国民二军进占保定后，张作霖勃然大怒说：我们退出保定，他们就进占，看来，只能与国民军决一死战，别无他途。他召集会议，拍案大骂主和者误了他的大事，并且故意问杨宇霆说，谁是最积极的主和者？杨宇霆回答：郭松龄和李景林。张作霖当时就要发电召回郭、李。王树常等人劝阻说，李、郭都掌握重兵，只能缓图，不可急决。张作霖于是电令郭、李速赴直鲁防御，并严加申斥。第二天，张又电李即日夺回大名等

地；令郭部集中滦州，回奉听候面命。郭、李接电后，知道事已危急，连夜密谈，约定联冯反奉。郭遂即派人至包头国民军总司令部见冯玉祥，商谈合作反奉。冯玉祥早已了解郭的为人，知道他有志于革命，同意一致行动，并以兵力作为郭的后盾。郭冯联合反奉密约签定后，郭松龄在天津积极进行了一切准备。十一月廿二日，郭松龄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在滦州举行了起义。

关于冯玉祥与郭松龄签订反奉密约的前后情况及密约内容，冯玉祥的《我的生活》和日记，《国民军史稿》和《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中均有详细记载，其梗概内容大致相同。其中《我的生活》和冯玉祥日记中所载更为翔实和珍贵，阅后可以使人对冯郭联合的历史原因、过程、结果一目了然，故摘录于后。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日本举行秋操，约请国民军和东北军前往参观。我们国民军选派军官七、八人，以韩复榘为领队，东北军方面领导者则为郭松龄氏。两方面人员到了东京，同住在一起。却说那位郭松龄虽然列身奉系，为人却极是忠正而有血性，目睹国内情状，国际处境，对于张作霖骑横恣纵，殃民祸国的行为，久怀不满之心。一天郭找韩密谈，说有一件希奇特别的事，不知可不可以相告。原来他这次被奉派到日本之后，日本参谋本部就有一位重要职员跑来访问，问他这次来日本是否还兼有代表张作霖签定密约的任务。他茫然不知所谓。那位重要的职员也就珊珊地走了。但郭却把此事放心不下，百般探听，才知道最近奉方拟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国民军。这个密约已经完全商洽成熟，最近奉方致电日本，说签字代表

已经动身，即日可到东京，正式立约云云。恰巧郭于此时来日参观秋操，日本即以为郭是奉张派来的签字代表。其实签字代表乃于冲汉，迟到了数日。郭松龄查悉了这件害国殃民的阴谋，一时激于义愤，不可遏制，便毅然把全部密约条文，对韩复榘坦白说出。当时他愤慨说道：

“国家危殆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权利，出卖国家。他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韩复榘回到包头，将此事同我报告，请示我的意见。我说：“这事情关系太大，不要轻率地乱做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什么东西，派两个亲信的人送来，两下从长商酌一下，方显得慎重其事。”韩复榘到天津不久，郭的参谋长同他的弟弟郭大鸣便来到包头。他们带来了郭所拟具的亲笔条款，共四、五项，大意是：

一，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擅订祸国条约，以图进攻国民军，此事他誓死反对。

二，奉张进攻国民军时，他即攻张。他的部队改用“国民军第四军”或“东北国民军”番号。

三，他愿率部出兵，专门开发东北，决不与问关内之事。

四，河北、热河，拟请划归李景林。

在条文后，他已经把字签好了。对于上述条款，我

除建议他的部队改称“东北国民军”外，其余都予以赞成。另外我又写了“严军纪，爱百姓，就是真同志”的几句话，交给他的代表带回天津去。^{〔98〕}

关于签约的过程，《冯玉祥日记》中也有记载：

二十日 八点，令王乃模与郭松龄之代表谈话。……李都统、宋师长来，告以解决时局之方法，及今早与郭松龄代表接洽之情形，并令宋师长带骑兵两师往多伦，牵制热河之奉军。

二十四日……八点半，臆司令电告：郭松龄发动，山海关方面奉军已有变化，旋同李都统、张师长等，讨论解决时局之办法。

二十五日 七点半起，阅公事，知郭松龄反张已发动。乃将此种情形告知：李都统、张师长、佟旅长、冯旅长。八点通电张下野，来历述其应下野之理由有：

（一）全国民情，早已共弃；（二）纵容军队，解散学生，残害工人；（三）赞成帝制，仇视国民军，历年兴兵，动摇国本。……

二十七日 七点，与连长以上军官讲话……问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合乎忠义否？或答不忠不义，或答忠义两全。余告之曰：郭忠于国民，不忠于一人，实大仁大义大忠也。……十点，王乃模、熊斌同郭松龄代表来见。^{〔99〕}

关于郭冯密约的内容，《国民军史稿》和《国民军革命史初稿》均有记载，条款虽有简繁的不同，但其主要之点均与《我的生活》中所述相同，即：在政治上排除军阀专制，消除战祸，实

行民主；在经营地区划分上，冯玉祥治理京汉路以西的西北地区，郭松龄开发东北，李景林经营直隶和热河；在军事上，郭松龄进攻东北，冯玉祥应全力援助。至于密约全文，《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上）所载甚详，兹录于后：

冯郭革命密约全文

甲（指冯）乙（指郭）系同志结合，为达到左列革命目的，公定条约如下：

- （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
- （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
- （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
- （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

A，直隶、热河，均归丙（指李）治理，甲为贯彻和平主张，对热河决不攻取。保大京汉线，甲军随意驻扎，但直省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决不侵夺。山东听其自然变化，但黄河以北各县，由丙军驻扎，收入亦归山东。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之。

B，乙为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内蒙古，使国民生活愉快，消除隐患，拥护中央，促进国家统一起见，改造东三省政府。前项改造事业，甲以诚意赞助之，并牵扯反对方面。

C，乙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

- （五）以后两军，犯左列条件之一者，此约无效。

A，为攘夺权利，向内地各省战争。

B，为达前项战争目的，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国借款。

C，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

(六) 中央政府之组织及施政方针，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及断送权利为限，悉依国民公意，甲乙两军，竭诚拥护，决不干涉及掣肘。

(七) 此约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冯玉祥印。

十四，十一，二十。

郭松龄印。

十四，十一，二十二。

从以上密约全文来看，冯郭不仅订立了军事同盟，而且宣布了共同遵守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应当说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文件。

19. 郭松龄直捣奉天与国民军击破李景林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郭松龄在郭冯密约上签字后，立即从他称病住进的法国医院，赶到滦州召开军事会议。会上，郭松龄历数了张作霖的罪状和杨宇霆助纣为虐的事实，诉说了这次反戈倒奉的苦衷与原委，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将领的赞同；同时将几个表示异议的将领加以逮捕，交给李景林拘押起来。郭松龄还捕获了张作霖的忠实帮凶、曾任安徽省督办的姜登选，执行枪决。

当天，郭松龄向全国发出声讨张作霖的通电，揭开了倒戈反奉战争的序幕。这封长达一千五百余字的电文，痛数了张作霖包藏祸心，挑起内战，压迫人民，搜刮民财的种种罪行，以及所造成的“现金告匮”，“价格日亏”，“僵尸盈前，蒿草载道”的惨

景。通电劝张作霖下台，“婆婆岁月，玩赏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表示拥戴张学良主政，而他自己“愿遵命助勤，竭诚匡佐。更弼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豁除兴轮。严刁以除盗贼，厚廩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迁劳工，以消激党。黄（按：音洪，学校）舍矢于普及，宝藏期于尽宣”^{〔100〕}

从通电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郭松龄对张家父子所持态度的苦心。对张氏父子，一律反对，似觉不妥，因而反其父拥其子。但是，这种谏议当然不可能实现。张作霖决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去过“玩赏烟霞”的神仙生活，张学良也不可能与郭同反其父而自立为“王”。

郭松龄在通电劝张作霖下台的同时，还通电将所部编为“东北国民军”。电文如下：

松龄此次班师，纯为救国保民，所有愚衷，前已奉达。兹为贯彻宗旨，特改编本军为东北国民军，誓必同心以救国，不供内乱之牺牲。众惜一致，海谋金同，谨电奉闻，诸希垂教。^{〔101〕}

郭松龄在发出反奉通电之后，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发出通电请黜杨宇霆，指责杨是“不惜国家安危”，“不念人民之痛苦”的战争罪魁，是奉军的唯一主战者，“要求万恶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

未过几天，郭松龄感到“对杨宇霆祸首罪状，仍有不能已言者”，于是又发出第二次请黜杨宇霆的通电，痛斥“杨之为，人，残恶性成，阴险万状。排除异己，嫉妒老成”，“遍树死党，滥用职权，苛敛民财，诛求无厌”。表示“一俟将祸首驱逐以后，

即行率同部曲，屯垦边境，以固国防”。^{〔102〕}

在发表通电的同时，郭松龄迅速将所部七个整师改编为五个正规军，总兵力达七万人。并遂即作了军事行动的部署：以主力第一军（军长刘振东）长驱入奉。第二军（军长刘伟）与山海关附近之张作相、汲金纯两部，先行谈判，争取他们一致革命，否则武力解决。第三军（军长范浦江）进军热河，先劝阎朝玺部合作，否则与之一战。第四军（军长霁云）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第五军成立稍晚，以魏益三为军长，留守关内，以防李景林从背后袭击。

本来，郭松龄联冯反奉，是征得李景林的赞同的。但是，李景林因老母妻子均在奉天，恐遭张作霖的杀害，便背约抽身，只允保持中立，不在反奉宣言上签字。郭松龄担心李景林出尔反尔，赴滦后将铁路的一部分破坏，截断津滦交通，并编成第五军留后，以免被李景林乘机断后。

郭松龄部署既定，动员誓师，兴兵返奉，大军星夜向关外挺进。

对于郭松龄的举兵，张作霖开始以为无关大局，认为只要杨宇霆出走，一定可以解决。于是让杨宇霆辞职去大连，避开郭的锋芒。与此同时，张学良听说郭松龄反奉，绕道大连至天津，派人约郭松龄至绥中晤商，说无事不可解决，并保证郭在绥中的生命安全。郭松龄自知回奉自身难保，于是给张学良写了一封婉词拒绝的回信。信中赞奉张学良的知遇之恩，说此次举兵也是为了拥戴张学良，只不过是要“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因此请张学良谅解，如果认为这样作不妥，可以指示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张学良将郭的复信报告张作霖后，张作霖要张学良用电话告诉郭松龄，他派张学良前来查办，并对郭将有严重处置。郭接电话后，又给张写了一封“绝交”回信。

回信开头就指出，张学良对郭松龄的关系至此已发生了变化，“是我公于松龄，已无爱惜之心”；但是郭松龄还是本着“古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态度，对张提出“最后忠告”。信中陈述了郭松龄班师的六条原因，指出：一是张氏父子，不顾人民和士兵的死活，妄想“征服各省，入掌中柜”；二是东北财源枯竭，“胡匪遍地，人民不能安居，不思治理”；三是东北的“大好国土，让与外人”；四是此次奉军入关，系“为姜杨争地盘，为将军争总统”的不义之战；五是部队“饷糈（按：音胥，粮食）拆耗”，士卒“进不得饱，死无人恤”；六是“新兵强募，不教而杀，实所不忍”。

信中列举了张学良四个问题，要他反省：一是“为人多疑，好杀心滋”，奉军功臣不少是“狡兔死，走狗烹”；二是郭松龄与李景林“无年不战”，屡立战功，但却得不到信用；三是每当临战处于不利形势时，就想舍弃将士，只身出走；四是忠于张作霖一人，而不顾“数十万官兵生命，东三省国民膏血”，不忠于国家人民。

回信最后对张学良提出期望，说：“愿我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梟桀；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13〕}

上述郭松龄发难之初的各次通电和信件，对奉系军阀黑暗内幕及派系之间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真相，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对郭松龄同奉张父子历史关系的演变，以及联冯倒奉的背

景与根源作了深刻详细的陈述；对张作霖软硬兼施的手段，给予坚定的回答。张作霖再无计可施，又听山海关危机，于是决定讨郭。

开始，张作霖设第一防线于山海关，第二防线于石山坦，第三防线于辽河。并以张学良为总司令，召回杨宇霆为参谋长，率卫队及一师、一旅之众，以绥中为大本营，横断京奉铁路，截止东北国民军。

郭松龄部在山海关附近，与山海关守将张作相部激战，廿七日占领山海关。张作相丧师大半，退守万家屯。在绥西一带的汲金纯部也不久被郭军解除武装。郭松龄自占山海关后，即由汤河进军秦皇岛，张学良退守葫芦岛。郭军遂长驱推进，直至前所。在前所阻止郭军出关热河的阚朝玺军，也放弃热河，撤至锦州。

在郭松龄通电和兴兵后，冯玉祥为了援助郭军，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致书张作霖，请其下野。信中列举了张作霖应当引退的三条理由：一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张作霖已经是“全国民情，既已共弃”了；二是“五卅”惨案中“解散学生，残害工人”，“自宜引咎自责，以谢国人”；三是仇视民国，操纵内战，违背世界新潮流。冯玉祥劝张作霖要看清世界潮流，“毅然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104]

冯玉祥在通电促张下野的同时，派宋哲元率部进军热河，从奉军背后配合郭松龄。郭得到国民军援助后，进军更加猛烈。

正当郭松龄节节胜利，张作霖屡战屡败，奉军老巢沈阳朝不保夕的危机情况下，张作霖派杨宇霆去大连，加紧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策划对反奉营垒内部进行分化与破坏。他们选中了李景林这个一开始就表现不稳定的分子。日本方面以帮助枪械和保

证安全为钓饵，诱李景林反郭助奉。李景林本来就担心留在沈阳的家小，又见有利可图，同时对国民二军占据保定、大名，耿耿于怀，竟公然背信弃义，决定助奉、制郭、攻冯。他释放了郭松龄交给他管押的奉系分子，诬蔑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赤化”，积极对国民军进行战备。

郭松龄得知李景林背约，写信婉言规劝，希望他迷途知返，弃旧图新。信中提醒李景林说：“顷者联合冯军，共揭斯旨。盟书俱在，部曲咸知。既荷赞成之雅，自无逆臆之人心。”意思是说，与冯玉祥联盟是你所赞成的，人所共知，你是不会违背的。信中还说，诬国民军过激，是“忌者中伤”。来信还回顾了郭李生死之交的友情，希望互相信任，不要中了反间之计。^{〔165〕}

郭松龄原以为此信可以使李景林免除误会，幡然悔悟，殊不知李景林的变化并非由国民军引起的。李景林接信后，丝毫无动于衷，对国民军咄咄进逼。

对于李景林的背信弃义，冯玉祥有如实记录：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三日 八点，李筱垣来，谈李景林近日之态度。

四日 九点，王乃模，熊斌由天津耑返。谓李景林自称直鲁联军总司令。

八日 七点，郭松龄电称，奉张已离沈阳。九点，令秘书长拟讨李景林之通电。^{〔166〕}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冯玉祥通电讨伐李景林，并派张之江为攻津总司令，率部前进，在杨村附近，与李军开始接触。

当时，李景林约有六、七万人，以三分之一分布于南线王良庄、静海、马厂之间，以防御国民二军、三军。以五分之二，部

署在西、北线北仓、汉沟镇、韩家墅、军粮城、杨柳青、王庆坨等地，以防御国民一军。

国民军方面，最初由张之江部，三路进攻杨村、北仓、王庆坨，因兵力单薄，未能进展。以后，陆续派李鸣钟、宋哲元、鹿钟麟部参加。二十二日，冯玉祥下令进攻，经过步兵、骑兵、炮兵和装甲车的猛攻，当日，李鸣钟部进占汉沟镇；宋哲元部占领西堤头；孙连仲部与由南路北进的国民二军邓宝珊部夹攻杨柳青，李景林军不支，向天津败退。此时，国民三军徐永昌部击退了独流、静海的李军；驻滦州之唐之道师也连克塘沽、军粮城。国民军形成了对天津的合围之势，李军虽负隅顽抗，但已溃不成军。二十三日下午，李景林换上便衣到穆家庄视察，见士兵向西站溃退，知道大势已去，逃入英租界，溃兵逃至西沽一带，旋即被歼。二十四日，国民军一军各部与国民军二、三军各部会师天津，战事遂告结束。

李景林逃入英租界后，由日本巡洋舰护送至青岛，然后到济南与张宗昌会合，阴谋东山再起。

20. 郭军攻败垂成与李钊悼念郭松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初，郭军刘振东部乘胜前进，占领兴城、连山等地。接着，郭军击破张作霖布置在大凌河、石山坦迤西的第二防线，于十二月五日进占锦州，奉军溃退。

张作霖自感无力抵抗，于十二月六日，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众人见大势已去，束手无策。张作霖于是准备了“宣布下野意见”^{〔107〕}十二月八日，张作霖携带他的家私离开沈阳，奉垣要人，

也纷纷外逃。

据有人回忆，张作霖当时真是惶惶不可终日。他“整天躺在小火炕上抽大烟，他抽一会烟，又起来在屋内来回走，口口声声骂小六子，自悔误信鬼子、六子”。^{〔108〕}张作霖之狼狈像可谓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危在旦夕的张作霖在苟延残喘中，加紧了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并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换取日本人的援助，以保住他在东北的张家小朝廷。

早在郭松龄倒戈时，日本侵略者就痛感这一事件将直接威胁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日本关东军、外务省、参谋本部和“满铁会社”，无不极力主张干涉。

郭军倒戈的第三天，即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满蒙”与日本有密切关系，对“满蒙”发生的事件，日本不能持“旁观”态度。接着，便大造谣言，胡说郭军“赤化”，“苏联进攻满州”等等，声明要“出兵护侨”。^{〔109〕}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二日，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松井七夫和“满铁”总裁，先后致电“外务者”，请求“扶持张作霖”。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在杨宇霆代表张作霖去大连请援后，派他的参谋长斋藤来到沈阳，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邀请张作霖在“满铁”属地沈阳旅馆会面。

会面中，斋藤表示，奉军如有需要，日本方面“情愿协助一切”。张提出，“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我想去旅顺暂避，希望关东军予以方便”。斋藤满口答应，并进一步说：“不过，我看不要紧，即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要通知他们，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时，关东军还可以出

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阁下若能同意这种作法，即请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阁下认为可行的话，即请在书面上签字。斋藤随即拿出打印好的五项要求，让人念给张听。这五项要求的内容是：

① 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

② 间岛地区（即延边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③ 吉敦铁路（吉林到敦化）的延长，并与图门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④ 洮昌道（指奉省西北部一带）所属各县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⑤ 以上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中日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听完这五项要求，不加思索地说：“行，行。”随即在草约上签了字。张作霖还以个人名义向日方借了三百万日元，以备去旅顺时使用。^{〔110〕}

关于张作霖的卖国行为，当年奉天代理省长王永江也说，当郭军占领锦州时，张作霖马上慌了神，沉不住气了：

没和任何人商量，就自己同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的日本军官签订了一项密约。密约的内容，主要是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交换条件是日本关东军答应对郭松龄发出警告，警告郭军不得在“满铁”沿线二十里内落下一枚炮弹，并在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可出兵保护张作霖和担负维持奉天省城的治安。^{〔111〕}当年的《民国日报》还揭露：

张作霖已订卖国条约内容为：日本出兵四万助张，日兵待遇及薪金一如中国营长，有死亡者每人给予一万元。^{〔112〕}

日、张密约签订后，十二月八日，日本内阁立即作出决定，令关东军“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113〕}当天，日本关东军即发出了“警告”，声称：“满洲之帝国臣民有数十万众，经营事业有极大之投资，故铁道附属地之权利保障，极关重要……。如有不幸和危害之时，本司令当取必要的武备。”^{〔114〕}并声明，禁止中国军队在铁路沿线附近作战。

十二月九日，在关东军司令部“扶张抑郭”的命令下达后，日军第十师司令部由辽阳移驻沈阳，第六十三步兵联队、旅顺口炮兵一队、公主岭骑兵一队，也随第十师司令部向沈阳附近集中。十三日，日本内阁作出增兵满洲的决定，将驻朝鲜龙山的日军三千五百人，调往奉天。居留奉天的日本人组成了“自卫团”；在附属地设置电网，南满铁路沿线两旁二十里边界村落，均挂日本旗帜，作为不准侵入地带的标志。^{〔115〕}

由于日本出兵干涉，张作霖打消了下野的念头。他立即搜集残部万余人，自任讨郭总司令，在辽西巨流河构筑阵地，阻击郭军。日本的大炮拉入奉军阵地，日本兵乔装混在奉军之中，日本官佐在奉军中充当军事顾问，日本间谍也大肆活动。日本出兵助张，给郭军造成了严重困难和障碍。

对日本帝国主义可能寻衅滋事，郭松龄是早有预料的。他知道，任何帝国主义者，都不允许中国革命势力的存在与发展，并预见到军事方面虽然很有把握，但外交方面却不易对付，有鉴于此，郭松龄在倒戈时，即公开声明：保护东三省外人的权益，请

各国政府对中国战争严守中立，并三次致电各国公使团。电文宣称：

敝军此次为永久和平，班师沈阳，清除内乱，改造政局。所有东省外人生命财产，完全保护。聘用外人，均依法继续，决不撤换。从前中外条约，继续遵守，想为贵公使等所赞同。惟此次兵事期内，东省官吏与外人互结之约，敝军概不承认。更希电达贵国，取中立态度，勿以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为，资助任何方面。

郭松龄还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与张作霖早有密切关系，又闻杨宇霆去了大连，为了避免日本方面从中作梗，郭氏专门致日本公使芳泽一信函，并派王正廷亲往交涉。信中在指出了东北三省与日本比邻，经济关系尤为密切之后，申明：

敬请转达贵国居留官民，凡两国条约上之权利，一律尊重，固不待言。即一切贵国私人，对于省政府经济契约，或与敝国人民，合办实业等项之合法事业，一律照前继续有效。至贵国人士，受政府及机关雇佣者，亦均继续任用。现多数系松龄旧友，尤可照常任事，不必疑扰。惟在本军起事以后，抵奉以前，其军事期内，如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订一切新条约、契约，均不能承认为有效。再敝军旋省，如有抗拒义师，势不得不加讨伐，此种作战行为，亦纯系敝国内政问题，应请转达贵国政府，通飭所属官吏，严守中立，不得有供给金钱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为，致伤两国亲善之友谊，而使贵国公正之态度，且启敝国国民，对贵国之疑虑。这封义正词严、正气浩然、有理有节的外交公函，日本当局

置若罔闻。

十二月十三日，郭军旅长马恭诚率兵一团，到营口河北车站，原拟赴辽河南岸，保护各国侨民及外国商业，日本关东军河川司令官派往营口视察日本守备状况的武兵置三大队长和步兵中佐安沫内勇，竟不准郭军渡河。郭松龄当即致电日本公使芳泽和各国公使，质问日本军阻挠郭军进驻营口的无理行动。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公然以武力阻止郭军由营口进军，张作霖取得了喘息时间，积极准备在辽河与郭军决战。他凭借辽河左岸山区地势，大力构筑阵地，据险防御。同时，在辽河右岸加强防务，并将张学良军的三个旅，集中新民布防。原分驻吉林、热河、黑龙江各军，也先后集结。

郭松龄面对胜利在望的形势，虽明知日方援助奉张，但为了国家民族，他不顾一切，激励士气，希图迅速扑灭奉张，使日本措手不及。为了鼓舞士气，动员社会舆论，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十二月二十日，通电全国，历数张作霖五大罪状，宣告十大政策。

五大罪状是：“教育腐败，学校日衰，其摧残教育之罪一”；“压制舆论，摧残自治之罪二”；“因招兵害农，扰民之罪三”；“用人不公，祸省殃民之罪四”；“横征暴敛，增兵害民之罪五”。

十大政策是：“一，实行省自治以提民气”；“二，保护劳工，节制资本”；“三，免除苛税，以苏民困”；“四，练兵采精兵主义”；“五，整顿金融，以维民业”；“六，增加教育经费，实行强迫教育”；“七，用人以才，……不拘党派亲疏之见”；“八，开发地利，振兴实业”；“九，整理交通，以利商

旅”；“十，肃清匪患，整顿警察”。

当时，东北国民军一部，虽已进抵沟帮子，但进展不尽如意，郭遂令先锋一旅，占领大虎山。此时，郭又发一通电，这是十二月二十日连续发出的第二封通电。这封通电再一次鞭挞了张作霖的满天罪行，述说了自己倒戈反奉的心迹，坚定表明了自己“誓将搜我将士，拯此一方”，“斗鹞（按：状似野雉，斗死也不退却）死绥，义无反顾”，战斗到底的决心。^{〔116〕}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郭松龄所遣先锋部队，进占新民。二十二日，击败奉军骑兵，进至新民屯。郭军乘胜向南挺进，渡过巨流河，进抵大名屯，矛头直指奉张老巢省城沈阳，前锋距沈阳仅六十里。

日本见郭军锐气很盛，虽然担心郭军“赤化”不易就范，但它总的政策是同时拉拢双方，以便见机行事，于是派代表同郭松龄交涉说：“眼见东三省的政权马上就是郭将军的了，两年来奉张和日本所订的条约，还望郭将军予以承认。”郭断然拒绝说：“那断断不能够承认了。我就是因为张作霖和你们订立祸国条约，这回才兴兵打他的。”

日本方面被拒绝后，知道郭松龄不易对付，一旦东北三省沦入郭手，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将付之东流，决心帮助张作霖，除掉郭松龄。

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出人出枪为条件，劝张作霖回沈坐镇。他们给张作霖残部提供枪械弹药，代奉张运筹帷幄，指挥作战，并重新部署，将新民防区，向东收缩，由奉张任中路，吉黑军任西翼。更为阴险奸诈的是，日本关东军乔装奉军，直接参战。

紧接着，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派日机八十余架，向郭军总部

驻地白旗堡，大举轰炸，白旗堡周围三十里化为焦土。同时，日军借口“南满附属地不得干犯”，武力阻挠郭军前进。伪装奉军的日本关东军，从东北国民军左侧压迫过来，黑省军队由日军掩护包抄郭军后路。

从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东北国民军分三路部署，同奉军展开决战。但是，日本一支侦察部队，切断了郭军指挥部与前线联系；日本关东军与黑省吴俊陞的骑兵突袭白旗堡，阻断了郭军后方；日本空军飞机数十架对新民、新立屯等地郭军狂轰滥炸，配合奉军向郭军正面进攻。东北国民军三面受敌，部署大乱。郭松龄虽然亲临前线指挥，部队英勇激战，终因背腹受敌，导致失败。^{〔117〕}

十二月二十四日，“郭松龄偕其夫人韩淑秀，和少数机要人员与部分卫队（都是青年学生），向营口方向走去，最后只剩几人。郭氏夫妇化装为农民，围着棉被乘坐一辆骡车南行。当走到辽中县的老达房时，吴俊陞的骑兵营长王永清……，按日本新民领事馆提供的情报追来。郭氏夫妇急藏于郝姓的白菜窖中。王永清追来后，在窖外发现了郭所遗失的一张名片，郭、韩遂被搜出逮捕”。^{〔118〕}

郭氏夫妇不幸被俘后，张作霖闻讯狂喜，立即电令将郭押赴沈阳。由于杨宇霆的怂恿，改变张意，就地枪决。二十八日，将郭松龄尸体运往沈阳。残暴的张作霖下令，将郭的内脏挖出，去祭他的“阵亡将士”，然后将郭暴尸三日。^{〔119〕} 前往观看的群众，无不为郭氏不幸遇害而叹息，对万恶的张作霖暗中咒骂，切齿痛恨。

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全国人民反日反奉运动中，年仅

三十四岁的郭松龄，不幸惨死于日、张毒手而功败垂成。

在郭松龄进军奉天和遇害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抗议日本出兵东北和声讨日、张勾结的反日讨奉运动。

十二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通电全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傀儡即倒，侵略无从，故不惜违犯中日两国民意，而参加中国内战，侵略我国主权，吾人苟一息尚存，自当一致奋起。”^{〔120〕}同日，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痛斥“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凶恶的爪牙”，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出兵东北及张作霖媚日卖国的罪行。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一向做日本帝国主义工具的奉张及安福政府，现在已经公然跪在日本政府面前求援了！一向替奉张安福保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也公然出兵援助张作霖抵抗郭军了！”“张作霖兵败早应出亡，他现在仍留在奉天不走，已经不是为自己作战，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日本出兵奉天，也已经不是利用张作霖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而是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了。”中央号召：“全中国人，任何阶级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参加此次由反奉而反日的运动，以保全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与民族自由。”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厦门、长沙、杭州等各大中城市和东北三省，先后召开了反对日本出兵东北和反对张作霖卖国罪行大会。二十七日，上海全市发动包括二百多个团体的六万多群众集会，举行了声势浩荡的反日讨张游行示威。

在全国反日讨张运动中，东北三省的人民群众，特别痛恨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张作霖出卖东北的滔天罪行。东北人民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和张作霖的血腥镇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十二月二十日，“东三省公民团”给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发出抗议书，对日本出兵东北和援助张作霖对付郭松龄，提出强烈抗议。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东北三省的留日学生，全部停学回国进行反抗，向全国散发了抗议宣言和爱国信件。这些至今保存完好的东北留日学生抗日反张宣言和信件，充满了反帝爱国的深厚民族感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鼓动性。有一封信写道：

刻下东三省留日学生以东省现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千钧一发之秋，已不待学有成功为国用，现已开会表决全体归国，赴各地各省作宣传运动，鼓吹民气，打倒军阀，排除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待他日张贼下野，国难稍靖，再来日本重游，以求深造。

在这封信的最后，留日学生立下了豪壮誓言：

当此之时，大丈夫当效班定远（班超）之投笔从戎，马援之马革裹尸，岂能坐死儿女手中也？！^{〔121〕}

一九二六年元旦，“东三省留日同乡会”即发《痛告东三省同胞宣言》，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张作霖相互勾结，为害东北，陷郭松龄于失败的罪行，进行痛快淋漓的揭露。《宣言》指出：

张作霖出身绿林，性本残暴，罪恶滔天，十数年来刮尽东三省之财源以肥一己之私囊，遍窥直鲁苏皖之地盘，以逞一己之私欲，横征暴敛，蹂躏民权，……。呜呼！哀鸿遍野，白骨成堆。长此以往，不惟我同胞永无安枕之希望，恐白山黑水不久即归异国版图，而大汉民

族亦必凌夷为韩人第二。凡此罪恶，罄竹难书。我关外健儿，能不切齿椎心，欲手刃此疮而后快乎。

《宣言》接着指出，在郭松龄倒戈反奉战争中：

张贼竟不惜勾结外寇，如杨宇霆之走大连，松井少佐（张作霖日本顾问）之赴东京，白川司令之告急电等，皆不过接洽日本政府订立密约之经过而已。……以致狡然思逞日人，据为唯一侵略我国之机会，大出日兵，实行援助，坐使郭公功败垂成，身遭屠戮，而关外锦绣河山已成日人囊中物，张逆何心竟忍出此。望我三省同胞各除私见，共志仇仇……，关怀祖国，慨念故乡，敢尽绵薄，同伸义愤，艰难不惜，汤火奚辞，誓必达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目的，决不承认亡国灭家之私约。此身可杀，此念不可渝。^{〔122〕}

这一充满爱国激情的反日反张宣言，表达出广大中国人民的心声，使张作霖恼羞成怒。他派遣军警四出搜捕爱国学生，而且贴出告示，为自己勾结日寇丑行竭力辩解。这种欲盖弥彰的卑劣伎俩，只不过激起了东北人民对张作霖卖国罪行的更大义愤而已。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张作霖的卖国丑行，激起了北京各界人民的愤怒。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的领导下，组织了北京国民反日大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李大钊应北京国民反日大会邀请，在国民大会上发表讲演，听讲者二千余人。他在讲演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之历史，发挥详尽”，“讲者颇为透彻，听者亦极感动”。^{〔123〕}

一月十四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非基督教大同盟、北京学生总会等团体在天安门召开反日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奉系军阀”、“反对直奉勾结”、“对日经济绝交”、“实行抵制日货”、“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124〕}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国民反日进兵南满大会，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郭松龄追悼大会。大会请于右任、陈启修、谭照鸿、程汉升、肖子升、李大钊、王励斋为讲演员。李大钊在追悼大会上作了悼念郭松龄的讲演。^{〔125〕}

郭松龄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潮流中倒戈反奉，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可惜功败垂成，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的、主要的，是日本出兵干涉和援助奉张的结果。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明确指出：“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126〕}

其次，反奉同盟内部发生了影响郭军失败的两种因素：

一是李景林背约助奉与制郭反冯，使郭松龄陷入毫无后援的困境之中。

二是国民军未能按照密约及时进攻奉军李景林和张宗昌部，对郭未能给予有力支援。其原因是国民二、三军不明联合反奉的大义，说郭的发难是奉系内乱，使冯提脚不动；而国民一军攻破李景林打下天津后，又互相争权夺利，使冯深感痛心而忙于应付。对此，冯玉祥回顾时曾深感内疚地说：“在这样一场恶战之中，我感受的苦痛，是没法述说的。”^{〔127〕}

最后，郭松龄本身存在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弱点，也是一个致命的根本原因。他没有提出、也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明确主

张，甚至幻想与日本取得一定的妥协。他举事太急，未能进行充分宣传动员；广大官兵不明反奉重大意义。他在策略上不能利用奉系内部矛盾分化孤立张作霖；在军事上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不善采纳部下的合理建议。在巨流河决战之前，郭在专车上召开军事会议，多数人主张两翼包抄张作霖。这样，既可以避开奉军主力；又可以不在日本控制的“满铁”附近作战，但郭却认为张的军队已是乌合之众，无须分路进击。他在专车上大脱大睡，以为指日可达沈阳，结果全军瓦解，造成了战败身死的悲惨下场，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郭松龄兵败被杀后，在山海关指挥郭军后路部队的魏益三当即表示，要继承郭松龄遗志，同冯玉祥合作，继续反对张作霖。但是，郭的噩耗传到魏的部队后，却引起了很大混乱，一部分人公开提出把武器抛入大海，散伙了事。许多人是东北籍人，乡土观念很重，仍想回到奉军，投附张作霖。大多数人拥护魏益三，愿意继承郭松龄的未竟事业，同张作霖干下去。

正当魏益三处境危困之时，冯玉祥发来电报，追悼郭松龄的牺牲，鼓励魏继续同他合作，共同反对奉张。第二天，冯玉祥又派李烈军、方春涛为代表到山海关，送来两万袋面粉，十万元现洋，以接济魏退出危险地区，希望他仍能坚持郭松龄的精神，再图奋斗的机会。冯的代表向魏提出：冯玉祥意见，魏可继郭的原职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也可隶属冯玉祥，任国民军第四军军长，任魏选择。魏考虑到，他只有六个步兵团、一个野炮团、一个工兵营和少数骑兵，依靠这点力量，难以完成郭松龄未完成的使命，担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已名不副实。于是，他表示愿意接受冯玉祥的领导和指挥，就任国民军第四军军长。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魏益三通电宣告：“誓追随我焕帅督办总司令之后，以继郭总司令未竟之志”。^{〔128〕}将部队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

郭松龄失败后，张作霖命张学良为总指挥，率兵六万，限五日夺回山海关。根据冯玉祥关于对奉军最好不与接战，以保存实力，退守滦州的电令，魏逐步把部队撤至滦州，与国民军唐之道部联成一气，扼守滦州。从此，魏益三以实际行动，继承了郭松龄联冯倒张的未竟事业，举起国民军第四军的旗号，继续奋斗。

七、党援助国民军大沽抗日 与“三一八”惨案

21. 直奉“讨赤联军”与党的联合战线主张

随着一九二六年的到来，北方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和重大的曲折。

由于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怒潮，席卷全国，迅猛发展；又由于封建军阀内部一次接一次的倒戈和混战，使军阀势力大大削弱；还由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势力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击败李景林，占领天津之后，声势大振；使帝国主义列强深刻感到，中国革命力量已经直接威胁到他们在中国的权益和统治，于是重新联合起来向革命疯狂反扑。英、日帝国主义迅速勾结起来，唆使张作霖和吴佩孚弃嫌和解，在“反赤”的幌子下，组成反革命的“讨赤联军”。他们帮助张、吴制定作战方案，以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援助张作霖由北向南，吴佩孚由南向北，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

帝国主义者不仅帮助中国军阀镇压中国革命，而且阴谋直接出兵干涉。据报道，在日本出兵东北之后，英国也曾制定了进攻中国的计划。报导说，这项计划称：

干涉中国，扑灭中国民族运动的计划，已经过详细的考虑。……依专家的计算，征服中国只须用十万军

队，半可由印度（该处有八万英兵）调遣。香港的警备亦已增强。此战争的计划，进攻中国，分南北二部，多数军队将配置于天津、上海之间。第一部分军队将在天津上岸，将力求与冯玉祥决战，且已获得张作霖之默许。

依财政专家之计算，战争目的达到，战争停止以后，英国可以攫取中国的铁路……。假定此战争需时二年……以克服中国，军费每日十五万磅，此数可由将来全国铁路抵押给英国时补偿。……目下英国国家银行已寄款六十万磅交汇丰银行，以为在东方开始广大宣传，战胜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苏维埃的费用。^{〔129〕}

这份计划，充分暴露了英帝国主义者阴谋扑灭中国革命运动和消灭冯玉祥国民军的狂妄野心。

早在时局变化微露征兆时，中国共产党就对时局状况和党的任务发出了通告。

当郭松龄倒戈反奉，奉系受到打击，军阀统治出现危机时，中共中央的通告就指出：“奉张自郭松龄倒戈之后，军事力量上也受到了打击，孙传芳、吴佩孚没有能力攫取政权”，“北京方面的政治便显然现出极动摇的状况”。“我们的职任，应当赶紧联合国民党、学生、工人、小资产阶级等革命群众”，“以及商会等人民团体，起来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出兵”，并“由广州国民政府联合国民军，人民团体代表一切反奉势力，组织委员制的临时中央国民政府”。^{〔130〕}

当英、日勾结唆使直奉联合反冯的趋势刚刚出现，中共中央立刻指出：

目前政局是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影响直系有渐趋于日奉直联合之势。故最紧要的是人民与进步武力的联合战线。此时直奉妥协虽在进行，然尚未成功；国民一、二、三军表面上似不和，然实际上尚甚合作，此时均须极力鼓吹人民、国民军、国民政府一致反奉的联合战线。^{〔131〕}

担负北方国共两党领导责任的大钊同志，这时也密切地注视着北方战场的急剧变化和帝国主义新的侵略动向。他明确地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活动，采取积极进攻的方策。第一，它与英帝国主义结成联合战线，撮合张、吴间的讨赤联盟，勾结国民党右派，……以破坏中国的以工农阶级作主力军的国民革命运动；……破坏世界革命运动中东方弱小民族革命的联合阵线。第二，它愿离开英美的关系，要单独地和中国订立一种条约，至少在满蒙境内，实行取得那二十一条件里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以树立他那所谓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的基础。……日本政府规定加重关东司令官军队召集权。如在满常备兵不能维持在满侨民之生命财产及国防第一线时，该司令可不待政府训令，召集在满预备兵，直接供其指挥，并在满设兵器弹药被服库，以利供应。

大钊同志综合以上情况变化后，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进攻，异常的猛烈。”他号召：“全中国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啊！在全国民众号召各地的国民革命军讨伐勾结英日帝国主义的张、吴的战争中，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地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及其侵略满蒙的阴谋和行动。”^{〔132〕}

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根据当时的形势，直接发动和组织了如火如荼的反对英、日、张、吴的群众运动。在一月份先后组织了三次反日讨张的示威游行后，又相继成立了“国民讨吴大会”、“反英讨吴大会”等群众革命团体，连续举行拥有几万、几十万，以至百万多民众参加的声讨大会和示威游行。

二月二十七日，党组织一百三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反英讨吴国民大会。会上，群众高呼“打倒吴佩孚”、“反对张吴联盟”、“要求国民政府北伐”的口号声，惊天动地，严重地打击了内外反动派的疯狂气焰。大会发出致国民军将领和全体士兵的通电，表示全国人民誓为国民军之后盾，全力援助国民军坚持反奉反吴到底。通电称“国民军是反奉战争中最中坚、最接近民众的武力”；指出，“现在帝国主义的势力集中于一点，我们反帝国主义的势力也要格外团结而一致，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结合愈密切，我们民众与武力之结合也应更进一层，方能与之相对抗，而得最后的胜利”。通电还指出，“奉张势力已成强弩之末，吴佩孚成为唯一的帝国主义得力的走狗”，希望国民军集中力量打倒吴佩孚，肃清奉张残余势力，把反吴反奉战争进行到底。^{〔33〕}

北京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直接地动摇和威胁着段祺瑞执政府的反动统治。段祺瑞惶惶不可终日，处心积虑地酝酿和筹划着制造一场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罪恶事件。

22. 日舰炮轰大沽口与国民军英勇反击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者蓄意制造了大沽口事件。事件始末如下：

三月十二日，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派人至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呈报，日舰一艘将于上午十时进口。总指挥部转知大沽海防，届时可以放入。但是日舰迟至下午三时余方进口，不是一艘，而是两艘。按照国民军与各国商定的办法，外国舰船驶入商口，必须缓行，并在指定地点接受检查。但是，日舰却急驶，强行闯入海口，未在指定地点停泊。国民军大沽海防守军当即发旗语令日舰停驶，不听，于是发空炮警告。日舰不仅置之不理，而且猝然实弹轰击大沽炮台，伤国民军十三人。炮台守军忍无可忍，英勇地进行了还击，日舰被迫退至海面。

事件发生后，国民军前敌指挥部总司令鹿钟麟向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日本领事当时尚表歉意。但是，到了晚上忽然派人见鹿，声称日舰伤人，情形重大。鹿钟麟答复，既然伤人，就该上陆诊验，日方又诡称已经送回旅顺治疗。

这次事件，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出兵东北助奉灭郭，侵犯我国领土和主权的继续和扩大。进入大沽口的两艘军舰中，一艘为日舰，而另一艘却系奉舰。日舰企图掩护奉军进入大沽口，进攻国民军。国民军面对日舰野蛮暴行，满腔怒火，奋起反击，粉碎了日奉阴谋，维护了民族尊严，伸张了民族正义。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应承认错误，但却怙恶不悛，竟于三月十三日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

照会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不仅将日舰炮轰我大沽炮台，伤我国民军官兵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反诬“受炮台附近之中国军队之射击”，造成日舰人员受伤的“不祥事件”，进而提出抗议，以“事态极关重大”，有关“邦交之大局”相威胁，要求中国政府即时以“最有效之手段”，“严饬前方军官，遏止此种

不祥事件之再发”。

对日本方面的无理狡辩，大沽口炮台国民军海防官兵，十分气愤，当即以亲身经历的来龙去脉和事实真象，公告日本朝野与中外人士，申明正义，澄清视听。

这份公告，义正词严，有理有据，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虚伪狡诈的侵略面目，以无可辨白的事理驳斥了日方的狡赖，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充分表现国民军官兵的爱国思想和英勇气概，因此，有必要摘录于后。

文告首先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口谈亲善，而实则罪恶的鬼蜮伎俩，

尝读世界历史，内争二字，何国蔑有，因争而封锁港口，亦属屡见不鲜之事。港口既封，无论何国船舰，自在出入禁止之例。吾国则以辛丑条约之束缚，不许建筑炮台，复不容封锁港口，以我极痛苦极耻辱之事，而外人反视为奇货可居。每于此非常时期，故与为难。呜呼！孰谓公理战胜强权乎？甚不解此类不祥之事件，每多发见于兄弟之邦之中国与日本之间也。更不解吾人正高谈中日亲善，而亲善途上障碍物愈益加多也。

接着，公告指出了帝国主义者违背国标惯例，竟用军舰掩护和运送奉军进攻国民军。公告说：

查国情惯例，对交战团体，应表示平等待遇。乃此次国奉交授，奉方军舰滞留大沽口外，俟机登陆，为害国军，其倚俾外人而在沿海所施之种种危险行为，不少成例。而外舰复为之运兵由北塘上陆，外交困迄不制止。国军封锁港口，盖为自卫计，迫不得已而出此也。

公告在申明了外国船舰进口时必须遵守的条件后，以铁的事实批驳了日方的照会。这段公告铿锵有声，有条有理，谁是谁非，一目了然，使人读后为之一快。公告说：

贵国藤字第十五号军舰一艘，因贵国总领事与天津当局交涉之结果，准免检查，许其即日入口。不料十二日下午三时，该舰进口时与贵国领事对当局声称之点，全不符合，国军不得已乃施以警告，该舰即以机关枪迎击，势甚凶恶，幸潮水大落，该舰始退。此当日之实在情形也。

吾人于此有下列四项，证明此次之责任在贵国军舰，而不在国军。（一）我军在津沽布置海防，为顾国际条约起见，对于各国轮船出进，曾与各领事商订办法，双方遵守。十二日贵国领事曾派人至我前敌总指挥部声称，是日有贵国藤字十五号兵舰一艘进口，当由总指挥部转知海防，我军按照商明办法手续进行。乃该舰驶进之际，又有一艘随行。我军海防官兵，见与所报舰数不符，恐系敌舰诈冒进袭，不得不令其停止。（二）时间问题。贵领事原言该舰上午十时进口，而该舰迟至下午三时余始行进口，致海防官兵无从明其是否即系日舰。

（三）按照原订办法，无论何国船只进口，一至指定地点，即须停泊，以便查验放行，而是该舰并未遵照前约，驶往应停地点，只知强行闯入海口。我们为防止敌舰之袭击起见，自不得不设法制止。（四）该舰谓我军先开炮之说，绝对不确。盖既有上列三种原因，我军见该舰驶入口时，当然设法令其停止，并未实弹放枪。而该舰误为敌视，即用机关枪扫射。我军方面因猝不及防，受伤者

十数人之多。上述理由，至为明瞭，想贵国人士，当有同等之感想也。吾人今后不谈中日亲善则已，否则愿贵国人士主持公平正大之态度，以处理此不^祥事件也。⁽¹³⁴⁾

但是，帝国主义从来是不认事实，不讲公理的。他们不仅对国民军官兵的公告不予理睬，而且变本加厉。三月十六日，英、美、日、法、意、西、比、荷八国公使团，由荷兰公使以首席公使名义，向段祺瑞政府的外交总长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停止大沽口至天津一带的战事，撤除大沽口水面的水雷及其他障碍物，恢复所有航行标志，不准干涉外国航船，停止对外国船只的检查。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和“保留采取行动之权”。

面对八国公使团的最后通牒，英勇的国民军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公布了大沽口事件真象，拒绝了列强的威胁恐吓和无理要求。据《冯玉祥将军》一书所载，公告内容如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军舰两艘掩护奉军进大沽口，企图进攻国民军。驻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发现后即以旗语制止，日舰置之不理，国民军于是发空炮警告。蓄意侵略的日舰对于国民军的警告竟报以实弹射击，结果国民军炮台受损失，守军人员死伤十余人。国民军才不得不予以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次日，日本不但不接受国民军的抗议，日本公使反而向卖国的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十六日，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八国公使无理要求国民军撤去防御，并以“采取必要之手段”相威胁。这种野蛮的态度和行为，引起北京人民的极大义愤。⁽¹³⁵⁾

国民军据实揭露日舰炮轰大沽的真相，又一次维护了中华民

族的尊严，受到北京和各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

帝国主义列强在发出最后通牒之后，随即加紧海军的调动，从十七日到十八日，集中到塘沽海面一带的英、美、日、法、意等国的舰只达十八艘之多，其中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十一艘、炮舰四艘。各国驻天津的海军司令官，也频繁往来，并开会决定，一旦交涉破裂，即采取行动。一时之间，战云密布，形势十分紧张。

23. 人民群众反对英、日、吴、张 运动与“三一八”惨案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大沽口事件的强盗行径和八国公使最后通牒的挑衅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北京人民更是热血沸腾，群情激昂。

三月十四日，在党的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发动和领导下，三十万群众举行反日国民大会。大会同仇敌忾，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强烈抗议日舰炮轰大沽口。

三月十七日，党和李大钊又组织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师生，和反日讨张大同盟等团体的代表，在北大三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要求段祺瑞政府必须以强硬态度，即日驳回八国公使最后通牒，坚决驱逐签署最后通牒的八国公使出北京。会议结束后，大钊同志亲率代表团持函分甲、乙两组，前往段政府之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函曰：

外交总长大鉴：大沽事件，屈在日本，事实显然，乃辛丑条约关系各国，竟向我国提出最后通牒，限我四十八小时答复，侮辱国体，侵犯主权，莫此为甚。查辛丑条约本系帝国主义者强迫签订之不平等条约之一，国人

早已大声疾呼，运动废除。矧（按：音审，况且）此次事件，且非条约所许，纯为干涉内政侵略中国之举动耶。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现在国民闻状之下，莫不纓冠披发，誓死反抗。存亡关头，在此一举，务祈总长据理力争，勿稍退让，于必要时，即以铁血相抗，亦所不惜，全国民众誓为后盾也。兹派代表晋謁大部，面陈一切，……希赐予接纳为幸。^{〔136〕}

代表团抵达段政府后，一致要求政府公开表明态度，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乙组百余人的代表队到达国务院，要求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耀德接见，段、贾不但无理拒绝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而且早已准备好用屠杀人民群众来博取帝国主义的欢心和支助，悍然指使段祺瑞的卫队行凶，代表多人被刺伤。

在这天的请愿活动中，群众还与国民军守门的卫兵发生了小的冲突，大钊同志作了妥善处理。据当时参加这次请愿行动的李葆华回忆说：

……那天守门的卫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卫兵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便把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有人还想翻墙进去抓段祺瑞，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直围到天色很晚，人群方才散去。当天晚上，总指挥韩麟符向父亲汇报当天群众运动情况。父亲听到我们同国民军士兵发生纠葛时，即表示同国民军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137〕}

由此可见，大钊同志对联合国民军的方针是十分坚定的，即使是具体细微的情节也极认真。

另据当时在北京“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担任领导人，负责

党的统战工作的陈毅同志回忆说：

当时，北京的兵权在冯玉祥手中，他比较同情进步势力。进步势力想依靠他向段祺瑞政府施加压力。三月十七日，我和另外三名代表（由北京各团体联席会议推出，两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国民党员）去见段祺瑞，和卫兵发生口角，卫兵竟至动武。我警告段祺瑞的秘书长：现在已经是民国，反对人民的人，如满清皇帝、袁世凯都垮台了，段祺瑞也不一定保得住。^{〔138〕}

其情形与李葆华回忆是基本相同的。

三月十八日八点，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总会等二百多个社会团体、十多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大会主席台前，悬挂着十七日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旁写“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八个醒目大字。十时，大会开始。大钊同志是会议主席之一。他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精神、“五卅”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139〕}他的演说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当十七日的请愿代表报告向段政府交涉过程，和执政府卫队镇压群众刺伤代表的暴行时，报告人声泪俱下，听众满腔怒火。报告者还当场宣读身受重伤、生命垂危的代表杨伯伦致大会民众书，当读到“我为革命而死，死亦无憾，望大家继续努力”时，全场群众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坚持到底！”“誓死不屈！”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国民大会一致通过了“要求驳斥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等八项提案。

大会结束后，随即组织了几千人的游行示威，浩浩荡荡开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大钊同志也在主持国民大会和召开北方区委

会后，立即赶去参加游行示威。

当游行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后，蓄谋镇压革命的段祺瑞政府，令军警封锁了广场出口。执政府的卫队立即用排枪、刺刀、大刀，开始了对群众的血腥屠杀，人群一批批倒下去，鲜血染红了广场的土地。这就是段祺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这次惨案死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被鲁迅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李大钊同志亲自参加并组织指挥了这次示威游行。当流血惨剧发生时，他虽然头部和双手都受了伤，但却临危不惧，正气凛然，从容不迫，镇定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他机智地逃脱了敌人的追捕，直到枪声响过半小时，才随最后一批群众撤出广场，表现了共产主义者大无畏的气魄和进攻在前、退却在后的高尚品德。

对“三一八”惨案和李大钊同志的伟大形象，几位参加过当天游行示威，目睹当时情景的革命前辈，曾撰文回忆。这些文章对我们了解事实真象，研究李大钊同志的革命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陈毅同志回忆说：

第二天（按：即三月十八日），发动几千人的游行，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口，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扫射，造成喋血惨案。我是游行带队人之一，被人群挤在两挺机关枪之间，幸未负伤。游行队伍被打散。^{〔140〕}

李葆华同志回忆说：

那天我跟着团组织活动，事先不晓得父亲也来参加示威请愿。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

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丧心病狂的反动军阀政府，竟然用排枪、刺刀，大肆屠杀无辜群众。

李葆华同志指出，这是段祺瑞执政府对人民革命运动，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一场血腥镇压。葆华同志说：

段祺瑞对国民军十分不放心，把门卫全部换成他们自己的卫队，还预先埋伏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军警。请愿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后，有位青年爬到大门一侧的石狮上讲演。就在这个时候，段政府的卫队朝这位青年开了一枪，成为镇压群众的信号，于是一场残酷野蛮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

许多事先埋伏的军警，纷纷钻进人群中，一边咒骂，一边用手枪射击。无数爱国青年在排枪、刺刀和大刀下牺牲了。在混乱中，我随着人流，向铁狮子胡同东边奔去，终于避开了刺刀和枪弹，跑了出去。事后得知，从西口走的同志，大多数牺牲了。大部分人是从东口跑出来的。

李葆华回忆了大钊同志感人的英雄形象，他说：

惨案发生后，父亲沉着、镇定地指挥群众迅速离开现场，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最后他才从胡同东口撤出来，立即到党机关所在地，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商量了下一步的工作。一切安排好以后，他才回到家里。见到了他，我们全家松了一口气。听完父亲的讲述，他那种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为了革命利益丝毫不

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深深教育了我们全家。^{〔141〕}

李大钊同志的这种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当时就受到革命群众无比敬仰。他冒着生命危险同大家一起战斗，大家无不为了他的安全而担忧。据夏之栩同志回忆，当时参加游行示威脱险回到宿舍时，听到李大钊同志到铁狮子胡同去了，“我们紧张的心情并未缓和，因为还没有得到李大钊同志平安脱险的消息，同时我们又为死难者悲伤。直到天色将晚，才有同志来报告：‘李大钊同志已脱险回家！’我们大家才舒了一口气”。^{〔142〕}

“三一八”的当天晚上，大钊同志召开了北京党、团区委的联席会议，决定把斗争坚持到底，开展对死伤者的慰问追悼活动。三月二十三日，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学联等团体，在北大举行追悼大会。会场上写着“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八个大字，气氛庄严肃穆，群众悲痛激愤。有的爱国青年用鲜血写下了自己的革命誓言。据陈毅同志回忆说，追悼会上“虽然段的暗探混进来，但有冯玉祥派兵保卫，段未动手”。^{〔143〕}

三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指出，“三一八”惨案血的事实，无情地揭露了反动派凶残、无耻的本性，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许多人抛弃了对军阀的最后一点幻想，进一步认识到了“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的必要”。根据奉直讨赤联军进攻国民军的危急形势，告民众书号召，“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全国各界人民要不惜以重大牺牲，援助国民军”。这是因为“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吴两派军阀统治中国之障碍”。^{〔144〕}

从大沽口事件以来，群众对国民军是大力支持的，国民军对群众也是给予了声援的。但是，在“三一八”惨案中，国民军北

京卫戍司令李鸣钟却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

据《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记载，当时有这样一些背景：

“三一八”惨案后，有一次，驻国民军的苏联顾问团找北京卫戍司令李鸣钟，问他：“你打算怎样对待总统（按：指段祺瑞）呢？”李鸣钟吞吞吐吐地答道：“我知道，顾问们所有的崇高感情，不能不谴责凶手，但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和总统斗争，此外，游行示威者也不该到总统府去。”

顾问说：“你有一个警备旅，你可以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他应该当作凶手和人民的敌人来审判。”

李答：“他的确是凶手，但他有一个警卫旅，因而在京都可能会发生战斗。……目前，我无能为力，我必须不介入这件事。”

和李鸣钟谈判告吹后，苏联顾问知道李大钊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又是中国北方最有威望的人，于是去找李大钊。他们向李大钊提出，现在不能指望李鸣钟，他必须离开北京，并建议把鹿钟麟调回来，担任北京卫戍司令。当时，李大钊正在主持国民党、共产党北方区执行部会议。会议在大钊同志提议下，同意苏联顾问意见，劝冯玉祥召回李鸣钟，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北京卫戍司令。不久，国民军总部发出电令，从北京召回李鸣钟，任命鹿钟麟为北京卫戍司令。

鹿钟麟就任北京卫戍司令，回师北京后，四月九日，解散了屠杀学生的段祺瑞卫队，为爱国青年伸张了正义。然后举兵包围段祺瑞执政府，欲拿段祺瑞问罪，段祺瑞事先闻风逃跑，执政府要人均被国民军看押，执政府遂告瓦解。四月十日，担任北京卫戍总司令的国民军将领鹿钟麟，通电全国，宣布了段氏安福系的滔天罪行，其中，把“三一八”惨案也列为段祺瑞滔天罪恶之一。通电

说：

……三月十八日，莘莘学子，前往请愿，纯系爱国热忱，迺竟开枪轰击，惨毙多命。较之五卅案，伤害尤多。残忍成性，是非颠倒。揆诸情理，复杂难容。……^{〔145〕}

由以上可见，国民军对革命群众是同情的，是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的。

由于奉直联军的进攻，四月十五日国民军撤出北京，退至南口据守，奉直军阀进入北京执政。从此，北方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

八、李大钊、蔡和森、刘伯坚 配合争取冯玉祥

24. 李大钊亲自安排冯玉祥出访苏联

一九二五年年底，国民军打败李景林进占天津后，局势开始发生急剧变化。在英、日帝国主义撮合和唆使下，吴佩孚、张作霖达成和解。十二月三十一日，吴佩孚通电声明讨奉军事结束。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张作霖通电吴佩孚表示谅解。于是，帝国主义牵线的反动军阀大联合之势，宣告形成。

当此紧要关头，冯玉祥感到险象环生，战争一触即发。同时，冯深感国民军势力孤单，特别是国民军一、二、三军，不仅联系不紧密，指挥不统一，而且内部矛盾重重，在占领天津后，地盘权力的争执，暗中发展得很激烈，步调难以一致。冯玉祥处于此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想以辞职来避免战争的爆发。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冯玉祥发出“下野”通电，电文说：

值此千钧一发之机，彻底澄清之会，仍宜本和平之初衷，但愿战事从此结束，俾人民得资休息，玉祥个人立即下野，以卸仔肩。^{〔146〕}

一月十四日，冯玉祥由包头移居绥远小镇平地泉。

冯玉祥以为自己宣布引退，就可以转移奉张的目标，使内战不致再起。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冯玉祥和国民军采取的

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深为痛恨和恐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组成“中国反赤大同盟”，称孙中山为“南赤”，冯玉祥为“北赤”，并由奉（张作霖）、直（吴佩孚）、晋（阎锡山）、鲁（张宗昌）各系军阀部队，组成“讨赤联军”，从南到北将国民军分割包围，自一月五日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此时，适遇国民军参谋长熊斌率高级军官赴苏考察回国。冯玉祥听取熊斌访苏报告后，决定自己出访苏联，进行考察和学习。一方面，他确有学习革命经验的愿望；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他的出国，促使军阀们悔悟，化除仇怨，停止干戈，这当然是徒劳的。

有一次，他在同李大钊和徐谦谈话时说：“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循环无穷，不知要打到那天才算了局？”冯玉祥把战火的引起“归结到自己学识不足，办法不够”。因此，他说：“我必须跳出国内的漩涡，出国去好好考察学习一番，同时希望大家痛定思痛，毅然悔悟，赶快化除仇怨，停止祸国殃民的内战。”李大钊、徐谦听了他的愿望和要求，规劝他在当时的形势下，不要离开国民军部队，过一个时期，看看战局变化再出国为好。但是，冯玉祥一再申明说，他必须亲自赴苏参观学习革命经验，回来革命，才能有办法。并说明，他访苏出国，把国民军部队暂时交给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指挥，不会发生问题。李、徐见冯出于真诚，答应回京后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商议后再定。

一月六日，经李大钊回北京疏通后，加拉罕通知国民军总部外事处长唐悦良，来北京研究冯玉祥访苏问题。加拉罕向唐表示：苏联政府欢迎冯玉祥将军赴苏参观考察。为避免段祺瑞、张作霖和帝国主义者们的注目，加拉罕提出，最好通过外交途径，让

段政府外交部给冯签发，去德国访问而途经苏联的护照。唐悦良回平地泉向冯报告后，再去北京请外交部长王正廷即来张家口商谈出访手续事宜。王受约去张家口，回京报请段执政府批准，发给冯玉祥及随员魏凤楼、陈天秩、尹心田、张金瑞、陈秉钧、丁良俊等六人，赴德访问途经苏联的护照，分送德、苏两使馆予以签证。

一月九日，段祺瑞发布任免命令：“特派冯玉祥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实业事宜，准予免去西北边防督办兼督甘肃军务事宜之职。”蒋介石、汪精卫当即来电挽留，国民军的将领们也纷纷规劝留部，冯玉祥都一一谢绝，着手出国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李大钊曾亲自秘密去张家口，为冯玉祥访苏作了具体安排。

三月二十日，冯玉祥携带随员、卫队，由平地泉乘汽车启程赴苏，二十二日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库伦（今乌兰巴托），逗留了一个多月（三十七天）。

冯玉祥这次出国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学习革命办法，增进革命知识。因此，他到达库伦之后，就怀着自己“知识不足”之感，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和探索。

冯玉祥在库伦与蒙、苏共产党人多次晤谈。他与蒙古党领导人丹巴、总理阿木耳车、军队领导人确阙将军，除了一般礼节性会见之外，主要是向他们请教，请他们介绍革命经验，甚至为他上课。第三国际和蒙、苏两党也通过这些活动，对冯玉祥做工作。前后有第三国际代表阿木加讲《第三国际》，苏联驻蒙大使尼氏介绍俄国革命情况，苏联那氏介绍《世界各国党派情形与中国情状》，苏联林顾问讲《列宁传》。特别是蒙党领导人丹巴，一个月内在冯玉祥接谈达七、八次之多，亲自为冯玉祥讲解《蒙古革命史》和党

务工作，与冯玉祥研究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回答冯玉祥提出的问题，并亲自向冯玉祥的卫队讲课。在这方面，《冯玉祥日记》有不少详细记载。现摘记几则于后：

二十七日 丹巴先生来，对我卫兵讲话，略谓：当兵最要者，在知为谁当兵，否则将变为走狗矣；又当知党为何物。党者，即人民与政府之介绍人也，故民主国家，均不可无党。

二十八日 本日为礼拜日，丹巴来。再向卫兵讲话，专重党之认识及重要。

三十一日 本日谈话数则，记录如下：

丹巴问余：对中国大局有何意见？

余答：中国现当过渡时代，卖国军阀甘为帝国主义者做走狗，昏聩糊涂，不明世界大势，终必为民权所打倒。

又问：中国现在加入革命者为何项人？

答：第一为国民党，第二为国民军，第三为工人及学界；但此项国民革命工作，尚在幼稚时代，因无妥当完备之组织及宣传故也。

又问：中国人民对于广东政府及国民党，观念如何？

答：中国有知识者及有改革精神者，与一般良好国民，均表示同情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予不久即将加入于国民党，极力拥护之。

又问：国民军何故又将天津让出，让与敌人？

答：有三因，一，周围受敌；二，因战略上江西与

湖南之关系，三，弹药军械之关系，故退兵改变战线。

四月三日 四点，丹先生再来，讲党之组织，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办法，并批评中国国民党之缺点，所言皆中肯。

冯玉祥不仅请教和听讲，而且对蒙苏军事设施和蒙古社会情况进行了考察。他在日记中对参观苏联军营一事是这样记载的：

二十五日 午前十一点，同尼大使参观俄国兵营，布置颇洁净。……政治训练室及俱乐部，设备极好。兵器教练之各种图画，亦极周备。骑兵虽系新兵，但其教练及体操，均极有精神，如教马上冲锋，则层层前进，约有四层，重垒而上，真有作战敢死之精神，可见其教法之精矣。

冯玉祥还利用在库伦逗留的有利时机，反复阅读三民主义，同时，决心学习俄文。他在四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决心学俄文，熟看三民主义，及为平民而不作官。以四十余岁之人学外国文，非平心静气，努力又努力，决难有成，此点须特别注意。”可见，冯玉祥求知欲望之强和决心之大。

冯玉祥虽身在国外，但对国内情况仍十分关心。国民军胜，他则喜；国民军失利，他则忧。三月二十六日，他看到报纸刊登的“三一八”惨案消息后，大为感慨地写了一段日记：“本夕阅报，始悉三月十八日，北京男女学生，因反抗八国所递哀的美敦书事，游行至执政府门前，被卫队开枪轰击，伤亡不少，遂酿成‘三一八’惨案。”他愤慨地写道：“政府如此屠杀民众，诚自杀也。”在此期间国民军刘骥曾来电请冯暂缓出国，冯玉祥回电说：“余复以救国救民之心，而作害国害民之事，决不忍为也。

而况无党无主义之争，又万无成功之理乎。”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参观考察，冯玉祥感受颇深。他目睹蒙古革命后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深悟振兴中国的迫切。他说：“思及吾国国家及政府，有如六七十岁之老人，既患半身不遂，且患神经病症。而蒙古新政府，则可方之十五六岁之青年学生，凡百事业，均勃然有生气，一种中兴气象，实深刻印入余之脑海。”他认识到“在现在之社会中，压制人之强盗，到处皆是。有势力者压迫无势力者，有钱者压迫无钱者，层层压迫”，是一个“丧心病狂之世界。”因之，革命一定要“革之又革，”“非革之又革不可也，非革之又革不成也”。可见，他已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和曲折性。同时，他对革命也有了信心。他说：“盖凡有人心者，均当以多数人民为念，而努力以拯救之，解放之也。此大事业，一时纵未必能即成功，然大多数被压迫者之同情，无论如何，终必有战胜之一日也。”冯玉祥能够认识到大多数人民拥护就一定能胜利的真理，这不能不说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大的进步。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冯玉祥对“党”的认识有了新的境界，正如他在给刘骥的复电中所说的“无党无主义之争”，“万无成功之理”。这既是冯玉祥长期从事国民革命的经验总结，又是他在蒙的一个新的思想成果。冯玉祥尊重孙中山，崇信三民主义，但他却未加入国民党，就在他离蒙赴苏前夕，由徐谦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147〕}

原来，在冯玉祥抵达库伦的十天后，四月三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偕中国国民党要员于右任、顾孟余也赶到了库伦。他们连日同冯玉祥商谈“国民军国民党合作”、“救国救民及党之重要”等

事宜。经过鲍罗廷、徐谦、于右任的谈话，冯玉祥决心加入国民党。

据《国民军史稿》和冯玉祥《我的生活》载其经过如下：

有一天，鲍罗廷去见冯玉祥，劝他加入国民党，说：“你拥有中国最英勇顽强的军队。二十年来，你胸怀救国之志，但是却不知道你的救国方针和具体计划是什么？如果你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宁愿脱离国民党来帮助你；如果没有，那么，就请你赶快加入国民党，接受他们的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共谋革命大业。”冯玉祥无言对答，只好说：“我是一个军人，不懂得政治，耿耿此心，只知道革命，没有什么方针和计划。”徐谦也劝冯玉祥说：“我们的党，决不是你心目中所想的那个党。这个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的，决不是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的党，也更不是‘营私结党’的党。”长期从事革命，身受统一战线影响，又在旅蒙期间受到革命启发的冯玉祥，听了这番话之后，思想上大受触动，反复考虑，彻夜未眠，决心加入国民党。翌日，由徐谦介绍，履行了入党手续，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冯玉祥正式加入国民党，是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个新的进步，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此“作为一个党员，共同为中国奋斗”。^{〔148〕}

25. 冯玉祥在苏联参观访问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冯玉祥将夫人李德全暂时安置在库伦，下午三点，偕徐谦及随员起身赴苏。翌日下午七点，进入苏联边城恰克图，当地军政官员到郊外迎接。

冯玉祥进入苏联之后，他怀着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和崇敬，以浓厚的兴趣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建设，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并细心地进行考察和研究。他每有所感，常常以中国状况相比较，探索和思考改造和振兴中国之办法。

在恰克图的两天见闻，也使他颇有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
一到恰克图，远望一片砖房，鳞次栉比，街道整洁，气象雄伟。民族民族，尔不努力，将来不能存在于此地矣。

军队之整肃，及马匹之高大，均有深刻之教训于余。余不忍言，国民国民，其自思可也。

在恰克图的第二天，驻防当地的红军第五十三团军乐队，特为冯玉祥一行奏乐欢迎。这天，冯玉祥还观光了市容。他在市场上特意购买苏联生产的花布一匹，寄给暂留库伦的李德全女士，作为进入苏联第一次购买货物之纪念。诸多的新鲜事物，使冯玉祥目不暇接，感慨倍至。他写道：

乐兵老小均有，乐声悠扬悲壮，极好。外出见市房多整齐，窗内盆中红花绿草灿杂列。又闻打钟声，知为礼拜堂预备耶苏复活节也。……又见工人运动场，多树木，另有新沙土堆，高约尺许，系去年大水所淤成，盖亦如前年我张家口之大水也。到街市观消费合作社，百货俱备，知其竭力提倡国货。惜余在张垣时，曾欲行之，终因官长知识太差，未底于成，甚矣新知识之不可少也。

四月三十日，冯玉祥一行乘汽车继续西行，于午夜十二点到

达苏联布利亚特共和国首府上乌金斯克。共和国政府代表，携同军乐队，去城三十里以外欢迎中国客人，使冯玉祥深受感动。

五月一日，冯玉祥和徐谦参加了布蒙人庆祝国际劳动节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观礼。对于劳动群众这种盛大的庆祝活动，冯玉祥称赞为“新式之阅兵，新式之讲话”。

五月三日，冯玉祥等乘车游览上乌金斯克全城市容。然后即去“参观工人住宅，松树苍翠，红房遍野，老幼男女，携手行树林下，洵得自由之幸福也”。冯玉祥“坐树荫小椅上，发生无限感慨：以布蒙人文化之低，今竟进步如此，可知民族不维新、不努力，万无解放之一日。或者我民族本缺乏一种改良之血质欤？！不然，妇女缠足，何以至今尚不解放也。”冯玉祥把中国因受“三座大山”压迫而造成的愚昧落后，归之于人种之优劣，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由于苏联革命后突飞猛进的盎然生机，触发到冯玉祥的思想深处，对比仍在贫穷和落后中苦熬的中国，忧国忧民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下午两点，冯玉祥又到驻地红军一骑兵营参观，先后深入到宿舍、厨房、射击房、列宁室、厕所、马厩等处，深感“处处朴素坚固，均极美善，而厨房尤最”，“尝其用饭，真可与在督军任内请客之饭相等。至马蹄、马毛、草料、病症，均有标本，枪械各件，俱有实物陈设，被服、毛毯、草褥亦厚”。回到住处后，冯玉祥接见了华侨代表九人，他们“谈祖国之腐败，人民之痛苦，及救国救民，有待于自奋者殊多”。

五月三日下午四点，冯玉祥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离开了上乌金斯克。经过这一段参观学习，冯玉祥为国为民的思想又有了深化，他在车上默默思考着人生的道路，悟出了“人生在世，

在求有益于人”的哲理。

九日正午十二点，冯玉祥一行抵达莫斯科，虽然经过连续七天的旅途劳累，然而，冯玉祥“一下车，便觉得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在车站，受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长普加切夫，莫斯科卫戍司令雅可夫烈夫、外交人民委员会远车司长米尔尼可夫等重要军政官员，率红军军乐队和武装分队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冯玉祥看到“欢迎的人员很多，步兵，骑兵，都兵强马壮，武器鲜明。苏联政府人员个个显得精明强干，富有朝气。其中最多而且最使我注意的，是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男女青年学生。他们约四、五百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都有一种英俊有为的样子。他们手里持着小旗，狂热地高呼着‘中国国民军万岁’的口号。他们贴的标语各式各样，诸如‘欢迎国民军领袖’之类”。这种热烈盛大的动人场面，使以“下野将军”身份出访的冯玉祥“极是感动”。^{〔149〕}齐集火车站的各报记者，争相摄取精彩场面的镜头。在车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冯玉祥作了讲话。冯玉祥宣称：

我到苏维埃俄国来，是为了加强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
的纽带，和学习重建俄国和红军的经验。在从上乌金斯克到莫斯科的一路上，我已经从许许多多刚刚完成的桥梁、公路和公寓大楼上看到了重建工作的成就。我很高兴我在这儿，在俄国，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使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你们的国家，在红军特别是红军骑兵中，当我在上乌金斯克参加五一庆祝活动时，亲自看到了红军和人民之间的团结合作。我访问了许多兵营就象学术机关那样整齐干净。^{〔150〕}

随后，他走到了中国学生们中间，对他们的盛情表示感谢，博得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国民军领袖万岁！”“反帝战士万岁！”作为他同情苏维埃事业的进一步姿态，他个人捐献一百卢布，救济正在罢工的英国工人，并呼吁他的随行人员捐献。自然，这一姿态又得到了《真理报》的头版报导。^{〔15〕}

冯玉祥到达莫斯科的当天，苏联外交委员长齐切林到他下榻的欧罗巴旅馆作礼节性拜访。第二天，冯玉祥回拜齐切林，并就访问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与参观考察日程，进行了商谈和安排。中山大学学生、共产党负责人朱务善、周达人（曾任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的翻译），共青团负责人陈绍禹，国民党人谷正刚、张镇等，相继到旅馆拜会冯玉祥。由朱务善、周达人安排，征得冯的同意，决定五月十一日晚，在中山大学礼堂举行欢迎大会。

十一日，冯玉祥带领所有随员步行到中山大学（旅馆到学校步行只须十分钟），朱务善、周达人和中国学生，都在大门及庭院迎候，在休息室学生们围绕在冯玉祥身旁，询问国民军与张、吴军阀战争情况。

下午八点，欢迎冯玉祥将军大会开始。参加大会的除中山大学学生外，东方大学的学生也来参加。欢迎大会由共产党人朱务善主持，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第三国际东方部长、中国问题专家）致欢迎词说：

吾等今日欢迎中国国民军领袖冯玉祥，及国民党同志徐谦两氏，与将来参加中国革命战线之数百新战士，济济一堂，实为最难得，亦最有意义之良会。在革命过程中，其失败也，未始非成功之本。今次国民军，本未失败，而自动退出北京，不过作战之一种策略，养精蓄

愧，卷土重来，今次退却实有深意焉。

打倒军阀，乃中国青年之标语，无补实际。革命必有武力，军阀乃能打倒。今日中国南方，则有国民政府下之革命军，北方则有国民军。南方革命军之进行，恒得人民援助，即以该军有携民众之显明表示，可谓民众化之武力。国民军亦注意提携民众，为民众而奋斗，故亦可谓民众化的武力。然除国民军外，其他军队，乃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如吴佩孚，乃英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张作霖乃日帝国主义者之工具，而彼辈反诬冯玉祥为上帝之难将，且对冯部之民众革命军，加以赤色怪物之名号焉。

劳农联邦，非特与中国革命党提携，且与全中国人民提携，更进而与代表民众利益之革命军提携。

国民军之大旨，乃为民众利益而奋斗。……故冯玉祥乃为民众利益奋斗之战士，亦世界革命之战士。鄙人代表本校干部，三呼：

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中国国民军万岁！

拉狄克的讲话，虽然流露出对群众运动的作用估计不足，和对国民党的依赖观点，但他的讲话热情洋溢，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给予了很高的估价，对冯玉祥是个很大的鼓舞。

冯玉祥非常高兴地自我介绍，说他是工人的儿子，接着发表了长达一小时十五分钟的答词。他在答词中回顾了国民军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佩孚、张作霖的斗争历史，阐明了国民军“食民肉，饮民血，应有保护人民，甘愿作人民之工具”，

“力争人民利益”的宗旨后，畅谈了访苏的感受。他说：

游俄之途，颇得若干教训，如恰克图某县知事，皆由选举；而敝国各省县长，非省长之戚，即师长之弟，或吴佩孚之护兵，目不识丁，与贵国大不同焉。

再言士兵生活，敝国兵饷，月给六元，自活不暇，何从养家，甚至六元亦复不与。国民军则六元之外，加给一元，上级官即或拖欠，兵饷绝不敢缺。若贵国兵士，生活较优特多。余见劳农政府之赤军，饮食且过于余之宴客品焉。

余观贵国工人生活状况，最少月入三十余元，敝国则远不逮。总之，中国若不决行革命，改善贫民士兵待遇，国家民族，皆至危险。^{〔152〕}

冯玉祥在答词中，还称赞在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是“有志救国的知识青年”，称赞他们“不为个人名利，到这里学习革命，武装自己，准备为中国革命、为人民幸福而流血奋斗”。他宣称：“我在各位面前宣布：我热诚的欢迎你们将来到国民军去工作！我们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讲话结束时，冯玉祥高呼：“列宁主义万岁！无产阶级万岁！世界革命万岁！”^{〔153〕}冯玉祥的演说，牢牢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会后，中山大学党组织在讨论是否应该给冯援助问题时，大多数人赞成给冯援助。

五月十三日晚上，冯玉祥在周达人陪同下来到克里姆林宫，同中山大学校长、第三国际东方部部长拉狄克进行了长谈。拉狄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述了中国的历史，并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前景，使冯玉祥更坚定了国民革命的信心，高兴地接受了

中山大学名誉学生的称号。

冯玉祥下榻的欧罗巴旅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苏联政府的招待也极为殷勤周到。冯玉祥想：“我在张家口住的是土房，一生也未住过这样好的大楼，心里老觉得不安”，“想到国内正在与军阀苦斗的朋友与同志，对着面前讲究的菜饭也无法下咽”。在冯玉祥再三要求下，苏联政府把他搬到察里村去住。

在此期间，冯玉祥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庄、图书馆、博物馆、政府机关和军事学校，参加了多次重要集会、欢迎会和莫斯科阅兵典礼，与工人、农民、士兵和各界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还会见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负责人。

为了便于冯玉祥的参观考察活动，苏联政府特意派曾经担任过加仑将军参谋长的乌斯马诺夫作他的专门顾问，与他同住一处。冯玉祥说，此人“很有学问，谈吐也好”。“他每天给我讲一点钟的辩证法唯物论，每次总在郊外的树林下上课。这是研究新兴哲学的开始”。^{〔154〕}冯玉祥还聘请了一位绘画教师，每天坐火车从三十里地以外赶来上课。在读书绘画之余，有时他还到附近的一所玻璃厂做工，以便接近工农群众。

通过访苏的一系列活动，冯玉祥视野更加开阔，胸襟抱负更加宏大，革命信心更加增强。他决定把随员张金瑞、尹心田、丁良俊、彭秉钧和汽车司机张国珍送基辅军官学校学习；随从摄影师送莫斯科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身旁只留陈天秩（解放后曾任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外展览处副处长）、魏凤楼跟随他活动。冯玉祥还决定，将原来打算送到德国留学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送中山大学学习，二女儿冯弗伐及冯的勤务员张某、王某，送莫

斯科一个工厂学工。冯又发电报给张之江，让他在国民军干部学校中挑选六名优秀学员，送基辅军官学校学习。其中卢匿才、张培泽、龙化儒等四名，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26. 蔡和森、刘伯坚对冯玉祥的争取工作

冯玉祥赴苏访问期间，蔡和森和刘伯坚同志亲自对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后来参加革命策应北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蔡和森同志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他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后来毛泽东同志概括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的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他和李大钊等一起作了巨大努力，发挥了首倡人和促成者的重要作用。冯玉祥访苏期间，正值他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后，而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当时，国内由于国民党右派的疯狂破坏，中国革命和国共统一战线出现了曲折，因此，蔡和森对冯玉祥的到来十分重视，加紧对冯玉祥的争取工作。

冯玉祥抵达苏联之初，蔡和森特意前往冯氏下榻的欧罗巴旅馆，与冯玉祥及其随行的将领们，进行了整整三天的长谈。蔡向冯详尽而又精辟地阐述了党的政治主张与国民革命的伟大意义，并启发大家自由发问，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蔡和森都一一给予耐心的回答。蔡和森还多次向冯玉祥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述了列宁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革命，并在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发挥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列宁领导俄

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绝不是生搬硬套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拿到中国去实行。他批驳了国民党右派高唱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谬论，着重强调国共合作，是根据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决定的。

蔡和森同志还派中山大学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朱务善、周达人，每周以两个下午，去察里村冯氏住处给他讲解中国革命的问题，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因无革命政党领导而失败的原因等。

蔡和森亲自对冯玉祥做的工作，和在他组织指导下为冯安排的一系列活动，使冯玉祥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理解，进一步加强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信念，坚定了继续参加革命行列和北伐战争的决心和信心。冯玉祥深深体会到：“中国若不进行革命，改善贫民、士兵待遇、国家民族皆至危险。”而“革命彻底成功，必须有鲜明主义及正确党员为之领导”。他在回国时，向蔡和森提出请求，要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派人与他同行，帮助他改造国民军成为真正与人民结合的军队。蔡和森对冯的这一要求，非常高兴，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给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写信，提出他对继续做好冯玉祥工作的建议。

在蔡和森积极进行争取冯玉祥的同时，共产国际还提出：“趁冯玉祥来苏联考察的机会”，共产国际决定争取冯玉祥，“并委派刘伯坚参加这一工作。”

刘伯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活动家。一九二三年底，他由比利时中国旅欧勤工俭学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调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并被公推为中共旅莫支部干事会负责

人，连任旅莫支部书记三年之久。一九二五年，为适应“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革命高潮的需要，旅莫支部决定全部中国留苏学生，分期分批回国参加南北战场的斗争。由于旅欧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欧阳钦、李大章等三十多个同志，因在法国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后，转到苏联学习，刘伯坚为了接待和安排这些同志的学习和生活，回国行期一再推迟。后来，组织上决定刘伯坚继续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刘伯坚同志热情洋溢，乐于为大家服务，帮助大家解决各方面的困难。他负责的旅莫支部什么事情都管，人们亲切地称之为中共“党内驻苏大使馆”。冯玉祥到达苏联后，接待和争取冯玉祥与国民军的工作，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在此以前，刘伯坚早就与国民军发生了联系，接待国民军官兵来苏访问和学习。一九二五年秋末冬初，冯玉祥派鹿钟麟等一批国民军高级将领到苏联参观学习。刘伯坚、曾涌泉等，组织了东方大学的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担负接待任务，负责帮助他们解决食宿问题，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引导他们参观访问，学习苏联十月革命和各方面建设的经验。

冯玉祥为了培养国民军的建军骨干，组成一个由进步知识分子和失学青年为主要成分的“学兵团”，送到苏联学习和深造。这一批青年，也是由刘伯坚组织接待，并负责他们的思想工作。

冯玉祥派往苏联留学的高中级军官和青年学兵，分送到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等地的红军军事学校，学习步兵、炮兵、空军等诸兵种专业知识和红军实战经验。为了协助苏联军方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刘伯坚派东大的李一特（后来曾任四方面军参谋长）、赵秀峰、曾涌泉等，分赴各地军校对他们进行政治

思想工作。曾涌泉是派往列宁格勒军校，负责帮助学空军的国民军军官。曾涌泉调往莫斯科工作后，刘伯坚又改派刘鼎接替他。在刘伯坚具体指导下，旅莫共产党人对国民军留学人员的工作取得了成效，对国民军更多的人倾向革命和投身革命，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这次，冯玉祥到达苏联后，五月十七日下午，刘伯坚、曾涌泉和武胡景以《前进报》记者身份，到欧罗巴旅馆去拜访冯玉祥，并赠送冯玉祥一套《前进报》。刘伯坚向冯玉祥畅谈了国际国内形势，并对国内政局的发展做了精辟、透彻的分析，给冯玉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刘伯坚在与冯玉祥的经常接触和交往中，向冯玉祥详细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方法；指明彻底解放工农建立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道路；阐明推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理论和方针、方法。

刘伯坚除了做好冯玉祥上层人士的工作外，还注意在冯的部属中发展和加强党的力量。冯玉祥有一个亲信副官叫张振亚，就是在冯访苏期间由刘伯坚与曾涌泉介绍入党的。后来，冯玉祥离开革命，张振亚仍带领一个旅潜伏在冯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率领全旅到晋察冀参加了八路军。

冯玉祥在苏联与中共党人三个月的密切接触与经常来往，对我们党和党的干部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冯玉祥很器重刘伯坚。他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派刘伯坚和他一道回国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共产国际同意了他的请求。一九二六年八月，刘伯坚遂与冯玉祥以及苏联顾问等一起回国。”^{〔13〕}

刘伯坚陪同冯玉祥回到国内，立即与党的北方区委取得联

系，经常向李大钊和北方区委汇报工作，接受北方区委的领导。原西北军机关报《西包头日报》改版的《中山日报》，就是刘伯坚与北方区委联系的纽带。刘贯一讲，他在该报当记者时，经常看见刘伯坚用显影药水，在方绢上写报告送北方区委，请示和联系工作。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由苏回国不久，蔡和森从莫斯科致信李大钊，提出了对冯玉祥工作的所谓“莫斯科三原则”。信中说：

马二先生^[156]此时谅已抵包，不知兄已晤见否？伊在此进步甚大，颇可乐观。与伊同行的有俄顾问桑古斯基及刘伯坚同志，刘系马二自己要求其回去者。于霁^[157]在此与马二接头结果颇佳，于先马二起程一星期，想已先见之矣。于与马二接头之主题为国党与国军^[158]之关系。此间要人意见：（一）此时国军工作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西北政府（季龙计划者）固不需要，即国军与国党之联系（于提者）亦不需要；二者关系之形式即为国党一二受命之中央委员与冯个人之接头。（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以上三个原则，系根据广东经验；望兄特别注意。初步工作，须处处应用此原则，将来第二步工作之形式怎样，应看将来具体情形而定。

蔡在信中提出向国民军选派干部的方针和培养人才的方法，指出：

冯要此间（孙、东两大）^[159]为之准备工作人员四、

五十名，此间要人及弟意见认为此间同志皆甚幼稚，不宜多去，待冯再来电请求时，只选派最少最好者去。弟意国军工作人才应注重下列来源：（一）在国军本身中养成大批工作人才。（二）择一部分在粤工作过的最好分子。这样才不至踏粤复辙。……伯坚颇为冯信任，但伊政治能力不够，又少经验，弟颇担心，望兄特别注意。桑顾问为人颇小心而客观，望兄与伊（桑）保持一种密切的接头，伯坚常在桑指导下当可不至损事也。^{〔160〕}

在当时，蔡和森根据冯玉祥从直系军阀阵营中分裂出来不久的状况，提出为冯氏所能接受的政治工作原则和较灵活的策略方法，作为过渡措施虽然是可取的，但作为国共合作的基本原则，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是不无偏颇的。

27. 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会见 冯玉祥与斯大林援冯决策

冯玉祥在莫斯科受到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负责人的亲切接见，并进行了多次会谈。

据冯玉祥自己说，他在访苏时，“和苏联政府的主要人员差不多都见过几次面”。他说：

第一个会见的是外交委员长齐趣林，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就到旅馆里来看我。随着我又和徐季龙先生去看他，相见寒暄一番，……欢迎我参观各机关团体，多多指教一类的话。会谈之间，也曾谈到中国的问题。他对中国的情形，尤其回教的情况，相当地熟悉。

苏联政府主席加里宁的会见，给冯玉祥留下良好的印象。

我和季龙先生按照约会的时间去拜访他，看见他……动作言语无一不是农民的风度。他那时已经五、六十岁了，还很矍烁健康。他和我们详谈苏联革命的过程以及那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策。……后来详谈苏俄建设的各方情形，及所遇的困难，又问及我们关于“五卅”惨案和首都革命之事，我们也一一详述一番。^{〔161〕}

加里宁还向冯玉祥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理论经验，指出：“①革命必须依靠本国力量，不能依赖外国；②革命军队必须与农民相结合；③要有正确的政策；④人民要依靠革命军队。”这些理论是冯玉祥前所未闻，聆听之后，视野更加开阔。

加里宁谈话的时候，亲切活泼，随随便便，一会儿坐着，一会儿一只膝盖跪在椅子上，完全象乡下老头儿谈家常一样，一谈两三个钟头，没有一点官僚架子。冯玉祥还同上访加里宁的许多农民进行了交谈。这些农民都各有自己的困难，来请求中央政府主席解决问题的。加里宁一一接见或派秘书代为接见，农民的要求都得到妥善而满意的解决和处理。见此情况，冯玉祥“大受感动”，说“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他感慨万分地说：

我们的总统或国务总理哪能如此耐烦？他们时时摆着官僚的架子，他们视老百姓为奴隶，百姓怕他们如虎狼。相互之间，永恒保持着“治人”与“治于人”的关系，彼此隔膜，不相亲近。百姓只知道替他们纳粮服役，官吏则孜孜于搜刮与淫乐。象加里宁似地和老百姓亲爱如家人，彼此生活打成一片，中国的人民哪里梦想得到呢？我以为我国官吏最须效法这种精神。^{〔162〕}

冯玉祥拜会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阿里克夫，彼此交谈了苏

联革命情形和中国革命现状，约两小时。

冯玉祥多次会见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就双方关心的革命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热烈的争论。有一次，在冯、拉两人会谈时，谈到斯大林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演，宣布苏联和日本两国关系已很亲善，并且宣称苏日之间将更进一步实行睦邻邦交等等，徐谦就此问题向拉狄克提出质问，引起了双方激烈的争辩。徐说：“苏联既愿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携手奋斗，便不应该在中国正在进行革命，力谋打断日本帝国主义所加的锁链的时候，而与中国的敌人日本讲什么亲善，说什么敦睦邦交。日本是东亚的强盗，苏俄如何要与强盗为友？”拉狄克争辩说：“主义与政策不能混为一谈，政策与外交手段又有不同。”徐接着说：“即便是这样，你们也当给我们一个信儿。现在如此办理，我们国民党的三大政策怎样向人民交代？”第一天辩论了两个钟头未得结果而散，第二天见面又辩论了两三个钟头，愈辩论愈激烈，问题还是没解决。

在访问苏联海陆军人民委员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时，冯玉祥提出一些有关苏联军备的问题向他请教，他详细作答，说话有条有理。冯玉祥看到苏联军事委员长的服装与士兵一样，只是领子上的符号不同，饮食也和普通士兵一样，日常生活非常简朴，真正做到了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地步。后来，伏罗希洛夫问及关于国民军和军阀们孤军苦战的情况与中国政治军事一般形势时说道：“中国是一个有伟大前途的国家，只要坚持主义，努力贯彻，没有不成功的。”^{〔163〕}

在苏联军事委员会安排下，冯玉祥参观了红军陆军大学 and 高级步兵学校，了解到大多数学员出身于普通工人，在战争年代立过

战功；有些是有实战经验的中上级军官，被选送来校深造。使冯玉祥感到惊奇的是，有些在帝俄时代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的学者担任教官，使他们的才能能够贡献给新兴的苏联。在参观兵营时，冯玉祥又看到士兵们在完成操作技术和战术演习后，与军官们一起吃饭，白菜牛肉汤和黑面包，饭菜简单而营养丰富。冯玉祥在同士兵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非常懂得自己的神圣职责是保卫苏联国家的经济建设，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成果；同时，他们也非常了解世界大事，知道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吴佩孚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非常理解苏联援助中国的意义，并愿意帮助中国革命。冯玉祥还参观了连队的列宁室，看到张贴的图表中有中国地图，而且在作战双方的战略点线，插上小旗标明战局变化。从此，冯玉祥了解到列宁室，是苏联共产党对红军士兵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从而对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列宁夫人、苏联文化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克鲁普斯卡娅，也同冯玉祥进行了亲切的会见与交谈。克鲁普斯卡娅在会谈后，赠送冯玉祥一套二十六册的《列宁全集》和一座列宁雕像，使冯深感荣幸。

参观访问安排得紧凑而丰富多彩。冯玉祥连续参观了莫斯科苏联革命博物馆、苏联民族博物馆、艺术博物馆，以及作家和艺术家们夏令休养场所。苏联作家和艺术家休养地，是莫斯科郊外沙皇时代王公贵族独享的华丽别墅，每年夏季各地的作家和艺术家来此疗养休息一个月。在参观苏联革命博物馆时，先烈们的宝贵遗物和英雄事迹，引起了冯玉祥的浓厚兴趣，他非常仔细地参观审视，受到了书本上所没有的革命思想教育。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乌斯马诺夫陪同下，冯玉祥专程赴列宁格勒，参观了苏联红军海军军官学校和海军炮兵实弹射击演练。之后，又参观了帝俄沙皇的冬宫。在巍峨雄伟的宫殿中，尼古拉二世穷奢极欲的豪华生活用品，原封不动地陈列着，供各族人民参观，作为俄国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冯玉祥看到来休息的工人，在这座豪华的帝王宫殿中游泳、划船、下棋，而且按照医务人员的生活安排，每天供应五次营养丰富的饮食和点心，颇受感动。他认为，昔日帝王将相享乐的宫殿与王孙贵族消遣的别墅，今天成为劳动人民休养娱乐的场所，除非共产党领导的苏联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访苏期间，冯玉祥还同共产国际领导人进行了亲切会谈。据冯玉祥说，他到莫斯科不久，第三国际负责人就同他会面谈过一次。冯说：

那次我们谈了三个钟头。对于欧洲近势和东方各民族革命的问题都谈得很详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说话很有条理，态度异常的诚恳。虽然说到后来，他因谈话过多，不免显出疲乏的样子，但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谈下去。^{〔164〕}

不巧的是，那时斯大林在黑海养病，不在莫斯科。他写信给冯玉祥说等他病好，再行约会。后因冯玉祥回国急促，始终未能见到，致使冯玉祥“引以为憾”。

一九二六年七月底，冯玉祥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后，接到张家口报告，国民军在南口战败后撤，遭到奉张、直吴和晋阎的进攻和堵截，处境危急。冯玉祥心情焦急，坐卧不安。这时，李大钊特派于右任赶来莫斯科，敦促冯玉祥赶快回国。冯请乌斯马

诺夫报请苏联有关方面，应该快些给以枪弹援助，他即回国奋斗。

乌斯马诺夫上报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后，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季诺维也夫，邀请冯玉祥到克里姆林宫会谈。冯玉祥谈了国民军在南口同张作霖、吴佩孚军阀联军激烈战斗后撤退的情况。季诺维也夫说：“我们已了解你们的困难与需要。斯大林同志很想和您见面交谈，因他身感不适正在黑海疗养。经过研究决定，尽我们全力满足你所希望的援助。”他还说：“现在广东革命军准备出师北伐。想你回国后定能重振旗鼓，策应北伐军，给反动军阀以致命的打击。我们预祝中国革命的成功，请你即回国做准备。在准备启程和回国途中如有任何需要，都请乌斯马诺夫同志会商有关部门解决。”〔165〕

据毛以亨《俄蒙回忆录》载，苏联与共产国际对冯的援助，是斯大林最后作出决策的。毛氏详细记载了斯大林会见某君时谈冯谈话的内容，原文如下：

斯大林此次与某君的谈话，是从中国当时的政局开始的。问答内容如下：

“你看中国前途如何？”斯问。

“我们皆以为北京政府必倒。”某君答。

“蒋介石北伐，这样没有把握的仗，你们认为能胜利吗？”斯问。

“我们以为这是全国人心所盼望的，必然成功。”某君答。

“蒋氏能反帝国主义到底而不与英美妥协么？”斯问。

“惟对日本则绝不能妥协，因为全国人心都是反日

的。”某君答。

“这样就不彻底了。英美之帝国主义，其力量比日本尤大。”斯说。

“……中日关系是个死结，任何人都解不开，这把火必然要烧起来的。现在中国人对苏联最好，因为她已放弃特权，而以平等之民族待我们。现在苏联已经帮助我们革命，将来还希望帮我们打日本。”某君说。

……

说了半天，终于言归正传，转入对冯玉祥援助的本题了。

“我想装备在甘肃之冯玉祥部五万人。”斯说。

“如此则只能使冯氏有了甘肃地盘。若帮助一个割据的军阀，固然够了。不过苟欲装备冯氏，使其参加国民革命，出陕西，入河南，而与国民革命军会师，则力量尚差得远。陕西杂牌军阀，其力量超过十万人，这须冯氏独力应付的。北洋军阀张吴合并起来，在河南增兵至五十万，而孙传芳所部，尚未计算在内。我们与党军合并起来，与北洋军阀力量之对比，为一比五，如何能济？况且我们还要为郭松龄报仇，直捣东三省之奉系老巢，届时是要遭遇日本之关东军的。”某君说。

“那末你们所希望之最大限度，要装备多少人？”斯问。

“我们不以内战之胜利为目标，而以打到东三省，遭遇到日本之关东军为目标。关东军是日本的精锐，我们单独的力量，勉强希望能击败奉军，不能有击败关东

军之自信。所以希苏联在远东的红军，与西北军合作，做成两钳之势，以钳住关东军。红军可以按兵不动，只是我们这一钳迎上去，与红军之一钳接合，而企图把关东军钳在里面。造成此一形势，则我们解决奉军时，关东军必不敢动，故亦不至牵动国际局面。不过两把钳子的力量须平均，尤其我们动的这一面钳，力量不能弱”。某君说。

“你们是不是要求与远东红军，有同等数量的装备？不过你们若不拿来打日本人，而在中国称雄起来，则我们不特害了中国，妨碍其革命的推进，而且结果会害了你们自己的。”斯说。

谈话至此，某君自然连说不会。……斯大林脸上露出兴奋与得意之状，而以加倍努力于革命相勉励。谈话至此，某君觉得功行已经圆满，遂兴辞而出。

就在这次谈话最后，斯大林决定把原来确定提供五万人军事装备的计划，扩大八倍，即装备四十万人。^{〔166〕}这么巨大数量的无私援助，给予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下的国民军，这就不能不使冯玉祥深刻认识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是他的可靠的朋友。

冯玉祥就是这样带着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深厚友谊和无私援助返回中国，以重振他那陷入重围之中的国民军。

九、李大钊制定进军西北的战略 方针与敦促冯玉祥回国

28. 南口战役及李大钊分析其失败原因

自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奉直“讨赤联军”向国民军发动进攻以来，其初，国民军取得了一些胜利，随后即成溃败之势。最先是国民三军孙岳不敌，然后国民二军岳维峻兵败河南，弃豫入陕。晋军阎锡山，加入奉直联军，出兵大同、石家庄，威胁国民军后方。于是，国民军陷入奉张、直吴、晋阎、直鲁联军的围攻之中。根据当时的形势，国民军决定：军队必须撤出阵地，有秩序地退守南口一线；但是，必须保持部队旺盛的战斗情绪。为了麻痹敌人，争取有利的撤退时机，国民军总部命令前线部队全线发起进攻。各部队战斗情绪高昂，与敌人展开了浴血战斗。沧州、滦河一带，部队取得胜利；保定地区的部队大大向前推进；天津周围的战役顺利发展。

此时，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的部队，已占据了北京城内战略要地，悄悄地修筑了一些工事，并把机枪架设在段政府周围的高房和塔楼上。鹿钟麟找段祺瑞会谈，要他颁布和平法令。段祺瑞迫不得已，发布和平法令，呼吁交战双方停止内战，各自在自己的辖区过和平日子。和平法令颁布后，国民军总司令部顺势向全军发布命令，传达了法令的全文，并宣告：“尽管国民军在各个战

线都取得了胜利，但还是要遵照总统（按：指段祺瑞）法令，停止进攻，回到自己的防地和辖区。如果敌人不愿和平，继续进攻，国民军也不再向敌人发动进攻，以便让全体人民理解，国民军不是军阀，而是被迫自卫。”〔167〕

三月廿四日，国民军一夜之间尽撤天津之兵，退至京东、京南一带。其他各线部队，也有秩序地逐步撤至南口一线。

正当国民军失利，直奉军阀势力进逼北京之时，段祺瑞见有机可乘，顿生祸心，他暗中勾结京畿驻军唐之道部，作为奉军内应，准备里应外合，把北京的国民军全部消灭。鹿钟麟侦知此情后，于四月九日包围了执政府，收缴了执政府卫队的枪，段祺瑞及皖系政客一个个如丧家之犬，仓惶逃入东交民巷大使馆，北京执政府从此鸟兽散了。但是，软弱的国民军却妄想联吴抗奉，并释放了曹锟，电请吴佩孚入京处理政务。狡黠阴险的吴佩孚，利用国民军消灭段祺瑞，取得与张作霖争夺北京的均衡局面。但是，在对待国民军的态度上，张吴仍然一致，非根本消灭之而不可，继续猛烈进攻。四月十五日，国民军撤出北京，由方振武部作掩护，各主力部队沿平绥铁路线退往南口附近。京东地区各部退向怀柔、顺义、延庆一带。京西地区各部，退向斋堂、蔚县、多伦地区。国民二军弓富魁等部、国民三军徐永昌等部，大部分经南口，一部分经三家店，退向怀来、涿鹿。

国民军此次撤退，是在李大钊与苏联顾问团参与和指导下，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撤退时井然有序，运动神速，往往军队撤走，居民还不知道。

国民军退守南口一带，派重兵扼守东西南各要隘，严阵以待。

南口是国民军长期经营的阵地，修筑有坚固的工事。当时，

负责协助冯玉祥规划修筑南口防御工事的苏联顾问维·马·普里马科夫记载如下：

三个工兵营修筑南口工事，整整干了一个月。山道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在南口，平地上高耸着一座座没有山麓的高山。狭窄的山道，以及沿山道敷设的京绥铁路，切断了这条大山脉。

一座南口古要塞位于出道口的南侧，它是在悬崖脚下修筑的一个厚达五俄丈的正方形城堡。要塞对面三百公尺处，孤立着的悬崖顶上，有一座倒塌的庙宇。从山顶望去，是一片无际的平原，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远处的北京城。南口要塞前面一公里处，是一个小村镇和南口车站。车站前面修筑了一些射击阵地，可以控制六公里的正面。

射击掩体挖成卧射用和立射用的两种。各掩体都挖有交通沟通往南口车站和第二道防线。第二道防线是一座机枪堡垒，修筑得十分坚固，而且有良好的射击面。炮兵阵地修筑在南口要塞旁边高地的后面。…山岭上几乎没有通道。最近的一条通道是古北口，位于南口以北五十英里，由骑兵部队和一个步兵旅防守。古北口只有不携带火炮的步兵才能通过。^{〔168〕}

就在这个险要的隘口，从一九二六年五月至八月，在北方战场上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战役——南口大战役。从这次战役投入兵力和武器之多，战役持续时间之长，战役战斗的艰苦和激烈程度各方面看，可以说是整个北伐战争时期诸战役中最大的战役之一。

当时，双方投入的兵力达八十余万人，占全国总兵力一百万

的百分之八十。双方兵力、兵器对比如下：

军 别	总人数(万)	师(个)	旅(个)	机 枪	大 炮
奉、直、晋军	59	42	47	946	890
国 民 军	22	18	25	625	400
合 计	81	60	72	1571	1290

从上表看出，反动军阀联军拥有的兵力和武器数量，都超过国民军一倍以上。

国民军在南口的兵力有步骑兵十一个军，九个师，三十八个旅，又六个特种团，共约二十万余人。其部署是：张之江任全军总司令，鹿钟麟、宋哲元分任南路、西路总司令。刘汝明扼守南口；王镇淮、席掖池守察东之沽源、多伦。韩复榘、石友三守平地泉、丰镇。

“讨赤联军”进攻南口兵力，除阎锡山的数万晋军外，张作霖、吴佩孚的部队有五十余万之众，并且兵分五路，向国民军发起猛烈进攻。

一，北京东北方面，奉军以张学良、韩麟春为正副总指挥，由北京向南口，由怀柔、密云、三河、香河向通州进攻；另一路由万福麟指挥，由热河向察北进攻。两路奉军还拟绕攻昌平，将京绥铁路交通截断。

二，北京西北方面，吴佩孚率领直军，以靳云鹗为总指挥，统田维勤等部，由保定分三路向察南进攻，并沿京汉线向长辛店攻击前进，并向门头沟伸展，以便进窥京绥线。

三，北京东南方面，直鲁联军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等部，由京奉、京浦铁路沿线向黄村进攻。

四、热河方面，奉军阀朝玺等部，向朝阳、承德方面进攻。

五、晋北方面，阎锡山派商震、傅作义、张培梅等部，向大同、天镇和绥远方向进攻。

上述五路联军同时并进，企图逼使国民军退入绥远一隅之地，形成围攻之势，然后聚而歼之。

在“讨赤联军”各系军阀背后，各有外国主子暗中支持和支配他们。帝国主义者早就在北京帮助军阀将领制定围攻国民军的作战方案与军事行动计划。日本帝国主义给军阀部队派遣了军事顾问与技术骨干，给奉军提供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给直系军阀提供财政援助。英帝国主义者还供给直系军阀一万五千支枪械。总之，帝国主义者操纵各系军阀组成“讨赤联军”，为他们出谋划策，给枪给钱，妄图一举消灭反帝反军阀的国民军，扑灭中国的革命烈火。

五月中旬，吴佩孚所部开始向南口淤泥坑附近进攻，直鲁联军向南口正面猛扑，激战十余日，未能前进一步。张作霖看到直鲁联军精锐损失殆尽，又令张学良、韩麟春等部加强右翼，集中重炮火力，每天向国民军阵地猛烈轰击，掩护步兵进攻，也未得逞。延庆方面，奉军万福麟部以谭庆林率骑兵为先导，由怀柔、撞道口、二道关发动进攻。在赤城、独石方面，国民军守备部队张心元团，擅自放弃赤城，后经激战夺回。沽源、多伦方面，战线长达三百多里，奉军吴俊陞率万福麟等部进攻多伦，汤玉麟等部进袭沽源，鏖战月余，屡失屡得，形成拉锯状态。总之，战役开始阶段，国民军依托坚固的预设阵地顽强抵抗，使“讨赤联军”遭到惨重损失。

在五十余万“讨赤联军”的围攻下，国民军深感寡不敌众，于是重新调整部署，以宋哲元为西路军总司令，其任务是，肃清

山西雁门以北敌军，攻克战略要地大同，恢复京绥铁路沿线交通。从五月下旬至七月下旬，西路军与阎锡山晋军部队，在大同、天镇及晋北地区展开激战。后因多伦告急，抽调各军增援，致使大同、天镇二城未能攻下，既定作战企图未能实现。

国民军既承受着优势敌军兵力的强大压力，又遇到给养困难，饷械补充无继，作战十分艰苦。而直系吴佩孚又命令刘镇华积极图陕，唆使张兆钾、孔繁锦攻甘，以断绝国民军的后路。同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又以饷械资助晋系军阀阎锡山，促其乘机向国民军反攻。阎锡山应约与南口方面相配合的奉、直、鲁各系军队，同时向国民军发动进攻。乘国民军后方空虚之际，晋军董中山部进占清水河、托克托等县，直逼绥远。后来，张作霖又收买赵有禄匪军，将包头围困起来。国民军几面作战，历时达四个月，有生力量伤亡过半，粮饷匮乏，与陕甘的联系又将断绝，乃于八月十五日下令总退却，向西突围。其部署是：以韩复榘、魏得成部担任掩护；宋哲元率多伦方面各军，石友三率晋北雁门方面各军，向绥远撤退。以平地泉为第一防线，卓资山、和林为第二防线，由韩复榘、石友三、孙连仲等部，分别担任收容和防守的任务。

由于国民军的战线延伸约二千多里，退却时经过的道路，不是崎岖小路，就是广漠流沙，村落穷僻，交通不便，命令传达难以迅速准确，行军给养筹措十分困难。加之塞外奇寒，朔风凛冽，生者无衣无食，伤者无医无药，死者无棺木埋葬。敌军间谍随时破坏，铁路军车数次互撞，部队损失惨重。西退愈远，供应愈缺，有时水浆亦不能入口。敌军尾追，无暇休整，部队困苦疲惫，不可言状。最后，国民军已所剩无几了。而在晋西北担任掩护、防守任务的韩复榘、石友三、张自忠等部，因撤兵不及，便

与晋军商震妥协，归晋军改编。

至此，北方战场鏖战四个月的南口之役，终于宣告失败了。

南口战役，是国民军战史中光荣的一页，能以少量兵力抗拒奉、直、晋、鲁联合大军四个月之久，虽然寡不敌众，损失甚大，卒至失败；但是，当时正是国民革命军宣布北伐，在工农群众支援下，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攻克长沙，直下岳阳，震撼武汉。而此时吴佩孚的精锐部队正被国民军牵制于南口，不能南下援鄂。同时，张作霖怨恨吴佩孚率主力久留北方，有与他争权夺利霸占地盘之嫌，不肯援助在南口作战之直军，因而吴的大部分主力被国民军歼灭，减少了北伐军前进的阻力，使国民革命军能够长驱直入湘鄂。八月下旬，北伐军进逼武汉，九月七日攻占汉阳、汉口，十月十日，攻克武昌，吴佩孚留在南方的部队二万余人，全部被歼。十一月，北伐军歼灭孙传芳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十二月，收复福建全省。一九二七年元月一日，广东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北伐军进展如此顺利，是和国民军在北方战场上牵制、抗击奉直数十万大军分不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南口战役及国民军的巨大牺牲，对国民革命是有很大贡献的。

对国民军抗击奉、直、鲁、晋联军的革命战争及南口战役，中国共产党曾作过高度评价，指出：这次战争“实际上是人民与军阀的战争，国民会议与军阀统治的战争，张吴联军与民众联合的战争”。^{〔69〕}党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分析，实际上阐明了战争的重大意义及国民军在国民革命中的巨大作用。

对国民军南口失败的原因，有过各种说法，但最透彻的见解，莫过于李大钊同志的分析。大钊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此次西北国民军之退却，并不是原于战败，乃是原

于西北军内部有张之江作奸细。在国民军未退南口之前，京畿一带有三万以上的军队，相约于十二日一致动作，解决吴佩孚，并截断奉鲁军后路。乃张之江故意弄错，致国军未能届时出来，功败垂成，反在张家口假装疯魔，痛哭流涕的说人家骗钱失信，至十四日他便大举撤军了。我们看日本东京、大坂各大报所载，十日北京发的电通社电说，张家口方面主和派（非战派）的秘使赴奉，又张的秘书长某致某君函云，以后如有关于与广州接洽之事件，可迳函鹿，关于与奉天接洽之事件，可迳函张之江，便可知道这次撤兵的黑幕了。张之江于自觉的和非自觉的反革命外，还是一个最无能力的东西，所以撤兵之顷，弄得一塌糊涂，冲车失火，毁损甚巨。^{〔170〕}

因此，大钊同志斩钉截铁地下了论断：

这次国军退却，实为一大失败，丧失精锐兵士及器械无算，这不是因为战争失利，而是因为主帅之无谋。^{〔170〕}

南口之役失败了，出路在哪里？大钊同志向党中央提出：“唯一的希望在冯即日回包，还可重整旗鼓，否则万事将败于张之江之手矣！”^{〔171〕}北方的局势正是按大钊同志提出的方针与方案发展的。正是大钊同志多次敦促冯玉祥由苏回国，收拾残局，重整旗鼓，才得以挽救国民军于危亡之中。

29、李大钊敦促冯玉祥回国 与进军西北的战略方针

一九二六年七、八月间，正当国民军处于危难之时，李大钊

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这三次电报都是由国民党左派于右任转达给冯玉祥的。

原来，冯玉祥出国后，李大钊请当时正被奉军通缉的于右任，去苏联做冯的工作。于欣然受请，便偕同翻译马文彦（中共党员）取道日本前往苏联。原李、冯约定冯在上乌金斯克会见于，但是，于到达时，冯已去莫斯科了。

于在上乌金斯克接到李大钊的第一封电报。当时，奉直联军猖狂向国民军进攻，国民军已难于支持，战局十分危急。那时，每日战况，由张家口国民军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电告苏联大使馆，大使馆随时转告李大钊。出于国内战局发展的需要，李大钊发电给于右任，要于尽快赶到莫斯科会见冯玉祥，敦请冯及早回国，收拾部队，向西北进军。于右任立即赶赴莫斯科，经过与冯玉祥秘密商谈，冯玉祥毅然接受了李大钊提出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并决定于八月中旬起程回国。

南口战役失败后，李大钊为避免战局继续恶化，预防察绥再出问题，第二次发电要于右任催促冯玉祥尽快登程。于右任为了促使冯玉祥及早回国，自己先期起程，从莫斯科乘车去上乌金斯克。在上乌金斯克，接冯来电，要于等他。为减少冯在途中滞留时间，于未等冯，即先程赴库伦。行前，于给冯回电说：“先归收拾残局。”冯愈觉形势严重，在上乌金斯克未敢停留，径直赶往库伦。

于右任刚到库伦，又接到李大钊第三次来电，说冯军的一部分已投降阎锡山，要于再次催促冯玉祥尽快回绥远收拾局面。冯因事在库伦停留数日，直到固阳县一带，冯玉祥的车队才赶上于右

任，一同回到国民军驻地五原。^{〔173〕}

30. 冯玉祥决心回国重震军威

经过李大钊的再三催请和国民军将领的要求，冯玉祥决心回国收拾残局。他在莫斯科只经过几天的准备，便于八月十七日，告别莫斯科，搭乘火车取道库伦回国。这次陪同冯玉祥回国的，除冯的随员外，有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

回国途中，冯玉祥十分关心国内时局变化，对改革政治，挽回败局也有许多考虑。从他的日记中可见一斑，兹录于后：

十八日 ……十二点，与刘伯坚谈共党之目的及方法，其方法虽每因时制宜，而目的则未尝稍有更改也。

二十日 ……午后八点，到托木斯克。阅报，知敌军占领南口。九点，发致德全一信，旋与刘伯坚谈苏联现状。

二十三日 ……午后九点半，到上乌金斯克。阅报，知敌军已到张家口，我军方面退也。按敌军之枪炮、粮秣、兵力，均厚于我，惟其结合颇不坚固。故吾未出国时，早有令全军退至丰镇以西之训令，以诱致其自相火拼，惜未实行。敌人见我之不退也，遂切实联合，协以谋我，既以重兵攻我南口，复以大军压我多伦，又以国军断我后路，楚歌四面，环顾皆敌。我军以伤亡日多，子弹日缺，遂不能不退而西行。特我军战败而退，远不如乘胜西行之足以保全兵力耳。是究是图，亶（按：音胆，诚然之意）其然乎，特志之以见知兵之不易也。

二十四日 昨夜，卧不成眠……感想列下，（一）余本

以救国救民为职志，而目的不能即达到者，要在学识之不足耳。清室之优待条件，既经完全取消，对于旗圈，仍不废除，是作事之不彻底也。（二）今天竟言土匪多矣，然土匪何自而来？果政治清明，人民安居，匪患自当无由起矣，是由不能不归咎于一般执政者也。（三）报载江苏震记有电水戽，可以灌田，每亩年仅费洋六角。查察绥之水，流入京南各县，每成巨灾。如察绥用以灌田，则察绥之粮固可增，而京南亦不至复有水灾，一举而两得之，岂非计者得者哉。

二十七日 ……接李石曾等由飞机传来之电报，深以退南口为非是，并言宜分兵陕甘，出潼洛，下襄汉。余思此事谈何容易，我军之枪械兵力及地方补充，均远不若张吴，坚守南口，徒蒙无谓之损失耳，有何益耶？又人才、款项二者，实为作事根本，事后应详为讨论规定也。

二十九日 ……午后二时，看《东方杂志》。内载：有美人虐待黑人事。夫黑人亦人类也，美人尝自诩为文明之国民，理应以人道待之，乃杀戮之，牛马之，无所不用其极，是岂所谓平等博爱者耶？须知强权终为公理所战胜，不见俄皇、德皇、奥皇以及我国之袁世凯乎？当其志得意扬之时，何尝不炙手可热，乃曾几何时，所谓一世之雄者，而今安在哉？是以吾人一生，惟有牺牲一己，以救助贫苦阶级，扶助弱小民族而已，海有枯，石有烂，此志不可渝也。

九月一日 五点，下火车，改乘汽车。……闻乌金斯

克式渡舟已办妥，约十日内外可运人，是以为世界之新事业矣。苏俄政府建设之精神，良足矜式（按：取法之意），因作一诗咏之。诗曰：“新桥新路并新船，便利民行设计全，终日为民谋利益，革新政治是苏联。”^{〔173〕}

这几则日记，表达了冯玉祥访苏之后回国途中的心情、思想、志向和动态，说明他仍然立志改革政治，实现民主，振兴经济，匡扶世界弱小民族；他对苏联倾注了仰慕之情，作为“矜式”，立意仿效；对国民军的处境与前途，十分关心，但神情镇静，头脑清醒，对挽救败局，似有成竹在胸。这一切足以证明，冯玉祥访苏之行有了长足的进步。

九月三日，冯玉祥一行抵达库伦，住了六、七天，除了进行必要的外交活动外，主要是进行开会仪式的练习。会议共开了五次，由刘伯坚担任主席，参加人有冯玉祥及其主要随员何其巩（冯的秘书，后任北京市长）、李兴中（后任国民军军长）、任佑民（冯的英文书记），还有乌司马诺夫和顾问、翻译、秘书等人。会议主要解决国民军的对外宣言，由刘伯坚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草拟和审查通过了《国民军对全国民众的宣言》等七个宣言，和冯玉祥对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孙传芳的忠告书。这些《宣言》一一在会上进行了演练。

由此可见，刘伯坚等同志，利用在库伦停留的时间，为冯玉祥回国后举行五原誓师，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实际上是五原誓师的预备会议和演练。

在库伦的练习会，冯玉祥有一段值得一看的记载，展示了刘伯坚办事认真的严肃精神和冯玉祥对共产党人的崇敬。他写道，有一次正练习开会时，乌司马诺夫忽然站起来，很郑重地说，

“开会革命工作之一，大家不可随便嬉笑。”当时冯玉祥不知道这话有何所指。事后有人告诉冯说，有一次正当开会的时候，何其巩轻率谈笑，颇有视为儿戏的样子。冯认为：“刘伯坚是个严肃的革命青年，对何的态度，视为应当纠正，于是把此事告诉了乌斯马诺夫，因此惹得他说了这番话。这完全是何其巩的错误，当大家郑重其事练习开会时，他岂可轻狂发笑？而刘伯坚与乌顾问的严肃不苟的精神，尤其值得我们佩服的。”^{〔174〕}

九月十日，冯玉祥偕同刘伯坚等，从库伦向包头出发。途中乌斯马诺夫忽然问冯玉祥：

冯先生，你的部队这回在南口一败涂地，投降的投降了，溃散的溃散了，现在你带着我们回去，究竟怎样办理呢？

冯玉祥很自信地回答道：

只要我们能遇着一两股，有个三二百人，我就可以有办法。就算跑到山上当个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将原有队伍慢慢召集起来。

乌斯马诺夫听了冯玉祥的话，十分兴奋，微笑地说道：

不但可以遇到二、三百，我们一定可以遇到成千上万的人马！^{〔175〕}

冯玉祥从库伦临动身时，曾发电致包头国民军唐某，表达了他这次回国“势必积极进行革命工作”的决心和计划，他说，“最要紧的是要把西北军赶快的与北伐军接连起来。”他在电报中谈了他进军西北由甘入陕的战略方针。还说：“方振武倾向革命较前益熟，预备联合西北二、三军的残部，由榆林入陕，改造军队，立志把他的军队变为党军。”^{〔176〕}

从以上记载看出，冯玉祥此次由苏回国，对革命的决心是很大的，信心是很强的，可以充分说明冯玉祥访苏是不虚此行的，收获是很大的。

九月十二日，冯玉祥在途中遇见了国民军第九军军长王镇淮、宋哲元部参谋长黄汉中等，乘坐汽车，迎面而来，打算到上乌金斯克去另谋新出路。冯玉祥劝他们跟自己回去，共同想办法。冯玉祥看出，大军受挫，人心动摇，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

又走了一程，国民军张允荣从包头来迎接冯玉祥。张向冯详细报告了南口战役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具体谈了包头会议情况。他说，大家在包头开会时，不免各诉枪弹缺乏，人马不济。张之江见大家要钱、要枪、诉穷诉苦，就急躁回答：“今天是要命有命，要钱没钱！”大家听了很不高兴。出席会议的国民军骑兵第一集团军总指挥赵守钰见此情形，就笑起来，有人问他笑什么？赵说：“你们忘记是干什么的了！我们是革命，革命就是克服困难，不是坐享安逸舒服。若是百事顺遂，毫无困难，还要革命作什么？”他又说：“我们现在处境当然不顺，可是并未至绝望之地。往西，有甘肃刘督办，薛省长，那末大的土地，难道我们真的饿死冻死？二军、三军也都在那边，力量上也很有可观，总司令又从俄国回来了，我们克服了困难，前途立刻就是光明，何必这样懊丧！”几句话把出席会议的人说出劲儿来了。

接着，张允荣又把韩复榘、石友三投阎锡山的经过，以及官兵们饥寒交迫的情形，渴望冯玉祥回国统帅国民军的心情，一一向冯玉祥作了详谈。

冯玉祥还从张的报告中，知道孙连仲、刘汝明、佟麟阁等部，都已通过五原，相继开往甘肃。又得知张之江和鹿钟麟已经会

面，鹿钟麟正带着队伍驻在五原，等候冯玉祥返部。

再往前走了一天，宋哲元前来迎接。冯与宋久别重逢，十分欢喜。冯听宋谈了前方作战及沿途所见退却部队情形，彼此都很难过。

九月十四日午后一点，在距大青山一百多里的地方，鹿钟麟、邓哲熙、过之翰等国民军宿将，带着一连手枪队，前来迎接，大家相见之下，悲喜交加。对此，冯玉祥情动于衷地回忆道：

大家见面，悲喜交集。手枪队官兵们见了我，多不禁地流下泪来，一如良家忠厚子弟受了人家的欺侮，一朝见了父兄的面，即不免悲从中来一样。我只好一一安慰之，并与谈革命大势，中外英雄故事，以及救国救民的道理。讲了一番，大家即十分振奋。我与宋、鹿、邓等同车，于途中详谈一切，大家都极兴奋。^{〔177〕}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冯玉祥返回国民军总司令部驻地绥远省五原县，他决心收拾残部，重振旗鼓。国民军的流散部队，听说冯玉祥回国，也纷纷携枪归队。

十、李大钊、刘伯坚帮助冯玉祥五原誓师 和开拓国民军建设新局面

31. 刘伯坚帮助冯玉祥五原誓师

五原誓师是冯玉祥国民军转败为胜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在李大钊同志敦促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由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具体帮助和组织进行的。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冯玉祥返回国民军驻地绥远省五原县后，全军将士欢跃异常，冯玉祥深受感动。此时，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正在顺利进行，战局发展很快，冯玉祥精神大为振作。同时，我党派刘伯坚等共产党人，陪同冯玉祥由苏回国复兴大业；加上苏联给冯军大量军援，更使冯玉祥深受鼓舞，信心倍增。他高兴地说：“我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

冯玉祥稍事休息后，即召集国民党左派代表于右任、国民二军弓富魁、国民三军徐永昌，以及国民一军的方振武、鹿钟麟、宋哲元等，商讨重振国民军之大业，决定组成国民军联军，一致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九月十六日下午，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宣言。这一誓师宣言，是冯玉祥国民军进入新阶段的行动纲领，是整个国民军发生革命性历史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于研究冯玉祥的政治思想和国民军的历史作用，具有重要意

义。现摘要记录于下。

宣言首先昭示了冯玉祥由苏返国献身革命的决心，写道：

玉祥本是一个武夫，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革命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中山先生说的好，行易知难。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的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从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己，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不是怎么东山再起。

接着宣言追述了出身于贫苦工人家庭的冯玉祥，从失学入伍，到投身革命的经历。宣言在列举了冯玉祥组织领导或参加的滦州起义、讨伐袁世凯运动、反对张勋复辟、北京政变、推倒段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革命事件之后，申明“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路线上而作的”，决不是什么“倒戈”和“逼宫”。

宣言从政治思想的发展上阐明了冯玉祥革命观的确立过程，有理有据地批驳了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们攻击革命、攻击苏联的无耻澜言。宣言写道：

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算是有点革命癖，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当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作的不对，就得要革命，无论他是亲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族的意义，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吴佩孚张嘴闭嘴所抱守的纲常名教，尽可由学究们放在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做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作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象革命，其缘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不意当时有人说我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了？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亦不知道什么是赤化。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制中国于死地，只有苏联自动的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能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隶待我们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

什么密约，尤其是荒唐之语！我向来痛恶卖国贼与外国人结密约，岂有躬身自蹈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自动的取消了，哪里有再结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理？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屑作这种鬼崇之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瞒于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若说苏联帮助革命，有所怀疑，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都作不出来。

宣言指出，吴佩孚非常明白事情的真象，却偏要制造“赤化”、“密约”一类谣言，“完全是骗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

宣言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人民贫困落后根源，指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宣言写道：

军阀本身实在无力量，乃是帝国主义在背后主持。因此，我们知道要战胜军阀，必须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人及一切受苦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

接着，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大量事实后，指出：

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交民巷的公使团是何等的强横，稍微明白中国政局的，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中国的内政动辄加以干涉。如去年大沽口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唆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

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人、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及一切的民众穷的要死，其原因都出于此。

为了改变国家民族陷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处境，冯玉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态度和革命主张，宣告：

苦痛的来源已经求出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立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人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共负革命的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及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在解放中国被压迫之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性命的危险，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能解除。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用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谨此宣言。于民国十五年九月十六日。^{〔178〕}

在冯玉祥向全国发出宣言的第二天，即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县的大校场上，召开国民军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宣

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之职，誓词宣告：

本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179〕}

在典礼大会上，冯玉祥、刘伯坚发表了演说，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北洋军阀政府，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刘伯坚的演讲，深入浅出地宣传了革命道理，指出了今后的斗争方向与前途，大大鼓舞了全体官兵的士气，雷鸣般的掌声不绝于耳。当场还举行了易旗仪式，将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刘伯坚亲自高举大旗威立阵前，冯玉祥郑重宣布，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全场群情振奋，欢声雷动。誓师大会后，冯玉祥和于右任扛着红旗，同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率部队在五原街上游行。会后聚餐，大家一菜一饭，以白开水为汤，菜是大锅菜和咸菜，名为“革命饭”。官兵们有说有笑，士气格外高涨。

这就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原誓师。

五原誓师是冯玉祥一生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国民军“新生命”的起点。五原誓师后，在刘伯坚等大批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冯玉祥着手改编军队，整顿队伍；同时，聚集流散的官兵，欢迎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数师之众翩然来归，并在全军范围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治工作队伍和政治工作制度。不仅使濒于败亡的国民军起死回生，迅速发展 to 二十余万人；而且使国民军走向摆脱旧军阀影响，成为一支具有比较鲜明的革命倾向、

同共产党积极合作的革命武装。同南方正在胜利北伐的十万国民革命军南北呼应，国民军联军在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旗帜下，开始了它参加北伐的革命新里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冯玉祥参加革命的事情。”当时，“冯玉祥率领他的军队在绥远省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参加革命”。^[180]从此，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在革命阵营的地位显著提高，对中国政局和北伐战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32. 刘伯坚库伦报告与党的国民军工作方针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刘伯坚陪同冯玉祥回国途经库伦时，把在库伦期间的活动及今后对冯工作的设想，向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十一月初，中共中央还做出了《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这几个文件是冯玉祥回国后党对国民军工作的重要指导性的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刘伯坚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写道：

我与冯玉祥同行到库伦已三日，因为许多事都在积极进行，不能立即得到结果，故今天才做报告。我在库伦所进行之事件之最大者撮举如下：

一、促冯电催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速派孙、东两大中国学生四十人（内派女同志十人）速到国民军工作。此事冯完全同意于我，但是俄顾问主张只来二十余人，将就我在莫斯科所提出的名单，再加上几个女同

志，这还是我同他力争的结果。他初主张只来二十人，他的理由：一因莫地中国同志们均未成熟，不能多派人；二因国民军退守包头、丰镇，政治工作的范围较前缩小，其实都不是有力的理由。

二、建议于冯请求职工、农民、妇女三个国际各派一同志到国民军中作工、农、妇女等运动指导人材，并向第三国际请求转派英、法、德三国共产党党员各一人到国民军中作指导研究国际问题的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他们本国的分析。前一项俄顾问完全同意已去电请求。后一项俄顾问只同意派一人指导国际问题的研究便够了，而我则以为一人研究国际问题，不如三人分门研究之较为深切。尤其要趁机会多参加外国同志到国民军去，使国民军全部都渐次有世界革命的知识，进一步渐次国际化，同时是应付国民军政治工作之扩大。

三、建议于冯在国民军办一政治画报，由苏联方面聘请美术家二人，由中国方面聘请我们的同志三人共同主持。又，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处就中“选择二处出两个日报，作为国民军的机关报……其计划由冯电请独秀同志……办理，以后一切均听其主持。关于前面所说由中国方面聘请我们的同志三人，必须把吴潮铭同志（去年由东大回国的）派来，余二人也要找比较高手且有政治头脑的。

四、聘请俄、德医生各三人，指明要共产党及财政顾问一人。

五、连日教冯及其重要官佐学习开会，共五次，都

是我作主席……

六、与外蒙国民党中央接洽，讨论内蒙工作（略）^{〔11〕}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在给刘伯坚复信之前，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十二条。决议首先重申和肯定了蔡和森致李大钊信中提出的“莫斯科三原则”；为进一步争取冯玉祥，改造国民军，提出了方针政策和具体要求；并指出了刘伯坚同志报告中的错误。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设党代表问题，决议指出：“冯既为党总代表，又为国民政府委员，其下各军长，各师、旅、团长均应正式加入国民党，国民军与国民党之关系只此已足，不必再设党代表，也不必组织各级党部。”

关于国民军中政治宣传，决议要求宣讲应“注重中国的外交痛史，军阀官僚的政治之腐败，工人农民之痛苦，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壮史，军人和工农群众之关系等等”。此外，还应“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打倒满清、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尊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民权主义”。对冯玉祥最近发表的意见也应广为宣传。“在士兵及下级军官中，要宣传尊重冯玉祥，使他们都服从冯，而不受反动的高级军官张之江等之影响。”

关于政策的掌握问题，决议指出：“我们不可强冯采用他还不能了解的左倾政策。我们现在不是要冯更左倾，是要使冯部下渐渐左倾，是要使冯与其部下之思想不致相差太远；若两项相差太远，冯便不能有所作为”。因此，“要用很大努力使冯的部下能够了解冯，信服冯，使他们相当的愿意执行冯的政策”。决

议提醒“万万不可换冯之权威，强迫其部下多数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如此不但使其部下怨恨我们，并且将使冯无法指挥其部下，变成僵局”。中央要求“在冯军中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军官，须服从冯的命令，执行冯的政策，万不可宣传或表示和冯有不同的政见”。规定：“冯的政策如何，只能由（共产）国际、国民党和我们党中央影响他，不可由冯军工作同志纠正他！”

对工作态度和活动方法，中央要求“在冯军中工作，态度上宜十分小心，务要使他们（冯也在内）敬爱，不可使他们畏惧，尤不可占面子使他们嫉妒”。中央特别要求，“在冯军工作的同志，尽可能不使他们知道是C.P.分子，使他们对C.P.怀疑与畏惧”。对“各军军官中及第一军军友团中我们的组织，尤必须绝对秘密，其不能守秘密或腐败分子急须淘汰出去，万万不可姑容以致妨害我们在国民军的工作”。

关于考察实际与规定政策问题，决议指出：“首先要懂得那个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是些什么社会成分，然后才能决定出适当的政策，使他们走上他们所能走的革命道路。”对于在国民军进行工作，决议指出，同样“首先要懂得冯军的实际状况和社会成分，还要懂得陕、甘、绥是怎样一种社会，只能施行何等程度的革命策略，万不可把莫斯科所学的讲义囫圇整个的搬到甘、绥冯军中应用”。中央决议还指出了刘伯坚同志未了解和考察西北地区及国民军实际情形，就在回国途中定起政治工作计划，提出调留苏中大、东大学生回国，请求职工、农民、妇女三个国际，及英、法、德等国派共产党人到国民军工作的错误。

关于回民政策，决议指出，“冯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使他

们乐意帮助冯军，至少也要使他们不为吴、张利用反对冯军。”

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指出，“冯军统治下（陕西、甘肃、绥远）的农民运动，我们要看做与军事工作同样重要。我们固然要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又要提出‘军队和农民相好’的口号”。

最后，关于同奉军作战与保障北伐问题，中央认为“南口失败后，损失极大”，提出“此时重在与甘肃、绥远的民众合作，以巩固在甘、绥的政权，以从容恢复充实其战斗力，及施行普遍下层的政治教育，不可怂恿其急于向外发展。因为现在没有和奉军继续作战的力量。”中央相信，“只要他能够渐渐恢复战斗力，能够占住包头，便能威吓奉军使其不敢南下对付北伐军，这就是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了极大的作用”。^[182]

接着，中共中央于十一月九日发出给刘伯坚的复信，题为《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信中对冯玉祥的思想状况、国民军的战略地位、以及党对国民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政策，作了全面指示。指出：

（一）冯玉祥这次回来，的确是非常进步，非常左倾。国民军虽在残破之余，却另给以新的生命，我们为国民革命的前途，未来北伐的前途计，国民政府必须维持国民军能在西北存在和发展。因为他的存在：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住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未来北伐，对奉若没有国民军之骑兵炮兵参加，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而且冯军之纪律与战斗力，实较一般的北伐军为好。再加一个时期的休养训练，同时助以政治工作，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们对于现时的西北军工作十分重视。

(二) 不过我们重视西北工作，不是把西北军同全国隔离的来看。要知道西北军在现时的革命斗争中占什么地位，未来革命斗争中占什么地位；要知道西北军现在处的是什么环境，他只能有些什么可能的发展；要知道国民军的内容，他所包含的成分，他一般的政治程度。我们必须充分的了解这些客观现象才能工作。

中央来信根据上述原则，指出了刘伯坚同志在工作中的优缺点，并就此提出了在西北军工作中应注意之点：

1. 西北军经过了很大的残败之后，他现时需要的是补充训练和迅速肃清陕西全境，与晋军结成很好的联盟，才能站住西北，为将来发展的基础。他在现时没有就积极对奉作战的可能，不能有马上回复去年状况的野心。

2. 西北军现时所占的地盘，是最贫瘠苦穷之地，经济上一切措施均受限制。政治上还有一个民族问题（对回民），须对付得好。文化上亦非常落后。我们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是不能乱发野心有过于高远的行动。比如对妇女问题，只是在提倡天足，妇女教育时，万万说不到就宣传什么社交公开，两性自由。

3. 西北军只是冯玉祥进步了，他的部下很多还是非常落后。若果我们不注意使冯的部下能够赶得上冯的左倾，仅仅冯一个人左倾是很危险的。总要注意使冯与他的部下之进步不致相隔得太远（若果相隔太远不是部下对冯不信仰，便是冯部下痛恶我们工作同志，认为我们鼓惑冯如此做）。

接着，中央来信继续写道：

（三）莫斯科所定冯军工作的三个原则，是非常之对，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粤工作两年所得的宝贵经验之应用。尤其是指出“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不要限制冯之职权”更为有见地。

军中党代表制度，本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产物。要有这样组织严密具有无上权威的党，才可以说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现在，中国还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各将领对于党的命令，并不十分尊重。国家行政对于党的决议，也尚不能奉若命令的执行。党并不能真正指挥政府，指挥军队。国民政府境内的国民党部，大多数均尚只能做到代表民众利益与政府合作地步。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指挥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

（四）现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不仅我们，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所以此刻我们在冯军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

（五）在西北军中，我们的同志除绝对无法避免必

须公开的部分外，其余均尽可能的秘密，以免引起冲突的目标，对于工作同志当十分严重的督察，勿使有浪漫越轨的行为。

总之，我们现在西北军工作方才开始，老冯又是抱有满腔的热望从事改革他的军队，若果我们现时工作不好，可以使以后工作发生不良影响，甚至影响老冯之失望，改变其左倾观念，这是要十分小心的。⁽¹⁸³⁾

上述党中央来信和关于国民军工作方针的决议，对于两种军事势力斗争形势的分析，对于冯玉祥回国后的思想转变，对于国民军在北方战场和北伐战争中战略地位的估价，无疑是正确的。对我党在国民军中的政策、策略和方法，中央强调要从国民军的具体条件出发，采取谨慎的态度，防止左倾蛮干，这无疑也是对的。因为如果不是十分谨慎地对其上层和下层，特别是对掌握兵权的上层人物，把我们的革命活动限制在他们所能接受和允许的范围内，并采取相应的正确政策和灵活的策略，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之在革命党的影响和领导下，逐步地在政治、思想、组织和制度上更加革命化；而是一派人进去，就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和成熟，要去充当指挥官夺取指挥权，那怕在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染上些许急于求成的左派幼稚病，就很有可能同上层人物闹翻脸，使自己陷于孤立而失败。但是，这两个文件，却过分强调了这一面，把我党在国民军的主要活动限制在政治宣传工作，根本不提在条件成熟时应当采取积极态度掌握部队组织指挥。在同国民军上层人物合作关系中，对其表示革命的言行过于乐观，缺乏必要的政治警惕，只强调尊重维护和 unlimited 其职权，不许进行必要的批评或斗争。这些，都反映了我党领导人陈独秀

放弃对革命运动和武装部队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并且和共产国际对我国大革命指导上的重大失误不无影响。究应从中吸取何种经验教训，尚有待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33. 李大钊、刘伯坚和国民军 政治工作新局面

一九二六年九月，国民军联军五原誓师后，李大钊同志曾担任过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大钊同志在北京未能到职，由刘伯坚同志代理。^[184]从此，在大钊同志的指导和刘伯坚同志的具体组织下，国民军联军的政治工作，在原国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局面。

首先，在整个国民军联军各部队均增设政治工作，选派党政工作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机关。

再就是，建立起一支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政治工作骨干队伍。

五原誓师后短短一个多月内，冯玉祥曾三次发出电令，强调开展与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时，政治干部非常缺乏，虽然有了大批共产党人充任了政治干部，但仍然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冯玉祥派出他的警卫团长持他和刘伯坚的亲笔信，去北京请求李大钊帮助解决。李大钊接信后，立即派共产党员方仲如去包头与冯、刘商谈办法，同时将冯玉祥来信向中共中央报告。党中央立即派陈乔年去包头，同冯、刘会晤接洽，又从上海、北京、武汉、黄埔军校，派调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国民军联军担任政治工作。当时，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的各级领导

职务，几乎全部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著名的有：

李大钊	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未能到职)
刘伯坚	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
刘志丹	第四路军政治部主任
魏野畴	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
贾从周	刘郁芬部政治部主任
宣侠父	孙良诚部政治部主任
李世乐	韩复榘部政治部主任
卢绍亭	方振武部政治部主任
张兆丰	第五军第三师师长
史可轩	中山军事学校校长
李林	中山军事学校副校长
邓小平	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
许权中	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冯玉祥、刘伯坚和于右任组织国民军联军中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后，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成立最高特别党部。会上，刘伯坚报告国民党的主张与大会的意义，冯玉祥报告国民军的情况和国内外形势。大会选出刘伯坚、方振武、王一飞、石敬亭等十一人为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刘骥、史宗法等五人为监察委员；还选出候补执行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共十人。

至此，整个国民军联军的党政工作系统，已趋于完备，为深入开展全军的政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一九二六年十月，为了加强国民军的政治工作，促进国民军联军革命化进程，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

作大纲》三十九条，作为加强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大纲》规定国民军联军的宗旨是“与国民党联合一致，誓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自由平等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应以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策作中心”。

《大纲》充分估价政治工作在国民军中的地位，指出：“全军官佐应特别提高政治工作及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重要的事上”。

《大纲》规定，在军和独立师以上部队设立政治部，师以下部队和分队设置政治指导员，并且规定了各级政治部部长（即政治部主任）的职权范围和各级政治指导员的任务与权限，明确“军队中的政治部，就是党在军队中的分部”；“每个政治指导员就是他的官长在政治方面的助手”。对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大纲》也作了要求。

《大纲》还对俱乐部工作、上政治课、战时政治工作等作了具体规定，强调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为的要使每个兵士都彻底了解政治的意义、战争的目的”，“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185〕}

《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的颁布，使国民军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34. 李大钊提出“固甘、援陕、 联晋、图豫”的行动方针

国民军五原誓师后，旗鼓重振。但是，由于各部经过南口数

月苦战，已无一军完整，而且面临隆冬塞外苦寒，官兵仍着单衣，襤褸不堪。广州革命政府虽已答应每月拨款一百万元，但只能领到六十万。由于汇兑困难，从上海能汇兰州的只有二十万，其余大部须汇蒙古库伦，再由库伦转运西北。加上京绥铁路被奉军封锁，棉布等御寒物资，在包头地区很难采买。苏联援助的军械，要由外蒙经戈壁西运，远水难解近渴。而且，溃败后的部队军风纪相当涣散，急待整顿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民军联军的行动方向与部署，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当时，在国民军将领中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部队仍应由五原回师收复南口，然后向东进攻夺回北京；另一种意见是，由五原挥师西征，进取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南北对进，会师中原。

然而，这两种方案，都面临很大困难。如果国民军联军由京绥铁路向南反攻，进取北京，将连续转战数月，部队疲劳困乏，粮弹两缺，不但没有胜利把握，而且与北伐军无法接应。如果向秦陇、包头西进援陕，又感兵力单薄，且西安被围，已历数月，困难颇多。何去何从，国民军将领们争论不休。

正当冯玉祥处于举棋不定的困惑之中，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决策，指出：“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之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可暂自保，以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186〕}

还在五原誓师之前夕，李大钊于九月八日在给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国民军的作战方针应是平甘援陕，东出潼关，会师中原。他在报告中说：“出兵陕西，经富（府）谷县、佳县、延川、洛

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187〕}五原誓师后，李大钊即派人将这一战略计划送给冯玉祥。

冯玉祥接到李大钊的密函，豁然开朗。当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认真研究讨论，进一步领会到，出师南口，进攻北京，则敌强我弱，恐难获胜，且不能与南方北伐军互相接应，互相支援，更无法解西安之围。入陕西，出潼关，则既可解救陕西被围困之国民军，又可与北伐军会师中原。于是，一致决定，采取李大钊的战略计划，实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行动方针。^{〔188〕}从此以后，国民联军进军陕西，解围西安，出兵潼关，会师中原的一切胜利，都是实行李大钊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的结果。

战略方针既定，还需要处理好事关重大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有巩固的后方作前进的依托。大军进攻陕西，甘肃就成为重要的后方基地。当时，甘肃方面直系军阀张兆钾和孔繁锦，虽然已被国民军打败，但它的残余部队尚未肃清，这就必须采取措施，将甘肃后方基地巩固起来。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协调好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问题。国民联军为了南下进攻陕西，必须设法争取阎锡山保持中立态度，若能取得阎的合作将更为有利。否则，晋军若与国民军为敌，将使陕西直系军阀刘镇华得到阎锡山的后援，国民军东侧必将受到晋军的威胁，对于攻陕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如何“联晋”以消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成为西进战略的关键问题。

十一、李大钊联络阎锡山援冯反奉

35. 阎锡山参加“讨赤联军”

反冯的历史经过

一九二六年初，北方战场上出现了激剧变化的局势。直系军阀吴佩孚破坏全国的反奉战争，转而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组成“讨赤联军”，向国民军发动了进攻。当时，奉军矛头直指关内；李景林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攻直隶；直系军阀靳云鹗进攻河南；吴佩孚令寇英杰从武胜关取信阳；直系刘镇华、张治功进扰豫西和陕西。国民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困境地。在这种局势下，处于奉、直、鲁联军与国民军中间的晋军阎锡山，就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都派出代表到太原，对阎锡山进行了一场隐蔽的争夺战。

据当时亲历者的记载，首先到太原的是冯玉祥的代表张吉士。张见阎锡山后提出，希望阎能和国民军进一步合作。张向阎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奉张因为郭松龄倒戈，李景林携贰，若不是日本替他撑腰，不许郭松龄通过南满铁路，早已一败涂地。现在奉张虽然还能苟延残喘，可是元气大伤，最近这个时期只能在关外休息整顿，决不敢再问鼎中原了。”对于直系军阀，他说：

“吴佩孚在湖北，和肖耀南同床异梦，他的精锐部队在上次战役中已经损失净尽，现在都是拼凑起来的杂牌军，作战能力当然不

是当年可比。”张吉士接着说：“国民军占有华北京津，特别是察绥一带，和山西是比邻，真是唇齿相依的形势，就地理来说，山西与国民军合作最为妥当。”

当时国民军占据的察、绥两省，与山西雁北十三县犬牙交错，雄踞山西省的背后，这对阎锡山来说，确实是心腹大患。假如得罪了冯玉祥，国民一、二、三军夹攻山西，虽有天险雁门关、娘子关的有利地形，也很难把守。所以，阎锡山听张吉士说到此处后，虽然内心忐忑不安，表面上却不露声色，还含笑说：

“焕章一切新政，都实获我心，很好！很好！”当时有人插言问道，冯玉祥已经通电下野，国民军岂不是群龙无首吗？张吉士微笑回答，冯虽然宣布下野，但实际有长途电话与国民军诸将领联系，等于还直接指挥。接着，张吉士又向阎宣扬了冯军练兵的特点，纪律的严明，上下团结一致，部队非常坚强。还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国民军收编了吴佩孚很多部队，实力更加充实。这次谈判，阎锡山未作肯定答复，只是用他平素那套虚伪作风敷衍了一番。

接着，吴佩孚派代表顾祥麟到太原活动。顾见了阎锡山首先剖白说：“玉帅愿与百帅^{〔189〕}尽弃前嫌，仍修旧好。”他竭力吹嘘吴佩孚的实力“胜过以前”。而且危言耸听地说：“最近冯的措施，非常乖谬，口口声声救国救民，实际上不仅勾结广东的国民党，而且还和苏联秘密联络，意图赤化全国。”他鼓吹，“玉帅对冯玉祥倒他的戈，一直耿耿于怀”，“东北的张作霖也因为冯的倒行逆施，极为痛恨，愿意和玉帅携手，大张挞伐”。他还别有用心地讲到一九二五年，国民二、三军联合豫军樊钟秀合攻山西的往事，提起国民一军也曾有进攻山西的计划，以挑拨冯阎关

系。这次谈话，阎锡山似乎感到很投机，最后对顾表态说：“冯军不仅是玉帅的敌人，也是山西的敌人。”

最后来太原的，是张作霖的代表于国翰。他带来张作霖的亲笔信，见了阎锡山之后，先从郭松龄倒戈谈起，指责“冯玉祥自己倒了吴子玉的戈，还要勾结郭松龄、李景林倒雨帅^{〔190〕}的戈”。他说：“这一次，给雨帅很大的教训。他认为冯玉祥是个祸根，如果不除，这种犯上作乱之风，将永远不会消灭。现在不但中国人对冯痛恨，连日本人也怕冯一旦成功，中国就要全部赤化，也极力表示愿意帮助雨帅，消灭冯的势力。所以，雨帅决心和吴子玉合作，打倒冯玉祥。不过冯军占领京津一带，财源富足，国民一、二、三军之外，又加上东北方面的魏益三也投靠了冯玉祥，改称国民四军，兵力也不算少。即便直奉合作讨冯，这个仗也要费点力气，所以雨帅特叫我来面见百帅。雨帅说，上次百帅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这次为了消灭国贼，一定还得继续帮忙，咱们三方面合作，消灭一个冯玉祥，那就可以胜券在握了。他竭力恭维阎锡山“力量远胜过从前”，并当着晋军炮兵司令在场，夸奖说：“你们炮兵就练得塌实，比我们的强得多，冯玉祥的大刀还能胜过大炮吗？”他还大肆将冯玉祥的所谓“罪恶”数了一番。阎锡山对于的“慷慨陈词”，连连点头称是，并当场表示：“雨帅和玉帅在中原会师的时候，我一定追随。”

当冯、吴、张三方代表在太原的时候，阎锡山频频召集他的亲信开会，研究对策。会上，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联合倒冯，唯独参谋长郅寿铭与众不同，竭力主张与冯合作。他从战略上说明不能反冯的理由，他说：“奉军远在关外，吴佩孚的势力也在两湖江浙一带，而冯的力量却近在华北察绥，国民一、二、三军正象

一把钳子一样，紧紧扼住了山西省的咽喉。如果我们不和冯玉祥合作，他们全力进攻山西，等于泰山压顶，纵有张、吴的外援，也恐怕远水救不了近火。”正因为如此，使阎锡山举棋不定，既不敢马上答应张、吴的要求，又不敢同冯玉祥立即反目。^{〔19〕}

大凡熟悉山西情况的人都知道，老奸巨滑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是“钱鬼子”出身，他的算盘打得最精细。每遇大战临头，总是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摆在他的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超过对方的时候，他才看风驶舵，明白表态。否则，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冒然得罪于人。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阎锡山的态度发生变化。当他看到吴佩孚与张作霖公开宣布联合讨冯，又得知吴佩孚的直军旗帜上写着“讨赤军”，由河南滚滚北上的时候，阎锡山认为时机成熟，决定与张、吴合作，加入“讨赤联军”，共同讨冯。他们议定了作战计划：直军与奉军，分别沿京汉、京奉铁路两路进军，直攻北京、天津；晋军则从大同方向进攻察绥一带的国民军；然后对国民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聚而歼之。正如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所指出的：“这是反奉战争起后中国政局上最大的变动——由进步势力结合进攻反动势力的局面，转而成了反动势力结合反攻进步势力的局面。”^{〔192〕}

晋军参加奉直反冯盟约后，即配合“讨赤联军”向国民军进攻。当吴佩孚派兵北上追击在河南溃散的国民二军时，阎锡山也出兵娘子关。但是，当时国民军的将领们还蒙在鼓里，他们认为一九二五年没有答应与樊钟秀共谋山西，有恩于阎锡山，阎曾指天誓日，感激涕零，因此幻想阎不敢与张、吴合作，于三月十日

还电阎锡山及其将领，劝其仍持“保境安民之志”。间接此电后，还自辩兵出娘子关是自保。但是，当国民军第五军方振武部抵京汉铁路沿线附近之白鱼镇时，晋军发动突然袭击，并促使魏益三部投降吴佩孚。四月下旬，国民军刚刚撤至南口，部署方定，阎锡山即进兵阳原、蔚县，窥视涿鹿、宣化。不久，又将天镇至大同的铁路拆毁，截断了国民军的后方联络；并以商震为总司令，将第一线部署于左云、右玉、大同以北的孤山、阳高、天镇、阳原、蔚县等地，企图从后方夹击国民军。南口失败后的国民军被迫西撤时，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一说为张自忠）部行至绥远包头一带，不肯再西撤，而与驻大同晋军将领商震取得联系，投降晋军，被阎锡山改编为晋军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师。

由此可见，阎锡山联奉反冯，对国民军造成了极大困难。

36. 党的“联合阎锡山”与 “四省联合抗奉”方针

一九二六年秋冬，北伐军长驱直入湘鄂，十月十日攻克武昌，进而控制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吴佩孚的反动军基本被消灭。在北方，国民军五原誓师后，军威大振，开始挥师西征，占领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一向老奸巨滑、惯于看风使舵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也处于政治动荡之中，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

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根据阎锡山对冯玉祥态度的变化，提出了“联合阎锡山”和“四省联合抗奉”的方针。中央指出：“以冯玉祥现在之处境，又必须与阎锡山联合”。

“绥远之商震，太原的阎锡山，此时皆渐与冯表示好感，陕、甘、绥、晋四省有联合抗奉之可能”。^{〔193〕}历史的进程证明中央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中央的斗争策略方针是正确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为了争取绥远方面的合作，冯玉祥与刘伯坚亲自到包头，主动与驻扎绥远的晋军将领商震联络，敦促商震转向革命。商在听了冯、刘劝说后，表示愿意参加革命，但当冯玉祥要他发出通电表明态度时，商却因害怕张作霖会为此出面与他为难，不肯发表通电。虽然如此，商仍然表示，对国民军所需物资，愿意给予提供。

冯、刘与商震接头面谈后不久，阎锡山即对冯表示友好，主动派出代表到包头会见冯玉祥，首先向冯解释，南口大战时，晋军出兵大同截断国民军退路，是一时的“误会”，请冯能够谅解；又主动提出，国民军可派一路军队，穿上晋军服装，假冒开往陕西援助刘镇华的晋军，取道山西，渡河攻陕。冯对阎方表示，这个建议虽好，但国民军枪械缺乏，军费困难，碍难遂行。阎方代表当即声称，阎锡山是很想热诚援助的。事后不久，真的从山西运来一万套晋军服装，许多枪弹和五十万元现款。但是，冯对阎仍保持相当警惕，所以未派出国民军，假道山西渡河攻陕。

阎对冯表示友好的另一件事是，把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部归还冯玉祥。在冯玉祥、刘伯坚来包头时，曾亲自说服韩、石返归国民军共举大业。阎知道韩、石原是冯的主力部队，深感很不可靠，于是顺水推舟作为礼物，将韩、石、陈三个师全部归还了冯玉祥，以讨好冯玉祥。从此以后，冯与阎之间保持了经常联系，经过多次磋商，在赵邨建立了“国民军与晋军联合办事处”。至此，阎锡山联冯反奉和“四省联合抗奉”的局面初步形成。

37. 李大钊争取阎锡山联冯反奉

阎锡山从联奉反冯转向联冯反奉，并最后表示倾向革命，是经过李大钊艰苦工作的结果。对此，李大钊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给中央的信中，详细地报告了这个过程。

首先，大钊同志在深刻分析当时局势的基础上，向党中央提出了“联络阎锡山”，分化“讨赤联盟”的三项策略。大钊同志写道：

侧闻鲁张颇以南方与鲁性质上冰炭不相容，终难谋妥协以言，似张曾以告杨度者。但彼既不得一新同盟者，则叛奉实有所不敢；不敢叛奉，则一切举措，不能不一唯奉之决策是从。现在时局之推移，靳、田、魏倒吴对奉之运动，已使京汉线上酝酿新变化，而杨宇霆眼看鲁张要把肥美的江苏独吞下咽，心殊不甘。且恐鲁张之长腿飞扬，易惹新战祸，故又放心不下，遂又拉孙传芳，使之再度南下，一以避党（按：指国民党）、奉两军之马上直接冲突，一以杜奉张之勃勃野心，耿耿虎视。这样一来，河南问题更形重要。我以为目下的策略应该是：（一）如能接近鲁张，仍当怂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拒杨；（二）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三）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

大钊同志对实现上述三项策略，身体力行，特别是他运用灵活的策略，巧妙地处理了阎、张（作霖）关系和阎、冯关系，一度实

现了阎锡山联冯反奉的预定目的。大钊同志在信中写道：

关于第三策，此间早已进行。在一个月以前，我便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说：“国民党中央驻京负责的人，很想知道晋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他的代表听了此话，含糊其辞，便急忙跑回太原，在太原住了二十天回来托人告我说：晋阎决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但此时幸为严守秘密云云。其余关于晋阎对于国民军之态度，彼所告者，全与我们及自包头方面的消息若合符节，从此证其代表某或不吾欺。

关于阎锡山与张作霖的关系，经过李大钊的工作，已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来信说：

最近奉张压迫晋阎，令其合攻国民军。当时提条件凡三：（一）是否能将绥、包一带之冯部驱逐除净尽；（二）是否能向甘、陕进击冯军；（三）如一、二两项办不到，则请以京绥全线让之奉方，奉方将单独进攻。阎复电谓：一、二项均办不到，三则请雨帅自由施行，晋愿将京绥全线交给奉方。

可见，阎锡山实际上拒绝同张作霖合作，任其自便，只不过他还不愿与张作霖彻底决裂罢了。

对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旧有芥蒂未尽，而现时又对冯玉祥的崛起，存有疑虑。大钊同志为了消除冯阎之间的矛盾，使阎不再同奉张合作，并进一步靠拢国民党与国民军，实现冯阎联合反奉，参加北伐战争，亲自派人向阎驻京代表宣传革命形势，追溯晋阎友好合作的历史，晓以利弊得失，要阎锡山郑重权衡，作出抉择。

大钊同志还亲自出面，调解冯阎矛盾，促使两方不念旧恶，联合抗奉。对此，李大钊给中央来信写道：

在此时顷，晋阎驻京代表复托人告我说，冯在包头大张旗鼓的作起来，颇令晋方为难，党对此有何善策？我即着人答他说：“晋阎自第一次革命即督山西，于今十五年矣。革命以来，历督一省，而始终未遭更动以迄今日者，百川而外宁复几人？然百川之苦心孤诣，历尽事齐事楚之艰难，而不惜卑身屈节以保此位置者，岂仅为身家一己之尊荣乎？抑将守此以有待而为吾国家民族完成革命之大事业乎？如使为一己，则吾于百川复有何言，如为民族革命之大事业者，则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命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

关于阎锡山对冯玉祥东山再起的疑虑，大钊同志解释说：

冯在包头知公为难，刻已旌麾西指，赴平凉督战矣，幸勿介意。^[194]

由于大钊同志亲自出面，反复做工作，据事说理，语重心长，切中阎氏要害，使其深为所动，故立即复电晋阎驻京代表，令他转报李大钊：“本号（暗指山西）与田君（暗示国党）同行，早具决心，幸为转达。”同时通告晋军，“除留一军二旅驻绥远外，悉数调回晋境。”阎锡山还宣称，他准备联络靳云鹗、魏益三及毅军米振标等部，组成北方国民革命军，共同讨奉。

鉴于阎锡山态度的明显转变，大钊同志亲自接见了晋阎代表

孔繁蔚，对阎锡山倾向革命与合作对奉的立场表示欢迎，对阎锡山组织北方国民革命军的主张，表示赞同，并要求阎氏迅速同广东革命政府联系备案，听候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命令行动。

至此，在李大钊对阎的亲自争取与出面斡旋下，阎锡山的立场转向有利于革命方面。阎很快按照对李大钊回电所说的，除留少量部队驻在绥远外，将京绥线上的晋军全部调回山西境内，消除了国民军挥师西进、会师中原的后顾之忧。当时，据归自包头的蒙古同志对李大钊谈，沿途所见，京绥路上之晋军，除一师余人留驻外，其余确皆调回晋境。

至于组织北方国民革命军问题，有这样一段过程。十一月，广东国民政府派代表胡宾到太原，与阎主动联系，希望阎能派代表去武汉，参加商讨北伐事宜。不久，阎即派山西老同盟会员赵丕廉前往。由于阎早与李大钊多次联系，并已表明组织北方国民革命军，合作抗奉的态度，所以在赵去武汉前，阎再三嘱咐：“秘密未揭开前，由你负责，揭开以后，是我的事。”此时，日本援助阎的一批枪械弹药，三个月后才能运到山西，阎不愿过早行动。赵丕廉到达武汉后，先后谒见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苏联顾问鲍罗廷，还去南昌见了蒋介石。赵说明了阎当时处境与三个月不能举事的原委，望给予谅解。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开会议决，继续北伐。经谭延闿向军委会提议，国民政府授予阎锡山以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赵丕廉携带任命和军事计划回到太原后，向阎作了详细报告。但阎不愿在此时表明态度，没有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阎锡山才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提议的公开名义，自任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改悬青天白日旗。至此，阎锡山对李大

钊的许诺，才算勉强得到兑现。

此外，李大钊还曾磋商为阎锡山派遣苏联顾问。据《王广林与阎锡山磋商结果及山西情形之报告》一文载：“余晤阎氏时，即询以闻督办有拟用顾问之事，阎答此事明白。详谈至次日早，阎派其警察厅长南佩兰（译音）来余处，声言山西派赴武昌代表曾向鲍罗庭请求顾问，但山西仅能位置二人，此二人须熟悉军事及党务之情形，并于表面上不能与以顾问名义，只可与以山西学校教习名义，免人注目。且山西方面亦不能供给薪饷云云。余当晚复晤阎氏，其言与南君所述相同。余答以俟余回京时，必将此事转陈李大钊等语。”^{〔195〕}此事详情虽不甚明瞭，但从中也是可看出大钊同志联晋工作的成效。

总之，原来作为进攻国民军的“讨赤联军”重要组成部分的阎锡山，经过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的大力争取，又迫于当时全国革命浪潮的巨大压力，终于助冯反奉，开始一度向革命靠拢了。

十二、冯玉祥西进援陕与解围西安

38. 杨虎城、魏野畴与西安保卫战

一九二六年十月，在冯玉祥准备西进援陕时，西安已经被围困逾数月之久了。

原来当奉直联军在京津地区向国民军发动进攻时，吴佩孚即令刘镇华率“镇嵩军”八万人进攻国民军二、三军占据的陕西，并以重兵包围了西安。西安守将、原国民军三军旧部杨虎城，在共产党人魏野畴等的帮助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英勇抗敌，因而刘军久攻不下。

为了便于说清冯玉祥西进援陕的情况，这里有必要先把杨虎城、魏野畴与西安保卫战的来龙去脉作个交代。特别是，魏野畴是大钊同志派往杨虎城部队，并在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这段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大钊同志对国民军的工作。

魏野畴，陕西兴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二三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野畴同志是党的理论家、宣传家和西北地区共产党组织创建人之一。毛泽东同志曾深情地赞扬他说：“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还有著作，我读过，写得有水平。”〔196〕

一九二三年春，应西北著名进步人士、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

先生的邀请，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决定，派魏野畴到陕北榆林，开展统一战线和军运、农运、学运工作，在西北建党，领导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

当时，杨虎城因靖国军失败，走投无路，身心交瘁，蛰居于榆林城中。经杜斌丞的推荐与介绍，魏野畴结识了杨虎城。两人相见如故，过从甚密，促膝谈心，十分投机。魏野畴针对杨虎城的身心痛苦，从靖国军的失败，谈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谈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经常给杨虎城讲解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明确指出，只有马列主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只有靠马列主义的指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魏野畴对杨虎城的热情帮助和深厚的交情，不仅使身陷困境的杨虎城，深受鼓舞，豁然开朗，病愈身健，信心倍增；而且对杨虎城后来参加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同共产党长期合作，走上逼蒋（介石）抗日和坚持革命道路，起了启蒙作用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榆林期间，杨虎城在共产党人魏野畴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政治活动。

首先，与国共两党建立组织联系。原在一九二二年冬靖国军失败，杨虎城为保存“革命种子”而转移到陕北时，曾派代表去上海向孙中山请示报告。孙中山要他“保持革命武装，以待后命”，并邀请他到上海直接晤谈，杨因病未能成行。一九二三年初，通过魏野畴与中共北方区委建立联系后，又于一九二四年派代表姚丹峰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那里见到了李大钊。孙中山也接见了姚丹峰，并为杨虎城加入国民党办理了手续。当李大钊为冯玉祥疏通国际关系请得苏联军援时，也曾拟为

杨虎城部请求苏联援助。国民党左派、我党忠实朋友于右任当时曾给杨虎城去信说：“正与苏联方面联系，拟通过蒙古为部队接济军火，此事已征得鲍罗廷同意。”后因杨部向关中挺进，未能实现。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李大钊领导北京的党、团组织，发动了三十万人，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陕西全省只有杨虎城一人送来挽联。杨虎城还在耀县军部驻地召开孙中山追悼大会，表现了他在靖国军失败后，为保持“革命旗帜不能倒”，拒绝北洋军阀的改编，坚持革命的原则立场，和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忠诚态度。

其次，整顿、训练和改造部队。杨虎城经过魏野畴的教育和帮助，下定决心与共产党人合作。他邀请与委托魏野畴等共产党人训练部队，教育军官。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杜斌丞则成了被称为“杨虎城灵魂”的重要决策人物。根据魏野畴的建议，杨虎城招收了一批倾向革命的青年学生，一部份派往广州黄埔军校受训，一部分举办了教导队加以培训。

一九二五年七月，杨虎城聘请魏野畴为他创办“三民军官学校”，担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同时聘请共产党人刘含初、吕佑乾、赵葆华等担任军校政治教官；并吸收了一批由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担任下级军官。“三民军官学校”从成立以来，对从部队抽调的青年军官和应考入伍的进步青年进行了军政训练，培养出许多优秀军官，如张汉民、孔从洲、刘威诚等人，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所部国民军中担任师、旅、团长等重要指挥职务。这些共产党员在杨部的积极活动，对杨虎城同我党长期合作，坚持从事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魏野畴先后在榆林、西安地区积极开展工作。他利用教师工作的方便和开办讲习班等活动，宣传和传播马列主义，影响和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指引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他创办了《西安评论》，并亲自撰稿，反映西北地区人民的疾苦和呼声，宣扬革命，指导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被誉为陕西“革命舆论唯一指导者”。魏野畴同志也被人民群众称为西北青年的“导师”。^{〔197〕}

魏野畴和刘天章等一起整顿和发展了全国性的进步组织“共进社”，使之成为当时全国规模较大、历史最长的进步社团，是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得力外围组织之一，而陕西又是共进社活动成效较好的地区。

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的领导下，魏野畴同志还与其他同志一起，先后在西安市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组成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创建了西安地区第一个中共组织——西安特别支部，成立了青年团西安地委。一九二六年初，经中共中央和豫陕区委批准，正式成立了西安地委，野畴同志担任了地委的领导工作。

共产党人和魏野畴同志在西北地区的工作，促进了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为西安保卫战和冯玉祥援陕之战，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一九二五年夏，魏野畴领导了陕西全省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驱逐军阀吴新田运动。这次运动的起因是，在西安广大学生群众纪念“五四”运动的那天，陕西督军、直系军阀吴新田所属部队，打伤了省立第一中学的数十名进步师生。野畴同志立刻抓住这一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组织西安市各校师生

举行罢教、罢课，要求惩办肇事凶首。广大师生走上街头，贴标语，画漫画，发表演讲，掀起声势浩大的驱吴运动。反动军阀吴新田出动军警弹压，妄图将学生运动领导人及党、团负责人魏野畴等同志一网打尽。为避开敌人锋芒，魏野畴带领学联和团组织负责人张秉仁、张含辉、高克林、任致远等撤离西安，转移到三原，继续领导驱吴运动。

“五卅”惨案发生后，野畴同志遂即将驱吴运动与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结合起来，领导和组织各界群众举行反帝驱吴大会，游行示威，通电全国，表示“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界，完我国权”。魏野畴还多次在三原召开的团组织座谈会上，响亮提出“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的号召，组织大批学生、农民和驻陕国民军官兵，参加驱吴斗争和“五卅”运动。他亲自率驱吴请愿团赴陕西耀县，呼吁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将军率部参加驱吴运动，并在杨部给官兵作政治报告，宣讲驱吴斗争和“五卅”运动的意义。在魏野畴的吁请下，杨虎城欣然答应所属国民军参加驱吴斗争，并给群众提供驱吴活动经费。

在魏野畴的正确领导下，陕西人民的驱吴斗争不断高涨。军阀吴新田眼见群众革命情绪异常激愤，又看到国民军参加与援助驱吴斗争，为避免复灭，于七月中旬率部向西撤退，行至虢镇，遭到杨虎城国民军拦截，吴军两个团一举被歼，其残部狼狈逃往汉中。至此，陕西人民的驱吴运动获得完全胜利，陕北和关中地区遂为国民军控制。

一九二六年三、四月间，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守南口前后，在陕西，被人民驱逐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奉吴佩孚之令，率“镇嵩军”八万人（号称十万），卷土重来，向驻陕西的国民军发动进攻。

当时，驻陕西的国民军，除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的部队外，其余均属国民二军系统，而且多系国民二军的留守部队，番号复杂，力量分散，指挥不统一。当国民二军精锐部队在河南被歼，曾经驰援豫西的国民二军系统的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云龙），在豫西战败后，这时刚刚逃回陕西不久，惊魂未定，究竟要走要守，胸中无数。他一方面向杨虎城紧急求援，说：“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走”，另一方面移辎重粮弹于咸阳，准备向西撤退。可见，陕西国民军守军处于混乱状态。

同时，陕西境内又出现了与刘镇华勾结的内应：一是刘镇华过去在陕西豢养的一批大绅，散布谣言，纠结势力，准备迎刘；二是同州麻振武匪部和蒲城续保杰部接受了刘镇华的改编，使刘镇华的进攻增添助力。因此，陕西东路门户潼关，不战而为镇嵩军占领，从潼关至西安三百里间，刘镇华部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一九二六年四月初，刘镇华兵临西安城下。当时，西安城内守军不足五千人。与刘镇华勾结的西安大绅已经组成“和平期成会”，一面催促李虎臣部西撤，一面准备迎接刘镇华。刘镇华满以为西安在握，静候城外，准备过几天就举行入城式。

正在此千钧一发、危在旦夕之际，魏野畴从北京回到陕西。他闻知情况紧急，便立即赶到三原，参加了杨虎城召开的国民军第三军所部的高级军事会议。魏在会上介绍了他从北京李大钊和北方区委了解到的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形势，和准备消灭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的战略计划。并亲自与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研究抗击镇嵩军进攻的军事部署，决定同国民二军分兵坚守西安、三原、咸阳，进行长期的军事斗争，决不让刘镇

华的阴谋得逞。会后，魏野畴偕同杨虎城率国民三军的三个旅，从耀县、三原进入西安。

杨虎城入城筹划甫定，吴佩孚便派空军飞机轰炸西安，散发传单，挑拨军民关系，动摇守城信心，并对杨虎城和李虎臣的首级悬赏十万元，作为恐吓和煽动守城军民的诱饵。刘镇华又派出军队围攻杨部防守的渭北重镇三原县，妄图彻底孤立西安守军。但是，面临西安守城部队的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如何实施统一指挥。

当时，西安城内有三个属于不同系统的部队：原在西安的国民二军第十师李虎臣部，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原为国民二军第十二混成旅）和后来入城的国民三军第三师杨虎城部。在这三部分军队中，论地位，李虎臣是陕西军务善后督办，但他的部队是败兵，实力较差，与卫定一部合起来兵力不足五千人，在西安进退两难，犹豫不定，对杨虎城部的依赖性很大。杨虎城部兵力五千人，有战斗力，特别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帮助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军事上有坚强的后盾和依靠，政治上也有很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坚守西安的态度十分坚定，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是西安保卫战的核心力量。至于陕军卫定一，地位与实力，都不能与杨、李两部相比。刘镇华深知西安守军各部队这种情况，大肆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挑拨部队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关系。

在此大敌当前，兵临城下的紧要时刻，实现各部队的统一指挥和团结合作，成为决定西安保卫战成败和数万军民命运的关键问题。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杨虎城在党的帮助下，采取了顾全大局和谦让团结的态度。为了团结李、卫两部共同对敌，他提出一律将守城部队改称陕军，取消国民二、三军的番号，将守城部队

编为四个师，以李虎臣为第一师师长，驻防泾阳的田玉洁为第二师师长，杨虎城为第三师师长，卫定一为第四师师长，推戴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杨自任副总司令。杨还命令他的部队，把从靖国军以来就戴的红圈军帽取消，以与李、卫部队保持一致。他的部队还主动担负了敌人重点攻击的东城、北城两个方面的防务，李、卫两部分别担任敌方压力较小的南城、西城两个方面的防务。所有这些具有政治性、政策性的重要措施，对于团结李、卫两部友军，统一军事指挥，坚持西安保卫战，直到最后胜利，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受到人民群众的赞誉。

西安防御部署既定，全体军民在杨虎城将军的指挥和共产党人的组织下，展开了浴血的西安保卫战。杨虎城在艰苦的战斗中率领官兵英勇抗敌，他曾对李虎臣说：“我们决不投降。如城破之日，你在那边钟楼，我在这边鼓楼，各拿一条绳子双双吊死。”他的这种与城共存亡的英雄气概，鼓舞了广大官兵。大家万众一心，决死守城。粮尽就以豆渣、豆饼充饥，弹少就以石头应敌，顽强战斗达八个多月，直到最后胜利。

39. 冯玉祥进军陕西与西安解围

一九二六年九月下旬，国民军联军稍事整训后，即按照李大钊提出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部署西进援陕。冯玉祥编定“援陕军”共七路：第一路方振武，第二路弓富魁，第三路孙良诚，第四路马鸿逵，第五路石友三，第六路韩复榘，第七路陈希圣、刘汝明、韩占元、韩德元、郑大章、张万庆等部。以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

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令孙良诚率前方各军，沿邠山大道，向西安攻击前进；方振武部由五原、经固原、平凉、乾州一带，至咸阳与孙良诚会师；孙连仲由宁夏，马鸿逵由固原出发，一致援陕。同时，以驻天水之张维玺师、进取陇东汧县，以掩护大军右翼。各路大军奉令后陆续开拔，国民军联军五千里路的西征由此开始。

此时，侵占京绥线之奉军，闻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军势大振，拟乘国民军联军准备尚不充分时，急派大军西进胁迫，企图消灭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一面督率大军西进，一面命郑金声为东路总指挥，率石友三、陈希圣部及骑兵游击师、骑兵三四师等部，在包头、五原一带组织防御，掩护西征大军。

十一月初，冯督韩德元、韩占元、赵守钰骑兵师及韩复榘之一部，移驻宁夏，布置三路，继续掩护西征；陈希圣为中路，弓富魁为上路，徐永昌为下路。由于阎锡山再次表示愿意与冯玉祥合作，徐永昌乃由榆林绕道入晋。后徐部留晋，归阎锡山指挥。

国民军联军援陕各部队挥师西进途中，正值隆冬严寒季节，终日风雪交加，骡马冻死很多。由于共产党人的帮助，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广大官兵心怀革命目标，斗志昂扬，克服困难，奋勇前进。

在艰苦的进军中，冯玉祥非常体恤远征的将士，同时考虑援陕的胜负，关系到西北革命全局，虽然当时国民军联军的经费比较困窘，但仍悬偿十万元，希望早日解西安之围。

十一月十七日，冯玉祥致电孙良诚，电文如下：

顷马师已到，并催各路援军，火速前进。惟西安之围，一日不解，余心便一日不安。务请弟百般设法，斟

酌情形，有机可乘，即猛进攻。倘能解西安之围，即由本司令赏洋十万，以资鼓励。

十一月二十一日，冯玉祥又分电前方各军，详细阐释援陕的重大意义，以期早日肃清陕西，声援北伐。原电如下：

我军自前月二十五日，援陕以来，势如破竹，直逼西安。官兵风餐露宿，千里驱驰，弹雨枪林，备受劳苦。遥望秦中，曷胜驰系。惟念：（一）甘肃为我军之根据地，甘陕毗连，表里相衷，唇亡齿寒，关系綦重。故解西安之围，即以解甘肃之围，亦即所以巩固我军根据地。（二）嵩军受吴指挥，围困西安数月于兹。秦民何辜，遭此荼毒。本已饥已饿之怀，慰陕人云霓之望，爰兴挞打，义不容辞。（三）邪正分途，势难并立，我不驱彼，彼必攻甘；我不杀敌，敌必杀我。是为救国救民计，为自卫卫关中父老计，均应同仇敌忾，灭此朝食。我军与国民革命军，共信中山主义，改造时局。既已献身党国，遑计目前安危。望我官兵，共明此义，虽身处艰困之中，应益奋英武之气，亟与陕中二、三两军，戮力同心，迅扫敌氛，庶可与党军联络声援，告成大业也。^{〔198〕}

孙良诚部既奉令急行援陕，自平凉出发，沿邠州大道，昼夜兼程，向西安急进。全体官兵不顾疲劳困乏，不怕脚底磨泡疼痛，精神异常振奋。十一月二十三日，孙部进至兴平、醴泉，围攻咸阳，敌军闻风远颺，国民军于当日占领咸阳。孙良诚乃以方振武为左路，向泾阳东南进展，攻西安城北附近之敌；马鸿逵部为右路，向泾县东北方向进展，攻西安城南附近之敌；孙良诚自

任中路，由咸阳进攻西安。镇嵩军八万之众，集中兵力猛攻中路，战况非常激烈。当时，孙部只有一万二千余人，敌军数倍于国民军，情况甚是危急。幸国民军训练有素，官兵沉着应战，顽强抵抗，敌人未能得逞。恰好孙连仲、刘汝明两师，相继赶至，分左右两翼向敌后路绕攻。二十六日拂晓，国民军全线开始总攻，激战一昼夜，两翼抄后路成功，刘部抵达十里铺。镇嵩军见后路被袭，全线动摇，分向潼关、同州、武关一带溃退。

这时，西安已被围困八月之久，城内弹尽粮绝，炊烟均断，斗争极其艰苦。守城军民因战、伤、病、饿而死的，多达三万人以上，饿殍载道，尸骸狼籍，目不忍睹。守城官兵每日数电求援，十万火急。忽然，救兵从天而降，并约定守城部队，开城夹击。镇嵩军大败，纷纷溃逃，向南遁入嵩山。

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十二时，西安解围。方振武部首先入城（一说为刘汝明部，似更确），西安军民欢欣鼓舞，市民蓬首垢面，沿街迎接。国民军入城后，把军粮救济居民，有些士兵还把自己的干粮分给群众吃。三秦人民，无不欢庆西安复甦。孙良诚部解西安之围后，乘胜追击，至河南西部阆乡而止。

十三、共产党人帮助冯玉祥 建立西北革命政权

40. 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军政府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

西安之围解除后，刘镇华统治陕西人民的反动机构，被人民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省议会之类的御用工具，也随之瓦解。这时，革命政权急待建立起来，以便团结全省人民，继续打击和肃清反动残余势力，将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

一九二七年一月，适应南北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经过我党与各界进步人士积极筹备之后，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新的革命政权——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左派、我党和李大钊同志的挚友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199]任副总司令。总司令部下设参谋长、秘书长、政治部、政治保卫部、总部办公室与民政厅、教育厅、司法厅、建设厅等军事和政治机构。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党员骨干，在这个革命政权中，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其中有：

魏野畴，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惠有光徒挂虚名），并兼《新国民军报》主编；

史可轩，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总队总队长（政治保卫总队实际上是我党完全掌握的武装部

队)；

杨明轩任教育厅厅长。

此外，王陆一、杨晓初、王授金、王尚德、葛霁云等共产党员，也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1919—1949)所指出的，在魏野畴、史可轩等共产党人的积极活动下，“使党的力量成为这个政权的领导核心和一切政策方针的决定者。”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后，魏野畴利用他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有利条件，选派大批共产党员到驻陕总部所属各军、师、旅、团、营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秘密发展党员。仅驻陕总部政治保卫师(又称政治保卫总队)就有近百名共产党员，有的党员还担任了上至师长、下至排长的职务，使这个师成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的正规军队。

魏野畴领导的驻陕总部政治部，还为驻陕国民军起草了《政治训练大纲》，规定通过政治教育使全体官兵了解“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结合及军阀的反动政策”，熟悉“中国农民状况”和“农民的要求”，明确认识“中国革命运动最后的目的，不独是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要在国内脱离本国的剥削者的压迫”。^{〔200〕}

魏野畴在加紧进行政府的行政实施和组织领导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特别重视宣传和开展西北的农民运动。据《陕西省委通讯》一九二七年九月第一期载，魏野畴曾在驻陕总部召开的政务会议上，作过《农民运动之标准及其活动范围与政府行政之沟通》的重要报告，强调国民军联军和各级政府机关，都必须“保护农民组织；一，保障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二，使农民参

政”。魏的这个报告经政务会议通过，并决定建立“农民事务委员会”，办理有关农民运动中的日常事务，如统一土地税则、减轻佃农田租、改良水利、保护森林、设立农民银行等。这些，都对西北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1. 西北最高政权机关——国民军 联军总部及其军政实施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冯玉祥率部行至潼口，接孙良诚电云：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围。十二月，冯进驻平凉。鉴于军政大事，经纬万端，亟待整理，西安方面多次电请冯玉祥入陕主持。同时，国民政府也因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部分路抵抗，电促冯军早出潼关，共同北伐。冯玉祥将后方诸事部署就绪后，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到达西安。

冯玉祥到达西安后，除继续安抚和赈济市民，祭奠阵亡将士外，主要是从军事、政治、财政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后方，积极整饬军队，准备策应北伐。冯玉祥认为，处在军事战乱时期，党、政、军必须高度统一，方能统一各方势力，集中力量，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他宣布：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是国民军辖区的最高政权机关，统管辖区的党、政、军、民一切事宜。同时制定和颁布了《国民军管辖区域军政时期临时行政大纲》，要求国民军各部和地方党政机关一体遵照执行。

《行政大纲》指出：

国民军管辖区域，与国民政府因交通梗阻，未能确实联络。在军政时期，为行政统一及革命军事便利起见，

根据建国大纲及……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各特别区市联席会议决议案，并参照国民军管辖区域内特殊情形，制定国民军管辖区域军政时期临时行政大纲，一俟国民政府能直接指导时，有与国民政府法令抵触之处，应修改之。

《行政大纲》规定国民联军总司令部的职权如下：

一，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为国民军管辖区域内军事民政最高机关。对于本军管辖区域内各部队、各级职员、各机关，有统辖之权。

二，国民军管辖区域内，所有各部队管理、编制、训练、指挥，军队中政治组织及一切军政实施事宜，均由联军总司令命令统一之。

三，国民军管辖区域内，对内对外，一切政务，统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主持。但带有地方性质及有特殊情形者，得由地方最高行政机关，按照本临时行政大纲，订出计划，呈报联军总司令核准施行。

四，国民军管辖区域内，一切行政实施，力求划一，但有特殊情形者，另定之。

五，国民军管辖区域内，一切财政，力求统一。

六，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对于国民军管辖区域内一切职员，有任免之权。

七，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代表国民政府，行使一切奖惩之权。

八，国民军各省驻军总司令，及省政府，承联军总司令之命令，分管一切军政民政事宜。但在作战时期，

戒严地带，由联军总司令规定。各省驻军总司令，得指挥民政事宜。

九，凡国民军管辖区域内，关于更订法制事项，应由联军总司令部，设法制委员会拟订，由联军总司令核定实施。

十，凡国民军管辖区域内，一切兴革事宜，得由各地方机关，及各种社会团体，拟具意见，陈由联军总司令核定施行。

十一，凡国民军管辖区域内，一切军政行政设施，应与各级党部，发生密切关系。

十二，本大纲由联军总司令命令公布施行。^{〔201〕}

为了改革吏制，澄清政治，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冯玉祥通令颁布《军政长官应遵守者十条》。《十条》强调了军政长官以身作则的重大意义。指出：“本军努力革命，原为扫除旧社会一切劣制度，恶风俗，使国人俾政，人皆良善。故革命党人，所认为应该改革者，必从自己做起，否则不能期人之相信，而使其必从。”如果“高呼革命，顾其所为，适与革命相反”，“只劝他人作流血之牺牲，而已则从中渔利，虽欲不败，亦不可得，绝无成功之可言”。

《十条》的具体内容是：

（一）下级职员，不可向长官馈送礼物。……

（二）军政服务人员，均不可有带政治性而又属于利己行为之互相请托。

（三）凡军政服务人员，不可随便宴会；如有外宾及特别事故，必须宴请时，每人膳费，不得超过一元。

(四) 凡军政服务人员，无论何地何时，不可有向他人需索财物及收受政费等事。……

(五) 凡军政服务人员，不可借公事向人市惠买好。各级高级机关人员，尤须特别注意。

(六) 凡军政服务人员，无论对于何人，均须谦和有礼，不可少涉傲慢及借势凌人。

(七) 凡军政服务人员，无论何处办事，不可借势招摇，一切言动，务须十分戒慎。

(八) 凡军政服务人员，应力戒阳奉阴违之恶习。对于已经公布之事项，不得发表相反之言论。如有意见，可条陈本营长官。

(九) 凡军政服务人员，不得为个人利益而私立派别，妄分畛域。

(十) 凡军政服务人员，彼此均宜推诚相与，互相勉励。如见同人有过失时，须婉言规劝，不可当面敷衍，背后讥诮。^[202]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冯玉祥又颁布了《诰诫高级军官十条》，对国民军联军全体高级将领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提高高级将领的军政素质。

《诰诫十条》首先指出：“古者兵法云，将者兵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得人则兵胜而国昌，失人则兵覆而国灭。兵之胜败，国之安危，皆系于将。况今当革命时期，以民众武力之军队，化之与之将领。是以将领之贤否，关系革命势力之成败，亦即关系于被压迫民众之存亡。”接着，在指出国民军将领的军政素质存在某些不足之后，对旅长以上高级军官，提出《诰诫十条》，

“均须日录一通，并诵一通，研究玩索，实践力行。贤者因以加勉，不及者应急起直追”。冯玉祥还宣布，他将“随时考查，督促进步，别其勤惰，以定奖惩”。

对十条告诫，冯玉祥都一一加以分析，强调其意义和目的，提出要求和措施。现将十条的内容，概述如后：

(一) 革命化。强调革命事业，革命理论，“非夙夜从事研究不可”，“革命之本旨，此为我辈最新生命，不容一刻疏忽”，要求全体官兵，“殚精竭虑，一致进行”。

(二) 勤学问。强调“凡高级军官，均须上知战略奇正虚实之用，下而至于连长排长一兵一夫之动作，皆须切实明了。一枪一炮之构造用法，均须件件亲自检点，亲自试放”。要求“无论何等繁忙，必须每日腾出时间，多学多问”。

(三) 宏器度。强调“为将之道，器度为先”。要求“柔而能韧，谦而有礼”，“必须忍人之所不能忍”，“纳众人之见，而后加以择取”，不要“骄矜自满”，不要“志量褊窄”、“安于小就，或妄自菲薄”。

(四) 办事理。强调办事“必先考察事之来踪去迹，然后详思其理，拟定办法数条，再加考究，择其妥善之途即当猛力前进”。

(五) 慎言行。强调“高级军官之一言一动”，应当成为所部官兵的“良好模范”，要求各将领“必须慎自检点，勿轻发无谓之言，勿苟发无意识之举”。

(六) 谨用人。指出“用人之道，至关重要”。强调用人“要循名考实，必使实当其名，名当其实。无论任用何人，授以何职，必须严密省察，以覘其是否称职”；要善于发挥每个人的

才能，“取长舍失，补偏救弊”。“譬如工师之治材然，得其道虽竹头木屑，皆供要用”。要求“不可因一时之喜怒，为用人的标准”。“至于不问才能而专引用亲戚故旧，最为所忌。如有此种举动，一经查出，定行重惩，切切戒之”。

(七) 明赏罚。指出“赏罚为军中唯一大政”。“惩不善，奖有功”，“盖以示全军以正鹄，而使之有所步趋者也”。强调“赏罚第一在明而得当，第二在速而应机”。

(八) 体兵情。强调长官对士兵要善于“体察抚慰，与共苦乐”，达到官兵“情意融洽，团结一气”。要求高级将领对所属“官兵各种状况，如身体，志向，学术，技艺，道德，嗜好，习惯，以及个人家乡生活情形”，“皆须留心访问，严密体察，时时刻刻，于此等处痛下功夫，加以体恤，导之以正轨，务服其心，务去其恶”。

(九) 励道德。指出“夫道德者，所以维持人与人之堤防，为个人立身行事之本”。强调道德对于军人和部队来说，“犹航海之有指针，万不可废”。要求革命军人，“必须先能廉洁，自持道德”；不可“见利忘义”，“只知爱钱，不明革命主义”；也不可有“动辙谩骂，肆情纵慾，骄人以功，受人谀赠，以及贪婪无耻”等败坏道德的行为。

(十) 有恒性。指出“救吾国及救全世界被压迫人类，为何等大事，路程遥远，障碍重重，则时间之久暂，未可预定。若无坚定不移之志气，而辅之以自强不息之精神，又何能达此目的，贯彻伟大主张”。强调要“立定目标，循序力进”，不能“中道半途之时，忽生息志”，每个军人都要在起居日用上，痛下功夫，练习和养成“恒性”。

冯玉祥最后告戒说：“以上所举，务须恒久行之，自有成效可见矣，切盼切嘱。”^{〔203〕}

从以上三个文件，不难看出，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坚持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政策，力求政治和军事的革命化。这三个文件颁布后，在国民军联军管辖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察哈尔、河南等省，以及国民军联军所属各部队得到推行，对北方地区统一行政管理，发展经济，整顿财政，开展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提高国民军的军政素质，推动国民革命运动，收到了广泛的效果，为兵出潼关，策应北伐，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基础。

十四、党领导创办“第二黄埔” ——中山军事学校

42. 中山军事学校与北方“军校网”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国西北地区的革命政权刚刚成立不久，在党的领导下，由共产党人史可轩、李林、邓希贤（邓小平）等主持，在西安创办了被称为“第二黄埔”的中山军事学校。它作为专门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正规军官学校，与广州黄埔军校，是南北辉映、相互媲美的两座革命熔炉。

这个军校，名义上归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全校各级领导和指挥职务，都是由共产党人担任的：

校长，由共产党员、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政治保卫师师长史可轩兼任。

副校长，由共产党人李林担任，并兼任教务主任。

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人邓希贤（邓小平）担任。邓小平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底由法国到莫斯科，先进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一九二六年底，冯玉祥提出派中共党员到他的部队中工作的要求，第一批被选派的二十几人，邓小平是其中之一。他们一行于一九二六年底到达库伦，然后派小平同志和另外两人为先遣队，随同苏联为冯玉祥运送子弹的汽车，辗转一个多月，于一九

二七年三月到达西安后，担任此职的。

组织科长，由共产党人高克林担任，并负责领导军校中共党的总支工作。

学员总队长，由共产党人许权中担任，主持日常操练。许权中原为国民二军团长，后为国民一军旅长、代理师长。

全校共分三个大队（相当于营），由共产党人高致凯、张汉俊、杨浪波，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大队的大队长。每个大队分辖三个中队（相当于连），每个中队辖三个分队（相当于排）。所有的中队、分队指挥干部及军事政治教官，除少数教官由苏联顾问团专家担任外，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学员不少也是党、团员。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象中山军校这样，全校各级军事、政治及教育大权，自上而下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的，包括全国南北方众多的军官学校在内，都是绝无仅有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中山军事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副总司令邓宝珊，及冯玉祥部队的许多官佐参加了典礼大会。

出席大会的各界名流中，有一位被周恩来同志赞誉为“生的伟大，死的伟大，正气磅礴，业可千秋”的“坚贞的革命战士，鲁迅式的共产党员”杜斌丞先生，^{〔204〕}在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了讲演，鼓励青年们在伟大的革命高潮中，要积极努力，奋勇前进，并且号召，以往革命的和未革命的人，都要参加到这一革命运动的行列中来。杜斌丞先生，是在得知我党正在筹建中山军校时，带领首批陕北革命青年学生来到西安的。他介绍六十二人进入中山军校，另十六人进了中山学院。开学不久，杜斌丞决定离开西

安，到外地考察。这批学生为他送行时，他谈了很多勉励大家的话。他说：“你们刚来这里受训学习，感觉如何？艰苦吗？应当如此。青春不再，趁此良机，在目前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努力锻炼自己。我总认为，道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积极努力，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我想美好的将来，是不难身临其境的。”他激励大家：“今后要把眼光放远大些，将来你们要担当各种事业，头脑要开阔敏锐，凡事要多思考，多分析，不要固步自封。”〔205〕

中山军事学校成立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巨大支持，成为培养大批军政人才的重要基地，并且在该校成立前后，在我国北方形成了一个“军校网”。

为了解决国民军联军对军政人才的迫切需要，在中山军校组成的那一段时间，国民一军各部队在五原、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地，成立了许多军政干部学校，大体上形成了以中山军校为中心、各新式兵种与各门类业务齐全的“军校群”体系。各军政干部学校，招收国民军下级军官、进步青年学生和有文化的士兵，经过短期训练，输送给各部队充当骨干，为迅速培训各种人才提供了基础。

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的组织与帮助下，冯玉祥为了尽快提高新建兵种及各行业务干部的军政素质，相继成立了军官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交通教导团、钢甲教导团，又增设航空司令部（共有飞机十九架），作为训练机关。还举办了军械、军需、军医等十六所训练学校，共接收和培训青年军官和进步学生八千多人。

以中山军校为中心的“军校网”的建立与发展，对培养各类军政人才，提高官兵的军政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43. 革命熔炉——中山学院

国民军联军在西北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西北地区革命高潮的到来。随着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干部“供不应求”成了非常尖锐的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以魏野畴为书记的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刚刚解围不久，即开办了地下党的骨干分子训练班，开设《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工运、农运、学运等课程，由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共产党人刘继曾、潘自力等同志，与国民军苏联顾问团一起，负责授课。

一九二七年一月，魏野畴为适应急待开展的地方工作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又开办了一个军事政治队，培训军政干部。全队共有军政干部学员八十余人，都是由陕西省各地党组织推荐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青年学生。

但是，这种小型训练班，远远满足不了革命形势发展对干部的大量需要。中共陕甘区委为了迅速造就大批党的骨干力量，解决西北地区党、政、军、民各界对干部的迫切需要，迎接北方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正式决定在西安创办一所正规的军政干部学校——中山学院。

这所学院，同中山军校一样，全校的各级领导职务和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实际成为西北地区具有中共党校性质的著名革命学校。

在中山学院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著名共产党人有：院长刘含

初，副院长兼总务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总队长任敬斋，总务科长呼延震东。学员大队和中队领导职务，也由共产党人担任。

学院下设四个学习运动班：军事政治运动班、农民运动班、妇女运动班和组党班。学员大都是西北陕甘各地党组织保送来的党、团员和革命青年，而且以我党建党较早，基础较好的陕北绥德第四师范、榆林中学与关中三原地区来的学生最多。学院创办之始，学员就近七百多人。

学院各班都有专业课、政治课和军事训练。政治理论课程的教材是统一编写的，主要有：《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政治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农民运动》等。此外，学院还给各班购买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书籍，订购了我党中央和团中央机关报《响导》和《中国青年》等期刊杂志。因此，革命书刊在学院师生中广为流传，大大提高了师生们的革命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

当时，学院经常邀请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人来讲课或做政治军事报告。其中有：刘伯坚、邓小平、潘自力、刘继曾、魏野畴、杨明轩、李子洲、钱清泉、严信民、王子林、吴化之、亢维恪、冯蒂周（一航）、杨慰祖、冯文江、杜松寿、金鸿图、吴有乾等同志。还不时邀请校外的党内老同志和苏联顾问团的同志来学院作“精神讲话”。学院在筹办过程中，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和帮助，刘志丹、陈玉壁、杨怀英、张汉俊、杨浪波等同志，都是由党中央派回陕西的，他们曾住在中山学院内，对建校工作都作出了贡献。

中山学院是我们党的战斗堡垒，又是锻炼与造就军政人才的熔炉。中山学院培养出来的干部，遍布西北各省。他们不论在军队或地方、农村或城市，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它在名义上是由国民党办的，实际上完全是由我党创建和领导的一所正规的军政干部学校。在大革命时期，它同西北“第二黄埔——中山军事学校”堪称“姊妹学校”。

十五、李大钊为“组织共产党军”而斗争

44. 李大钊直接领导的“张兆丰师”

早在大革命初期，大钊同志就十分重视组织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武装部队。据张次溪编著的《李大钊先生传》载：“一九二四年直奉两军混战之际，李（大钊）先生与冯玉祥签订合同，拟在西北军中，组织共产党军”。当时，“李先生约请宋仲宾随冯军入赤峰，计划乘此机会，在东北地域，建设一链革命根据地。”^{〔206〕}这段记载，虽然在表述上不够明晰准确，但也足以说明，在一九二四年九、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李大钊已明确树立“组织共产党军”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光辉思想，并开始付诸行动。紧接着，于十一月，李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派张兆丰同志到国民军中去开展党的军运工作。张兆丰同志早年曾受训于云南讲武堂，在于右任、胡景翼率领的陕西靖国军担任过指挥职务，与国民军三军军长孙岳、第三混成旅旅长刘廷森有旧交。因此，大钊同志派他到国民军去，以便相机建立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军队。

张兆丰临行前，李大钊专门会见了，对在国民军中如何进行工作做了具体指示。经李大钊介绍，张兆丰还会晤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

张兆丰到国民军后，先后担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混成旅参谋

长和该旅第三团团团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和旅长刘廷森的交情，在该部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他先把第一团团团长孙金宣和第一营营长谢连锋介绍入党，后来又陆续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起党的旅支部委员会。

接着，北方区委又派共产党员李林、王珪、张海如去该旅，分别担任了第一、二、三团的副团长，负责部队军事训练。张兆丰还征得旅长同意，在该旅开办了随军干部学校，派李林任教育长，党组织还派来了苏联专家担任教官。该校学员，大多数是来自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的青年学生和北京、天津、郑州的失业工人，以及张兆丰亲自从天津带来的由党组织介绍的几十个革命青年。张兆丰在学员中吸收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干校党支部。这个干校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对加强党在这个部队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张兆丰在国民军的工作，由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直接领导和掌握，他经常得到大钊同志的指示和支持，因而对大钊同志极为尊重和关心。他曾送给大钊同志一支小手枪。在艰苦斗争的岁月和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大钊同志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作为应急的自卫武器，直到被捕。后来，这支小手枪陈列在首都博物馆里。

一九二五年夏，方振武脱离奉系军阀，率部加入冯玉祥部，编为国民军第五军。李大钊和北方区委，为了在国民军五军开展工作，指示张兆丰部与方部建立合作关系。在晋西北地区作战中，张兆丰亲率第三混成旅第三团和第五军协同战斗。一九二六年五月，在进攻山西应县等地的战斗中，张指挥第三团担任主攻任务，连克应县、阳高、东井等数城。同年八月，第三团编入第五军，张兆丰因屡建战功，被升任国民军第五军第三旅旅长。

一九二六年九月，国民军五原誓师，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成立中国国民党在国民联军的最高特别党部，张兆丰被选为最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为党在国民军联军中开展工作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一九二六年十月，张兆丰所在的国民军第五军编为援陕第一路军，奉命解除刘镇华镇嵩军对西安的包围。经过不到半个月的战斗，即打败了镇嵩军，解除了西安之围。接着，又扫除了包围三原之敌。由于张兆丰在国民军西进援陕作战中战功卓著，被晋升为第五军第三师师长。

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出师潼关，戮路东征，同北伐军南北呼应，夹击奉军。张兆丰的第三师编为第一路，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出潼关，占灵宝，克洛阳，一路势为破竹，所向披靡，未用一个月时间，于六月一日同北伐军胜利会师郑州，乘胜东进，攻占开封。

共产党人张兆丰指挥的第三师，由于在配合北伐战争的援陕、东征战役战斗中，担任前敌先锋任务，英勇善战，战功显赫，军威远扬，受到武汉国民政府连续两次传令嘉奖。这支部队，由于李太钊和北方区委直接领导，张兆丰的努力奋斗和部队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体官兵纪律严明，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全力支持。^{〔207〕}

一九二七年四月，正当全国革命在南方和北方胜利发展的时候，暗藏在革命内部的新军阀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实行反革命大屠杀，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冯玉祥的政治态度也急剧右转。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妥协退让，张兆丰被

迫离开了第三师。这支经过党多年培植和兆丰同志艰苦经营的“共产党军”就这样被断送了。

兆丰同志离开部队后，曾被选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回国后担任顺直省委（后改为北方局）委员兼军委副书记、军委书记等职。对北方地区党的军事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

一九三〇年九月间，兆丰同志在山西军队李生达部进行“兵暴”工作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与威胁利诱面前，兆丰同志坚贞不屈，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被敌人杀害。^[208]

兆丰同志在我党早期的军事活动及其光荣业绩，将永垂史册。

45. 邓小平、史可轩共建的“许权中旅”

在国民军联军中，还有党直接掌握的“许权中旅”。“该旅的前身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209]和史可轩等同志共建起来的，是由我党完全掌握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总队（约八百人），和中山军事学校学员（约五百人）为基础组成的。这个旅的主要负责人有：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总队总队长史可轩、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许权中，中山军事学校中共党的负责人高文敏（克林）等同志。政治保卫队的骨干分子和中山军校的学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些党、团员是我党直接掌握这支军队的坚实基础。

许权中同志原是于右任、胡景翼为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的初级军官。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后，因作战勇敢，受到胡景翼的

器重，先后在国民二军任营长、团长。一九二五年，经旅长史可轩介绍，与李大钊结识。经过大钊同志的热心培养和帮助，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国民二军失败后，许所在的旅被吴佩孚改编。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经北方区委和大钊同志的同意，并与国民军总部取得联系，许权中率部在门头沟起义，加入国民一军，先后被任命为团长、旅长、代理师长。

国民军西进援陕进入西安后，许权中调任中山军事学校任学员总队长。后来，经史可轩和邓小平主持，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总队与中山军事学校学员总队合编，由史可轩任总指挥，许权中任副总指挥，高文敏负责党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实现宁汉合流后，把这支由我党掌握的部队视为眼中钉。七月下旬下达命令，要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军事学校开出潼关，阴谋消灭这支革命武装。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该部转移北上，独立发展我党的武装力量。七月二十四日，史可轩、许权中率部北移。二十九日，抵达富平美原镇，史可轩不幸遇害，许权中继任总指挥。这时部队处境十分险恶，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暂时接受了军阀冯子明的改编，作为冯部的一个补充旅，由许权中任旅长，进驻临潼关山镇。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成立了中共旅党委，由高文敏任书记，许权中、杨晓初、高治凯、张汉泉为委员。其间，部队吸收了许多在地方上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既保护了革命同志，又改善了军队的成份，加强了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底，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到许旅，传达了陕西省委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和各派军阀部队中，组织和发动武装

起义,参加和配合农民的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三月底,潘自力给许运转达了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致朱德同志的两封信,中心是强调革命军队要脱离军阀队伍,配合农民暴动。党的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又向许旅传达省委关于组织渭华暴动的决定,要求许旅扩大武装,准备起义。^[210]许权中旅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与指示,经过一系列的整顿,清除了部队内部的坏分子,撤换了一些不称职的指挥员,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部队基层连队的指挥职务,同时,补充了一批枪支弹药,加强了部队军政训练,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为发动渭华起义作了充分准备。

一九二八年五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在中共陕东特委和刘志丹、唐澎、刘继曾等同志组织领导下,渭南、华县农民和西北军许权中旅举行起义,许旅是这次起义军的主力。起义军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46. 党掌握着连队官兵的“石谦旅”

在国民军联军中,还有一支党掌握连队官兵的部队,这就是“石谦旅”。

这支部队是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领导和影响下,由陕西地方党组织培植和建立起来的。至一九二七年春,中共陕甘区委已在该旅的几个营、连里建立了党的支部,已经有六、七个连长和一百多名官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旅已有近十个连队的官兵群众和指挥权为我党所掌握。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在《致陕西省委信》中曾指出:陕西的军事运动较别的省有基础,不

仅有军官运动，而且设立了士兵支部，依数目说在陕西我们已有整个儿两旅和一些零星队伍。中央所指的就是“许权中旅”和“石谦旅”。

“石谦旅”的建立，经过了艰苦的工作过程：

一九二五年底，李象九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到陕北，利用他和井岳秀部下石谦的同乡关系，当上了安定县巡官。此时，经中共北方区委介绍，中共党员谢子长回到陕北安定，根据党的指示继续办县民团，任团总。谢、李二人有旧交，他们利用公开的身份，在安定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同情革命的石谦先后升任营长、团长。为了利用这个关系扩大部队实力，谢子长首先帮助李象九招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和贫苦工农，在石谦部队成立了学兵连，由李象九任连长。接着，谢子长把自己领导的安定县民团也编为石谦部四团三营十二连，自任连长。同时又通过中共绥德地委李子洲等，调来一批党员担任班、排长，负责基层的管理教育和训练指挥。李、谢规定连队每天除进行二小时军事训练外，其余时间全部用于政治和文化教育。谢子长担任士兵政治教育，讲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和马列主义常识，教唱革命歌曲。谢、李还多次邀请李子洲、杨明轩等共产党人来部队讲演，宣传革命思想和党的主张。谢、李等随着革命思想在部队的广泛传播，在石谦团中建立党的特别支部，由李瑞阳担任支部书记，李象九、谢子长等任支部委员，并接收了阎红颜、雷恩均等一批新党员。在连队里还成立了士兵自治会和俱乐部，学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等歌曲，又演新戏，组织球赛，部队气氛非常活跃，很快建立起新的连队革命生活。

一九二六年夏秋，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北伐战争不断胜利和国民军五原誓师的推动下，陕北的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此形势下，石谦又升任十一旅旅长。中共绥德地委对这支受党影响的部队十分重视，为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先后派李瑞阳、杜衡、冯景异、阎揆要等同志到石谦旅，同谢子长、李象九一起工作。

一九二七年春，决定将石谦旅中的党组织由特别支部，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由杜衡任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等为委员，并在连队基层官兵中开展宣传教育和建党工作。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强大影响和党的军支、谢子长等同志的努力争取下，促使石谦接受全旅官兵在宜川集义镇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的建议，谢子长乘此良机在广大官兵中散发革命书刊，并直接向石谦进行争取联络，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终于使石谦本人和该旅大部分官兵深受我党影响而倾向革命。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六月，冯玉祥开始“清党”反共，陕西全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八月，陕北军阀井岳秀派人暗杀了石谦旅长，并任命了一个反动分子代理旅长。在此紧急关头，在陕西省委领导下，由共产党人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等组织和发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四日，举行了清涧起义。这次起义虽然由于敌人的镇压而遭到失败，但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我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它削弱了陕北的军阀力量，锻炼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积累了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成为后来创建西北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前奏。

纵观以上三支部队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大钊同志关于“组

织共产党军”的思想，在实践中是有一定的成效的。

一九二六年，斯大林与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曾经指出，中国革命者，其中包括共产党人，不仅要“改善现有的军队，用一切可以办到的手段来使军队革命化”，而且要“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而“这些军团也将是以后发展为红军的新的军队核心”。^{〔211〕}斯大林的这些光辉思想，没有被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所接受；但是，在此以前，李大钊同志早就开始付诸实践了。张兆丰师、许权中旅、石谦旅，就是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或间接影响下，由我党在国民军中建立起来，并直接掌握的三支正规部队。它们虽然有的被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断送，有的在起义中遭到失败，但是却为后来创建的西北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开辟了道路。同叶挺独立团一样，它们在大革命中，是建树了丰功伟绩的。

十六、李大钊敦促冯玉祥 出兵长安、会师郑州

47. 李大钊密函建议冯玉祥出师东征

一九二七年春，冯玉祥进驻西安后，李大钊派人送来密函。根据奉、鲁、孙三方在北方地区的兵力部署和奉军的作战计划，敦促冯玉祥“出长安，会师郑州”。密函原文如下：

奉(张作霖)鲁(张宗昌)孙(孙传芳)三方兵力如下：

(一) 保定一带有兵五万，后方为万福麟。(二) 五原之兵，现调北京。有骑兵四旅，步兵一旅，山西接防。包头五原，有两步兵师，一骑兵师。(三) 张家口有两旅。(四) 北京有兵一万五千。总计奉军关内兵力，约有十万。至直、鲁军在南京浦口者有一万五千人。在泰安徐州者有九万人，尚有两骑兵旅。天津青岛亦有若干。孙(传芳)军分二部，总共三万五千人乃至四万人。安徽有三万以上。奉军作战计划，将出兵河南。建议(冯)出长安会师郑州。^[212]

冯玉祥接到李大钊密函后，积极整顿军队，改革政治，振兴财政，为出师东征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在此期间，奉军势力已沿京汉铁路进至许昌、郾城，长江方面，吴佩孚虽然垮台，但直鲁军和孙传芳军与南方北伐军仍激战于江

苏、安徽一带。吴佩孚的残部于学忠五万余人，盘踞湖北，并与鄂北驻军张联升勾结，希图乘虚直扑武汉。在陇海路，吴佩孚先驻巩县，后移郑州，豫西有刘镇华残部数万人，西至阆乡，与国民军潼关先头部队接近。

当时冯玉祥除令全军陆续入陕外，对援鄂攻豫，会师中原作了部署，配置分为五路：（一）中央军由冯玉祥自己率领，以孙良诚为总指挥，约八万人，集中豫西，沿陇海路向东进军。（二）右路军以孙连仲为总司令，率其本部和冯治安、韩德元两师，张耀枢旅，共约四万人，由陕南出荆紫关，向鄂豫边进发。（三）左路军以徐永昌为总司令，率其全部，由陕西过黄河，假道山西，直趋石家庄（后晋阎与冯联系，同意在适当时期，出兵石家庄，截断奉军退路。徐永昌部改归晋军，受阎指挥）。（四）南路军，以新由晋脱险归来之岳维峻为总司令，率杨虎城、李虎臣、邓宝珊等部，约五万人，集中于汉中，东向入豫西。（五）北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集中后防各部队于宁夏。五路大军共约三十余万人。各路大军奉令后，陆续开始行动。

一九二七年四月，河南的军事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奉军南下节节进攻，大败直系旧部（已叛吴）靳云鹗于郑州之南，靳部退守郾城一带。奉方探知国民军与南方北伐军联合，即将东出，深恐后方受威胁，不敢孤军南下，并派出三个旅，由万福麟统率，沿陇海路西进，协同张治公扼守洛阳、新安。吴佩孚迫于形势紧张，离开郑州，经南阳至湖北边界于学忠部，准备抗击北伐军。豫西之刘镇华，经冯玉祥多次派人联络，答应就任国民军联军东路军总司令，一致讨奉。晋军此时也表示一致讨奉。形势的变化，对国民军联军十分有利，国民军联军遂誓师东进。

48. 冯玉祥誓师西安与会师郑州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武汉国民政府电令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双方电商决定，联合北伐，分路出兵。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二十日大军出发。以唐生智、张发奎部沿京汉路北上，约定冯玉祥部沿陇海路东进，夹击河南之奉军，然后会师于郑州和开封。

五月一日，冯玉祥在西安举行了有数万军民参加的誓师大会。会上，冯玉祥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在誓词中，冯玉祥申明了他为革命而出师的决心：

……认为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贡献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决斗，完成国民革命，生死赴之。

宣誓完毕，冯玉祥发表了长篇讲演，并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

五月五日，冯玉祥下达总动员令，并亲自赴潼关指挥。

中央军以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马鸿逵为副指挥，率部迅速向东进发。五月六日克灵宝，七日下陕州，相继占领卢氏、洛宁、渑池等县。奉军张治公部顽强抵抗，退守铁门、新安一带。

廿一日，冯玉祥大军包围新安，激战一日，廿二日克新安。此时，在铁路工人支援下，缴获铁路机车一辆，货车百余辆，解决了冯军运输问题，对胜利东进给予了有力保证。

二十六日，冯军大败奉军，攻占洛阳。万福麟乘车东逃，张治公南窜入山。

洛阳既克，冯玉祥下令大军分三路东进。冯军英勇进击，势如破竹，攻无不克。五月三十日，国民军占领郑州。三十一日，北伐军唐生智部也进入郑州。奉军战败退过黄河后，被我党发动和改造过的当地“红枪会”的革命农民群众缴械不少。

国民军占领郑州后，继续向东追击。三十一日晚，奉军残兵败将，弃城东逃；六月一日，国民军进入开封；北伐军张发奎部也于同日赶到。

至此，大钊同志关于国民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战略计划，宣告完成。

十七、冯玉祥率国民军 官兵痛悼李大钊

49、李大钊英勇就义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正当国民军出师东征之际，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英勇就义。

绞杀大钊同志的刽子手就是反动军阀张作霖！

奉系军阀张作霖，原不过是一个土匪头目。他投机钻营，扶摇直上，从清廷营官，跃为民国师长、督军，一直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他不仅是“东北王”，而且“问鼎中原，”统治东北、华北达十三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

张作霖是屠杀和镇压人民的大刽子手。“五卅”运动中，他秉承英、日等帝国主义旨意，指使奉系军阀邢士廉、李景林、张宗昌等，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地，血腥屠杀人民，疯狂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正如当时我党创办的《战士》周刊揭露的那样：“五卅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高潮，是奉系军阀受英、日帝国主义唆使而镇压下去的”。“奉系军阀在五卅运动中实际上起了很大的汉奸作用。”^[213]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北京“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段祺瑞的执政府，对大钊同志等加以“假借共产学说，唆聚群

众，展肇事端”的罪名，“着京内外一致严拿，尽法惩办”。国民军撤离北京后，奉军进占京津一带，更加疯狂地迫害革命群众，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北京城内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214〕}的告示。进步报纸《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也被捕枪杀。大钊同志更被张作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再被通缉。许多军阀密探，帝国主义间谍，千方百计地侦察他的住处，企图捕杀大钊同志。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环境愈来愈困难。国民党的领袖们纷纷南下，有些人害怕了，不敢继续革命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北伐革命高潮，大钊同志把许多同志调离了北京，转移到其他地方。而他自己却多次拒绝了亲友们要他离开北京的劝告，毫不动摇地坚守自己岗位，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毅然将领导北方革命的全副重担肩负起来。为了应付突然事件的发生，他把党的机密文件作了妥善的安排，并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底，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由翠花胡同八号国民党左派市党部所在地，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

在敌人严密的监视、跟踪下，大钊同志的活动虽然受到了很大限制；但是他仍然通过种种方法，和北方各地革命组织、革命同志保持了密切联系。沉寂了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方革命运动活跃的指挥中心，那时在这里活动的革命者最多时曾达二、三百人。有时，日夜都有同志化装前来请示汇报工作；有些进步青年，以至大学教授，也常来求教。在这里，他审阅各地送来的报告，派出干部，发出指示信，继续领导北方革命力量，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大钊同志在敌人心里所展开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引起了帝

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无比恐惧和极度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张作霖谋杀李大钊和反苏反共大搜捕的阴谋，早已在策划和进行之中。据当时的《申报》报导：

张作霖一面训练了一批执行任务的军警，关在京师警察厅内，不许外出，以免走漏风声。一面密令汪大燮等人分别与英、美、日三国公使接洽，拟得其同意，派兵入东交民巷，搜查苏联大使馆兵营。帝国主义公使表示，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因俄使已不在辛丑条约国之内，除受国际上的待遇外，使馆界内优越权利，无享受之可能。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215〕}

张作霖得到帝国主义的默许和支持后，有恃无恐，决定马上动手。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上午十点半，张作霖派出警察和宪兵各一百名，便衣侦探一百五十名，悍然违犯外交惯例，闯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及其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实行了疯狂的大搜捕。

当大队警宪进行搜捕时，外交使团首席公使荷兰驻华大使欧登科，通知使馆界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216〕}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加岗布哨在附近“维持秩序”。美帝国主义宪兵营的楼上，架设着机枪、大炮，对准了苏联使馆的兵营。当时报纸揭露说：“此番领袖八公使的荷使，即是十年前包庇复辟犯张勋的荷使”，“象张勋那样的内乱实行犯，使团可以收容，而对于仅仅笃信共产主义的李大钊等，或三民主义的其他党人，反落井下石，从而害之”。^{〔217〕}

当张作霖的警宪涌入苏联大使馆时，大钊同志正坐在桌旁写

字。他听到枪声后，毫不慌张，由抽屉里取出张兆丰送给他的那支小手枪，同长女星华到院子里查看。他们找到一间小屋，坐下来静观事态的发展。如狼似虎的警察和宪兵，蜂拥而入，包围了大钊同志，夺去了他的手枪，枪口对准着他的胸膛。大钊同志临危不惧，巍然而立，没有丝毫的怯懦或惊慌。

大钊同志就这样被捕了。先后被捕的还有范鸿劼、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等共产党人，以及邓文辉、张挹兰等国民党左派同志。

大钊同志被捕下狱后，敌人用种种残酷刑罚拷打折磨，并以甜言密语施以利诱。在敌人面前，大钊同志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气节。他虽然遍体鳞伤，行动艰难，但仍积极宣传马列主义，鼓舞大家的斗志，赢得了全监难友的敬爱。

大钊同志被捕后，北方的同志莫不万分悲愤，社会上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均起而营救。但是，新旧军阀却勾结起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大钊同志阴谋加害。当时，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218]张宗昌也打来电报，胡说李大钊为“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北京司法部街一带，岗哨林立，交通断绝。万恶的军阀张作霖，决计要迅速而秘密地杀害大钊同志。上午十一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在警察厅南大院总监大客厅里，突然开庭，对大钊同志等人进行“军法会审”，只一个多小时，就匆忙结束，判决对大钊同志等立即处以绞刑。然后用汽车六辆，分载大钊同志等二十人，送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

场。沿途警戒森严，如临大敌，张作霖专门派他的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前往监刑。

下午二时，大钊同志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昂首挺胸，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就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先驱，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忠诚地战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终年只有三十八岁。

50. 西北军民痛悼李大钊

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正当冯玉祥督师东征，国民军联军总部进驻潼关时，传来了李大钊被刽子手张作霖于四月二十八日绞杀的消息。噩耗传来，冯玉祥将军痛哭甚哀。他电令国民军各部队和西北各地方机关、民众，举行大规模的追悼活动，并号令全体官兵，人人戴孝，以志哀悼。电令说：

李大钊……等二十人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秘密绞杀，噩耗传来，悲愤万状！如此重大之党狱及惨杀，实为中国革命史上最壮烈而又惨淡之一页。应即时在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运动和其他各种宣传方法，务使全军将士及当地民众，均对于此事变的真象和意义，有明确的认识，增加我们消灭敌人的决心和义愤。⁽²¹⁹⁾

在冯玉祥的号召下，各部队、各地方机关和民众团体，举行了追悼大会及其他悼念活动。国民军广大官兵出于对李大钊同志的衷心爱戴和真诚崇敬，无不悲愤泪下。在潼关总部召开的追悼大会上，冯玉祥发表了追悼电，电文对李大钊同志给予了崇高评价。电文说：

李大钊同志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又为北京政治分会委员，在北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之领袖。李同志的牺牲，系为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牺牲，一切被压迫民众，应深深的哀此伟大革命导师。又李同志为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对于共产主义素有研究，并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但他只是努力国民革命，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敌人欲以共产党三字，减轻李同志在革命中的地位，适得其反，并足以证明李同志更是世界革命中的领袖。李同志因地域的关系，与本军在南口转进以后，发生最密切的关系，李同志一死，北京革命工作，失了领袖，本军亦受极大的影响。^{〔220〕}

冯玉祥为吊唁李大钊这位良师益友，还沉痛赋诗，刻石铭志。诗文如下：

何故被绞杀兮？为革命。
何处被捕兮？
于苏联大使馆所在之北京。
何物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
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
何人主谋凶杀兮？

帝国主义倡首的日与英。
我方率军东来兮，师次潼关。
凶耗惊传兮，黄河流水为之呜咽。
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咷。
为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而痛哭兮，
非为同志而寿夭。
死我同志兮，增我灭敌之决心！
革命潮流终不被绞杀兮，
将复为之激荡而高涨与奔腾！
人孰不死兮？死有异同。
二十位同志之死，为世界工农。
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兮，
其精神永留被压迫人民心中！
后死者之责任兮，
起来向贼猛攻！
继死者之志愿而奋斗兮，
达到革命成功！^{〔221〕}

冯玉祥和国民军官兵对大钊同志的悼念，深刻地反映了大钊同志对国民军工作的卓著成效，反映了冯玉祥将军及其广大官兵对大钊同志的深厚革命感情。大钊同志的浩然正气，无疑成为鼓舞国民军胜利东进的伟大力量。

十八、党对冯玉祥将军的历史评价

51. 党中央领导同志对 冯玉祥的评价与赞扬

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坚强的民主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者。冯玉祥创建的国民军，对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党领导人对冯玉祥将军的一生作了正确的评价。

一九四一年，冯玉祥将军六十寿辰时，周恩来同志曾撰文祝贺，对他的丰功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文曰：

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这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周恩来同志在祝词中，对冯玉祥将军的治军和作战方法及国民军政治工作，也倍加称颂：

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最喜欢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故能深知士兵生活，民间

疾苦，也最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需。

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222〕}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冯玉祥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由美国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在途中不幸迁难。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唁电，对冯玉祥将军致力于中国的民主事业，深表感怀。唁电曰：

冯玉祥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223〕}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周恩来同志在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上讲话时，赞颂了冯玉祥由一个旧军人转变为民主战士的光辉而又曲折的历程，号召学习冯玉祥反帝的革命精神。周恩来同志说：

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冯先生生前曾进行反蒋，尤其在美国最后一幕，与美帝国主义曾进行了正面的斗争，……坚决地拒绝了美帝国主义对他的引诱，毅然离美准备回到中国解放区，接受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不幸中途迁难，实值得大家纪念。今天我们纪念冯先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尤其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224〕}

一九五二年，党中央为了永远纪念冯玉祥将军的历史业绩，

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泰山麓下，并由周恩来总理指导修建陵墓。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隆重地举行了冯玉祥将军骨灰安放仪式。墓前铭刻着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挽词：

冯玉祥将军逝世谨致悼意

毛泽东

焕章先生千古 为民主而牺牲

朱 德 挽

纪念冯玉祥将军的最好办法是坚决地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

周恩来

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时，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九月十四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时，对冯玉祥将军一生的功绩，作了全面评价。他以十分庄重的语气说：

今天我们一起纪念焕章先生一百周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很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业。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小平同志在回忆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军联军与冯将军合作共事的情景后，又说：

从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225〕}

小平同志的谈话，首先肯定了冯玉祥将军“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业”，“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而且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在谈话中，小平同志毫不讳言地指出，在冯玉祥的革命生涯中“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同时，也明确指出，在这段“曲折”中，冯玉祥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同蒋介石、汪精卫有区别的。小平同志的谈话，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冯玉祥的一生作出了全面的、正确的、公正的评价。对小平同志的这个评价，乌兰夫同志在纪念大会讲话时，进一步作了阐述。他着重指出：

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后，他组织国民军联军，誓师五原，参加北伐。他得知李大钊同志被杀害，下令全军戴孝，树碑纪念，号召士兵继承先人之志愿，达到革命成功。

冯玉祥将军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虽然历经曲折，但是，他献身于国家、民族的坚强信念，跟着时代脚步前进的革命精神，终于使他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赞扬和敬仰。^{〔226〕}

在这篇讲话中，乌兰夫称“冯玉祥将军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这既是代表党赋予冯玉祥将军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光荣称号，又是党对冯玉祥将军全面成就的最高概括。党中央领导人对冯玉祥的一系列的评价和赞扬，是我们研究和认识冯玉祥将

军的基本依据。

52. 党和中央领导同志对 冯玉祥亲属的关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中央领导同志对冯玉祥将军的亲属，给予了亲切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李德全同志是冯玉祥将军的亲密伴侣，解放后又是新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反帝反封建的长期革命征途中，她是冯玉祥将军的忠实战友和得力助手，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斗士。

一九四八年夏，她和冯玉祥将军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乘船由美国取道苏联回国，不料途中轮船失火，冯玉祥不幸罹难，女儿冯晓达也同时迁难，李德全同志受伤侥幸脱险。十一月，她回到祖国的东北解放区，当即在哈尔滨电台发表长篇广播演说，号召原西北国民军官兵弃暗投明，掉转枪口反蒋救国。

李德全回到祖国后，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赖。一九四九年三月，她被推选为国民党统治区妇女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九月，她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旋即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她多次受党和政府的委托，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李德全同志以花甲之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完成了由民主主义战士到共

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在长期革命工作中，李德全同志表现了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高贵品德。党对李德全同志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关怀。

在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李德全同志忧愤成疾，卧床不起。当时，有人依仗林彪的“第一号通令”，三番五次强逼她离开北京。李德全同志的女儿冯理达看到母亲重病缠身，给周总理写信报告了母亲的病情和处境。这时自己处境也很困难的周总理，仍然尽力设法帮助和保护她们。总理把李德全列为应予保护的干部范围之内，才使她免于被赶出北京。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李德全同志满怀对林彪、“四人帮”的怨愤，与世长辞。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医院向遗体告别。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叶剑英、李富春等和许多老同志，都参加了李德全同志的追悼会。邓颖超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了悼词，对李德全光荣的战斗的生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赞扬她“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努力为人民服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227〕

一九八二年，在纪念李德全同志逝世十周年时，康克清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专题纪念文章。她在文章中称赞“李德全同志作为冯玉祥先生的亲密伴侣，在长期的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争取人民民主的革命斗争中，和冯先生互相支持，互相砥砺，同甘苦，共患难”。她宣称：“李德全同志是我国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作出了很大贡献。”〔228〕康克清同志的

文章,不言而喻地代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李德全同志的公正评价。

一九八二年九月,在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时,党和人民对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同志,也表现了深切的怀念。小平同志在会见冯玉祥子女时满怀深情地说:“李德全大姐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²²⁹⁾

对冯玉祥将军和李德全同志的子女,党和中央领导同志同样是非常关怀的。即使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党和人民的真正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从未忽视对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的关怀。

周恩来同志和冯玉祥将军一家结交笃深而久远。早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周恩来在武汉就已经同冯玉祥经常往来访问,商谈国家大事。冯玉祥的子女洪达、理达、颖达,从幼年时候起,就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抚爱与关怀。一九五〇年,正在列宁格勒学习的冯颖达得了肺结核,周恩来同志去苏联访问时,听说颖达在那里医疗条件很差,就把她带回国内治疗。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不仅保护了李德全同志,而且对冯、李在国内的子女,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

李德全同志逝世开完追悼会后,朱德和康克清同志将冯、李的子女,特意请到家中吃饭。冯的长子洪达和女儿理达、颖达与他(她)们的爱人和第三代,大大小小十几个人,围绕在朱总和康大姐的身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合影。

蔡畅、邓颖超同志在李德全同志去世后,专门去冯李家中看望他们的子女,冯洪达向两位老大姐反映了压在他们身上多年的一个沉重包袱——家庭出身问题。邓、蔡两位老大姐不顾极左路线

的猖獗和威胁，坦率地表达了她们的同情和意见，而且排除种种阻力，为他们解决问题。最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对冯玉祥将军的历次评价，接受蔡、邓两位老大姐的建议，批准洪达所在党组织的报告，将他的家庭出身改为“民主军人”，而且冯、李的其他子女的家庭出身也都照此办理，从此搬掉了压在他（她）们心头的大石。

叶剑英同志对冯、李的子女，也象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关怀。李德全同志去世后，叶帅不顾“四人帮”的横行霸道，每逢过春节时，都邀请冯理达一家到叶帅府中，和叶帅全家一起聚餐，亲如家人。

邓小平同志对冯玉祥将军的子女，也是关怀备至的。仅据冯洪达、余华心所写《亲切的勉励》一文中，记述在纪念冯玉祥百年诞辰时，小平同志接见冯玉祥亲属的亲切情景，就可见一斑。

冯玉祥将军百年诞辰纪念会定于九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冯洪达、余华心接到通知后，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于十三日赶到北京。在首都，他们与从美国专程来参加大会的二哥冯洪志，居京的姐姐冯弗伐、冯理达、冯颖达及其姐夫们、第三代的孩子们，快乐地相聚了。冯、余感慨地说：“这是我们这一家前所未有的、将来也难得的一次大团聚。父母如地下有知，该有多么高兴呵！”

当天下午，民革中央吴茂荪副主席告诉他们，小平同志第二天可能要接见他们。冯、余写道：“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半晌没说出话来，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小平同志这样忙，还能抽出时间来见我们，这太叫人激动了！这一夜，我们兴奋得谁也没睡安稳，担心小平同志有事，见不到他。”

第二天下午五点，冯玉祥将军的子女们就赶到人民大会堂。快到六点时，他们看见小平同志神清气爽地健步而入，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姐妹的情况。

冯洪达、余华心写道：

小平同志和大家一一握手后，好象发现了什么似的，他首先就问道：

“弗能呢？”

“大姐弗能已经去世了！”二姐弗伐回答说。

“啊！”小平同志十分惋惜地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时，人大会堂工作人员招呼大家说：“先照象吧！”我们按预先排好的次序站好，镁光灯一闪，留下了永远对我们最珍贵的合影。

小平同志和大家一起入座后，便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谈话。二姐弗伐首先代表今晚没来的第三代，向邓爷爷问好。小平同志笑着点点头说：

“弗能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

冯、余的文章继续写道，小平同志在畅谈了西北军当年的情况后，点燃了一支香烟，往前坐了坐，以关怀的目光环视了八位在座的冯、李亲属，又开始了亲切的对话。

小平同志问道：

“你们在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理达代表大家感谢党的关怀说：“我们第二代、第三代都在健康成长，努力工作”。

陪同接见的民革吴茂荪副主席，向小平同志介绍了

在座的每位亲属的职业。

小平同志问二哥洪志：

“你在美国做什么工作？”

洪志接着回答说：“机械工业，具体地说就是搞水泵。”

“那很好嘛！”小平同志说。

洪志又说：“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三十多年了，再有两个月，我就退休了。退休后，准备回国定居，我还想在晚年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祖国服务。”

小平同志听冯洪志说完，马上转过脸去，对在座的统战部几位领导说：“想着这个事。”

接着，理达说：“一九四八年我们和爸爸一起回国的时候，二哥（洪志）本来是随后就要回来的，可是美国政府进行阻挠，不许技术人员回来，所以不能离境。”她又说：“二哥这几十年虽然在外面，可是他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这是很不容易的。”

洪志还给小平同志报告说：“最近我在美国组织了一个和平促进会，已经有四十多个人参加，每周聚会一次，目的是希望促成台湾早日回归。”

小平同志听完洪志在美国的活动后，点点头说：

“你们这一家，就是冯洪国差一点，解放战争时他在刘汝明处，我们去联系，没有联系上，胆子太小，人是老实人。”^{〔230〕}

小平同志在百忙中，和冯玉祥亲属整整谈了半个小时，方始离去。事后，在场的我驻联合国大使赖亚力同志对余华心说：

“小平同志对你们多亲切呵！”当晚，冯、余回到宾馆后，立即给孩子们讲述了小平同志接见的谈话内容和亲切的气氛，全家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与幸福之中。

几十年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冯玉祥将军的亲属无比关怀，对冯、李的子女象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冯玉祥将军的亲属子女，也把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成自己的亲人。这种深厚情谊是大革命时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晶，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生动体现，是共产党人珍视革命情谊的光辉典范。党的这种温暖和关怀，必将成为激励冯玉祥子女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动力。

53. 冯玉祥将军的亲笔遗嘱

当笔者撰写本书即将结束时，冯理达同志将她珍藏四十年的“传家宝”——《冯玉祥的亲笔遗嘱》的真迹拿来给我看。她一边逐字逐句地诵读，一边介绍当年的背景，听来十分感人。这份遗嘱，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冯玉祥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准备由美国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夕，在纽约亲笔写成的，是他亲手留下的最后一件珍贵遗产。这份遗嘱，是冯玉祥的生平自述，真实地记录了他由一个旧式军人转变为一个民主军人，为反帝反封建，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的革命历程，是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拥护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宣言。这份遗嘱，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投降卖国的滔天罪行，是反对独夫民贼专制独裁的战斗檄文。这份遗嘱，对于认识和评价冯玉祥将军一生建树的丰功伟绩和一度发生的历史曲折，具有极其重

要的史料价值。现将全文照录于后，以飨读者。

冯玉祥的亲笔遗嘱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于纽约。

自蒋介石推翻政治协商会议议决案以来，他完全要独裁，要实行希特勒（勒）、莫索利尼的办法。在教（较）场口大打，在仓白堂大砸，全是利用流氓、土匪、特务一类的东西，毁灭国家，不但不讲公理，不说是非，并且是倒行逆施。

在云南杀闻亦（一）多、李公仆（朴）两位大学教授，这种行为，只看他重用行凶的人，即可知是蒋下手谕教他们作的。关麟征、李宗黄。

在去年五月，南京大打请愿的学生，流血遍地。一个政府对于青年主人这种行为，不是反叛是什么？那还有一点公仆的思想？我在那几天发过告全国同胞书，就是要为青年主人们报仇的。

不久，武汉又杀学生，亦是人人都知道的。

在西安，把杜斌丞十几位民主同盟的朋友全枪决了，任意加给他们罪名。

在北平的余少将心清等很多人，都是和平民主分子，抓起来用特务刑罚加以焚打，硬说是共产党，至今死活不知。

用最新的武器杀自己的同胞，自开仗以来，每天死的不止百万千万。

说政治，贪污横行；说经济，一元美金已到二十二万；说军事，日日都在打败仗；说外交，将把国土卖

完。这是事实，即在面前，可以看的（得）见。

我自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以来，曾同蔡松坡、李协和二位将军，反对袁世凯作皇帝。后来，张勋复辟，我首先在廊坊誓师，打倒张勋。

民七，我在武穴反对段琪瑞的武力统一。民九，推倒段琪瑞。民十一，把害河南人民（的）赵倜铲除。

民十三，把贿选政府和吴佩孚打倒，又把帝制余孽溥仪逐走，欢迎中山先生北上。

民十五九月，我在五原誓师，经甘陕，出潼关，会师郑、徐二州，为的是实行三民主义。

民十八，蒋要独裁；民十九，曾打过他一次。民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说一切事都是他办错，他向大家认罪。

因此，我到南京去开会。上海“一·二八”抗日发生，我看蒋仍是不愿抵抗日本，迁都洛阳，徐州会议都是假样子。

于是，我由洛阳到泰山读书。当山海关、热河紧张之际，我到张家口。宋哲元等大战于喜峰口，蒋毫不接济宋张。

何梅协定成立，蒋断送中国。民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在张家口，有民众抗日同盟军之举义，出兵一月，收复失地四县，多伦名城在内。

蒋意在投降日本，乃有种种妨碍抗日之阴谋。宋回张家口，我仍回泰山读书。

民二十四年，蒋约我到南京开会。我告以如为抗

日，我来；如不抗日，我不来。蒋复抗日，于是我到南京，并提有救亡大计案（党大会提案）。

蒋要打两广，我以去就争，方得和平。痛说其不抗日而杀自己兄弟之非是。

“七七”抗战以来，蒋把他自己的军队竭力补充，藏在陕西和后方，而使他人军队去牺牲，并且对于主张抗日之人视为仇敌。

八年抗战以来种种打算，蒋只是消灭异己，培植其私人势力。所有朋侪，皆因日寇在前，不能忍的亦忍着不说，此亦大家都知之事。

日本投降之后，蒋以为他一人抗战，一人有功。所派接收人员，全由其一人所派，未同任何人商议，结果成为明抢明夺之事实，弄得天怒人怨，使世界各国笑骂。

因此种种，我觉得我应当本我推翻满清，打倒洪宪的民主救国精神和勇气，来打倒这个专制魔鬼的希特勒（勒）第二的蒋中正，使中国成为真正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国。这就是从去年五月二十六日发告同胞书的大根源。

近来和平民主联盟成立，本年一月革命委员会成立，这都是为打倒独裁，成立真的联合政府，好救同胞出此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之境地，并不是为己为私，为什么功名富贵。

可是蒋派出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要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遗嘱预先写好，免得我死后人们无办法或是莫名其妙，分条写出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

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

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

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除不可。

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李德全夫人。

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埋深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作桌椅用。

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

以上这预备被人打死的遗嘱写完。还要加上一句，假如我死不了，民主的真联合政府成立，我决不担任政府任何职务，我只愿住在外国写我的生活，免得别人以为我是为作什么官打独裁的。 冯玉祥

54. 历史地看待冯玉祥走过的一段弯路

冯玉祥自响应辛亥革命举行起义后，在北伐战争的年代里，由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经过李大钊等同志和北方区委的大量工作，从北洋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坚持反帝

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采取联俄、联共的政策，支持人民革命运动，参加北伐战争，对大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应当肯定，在郑州会议以前，冯玉祥的基本倾向是革命的，说明党和大钊同志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工作是取得了积极成果的。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至十一日冯玉祥、汪精卫郑州会议，和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后，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大逆转，竟然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反苏反共，背叛了革命，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对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样看呢？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对冯玉祥的全面评价和冯玉祥的全部历史，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供读者研究参考。

首先，冯玉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政治上的逆转，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原因。

在大革命时期，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支资产阶级的武装队伍，冯玉祥是资产阶级在军队里的代表人物。因此，他既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同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因而又具有一定的动摇性、妥协性。由于他反对帝国主义，热爱自己祖国，反对封建主义，要求民主，因而在大革命中表现了一定的革命性，并为革命作了建树。但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形势下，经不起蒋介石集团的拉拢和利诱，他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就暴露出来，终于走向联蒋反共的迷途。

冯玉祥在他走向革命道路后，虽然经过自己的学习和共产党人的帮助，政治上、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未根本转变，他的觉悟水平和政治视野也不可避免地带

有极大的局限性。

他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反对和阻挠在国民军中开展反蒋运动，不许政治工作人员提出倒蒋口号，无原则地强调蒋、汪、冯团结一致。据李世军所著《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一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可以看出当时冯玉祥对蒋介石的认识和态度。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二五年五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来潼关拉冯反蒋。邓在国民军联军总部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讲了国内外形势，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种种事实，最后当他高呼打倒军阀蒋介石时，冯玉祥的脸色变了，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这时，从队伍的后排右角，走出一个穿灰布军装、个子不高、身体挺结实的青年，他向前迈了几步，高举拳头，操四川口音，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冯玉祥怒形于色，立即宣布散会。这个青年，随即被军法处带走。第二天，刘伯坚同志向冯玉祥保释，才放出来。当时，冯玉祥对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春涛说：

“谁要打倒蒋介石，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在我这里，穿二尺半的，就不准喊打倒蒋某某人”。

李世军回忆说：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当时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郭春涛，在北京告诉他，当年在潼关欢迎邓演达大会上，喊打倒蒋介石口号的，是邓小平同志。^{〔43〕}

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对此事也有记载。他写道：

我到西安不久，各方面相继派代表见面时，蒋介石派来的代表是彭程万。记得那天在西安城东北角地方接见他，我们曾作长谈。他讲蒋介石人格如何伟大，为人如何有作为有魄力，将来必如何有为云，至今我还不

忘。

他继续写道：

在潼关会议的时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蒋的口号，同时街上也贴满此种标语。……我总觉得不是味道。刚刚还是一致拥蒋，转过脸来，就是倒蒋，到底是怎么回事？冯玉祥认为：

现在孙、张、吴、褚之类还保有他们的实力。奉军在京汉、陇海线张牙舞爪，急图卷土重来。我们境状如此之困，反动势力尚是如此强大，我们革命阵容内兢兢业业，团结一致，犹虞不足，岂容再有分裂？于是我和他们说：“我和蒋先生，不如你们和他的关系深，历史久，但是你们昨天还是拥护蒋总司令，今日忽又翻脸要打倒他，究竟是什么道理？”^{〔232〕}

可见，冯玉祥对在“四·一二”叛变了革命的蒋介石的真面目仍未识破，甚至还称颂蒋介石是“革命中坚分子，党国前途，同深利赖！”这就难怪冯玉祥易于为蒋介石所迷惑了。

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冯玉祥的认识是极其错误的。他根本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全国并无阶级可分，斗争者何？否则必演成民与民间之仇杀。使社会大乱而后已！”进而认为：“共产学说”“决不适合我国国情”。

对待工农革命运动，冯玉祥确曾给予一定的支持，但他对工农的扶助是有限度的。在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对工农运动纷纷责难声中，他也断言：“农民反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

由于冯玉祥在上述几个方面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观点，因此在

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的物质利诱和政治蛊惑下，在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上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发生政治上的大逆转，这是毫不足怪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前进道路上，都有可能出现某些失误和挫折，特别是象冯玉祥这样一个由旧式军人向民主军人转变过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挫折和失误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在全面评价冯玉祥将军的历史时，指出他在一段时间内也发生过一些曲折，既不是对冯玉祥将军的苛求，也不会因此而掩盖和抹杀冯玉祥将军在大革命中的功绩。

其次，冯玉祥对共产党的态度与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反动派是有区别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冯玉祥对共产党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

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在自己的辖区和军队里，配合蒋介石、汪精卫进行“清党”、“分共”，但是他没有象其他国民党反动派那样屠杀和镇压共产党人。一九二七年六月底，他将刘伯坚、邓小平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礼送出境”。七月十五日，又将宣侠父、刘志丹等三十二名共产党人“礼送”出西北国民军。

李世军著《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一文说，当时军需人员告诉他，“冯玉祥送给刘伯坚一千元，科长以上每人一百元，其余每人五十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这二百四十余人一下子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后来这些人大多去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233〕}

据刘贯一等回忆，甚至在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

对待共产党人，并不象蒋、汪那样斩尽杀绝，也偶而说几句共产党的好话。”在他八月十一日打给薛笃弼的电报中，一面说，“对共产党活动，务须严防严查”；一面又密令：“惟对此项党人，只准拘留禁闭，不准枪杀打罚。”〔234〕

对“清党”、“分共”，冯玉祥自己也有记载：

在河南以及在我们二集团军中的共产党人，用一军车向武汉送走，刘伯坚等许多位半途就下车他去。

这一记载，与李世军的回忆是一致的，因此也是可信的。

对苏联顾问鲍罗廷、乌斯马诺夫等，冯玉祥也是“礼送”回国的。

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下令驱逐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并密令冯玉祥在鲍经过郑州时将他杀掉。七月廿八日，鲍罗廷一行路过郑州，冯玉祥竟违背汪的密令，对鲍等以礼相对，并且挽留数日。三十日，鲍罗廷等乘火车启程回国前，冯玉祥率高级军官到车站欢送，并送给鲍罗廷大红绉纱一疋作为礼物。随后，派高级军官两名沿途护送。鲍罗廷一行乘火车西行至陇海路终点，改乘汽车经陕西、甘肃，直到库伦，平安回国。与鲍同车回国的，还有苏联驻国民军的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当时，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也与鲍罗廷同去，冯玉祥也假装不识，未曾相害。

对此事，冯玉祥也有记载，他写道：

我从徐州回到河南，武汉方面的清党运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作法，想杀弥衡，自己却不

下手，把弥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等鲍罗廷到了郑州，我特去接他，留住数日，几天谈话数次，而后派了张允荣和李连山二位，具办了一点礼品，直把他由潼关经兰州而送至库伦，使他平平安安地回返苏俄。昨天同在一个桌子会议，今日无缘无故翻脸相害，这等事我是万万做不到的。对于邓演达的情况，冯玉祥写道：

和鲍罗廷同车到郑州的，还有邓演达先生，想必也是听见什么谣言，对我怀了疑忌之心，竟扮作鲍罗廷的汽车夫，以为我们就不认识。我觉得这也是不认识我的地方，大可不必如此。我何至听从汪精卫的话，来加害于他们。

冯玉祥还记载了他送乌斯马诺夫回国时的谈话，他对乌说：

苏联是我们最忠实的好朋友，这回我返国参加革命，帮助我许多枪械，派来帮助我们革命的朋友至诚至恳的努力，牺牲性命的也有，我等岂有不感激之理？^{〔235〕}

由以上可见，冯玉祥当时虽与蒋、汪合流反共，不赞成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但他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给予他的巨大帮助，使溃不成军的国民军，在他回国以后，能够重振旗鼓，进军西北，胜利东征，是不能不铭心感激的。这是党和李大钊对冯玉祥工作的积极成果，也是冯玉祥以后又能够长期同共产党合作，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政策的历史原因和思想基础。

最后，冯玉祥终于总结教训，迷途知返，走向新民主主义中国。这说明，冯玉祥走过的曲折道路是他一生中暂时的失误。

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后，并没有得到他预期的结果。蒋介石出于

他排斥异己的要求，不仅将在徐州会议上答应给冯军二百五十万元的军饷和山东地盘一概食言，而且在军队编遣、管辖地区等各方面蓄意压冯。经过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被蒋介石消灭殆尽，最后不得不只身到泰山读书闲居，寻求革命真谛。

经过一系列的挫折，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反共反人民的本质逐步有了认识，对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政策也开始有了新的领悟，于是重新与共产党人接近，党也不断派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帮助，冯玉祥与共产党开始了新的合作。一九三二年，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英勇地开展了对日伪军的抗击。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与共产党亲密合作，支持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政策，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营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反对蒋介石投降，大骂汪精卫卖国。抗战胜利后，他进一步与共产党合作，反对美帝国主义援蒋内战。他在美国期间，在纽约成立了民主统一战线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组织爱国华侨，掀起了反美援蒋的斗争。当他听到中国共产党号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准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后，便毅然决定回国。可惜，他在回国途中不幸遇难，遽尔长逝，这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来说，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综上所述，冯玉祥将军虽然有过一段曲折道路，但他的一生，仍不失为光荣伟大的一生，他仍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良朋挚友。党与大钊同志在大革命时期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卓越工作基础，也不能不具有不可磨灭的光辉；大钊同志和冯玉祥将军在大革命时期结成的深厚友谊，称得起是国共合作的光辉典范。

结 束 语

在我写完《李大钊与冯玉祥》之后，仍觉得言犹未尽。

一方面，本书虽然力求忠实详尽地反映大钊同志对国民军工作的业绩，以及他与冯玉祥将军的革命友谊；但是，由于政治水平所限，又缺少驾驭文字的能力，因而力不从心，在许多方面、许多问题上存在缺陷，有待于继续研究、丰富、提高和补正。

另一方面，总觉得对于现在，还应当说几句话。历史是现代的借鉴。大钊同志英勇就义已经六十年，冯玉祥将军也千古于人世四十九个年头了。但是，他们建树的伟大业绩却彪炳青史，永垂不朽；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也是永恒的，世代传颂；他们树立起的榜样和开辟的道路，会不断给我们以新的启迪，我们应当从中受到深刻的教益。

统一战线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夺取全国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法宝。大钊同志在北伐战争时期，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他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成就，以及他与冯玉祥将军之间建立的友谊，堪为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些，在今天仍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

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是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伟大战略任务，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国两

制”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他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他还说：“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两党举行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邓小平同志的设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为国家的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和不计前嫌与国民党诚恳团结合作的宏大胸怀。从李大钊同志与冯玉祥将军的合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人与一切爱国民主党派和人士这种“肝胆相照”的共事精神的一贯性。一切有志于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之士，台湾一切有识之士，应当学习冯玉祥与李大钊合作的榜样，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而奋斗。

在这方面，冯玉祥将军的一生的政治道路，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实践证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任何有志之士，忧国忧民之人，如果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须把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轨道，这样，才会有光明的前程和光辉的业绩；否则，必然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历史的结论。冯玉祥的一生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在北伐战争中，接受大钊同志的帮助，与共产党合作，从垂败中重振旗鼓，发展壮大，走向胜利；而当他走上弯路，联蒋反共，结果落得半生奋斗的成果丧失殆尽，几乎成了孤家寡人。然而冯玉祥将军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善于从历史失败中吸取教训，迷途知返，胸怀献身于国家民族的坚强信念，跟着时代的脚步前进，重新走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的信任、尊重和赞扬。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今天，要做一个为国为民而又有光明前途

的有志之士，就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冯玉祥将军的一生是一切爱国人士的榜样。

创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大钊同志在对国民军工作中光辉业绩之一。那时的政治工作，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为指导，规定了革命军队的宗旨和战略目标，以爱国民主思想为主要内容宣传部队，教育部队，对保证国民军的革命化，鼓舞官兵斗志，增强战斗力，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由我们党在北伐战争时期创建起来的政治工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完善、成熟、创新过程，早已成为我军的生命线。在“十年内乱”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遭到极大的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创新，政治工作又继续发挥它的巨大威力。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工作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大大加强。当前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236]我们必须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继承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改革，不断发展，使我军政治工作，在实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继续充分发挥它的生命线作用和保证作用。

大钊同志在对国民军的工作中，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由共产党人主持的“第二黄埔”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国民一军“西北军政干校”，由王若飞创办的国民二军“北方联合军校”，由魏野畴创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和“中

山学院”，曾经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军政兼优的人才，成为国民军的骨干，对加强国民军军政建设，提高国民军的军政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搞好军队现代化建设，关键仍然是人才问题。近几年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军队干部队伍向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但仍然不适应部队建设的需要。我们必须切实把训练教育提到战略地位，办好院校，认真研究和总结历史的经验，不断进行改革，加强严格的、正规的、系统的军政训练，提高军队干部的军政素质和现代化战争条件下指挥和作战的能力。

当然，从大钊同志的业绩中，我们应当学习和汲取的有益教诲，还远不止我上述的几个侧面。但是，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赘述，只能有待于今后与读者共同去深入挖掘、研究和领悟了。

附录：

《李大钊和冯玉祥》大事记

一九二二年

- 1月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
- 夏 为了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李大钊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
- 6月15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必须用革命手段取消列强在华各种特权，肃清封建军阀。主张：建立民主联合阵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 7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
- 10月10日 北京党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利用庆祝辛亥革命十周年纪念日，组织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散发《敬告国人》和《敬告劳动者书》。
- 10月 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率部由河南北上进驻南苑。李大钊去南苑会见冯玉祥，并进行会谈。李大钊向冯玉祥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情况，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

鼓励冯玉祥转向革命。会谈后，冯玉祥说：“教授一夕谈，胜读十年书。”

一九二三年

春 李大钊派魏野畴去陕西榆林地区开展建党和统一战线等工作。魏野畴与靖国军杨虎城将军（后来改属国民军）结识，并帮助杨训练和教育部队。

一九二四年

- 1月 李大钊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 2月底 李大钊由广州回到北京。
- 4月20日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李大钊任组织部长。后来，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成立，李大钊为领导人。
- 6月 李大钊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苏联参观访问。初冬，李大钊回到北京。
- 9月 冯玉祥与孙岳、胡景翼进行秘密会谈，结成反直联盟，酝酿北京政变。
- 9月4日 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与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开战。
- 9月10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对时局宣言》，号召以革命手段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
- 9月18日 奉军进攻山海关，曹锟下讨伐令，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讨伐司令，强委冯玉祥为第三军司令攻热河。胡景翼任援军第二路司令。冯玉祥推荐孙岳为北

京警备副司令。

- 9月21日** 冯玉祥在筹划和安排好发动政变的准备工作后，率部从北京开拔。
- 9月24日** 冯玉祥抵达古北口。段祺瑞和张作霖的代表会见冯玉祥，商谈合作倒直。
- 10月19日** 冯玉祥在滦平召开全军将领会议，决定班师回京，举行“首都起义”，并拟改称所属部队为“国民军”。
- 10月21日** 冯玉祥下令班师回京。
- 10月22日** 冯部鹿钟麟、蒋鸿迂于午夜十二时，在孙岳配合下，率部进入北京。
- 10月24日** 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并分别兼任一、二、三军军长。当日发出“首都革命”通电和《建国大纲》。冯玉祥当即电请孙中山北上。
- 10月25日** 国民军全体将领会议，决定推倒曹锟政府，推举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会议在吴佩孚进攻杨村的紧急形势下，提议和通过请段祺瑞出山主政。曹锟下停战令，免去吴佩孚职务，调充“青海屯垦使”。
- 10月27日** 孙中山复电冯玉祥同意即行北上。
- 10月28日** 冯玉祥通电提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
- 11月1日** 曹锟宣布辞职。
- 11月2日** 黄郛摄政内阁成立。
- 11月4日** 在冯玉祥推动下，摄政内阁国务会议通过修改清室优

待条件，决定驱逐溥仪出宫。

- 11月5日 鹿钟麟、张壁、李石曾等携内阁决定，驱逐溥仪出宫。
- 11月7日 冯玉祥请马伯援持亲笔信去广州迎接孙中山北上。
- 11月10日 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旋即启程北上。
- 11月上旬 李大钊和胡景翼在北京会晤。胡要求苏联援助武器。
- 11月11日 段祺瑞召开天津会议，冯玉祥应邀到会。会议公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 11月19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 11月25日 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告下野，并致电段祺瑞，请求辞职。冯玉祥将军权交于张之江、李鸣钟后，于下午避居京郊天台山。同时，致电张之江、李鸣钟，勉励他们为国效力。
- 12月3日 冯玉祥连续两次电请段祺瑞准予辞职。段表示拒绝。
- 5日 不久，即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
- 12月12日 胡景翼率国民二军南下进驻开封，就任河南督军。
- 冬 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李大钊组织和领导下宣告成立。
- 年底 中共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为总负责人。李大钊与胡景翼在开封进行会谈，商讨请求苏联援助和派遣顾问专家等问题。

一九二五年

- 1月 孙中山到达北京，准备在北京主持国民会议预备会议，

因病卧床，未能实现。

李大钊劝说冯玉祥接受西北边防督办任职，经多次交谈，冯表示同意。

- 2月初 冯玉祥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
- 2月底 冯玉祥派秘书毛以亨去京邀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至张家口会谈，达成请求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协议。
- 3月1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李大钊出席大会，被推举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
- 3月12日 孙中山在京逝世。李大钊领导了对中山先生的追悼活动。
- 3月21日 苏联政府通过援助冯玉祥决议案，并决定向国民军派出顾问团。
- 4月10日 胡景翼在河南开封病逝。岳维峻接任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军。
- 4月 岳维峻上任后，与吴佩孚秘密勾结。为挽救中原危机，李大钊由国民党左派人士于右任陪同，至开封与岳维峻举行会谈，劝他执行胡景翼遗志，继续奉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岳阳奉阴违，最后导致失败。
驻广东革命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到张家口同冯玉祥会谈，进一步达成苏联援冯方案。
- 5月10日 李大钊赴张家口与冯玉祥会谈，达成在国民军建立革命政治工作的协议。
- 5月 苏联派以任江为首的顾问团三十人到达张家口，冯玉祥设宴欢迎。

- 5月30日 “五卅”运动爆发。
- 5月底— 北京学生组成“沪案雪耻会”，工人组成“工人
6月初 雪耻会”，各界组成“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会”。
- 冯玉祥下令国民军官兵悼念“五卅”惨案死难同胞，声援“五卅”运动。
- 6月3日 北京各界示威游行，参加者五万人。
- 6月10日 在天安门举行“北京国民大会”。会后示威游行，参加者二十万人。
- 6月21日 以西拉尼为组长的苏联顾问团三十多人，到达国民二军。
- 6月25日 北京各界示威游行，参加者三十万人。
- 6月30日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在天安门举行，朝鲜、印度、土耳其等国代表参加。
- 6月 李大钊派王若飞到国民二军，帮助开办北方联合军校。
- 7月8日 冯玉祥通电世界基督教徒援助“五卅”运动，反响沉寂，冯愤而抛弃基督信仰。
- 7月 魏野畴领导陕西全省驱逐直系军阀吴新田运动，呼吁杨虎城部参加斗争，吴新田放弃西安西逃。
- 杨虎城聘请魏野畴创办“三民军官学校”。
- 王若飞退出国民二军，就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
- 夏秋之间 李大钊派共产党员宣侠父、陶梁、蒋廷宋、胡英初等到国民军开展政治工作。
- 西北军干部学校成立，接收“五卅”运动后从北京来

- 投国民军的大中学生七百余名，进行严格的军政训练。
- 8月 李大钊派任国楨等去东北，策动郭松龄倒戈反奉。
- 9月 冯玉祥派出国民一军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联谈判援冯武器弹药的运送等问题。
- 10月 冯玉祥派参谋长熊斌率一批团级军官和优秀连排长赴苏学习。
- 10月7日 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发表《告工农学生军人书》，发动关税自立运动。
- 10月15日 反奉战争爆发。
- 10月20日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表《对反奉战争宣言》。
- 11月10日 李大钊领导和组织成立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
- 11月中旬 国民二军进攻山东奉军，后遭失败。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逃往山西，被晋军俘获。
- 11月20日 在李大钊的促进下，郭松龄与冯玉祥达成联合反奉密约。
- 11月22日 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倒戈反奉，并将所部改编为东北国民军。
- 11月下旬 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在22日、28日、29日，组织领导北京各界召开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关税自主国民大会，并游行示威。
- 11月25日 冯玉祥致电张作霖，促其下野。
- 11月27日 郭松龄率部挺进东北，占领山海关。
- 12月1日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表《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

- 12月初** 李景林背信弃义，决定助奉、制郭、攻冯。
- 12月8日** 冯玉祥通电讨伐李景林。
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本政府决定扶张、抑郭。
郭松龄致电各国公使和日本大使，申明郭军立场，不承认日张密约。
日本关东军对郭军发出警告。
- 12月13日** 日本政府决定增兵满洲。
日本关东军阻止郭军进军营口。
李大钊在国民大学发表反日讲演。
- 12月14日** 北京各团体在天安门召开反日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
- 12月18日** 上海总工会、各团体联合会等发布通电和宣言，抗议日本干涉东北，声讨张作霖卖国行为。
- 12月20日**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
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下，十二月下旬，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厦门、长沙、杭州等地，举行反日讨张示威游行。
- 12月22日** 郭松龄部在巨流河一线与奉军展开决战。
- 12月24日** 郭松龄兵败被俘，旋即被害。
国民军占领天津。李景林逃入英租界，后逃山东，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
- 12月27日** “北京国民反日进兵南满大会”举行郭松龄追悼大会，李大钊发表悼念讲演。

一九二六年

- 1月1日 冯玉祥发现奉直联合反冯的迹象，为避免引起战争，通电下野。
- 1月3日 郭松龄部魏益三，通电继承郭未竟遗志，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继续反奉。
- 1月5日 在英、日帝国主义唆使与撮合下，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组成“讨赤联军”，向国民军发动进攻。
- 1月6日 经李大钊疏通，苏联大使加拉罕与国民军外事处长谈判有关冯玉祥出访苏联事宜。
- 1月9日 段祺瑞发布任免命令，派冯玉祥出国考察，免去冯本兼各职。
- 2月27日 北京一百三十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英讨吴国民大会，通电国民军全体官兵，希望反奉反直到底。
- 3月12日 日舰制造大沽口事件，国民军守军英勇还击。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鹿钟麟向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提出抗议。国民军大沽口守军官兵发表文告，公布事实真象。
- 3月14日 北京三十万群众举行反日国民大会，强烈抗议日舰袭击大沽口。
- 3月16日 英、日、美等八国公使团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 3月17日 北京各团体举行紧急会议，要求政府驳回八国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并赴段祺瑞政府请愿。
- 3月18日 北京各界十万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

国民大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之一，在会上发表演说。会后，李大钊带领群众游行示威，至国务院请愿。段祺瑞政府对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李大钊头部和双手负伤。

当晚，李大钊召开北京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决定坚持斗争到底，慰问伤者，追悼牺牲烈士。

3月2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号召全国各界人民要“不惜以重大牺牲，援助国民军”。

冯玉祥偕夫人李德全及随员一行启程访苏。

3月22日 冯玉祥抵达蒙古库伦。在库伦参观游览，与蒙古党政军领导人进行晤谈，并由徐谦介绍正式加入国民党。

3月23日 北京总工会、北京学联等团体，在北京大学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3月24日 在“讨赤联军”进攻下，国民军撤出天津。

4月 吴佩孚命令直系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进攻陕西，包围西安。国民军守军杨虎城、李虎臣等部展开了西安保卫战。

4月9日 国民军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下令解散执政府卫队，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逃跑，执政府瓦解。

4月10日 鹿钟麟通电全国，声讨段祺瑞的滔天罪行，怒斥段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

4月15日 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守南口一线。奉直军阀进入北

京。

- 4月27日 冯玉祥一行由库伦启程赴苏。
- 4月30日 冯玉祥抵达苏联苏布利亚特共和国首都上乌金斯克，在该市参加“五一”节阅兵观礼，并参观游览市内建设。
- 5月9日 冯玉祥抵达莫斯科。
- 5月11日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中国学生，在中山大学举行欢迎冯玉祥大会，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狄克致欢迎词。
- 5月—8月 冯玉祥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会见冯玉祥。斯大林因病在黑海疗养未能会晤冯玉祥。他致信冯玉祥，并决策给冯军援助四十万人的军事装备。蔡和森、刘伯坚等中国共产党人会见冯玉祥，对冯进行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 3月15日 经过四个月的激烈战斗，国民军总部下令实行总退却，南口战役宣告失败。
- 8月 南口战役失败前后，李大钊三次致电冯玉祥，并委托于右任去苏联，敦请冯玉祥及早回国收拾残局。李大钊还为冯玉祥制定“进军西北，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
- 8月17日 冯玉祥由刘伯坚等陪同由苏联启程回国。
- 8月25日 陈毅受李大钊派遣赴四川万县杨森部队做军运工作。

- 在杨森部队与中共中央派往杨森部队工作的朱德会合。
- 9月3日 冯玉祥一行抵达库伦。由刘伯坚主持，在库伦进行开会仪式演习，并草拟各种文告。
- 9月8日 刘伯坚向中共中央发出《刘伯坚自库伦的报告》。
- 9月16日 冯玉祥返回国民军驻地绥远省五原县。
- 9月16日 冯玉祥发布《五原誓师宣言》。
- 9月17日 国民军五原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举行易旗仪式、阅兵典礼和示威游行。李大钊任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部长，刘伯坚为副部长。因李大钊在北京未到职，由刘伯坚代理。
- 9月 李大钊致函冯玉祥，提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行动方针。
- 国民军联军总部颁布《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
- 10月25日 冯玉祥组成七路“援陕军”，西进援陕。
- 11月初 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
- 11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
- 11月 中共中央在《中央局报告》中提出联合阎锡山与四省联合抗奉的方针。
- 11月27日 冯玉祥的“援陕军”进入西安。被包围达八个月之久的西安，从此解围。
- 12月5日 李大钊致中共中央信，提出“联络阎锡山”，分化“讨赤联盟”的三项策略。

一九二七年

- 1月 国民军联军在魏野畴等共产党人帮助下，成立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军政府——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以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魏野畴为政治部副部长，兼政治保卫师师长。
- 1月28日 冯玉祥进入西安，宣布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为国民军辖区的最高政权机关。
- 1—3月 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先后颁布《国民军管辖区域军政时期行政大纲》、《军政长官应遵守者十条》、《告诫高级军官十条》，统一西北地区行政管理，加强西北军政建设。
- 3月 中共陕甘区委开办中山学院，培训军政干部。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任副院长。
- 3月31日 在共产党人的主持下，“第二黄埔”——中山军事学校正式开学。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
- 春 李大钊密函冯玉祥，敦促冯玉祥“出长安，会师郑州”。
- 4月6日 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命冯玉祥为总司令。
张作霖出动大批宪兵、警察、特务，袭击苏联大使馆及其附设机构，李大钊被捕。
- 4月28日 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刽子手张作霖杀害。大钊同志大义凛然，英勇就义。

- 5月1日 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在西安誓师东征。
- 5月5日 冯玉祥下达东进总动员令。
- 5月6日 冯玉祥在潼关召开追悼李大钊大会。命令国民军全体官兵人人戴孝志哀，发出追悼电文，并沉痛赋诗，刻碑铭志。
- 5月26日 国民军攻占洛阳。
- 5月30日 国民军占领郑州。翌日，北伐军也进入郑州。
- 6月1日 国民军占领开封。同日，北伐军赶至。
- 至此，大钊同志为冯玉祥及国民军制定的兵出长安，会师郑州的战略任务，遂告实现。

注释:

- (1) 转引自邓力群:《在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和主要内容的介绍报告》(1981年7月7—8日)
- (2)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第二版
- (3) 李大钊,《狱中日记》,载《李大钊文集》第890页
- (4) 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载《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下)第12—15页
-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李大钊烈士碑文》(1983年9月)
- (6)、(184)李运昌,《大钊同志送我上军校》,《河北革命回忆录》第二辑。
-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李大钊烈士碑文》(1983年9月)
- (8) 薄一波,《在华北五省市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1982年7月5日)
- (9) 王占连,《李大钊与冯玉祥》,《唐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三、四期。
- (10)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68—370页。
- (11) 余华心,《冯玉祥与共产党交往片断》,《红旗飘飘》(1983年10月)第27集。
- (12) 《国民军革命史初稿》第151—153页。
- (13)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98—99页。
- (14) 《国民军革命史初稿》第153页。
- (15)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90页
- (16)、(17) 《国民军革命史初稿》第153—158页
- (18)、(19)、(20)、(21)、(22)、(23)、(24)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93—395; 398; 400; 400—401; 400; 400, 404页。
- (25)、(28)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116—118页。
- (26) 摘引自《大连日报》1985年1月31日。
- (27)、(29)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06—407; 409页

- 〔 30 〕 李泰荃，《国民军史稿》第128页
- 〔 30 〕 《中共中央报告选辑》（1921—1926），（中央党校出版社版）第54页。
- 〔 32 〕 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活动》，《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下）第12—15页。
- 〔 33 〕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6页。
- 〔 34 〕、〔 35 〕、〔 36 〕 《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1926年11月9日）《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一册第151页。
- 〔 37 〕、〔 38 〕、〔 39 〕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06—407；409页。
- 〔 40 〕 《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1926年5月1日）原载《校刊》1926年第六期。
- 〔 41 〕 维·马·普里马科夫，是1925—1926年冯玉祥国民军中苏联军事顾问团领导人之一。他在国民军第一军工作期间，曾以日记形式，对李大钊在国民军的工作，作了生动细致的记载。该日记题为《一个志愿兵的札记》，后来根据苏联国防部军事档案库发现的有关文献资料，进一步证明了《札记》的真实性及其史料价值。以上引自《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
- 〔 42 〕 《李大钊文集》（下）第796页。
- 〔 43 〕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22页。
- 〔 44 〕、〔 45 〕、〔 46 〕 《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上）第220—224页。
- 〔 47 〕、〔 48 〕、〔 49 〕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16页。
- 〔 50 〕 陈天秩：《共产党对冯玉祥将军的影响》，《河北文史资料选集》第十二期。
- 〔 51 〕、〔 57 〕 陈天秩：《我跟随冯玉祥先生的一些经见》，内蒙古《史料荟要》第二期。
- 〔 52 〕、〔 53 〕、〔 54 〕、〔 55 〕、〔 56 〕 《冯玉祥日记》卷五（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一日）至卷六（民国十四年二月四日、二月十七日—三月九日、二月二十六日）。
- 〔 58 〕、〔 59 〕、〔 60 〕 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第7—8；47页。
- 〔 61 〕 宣侠父（1899—1938），浙江省诸暨县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五年始，先后在国民军、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在国民军工作期间，开展了国民军政治工作，并在西北地区和西北军中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他随革命军远征甘肃时，以国民党左派身份，整顿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建立了中共甘肃省地下组织，组织了“少年同志会”、“甘南藏民文化促进会”等。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后，派往西安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成为周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被蒋介石、胡宗南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迁害牺牲，年仅三十九岁。宣侠父同志是我党进行兵运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先驱者之一。

- 〔 62 〕 金铃，《宣侠父烈士传》
- 〔 63 〕 刘贯一，《在我党帮助下的五原誓师经过》（1983年7月）。
- 〔 64 〕 陈天秩，《我跟随冯玉祥先生的一些经历》，内蒙古《史料荟要》第二期。
- 〔 65 〕 《国民军革命史初稿》第274—280页。
- 〔 69 〕 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第4—6页。
- 〔 66 〕、〔 67 〕、〔 68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屈武，《李大钊同志到河南指导党的工作》（陕西纪念胡景翼逝世六十周年大会印，1985年4月）。
- 〔 76 〕 以上引自〔苏〕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第68—70页。
- 〔 77 〕 以上引自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 78 〕、〔 79 〕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军会》，《李大钊选集》第564、568、569页。
- 〔 80 〕、〔 81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174—176页。
- 〔 82 〕 《人民日报》1985年4月15日。
- 〔 83 〕 《胡上将景翼生平事略》，陕西省纪念胡景翼逝世六十周年大会印（1985年4月）。
- 〔 84 〕 张绛，《李大钊在开封》，《史学月刊》1982年第五期。
- 〔 86 〕 马文彦，陕西三原人。一九二六年曾受李大钊派遣作于右任的

翻译,同往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当时在河南参加筹备总工会。解放后,曾任陕西省政协委员,已病故。

- [86] 李岳会谈情况可参看张绛《李大钊在开封》与《屈武、马文彦谈李大钊到河南》。
- [87] 《向导》(1925年8月31日)第127期。
- [88] 《政治生活》第五十六期。
- [89]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对反奉战争宣言》(192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辑》(1921—1925)第440页。
- [90] 《一封公开的信致中国国民党党员》(1925年12月10日)《向导》第138期。
- [91] 李大钊,《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争》(1925年11月18日)《政治生活》第58期。
- [92]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1—1925)。
- [93] 张静如、马模贞:《李大钊》第129页。
- [94]、[95] 廖华:《任国桢同志传略》,转引自任松、武育文,《郭松龄将军》第107页。
- [96]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第50页。
- [97] 《郭松龄将军》第107、108页。
- [98]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34—435页。
- [99] 《冯玉祥日记》卷六。
- [100]、[101] 《国民军史稿》第224页。
- [102] 两电均引自《国民军革命史初稿》
- [103]、[104] 《国民军史稿》第228—231, 238—243页。
- [105] 郭松龄的信引自《国民军革命史初稿》第334—336页。
- [106] 《冯玉祥日记》卷六。
- [107] 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第338页。
- [108] “鬼子”,郭松龄绰号;“六子”,张学良小名。见钱公来《辽海小记》第57页。
- [109] 《盛京日报》1925年12月1日报导。
- [110] 以上参看《天津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 〔11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
- 〔112〕 《国民日报》1925年12月13日报导。
- 〔113〕 《盛京日报》1925年12月10日报导。
- 〔114〕 转引自陈觉，《日本侵略东北史》第283页
- 〔115〕 参看上书第283—284页。
- 〔116〕 通电引自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第388页。
- 〔117〕 详见《申报》1925年12月25日报导。
- 〔118〕 王化一，《张作霖二、三事》
- 〔119〕 参看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编，《打倒奉系军阀》。
- 〔120〕 《国民日报》1925年12月20日报导。
- 〔121〕 《张作霖》第156页。
- 〔122〕 《民国日报》1926年1月1日。
- 〔123〕 《晨报》、《京报》1926年1月24日报导。
- 〔124〕 《晨报》1926年1月15日报导。
- 〔125〕 《京报》1926年1月27日报导。
- 〔126〕 《郭松龄失败之重大意义》，《向导》第140期。
- 〔127〕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41页。
- 〔128〕 《国民军史稿》第253页。
- 〔129〕 华岗，《中国大革命史》，原载上海《字林西报》（1926年2月20日）。
- 〔130〕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192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10页。
- 〔131〕 《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192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10页。
- 〔132〕 李大钊，《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案》，《李大钊选集》第556页。
- 〔133〕 《反英讨吴大会致国民军将领电》，原载《京报》（1926年3月9日）。
- 〔134〕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3月24日。
- 〔135〕 《冯玉祥将军》第71页。
- 〔136〕 《京报》1926年3月18日报导。
- 〔137〕 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李大钊研究论文

集》(下)第15页。

- 〔138〕、〔140〕《陈毅同志对张茜同志的谈话,早年回忆》(1952年),见《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
- 〔139〕《烈士传》第10页,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8月出版,转引自《李大钊传》第203页。
- 〔141〕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 〔142〕夏之栩,《片断的回忆——忆赵世炎》,转引自《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72页。
- 〔143〕《陈毅同志对张茜同志的谈话,早年回忆》(1952年),见《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
- 〔144〕《中共中央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1926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②(1926)
- 〔145〕《国民军革命史初稿》第285—291页。
- 〔146〕刘贯一、孔广耀、陈天秩,《忆党在冯玉祥部队的工作》,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第四辑。
- 〔147〕以上引语见《冯玉祥日记》卷七(民国十五年—十八年)。
- 〔148〕参看《国民军史稿》第301页;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53页。
- 〔149〕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61页。
- 〔150〕、〔151〕参看《真理报》1926年5月11日报导。
- 〔152〕《国民军史稿》第302—304页。
- 〔153〕、〔154〕刘贯一、孔广耀、陈天秩,《忆党在冯玉祥部队的工作》,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第四辑。
- 〔155〕参看《刘伯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辑。
- 〔156〕马二先生:即冯玉祥先生。
- 〔157〕于霁,即于右任。
- 〔158〕国党与国军,指国民党与国民军。
- 〔159〕孙、东两大,指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东方大学。
- 〔160〕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
- 〔161〕、〔162〕、〔163〕、〔164〕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65、463、

—466; 464页。

- 〔165〕 转引自陈天秩,《共产党对冯玉祥将军的影响》,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 〔166〕 以上引自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斯大林会见记》第一章第201页。毛氏在书中说明:“我当时把某君转告者,一齐记下来。这本书都是回忆当时的情形,……斯大林会见的谈话,是当时记在日记上,而现在抄录下来的。”毛氏还声明:“可惜某君以恐妨碍其政治前途,而不肯透露姓名,这是要向读者抱歉的地方”。
- 〔167〕、〔168〕 参看〔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1925—1926)第182页。
- 〔169〕 《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
- 〔170〕、〔171〕《守常政治报告》(1926年9月8日)见《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号(1926年11月15日)。
- 〔172〕 参看马文彦,《李大钊敦促冯玉祥回国策应北伐的经过》,见《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九期第25—29页。
- 〔173〕 以上摘自《冯玉祥日记》卷七(民国十五年)。
- 〔174〕、〔175〕、〔177〕、〔178〕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84、485、489、490—495页。
- 〔176〕 以上引自《响导周报》第176期(1926年10月19日)。
- 〔179〕 转引自简又文,《冯玉祥传》第136页。
- 〔180〕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41、159页。
- 〔181〕 《刘伯坚同志自库伦报告》(1926年9月8日),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
- 〔182〕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1926年11月),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
- 〔183〕 《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1926年11月9日)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
- 〔185〕 《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1926年10月)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
- 〔186〕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载《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

(1922—1926)

- 〔187〕《守常政治报告》(1926年9月8日),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11月15日)
- 〔188〕《中国共产党与国民联军的成立》,《江汉论坛》1983年第七期第10页。
- 〔189〕“玉帅”,是对吴佩孚字“子玉”的尊称;“百帅”,是对阎锡山字“百川”的尊称。
- 〔190〕“雨帅”,是张作霖字“雨亭”的尊称。
- 〔191〕以上参看《阎锡山参加直奉反冯的经过》,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
- 〔192〕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1926年2月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
- 〔193〕《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1926年12月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②。
- 〔194〕以上引自《守常同志来信》(1926年12月5日),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 〔195〕《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拾。
- 〔196〕转引自孔从洲《魏野畴二、三事》,见《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197〕杨明轩,《魏野畴同志与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思潮的启蒙运动》,《群众日报》1951年7月2日。
- 〔198〕《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下)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三月一日初版。
- 〔199〕邓宝珊,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早在我党成立之初,他就与李大钊、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一九二四年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后,邓参加国民军,任国民二军七师师长,拥护国共合作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五原誓师后,任国民军联军援陕副总指挥,为解围西安建树战功。邓宝珊与刘伯坚在国民军联军中互相支持,真诚相待,友情笃厚。刘被迫撤离国民军后,刘的妻、儿一直由邓负责掩护和供养,直到中央派人接走为止。大革命失败后,邓仍在暗中与共产党人合作。在八年抗战中,多次去延

- 安，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共商抗日大事。解放战争时期，推动傅作义接受我党和平建议，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了表彰他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功绩，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
- 〔200〕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10日）。
- 〔201〕、〔202〕、〔203〕转引自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民国十九年十月）。
- 〔204〕 转引自周恩来，《关于筹建杜斌丞图书馆的谈话》（1948年12月于陕西米脂县杨家沟）。
- 〔205〕 转引自艾林亭，《在伟大的洪流中努力锻炼》，见《杜斌丞同志纪念文集》第46—47页。
- 〔206〕 张次溪编著，《李大钊先生传》，香港神州图书公司出版。
- 〔207〕 以上参看，《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卷第124—126页。
- 〔208〕 参看薄一波，《张兆丰、谷雄一两同志就义三十周年祭》（1960年），见《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二）
- 〔209〕 《解放军将领传》第一集第303页。
- 〔210〕 参看《渭华起义史略》，载《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第53页。
- 〔211〕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9—210页。
- 〔212〕 转引自于志恭《关于冯玉祥吊李大钊诗》，载《人物》（1980年）第四辑。
- 〔213〕 《战士周报》第26期。
- 〔214〕 《宣传赤化者死刑》，载《政治生活》第76期。
- 〔215〕 《申报》1927年4月16日。
- 〔216〕 《国闻周报》第四卷第十三期（1927年4月10日）。
- 〔217〕 《现代评论》第五卷第一二三期（1927年4月16日）。
- 〔218〕 《民国日报》1927年5月12日。
- 〔219〕 转引自高兴亚，《冯玉祥将军》第96—97页（北京出版社第一版）。
- 〔22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1日。
- 〔221〕 转引自周树一，《李大钊同志对西北军工作》，《山西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四期。

- 〔 222 〕 周恩来,《寿焱章先生六十大庆》,《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4日报道
- 〔 223 〕 《东北日报》1948年9月10日。
- 〔 224 〕 《人民日报》1949年9月2日。
- 〔 225 〕 转引自冯洪达、余华心,《亲切的勉励——记邓小平同志会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1982)第3、4期合刊。
- 〔 226 〕 乌兰夫,《在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2年9月16日)。
- 〔 227 〕 邓颖超,《在李德全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72年4月27日。
- 〔 228 〕 康克清,《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纪念李德全同志逝世十周年》,《人民日报》1982年9月20日。
- 〔 229 〕、〔 230 〕冯洪达、余华心,《亲切的勉励——记邓小平同志会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文史资料》(1982年)第三、四期合刊。
- 〔 231 〕、〔 232 〕参看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党史研究资料》(1981)第十期。
- 〔 233 〕 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党史研究资料》(1981)第10期。
- 〔 234 〕 刘贯一、孔广耀、陈天秩,《忆党在冯玉祥部队的工作》,《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一九八五)第四辑。
- 〔 235 〕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63页。
- 〔 236 〕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114页。

后 记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蒙李葆华、张静如、马模贞、刘贯一、冯理达、胡景通、郭鸿志等同志审读了初稿的提纲，提出了宝贵意见，供给了珍藏史料，特表示谢忱。